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寻我记·魔圈

莫狄阿诺 著 李玉民等译 漓江出版社

Patrick Modiano:

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F · 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第四批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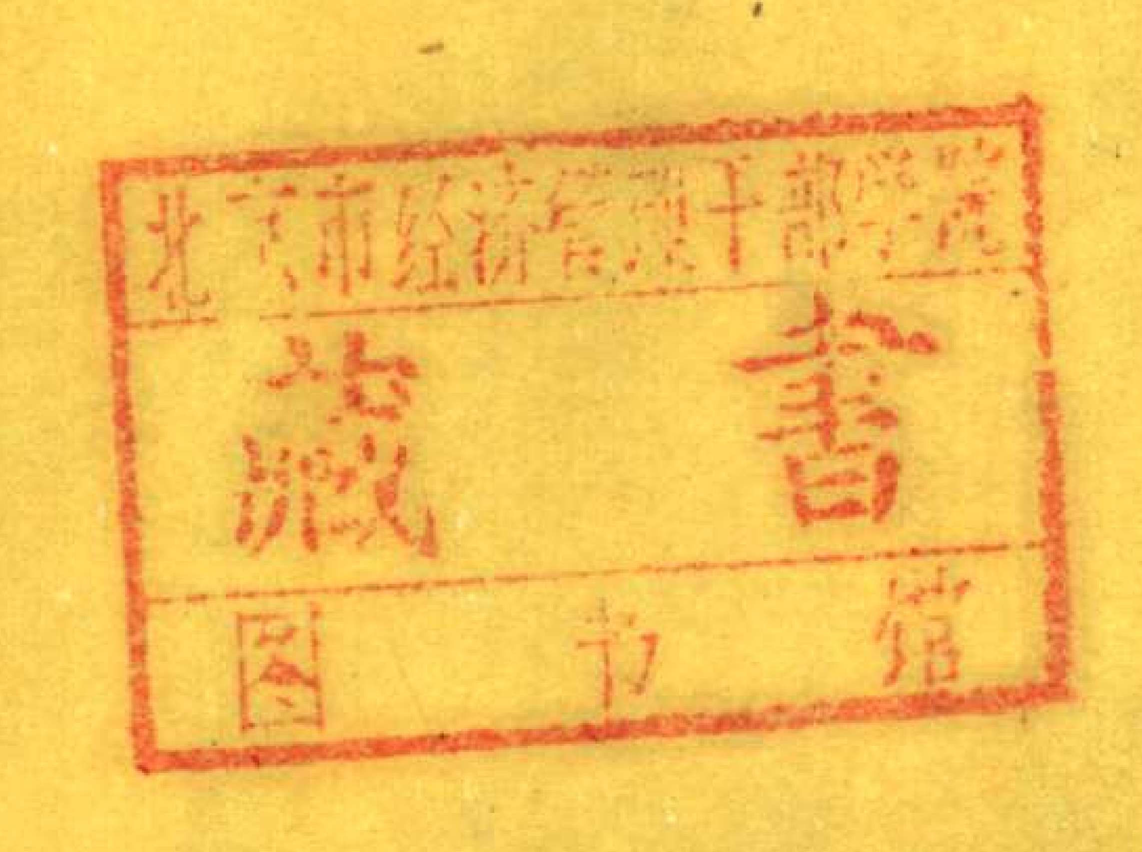
埃　梅	变貌记
波伏瓦	名士风流
萨洛特	天象馆
阿拉贡	圣周风雨录
布　托	曾几何时
格勒尼埃	未婚妻
莫狄阿诺	寻我记·魔圈

ISBN 7-5407-0778-0/I·547
定价：5.65元

F·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寻我记·魔圈

莫狄阿诺　著　李玉民等译

滴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寻我记·魔圈

李玉民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经济干校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4.625插页 2 字数267000

1992年 3 月第 1 版　　1992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407—0778—0/I·547

定价：5.65元

• 译本序 •

莫狄阿诺的魅力

• 柳鸣九 •

迦利玛出版社的福利奥袖珍本丛书开本甚小，排印得也很疏朗，每一行大约有十来个字，而莫狄阿诺收入这个丛书的几部小说，仅占一二行的文句居绝大多数，占三四行的文句已不多见，三四行以上的则极为稀罕了。这与法国20世纪文学中的“长句作家”的语言恰成鲜明的对照，那些“长句作家”，较远的有普鲁斯特，较近的有布托，往往一个文句就占一两页、两三页，而且还是“七星丛书”本排印得密密麻麻的一两页、两三页，或者是大开本的两三页，从句套从句，九曲十八湾。这种语言景象在莫狄阿诺的笔下是绝对没有的，他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从句，而经常用状语、补语与分词句，这就

使他的文句简练到了几乎是最大的限度。

过份简练，就得防止平淡、单调与贫乏。莫狄阿诺可没有流于这种危险。他的语言很有涵量，很有弹性，很有表现力，很是传神。

请看：

这是描写一个乐队极其糟糕的演奏："乐队正在折磨着一首克里奥尔的华尔兹"。好一个传神的动词"折磨"（Torturait）①！

这是写战争时期萧条的巴黎："街上空空荡荡，是没有巴黎的巴黎"，Paris absent这一个只带有一个形容词的名词，意味何其丰富②！

这是写疲劳时的感觉："疲劳就像是一只老鼠，把我周围的一切都啃得模模糊糊"③，原文只用了十多个字就把一种难以言状的感受，传达得如此生动！

这是写对城市的感情："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而脂粉满面的情妇"④。这三个简单的比喻，包含了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多么复杂的经历与感情！

这样的语言，既闪现着一种诗的才华，也体现出一种锤炼的功力。你读莫狄阿诺的时候，首先能

---

① 《夜巡》第20页，Gallimard版folio丛书本。

② 《夜巡》第112页。

③ 原文比引文更简练得多："Ma fatigue rongeait, comme un rat, tout ce qui m'entourait."《夜巡》第119页。

④ 原文为："Je l'aimais, cette ville, mon terroir, mon enfer, ma vieille maitresse trop fardée."《夜巡》第154页。

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凝炼的语言美！就是这种语言的魅力。

莫狄阿诺的小说还具有一种情趣的魅力，使你一拿起来就放不下。如果考究其因，那么，你也许会觉得是其中某种近似侦探小说的成份在起作用，至少在他最初几部使他名声大噪的重要小说里是如此。在《夜巡》里，一个青年人充当了双重间谍，同时为法国的盖世太保与地下抵抗组织效力，危险的差事使他的生活与精神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而读者也提心吊胆地看着他将有什么样的遭遇、他最终将如何解脱。在《魔圈》中，一个青年人打进一个形迹可疑、犯罪气息很浓的圈子，想要与陷入这个集团的父亲相认并了解他的过去，随着他的追踪，读者也一直想搞清楚这对父子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生活的隐衷。在《寻我记》中，主人公在一次劫难中丧失了全部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一些年后，他当上了一个私人侦探，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寻蛛丝马迹以求搞清楚自己已完全被遗忘了的前半生的真相，于是，读者也就被引入他艰难曲折的调查，关心着这个阿里阿德涅线团的每一个头绪。此外，在《户口簿》里，又有一个人的生平经历有待查清，在《星形广场》与《凄凉别墅》里，也有扣人心弦的逃亡与躲避。总之，莫狄阿诺小说里，老有某桩不平常的事件、某种紧张气氛与压力，老有一个与所有这一切有关的悬念在等着你，使你急于知道它的究

竟与结果。

他的悬念显然与柯南道尔、克里斯蒂、西默农这些侦探小说大师的悬念不同，在侦探小说家那里，悬念是很具体的，只关系到一个具体事件与具体人物的某个行为真相，而莫狄阿诺的悬念却是巨大的，笼统的，往往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的悬念(《星形广场》、《夜巡》)，或者是关于一个人的实在本质的悬念(《魔圈》)，要不就是关于一个人整整一段生活的悬念、全部生活经历的悬念(《寻我记》、《户口簿》)。在侦探小说家那里，导致悬念解决的，是一个个高度戏剧化、高度偶合的具体情节与行动，而在莫狄阿诺这里，导向悬念最后结果的，则总是一个个平常的细节、淡化的场景，绝不会有枪声、血迹、绳索、毒药瓶，倒是在这些平淡的场景细节中，充满了当事人自己即自我叙述者本人充满了感情色彩的思绪，甚至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这样，在他的小说里，就有了评论家所指出的那种“紧扣人心弦的音乐般的基调”，而到最后，与所有侦探小说中悬念都有具体答案的结局完全相反，莫狄阿诺小说的悬念答案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夜巡》中那个处于危急与困顿的双重间谍将如何结束他这种尴尬难堪的存在状态？《魔圈》中叙述者“我”所深情追踪的父亲仍是一个谜，《寻我记》中的“我”总算挖出了一段被埋葬的生活经历，然而对自己前半生绝大部分的回忆仍然是一片空白。莫狄阿诺小说的结局有一种强烈的揪心的效果，与读完侦探小说

时的那种释然的感觉截然不同，而且，它还留下了好些耐人寻思的余韵。于是，你会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莫狄阿诺的作品与侦探小说实有天壤之别，而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大有深意，如果说，莫狄阿诺有使你要一口气把作品读完的魅力的话，那末，他更具有使你在掩卷之后又情不自禁要加以深思的魅力，一种寓意的魅力。这对莫狄阿诺来说，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东西，显然也是他致力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

莫狄阿诺迄今发表了近十部小说，奠定了他在法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正是他最初的两组作品：《星形广场》、《夜巡》、《魔圈》与《凄凉别墅》、《户口簿》、《寻我记》。如果对这些作品进行综合观察的话，那就不难发现它们往往具有相似的成份、相似的格局、相似的矛盾，而从这些相似中，又闪现着相近的寓意的光辉，它构成了莫狄阿诺在当代法国文学中鲜明的标志与独特的魅力。

从作品的历史背景来说，这些小说的故事几乎都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时期。在《寻我记》中，虽然主人公是在战后寻找自己的过去，但他所找到的那一段过去，那一段悲惨的、使他丧失了全部记忆的生活，正是发生在第二次大战初期阶段。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奇怪：莫狄阿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他毫无第二次大战时期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他偏偏一

而再、再而三选了这个时期的生活作为他小说的内容？显然，他没有任何直接的感受与第一手素材能写出像《海的沉默》、《禁止的游戏》那样真切反映了大战时期生活的作品。他也无意于这样做。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很少对这个时期带历史标志的场景现象进行描写，只有《星形广场》有点例外，在它作为题词的小故事里，的确标明了“1942年6月”，还有“一个德国军官”也闪现了一下，小说的最后也有主人公在星形广场被处决的描写，这些总算带有明确的历史标记。在《夜巡》中，这种明确的历史标志有了淡化，除字里行间出现过“希特勒”这个名字外，几乎别无其他，在这里，身份明确的法国盖世太保也只是像一些模糊的阴影。到了《魔圈》与《寻我记》中，这种历史真实的淡化就更加明显，在《魔圈》中，只有一个反动文人关于检举出卖犹太人的只言片语与几个把“父亲”抓走的“穿风衣的人”，这几个人比影子还模糊不清；而在《寻我记》中，只有从主人公胆战心惊、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与他一心要逃到中立国去的愿望，我们才能断定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代。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莫狄阿诺绝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摄取历史生活场景的意图，他只满足于借用这个时期的名称与这个时期所意味的那种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直到战后很久还像恶梦一样压在法兰西民族的记忆里。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背景，在莫狄阿诺小说里，所具有的意义就只是象征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了，而

象征，正是最能包含寓意的形式与框架。

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来说，莫狄阿诺几部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犹太人(《星形广场》、《环城大道》)、无国籍者(《寻我记》)与飘零的流浪者(《夜巡》)，他们无一不承受着现实的巨大压力，莫狄阿诺从德国占领时期那里支取来的象征性的压力，就是压在他们的身上。《星形广场》中犹太人主人公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茨，在法西斯反犹太主义的阴影下，惶惶然从法国躲避到以色列，最后在幻觉中被处决在巴黎的凯旋门前；《魔圈》中的犹太人"父亲"，一直过着暗无天日、东躲西藏的生活，甚至不敢与自己的儿子相认，最后仍然落进了魔掌；《夜巡》中的青年主人公陷于法国特务的魔窟，在周围阴森恐怖的气氛下，他艰难的双重生涯使他的精神处于时时都有崩溃危险的边缘；《寻我记》中的彼德罗·麦克沃伊也无时不感到环境中危机四伏，夜晚，他经常灭了灯，躲在窗帘后面察看街上警察的动静。

在全面了解了莫狄阿诺笔下人物的存在状态之后，我们就逐渐接近莫狄阿诺的寓意。面对着黑沉沉的、看不见的压力与周围那种令人不安的气氛，面对着自己的存在难以摆脱魔影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些人物无不感到自己缺少存在支撑点、存在栖息地的恐慌，无不具有一种寻求解脱、寻求慰藉、找寻支撑点与栖息处的迫切要求，无一不具有一种向往"母体"的精神倾向，似乎是尚未满月的婴儿忍

受不了这个炎凉的世界，仍然依恋着自己的胞衣。引人注意的是，母亲、父亲、祖国以及象征着母体祖国的护照与身份证，成为了人物向往的方向、追求的目标，成为了他们想要找到的支撑点，但他们的这种向往与追求无一不遭到悲惨的失败。《星形广场》中的犹太青年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茨怀着扎根的意图，到处寻找自己的栖息地，最后是以恶梦收场；《夜巡》中的“德·朗巴勒公主”在严酷可怕的环境下，唯一使他感到慰藉的就是远在洛桑的妈妈，然而，要摆脱他所处的险境到那里去，却比登天还难，他最后只能以自己的生命去触犯死亡，走上了殉道者自我毁灭的绝路才结束他两难的存在状态；《魔圈》中的“我”，怀着深情，不畏艰难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但父亲却是一个无“根”的人，他只拥有伪造的“身份证”，他没有祖国，他还企望从儿子的一份中学毕业文凭中得到他的根基的确认，就像一个将溺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寻我记》中，不仅彼德罗是一个没有合法护照、没有正当身份的“黑人”，而且，弗雷迪、盖伊、维尔德梅尔也都是持假护照者，在法国没有正当身份，他们只能躲在边境上，伺机逃到中立国去，而这种冒险带来的却又是更大的不幸。莫狄阿诺小说中这样一个个故事，都集中地揭示了人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支撑点、自己的根基的状态，表现了人在现实中得不到确认的悲剧，或者说，现实不承认人的存在的悲剧。

不仅仅是得不到现实的确认，而且更惨的是得不到自己的确认。莫狄阿诺继续深化自己的主题，在表现人物寻求支撑点、栖息所的同时，又表现了人寻找自我的悲剧，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又一个深刻的寓意，也许是20世纪文学中最耐人寻思的寓意之一。

在《夜巡》的结尾，那个双重间谍这样说："我允许我的传记作者简单地把我称为'人'，并希望他有足够的勇气写出我的传记。"这句话明确地标出了小说故事与人物的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个双重间谍身陷于两个对立营垒的夹缝之中，疲于应付两方面的压力，这种难堪的状态使他完全失去了自我，他甚至没有自己的真实姓名，对于法西斯组织来说，他名叫斯温·特鲁巴杜尔，对于地下抵抗组织来说，他名叫"德·朗巴勒公主"，他的自我究竟是可耻的特务还是潜伏的志士？他最后的选择似乎是为了确定自己的性质，然而，你掩卷之后能完全确定他自我的性质吗？寻找自我的悲剧，在这部小说里已初见端倪。同样，在《魔圈》里，"父亲"完全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了自我的形象，他既无真名实姓，也没有清清楚楚的经历，他身上裹着一层暧昧的浓雾，而他这种自我的丧失，正是与他支撑点的丧失、栖息处的丧失紧密相关的。叙述者"我"力图替自己的父亲恢复自我、显现自我，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且，"我"本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丧失了自我的形象，人们称呼他的那个

名字，仅仅是他在旅馆登记簿上的一个化名，他替父亲显现自我的努力归于失败，也就等于他寻根溯源、寻找自我那一个重要部分的努力纯系徒劳，他将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这一部份自我。不言而喻，到了《寻我记》① 中，寻找自己的主题发展到更明确更清晰的程度，在这里，叙述者“我”几乎丧失了全部的自我：自己的真实姓名、生平经历、职业工作、社会关系，他成为了一个无根无底的人，一个没有本质、没有联系的飘忽的影子，一个其内容已完全消失泯灭的符号，而“私人侦探居伊·罗朗”这个符号仅仅是他偶然得到的，他真实的一切都已经被深深埋藏在浩瀚无边的人海深处，他要到这大海中去搜寻一段段已经散落的零星线索，他所从事的这件事，其艰难似不下于俄底修斯为了返回家乡而在海上漂流十年的经历，在这个意义上，莫狄阿诺创造了一部现代人寻找自我的悲怆史诗。

寻找自我，是一个深邃的悲剧性的课题，它不仅摆在莫狄阿诺小说中那些具体人物的面前，而且也摆在所有的现代人的面前，何况，莫狄阿诺笔下的“德·朗巴勒公主”还曾要求把他视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也正因为这是一个世人都面临的问题，所以，他才把为他写一部确定自我、寻找自我的传记视为一件需要“足够勇气”的事情。在莫

① 书名原文直译应为《暗店街》，现根据小说的内容意译为《寻我记》。

狄阿诺的作品里，确认自我、显现自我、寻找自我之所以特别艰巨，就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人都经受着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这种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首先是发生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发生在“流通过程”中，在这里，不仅有严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种种原因促使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我泯灭、自我消失，而且，复杂的社会流通过程、现代复杂的生活方式也促使自我的泯灭与消失，正像《寻我记》中的“我”所感受到的：“人们的生活相互隔离，他们的朋友也互相不认识”，于是，在开放性的现代社会里，频繁复杂的社会交往实际上倒成为了这样一种情景：“千千万万的人，在巴黎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就像无数的小弹丸在巨大的电动弹子台上滚动，有时两个就撞到一起。相撞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还不如飞过的黄萤尚能留下一道闪光”。

也许是更主要的：自我消失、自我泯灭还取决于个人是否具有获得自我、确立自我、显现自我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这种主体意识与相应的努力，自我的消失与泯灭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不幸，这恰巧是芸芸众生的常态。《寻我记》中有这样寓意深长的一大段：

> 经历很快烟消云散，我和于特经常谈起这些踪迹泯灭的人。忽有一天，他们走出虚无，只见衣饰闪几下光，便又复归沉寂。绝色佳人、美貌少年、轻浮的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即便在世的时候，

也不过像一缕蒸汽，绝不会凝结成型。于特给我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即他所谓的“海滩人”。此公在海滩上、在游泳池旁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在成千上万张暑假照片里的一角或背景里，总能看到他穿着游泳裤，混迹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谁也叫不上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呆在那里。有朝一日，他从照片上消失了，同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不敢对于特明讲，我认为自己就是那种“海滩人”。况且，即便我向他承认了，他也不会感到惊奇，于特曾一再强调，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拿他的话来说，“我们在沙滩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

这是莫狄阿诺又深一层的寓意，也是他在小说里多次加以阐释的寓意：“也许我什么也不是，仅仅时强时弱的声波透过我的躯体，飘浮空间，渐渐凝聚，这便是我”。“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最终会烟消云散。或者，我们完全变成一层水汽，牢牢附在车窗玻璃上”。“他们几个人也渐渐丧失真实性，世间曾有过他们吗”。直到小说的最后，莫狄阿诺又用包含了这个寓意的一句话来结束全书：“我们的一生，不是跟孩子这种伤心一样，倏忽间在暝色中消失吗？”

多么充满了悲怆性的小说！其悲怆性足以与马尔罗哲理中被判处了死刑的人①、加缪思想体系的

① 请参见拙序：《超越于死亡之上》与《马尔罗哲理与中国革命》，见本丛书第二批书之一：《王家大道》与第三批书之三：《人的状况》。

西西弗① 相比，这是莫狄阿诺力图描绘出来的又一幅人类状况的图景，在这图景中的寓意尽管不具有马尔罗哲理那种进取精神，也不像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那样带有坚毅的色彩，而倒有几分茫然若失、悲凉虚幻的意味，但仍不失为一种醒世的寓意，它将有助于认识现代社会中种种导致自我泯灭、自我消失的现实，也将启迪那种打破“海滩人”存在状况的自觉要求与自为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莫狄阿诺也具有他吸引人的思想魅力。

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当代法国文坛上相继有这样几个作家崭露头角，并获得极大的成功，先是米歇尔·图尔尼埃，而后是勒·克莱齐奥，再后就是巴特利克·莫狄阿诺，不论他们的题材、艺术形式、风格有什么不同，但他们都特别着力在形象中包涵深邃的寓意，于是，他们在法国当代文学中就有“新寓言派”之称，而且早已功成名就的老作家尤瑟纳尔也被划入了这个行列，还加上于连·克拉克与多米尼克·弗尔南德斯等人，这就构成了一个不亚于“新小说派”的强大阵容，即将作结的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了这个流派是本世纪下半叶法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在我国，对于这个流派的译介尚零星不成系统，“法国廿世纪文

① 请参见拙序：《从西西弗到正义者》，见本丛书第一批书之二：《正义者》。

学丛书”将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莫狄阿诺的这个选集就算我们的一个开端。

内 容 提 要

《寻我记》主人公数年前因偷越边境时遭遇劫难，受到极度刺激，丧失了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他给私人侦探于特当了8年助理侦探后，开始用探案技术在茫茫人海中调查自己的来历。他通过种种线索搜集的许多片断，究竟是他的一生，还是他冒名顶替的另一个人的一生呢？

《魔圈》探索一个青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法国被德军占领期间，他既是抵抗组织的秘密成员，又受命为盖世太保干事。在两种力量的夹击逼迫下，他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

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莫狄阿诺的作品富有诗的情趣和侦探小说的魅力，闪烁着寓意的光芒。

责任编辑：金龙格
装帧设计：刘绍荟

作 者 简 介

莫狄阿诺(1945—),法国当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196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新颖独特的文体深得评论界的好评。此后,他不断有作品问世,不断获奖,如《夜巡》(获钻石笔尖奖)、《魔圈》(法兰西学院小说奖)、《凄凉别墅》(书商奖)、《寻我记》(龚古尔奖)等。

80年代后,他又发表小说《一度青春》、《初生之犊》等,其作品语言简练,文意隽永。

目　　次

夜　　巡

张国庆　译

李玉民　校

P. Modiano:

La ronde de nuit

根据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69年版译出

献给吕迪·莫狄阿诺
献给妈妈

为什么我居然等同于我自己憎恶并同情的对象？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①

①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美国小说家，对生活抱着典型美国式的矛盾态度，认为美国生活既庸俗不堪，又绚丽多彩，充满希望。主要作品有：《人间天堂》、《漂亮的冤家》、《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是20年代美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黑夜里响起了阵阵笑声。总督抬起头。

“这么说，你是打着麻将等我们啦？”

说着，他把写字台上的象牙麻将牌给胡噜了。

“就你一个人？”菲利贝尔先生也问我。

“老弟，等我们很长时间了吧！”

他们大声说话还时而耳语，表情严峻地点头。菲利贝尔先生微微一笑，随意打了个手势。总督则把头歪向左边，十分倦怠的样子。他的面颊几乎贴到了肩膀，就像是一只秃鹳。

客厅中间摆着一架三角钢琴。四壁挂着紫色帷幔和窗帘。大花盆中栽满了大丽花和兰花。吊灯的光暗淡朦胧，宛若在恶梦中。

“来点音乐放松一下吧！”菲利贝尔先生建议。

“来点轻松的音乐，我们需要轻松的音乐。”莱昂内尔·德·吉也夫说道。

“《今明之间》怎么样？这是首慢狐步曲。”巴鲁兹伯爵提议。

“我更喜欢探戈。”弗劳·苏尔塔娜却说道。

“行啊，快点来吧。”莉迪娅·斯塔尔男爵夫人不耐烦了。

"《你、你从我身边走过》吧，"薇奥莱特·莫里斯用悲伤的声调低声说。

"就来《今明之间》吧，"总督拍了板。

女人们浓妆艳抹。男士们衣着鲜亮多彩。莱昂内尔·德·吉也夫穿了身桔黄色的西装和一件红褐色条纹衬衣；波尔·德·海尔德是黄色上衣，天蓝色裤子；巴鲁兹伯爵则穿着灰绿色的常礼服。已有几个人结伴起舞了：科斯塔切斯科和让-法鲁克·德·梅多德，加埃唐·德、吕萨茨和奥迪沙尔维，西蒙娜·布克罗和伊雷娜·德·特朗赛……菲利贝尔先生则靠着左窗，立在一旁。当沙波乔尼可夫兄弟之一邀他跳舞时，他耸耸肩膀，并未接受。总督坐在写字台前，随着节拍轻轻地吹口哨。

"你不跳舞吗？老弟。"他问，"是不是着急了？放心吧，你有的是时间，……有的是……"

"你瞧，"菲利贝尔先生明白地说，"警察就是久久的、久久的耐性。"

他走向角柜，拿起一本用摩洛哥山羊皮浅绿色封面精装书：《叛徒文选：从阿尔西比亚德① 到德雷福斯②》，随手翻看，将书页中所夹的各种东西——信件、电报、名片、干花都一一放在写字台上。总督似乎对这种研究很有兴趣。

① 阿尔西比亚德（又译亚西比德）（约公元前 450——前 404），雅典政治家。虽仪表堂堂、机敏过人，却自私自利，缺乏责任感。曾投靠过当时各个不同的阵营。

② 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当事人。

"是你最爱读的书吗，老弟？"

菲利贝尔先生递给他一张照片。总督长时间地审视着。菲利贝尔先生站在他的身后。总督手指着照片，低声说："他的母亲。""对吧，老弟？是令堂大人吧？"他又重复了一遍："令堂大人……"他面颊上流下了两行泪水，直流到嘴边。菲利贝尔先生摘下眼镜，两只眼睛睁得很大：他也流了泪。这时，响起了《来点柔和音乐》的曲调。这是曲探戈。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地方尽情蹦跳。于是就互相碰撞起来，有的人已踉踉跄跄，滑倒在地板上。"你不跳舞吗？"莉迪娅·斯塔尔男爵夫人问道，"来吧，陪我跳下一曲伦巴。""别缠他了，"总督低声埋怨她，"这个年轻人没心思跳舞。""就跳一次伦巴，伦巴啊！"男爵夫人恳求地说。"伦巴！伦巴！"薇奥莱特·莫里斯连声嚎叫。在两只吊灯光下，这些人满脸通红，而且越来越红，都变成了深紫色。他们的两鬓全是汗水，眼神特别亢奋。波尔·德·海尔德的脸黑如焦炭，巴鲁兹伯爵的两颊塌陷了下去，阿希德·冯·罗森海姆的黑眼圈显得更大了。莱昂内尔·德·吉也夫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科斯塔切斯科和奥迪沙尔维的动作也开始迟钝。女人们的脂粉已然龟裂，毛发的颜色越来越狰狞可怕。他们全在分解，肯定要就地腐烂发臭了。他们自已感觉到了吗？

"咱们开门见山，别讲废话，老弟。"总督小声地说，"你是否跟叫什么'德·朗巴勒公主'的

人接上头啦？他是谁？他在哪儿？”

“听见了吗？”菲利贝尔先生也低声问，“亨利问那个叫‘德·朗巴勒公主’的人，要了解他的详细情况。”

唱片转到了尽头。人们分别散坐在长沙发、软圆墩、安乐椅上。梅多德打开了一瓶白兰地。沙波乔尼可夫兄弟出去片刻，端回了两盘杯子。吕萨茨满满地斟上酒。“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干一杯，”早川建议说。“祝总督身体健康！”科斯塔切斯科高喊。“为菲利贝尔警官的健康干杯！”米基·德·瓦赞也大声说。“为德·蓬帕杜尔夫人干杯！”这是莉迪亚·斯塔尔男爵夫人的尖叫声。一时间大家举杯相碰，一饮而尽。

“朗巴勒的地址，”总督仍然低声说。“亲爱的，爽快点儿，把朗巴勒的地址告诉我们吧。”

“亲爱的朋友，你很清楚，我们强大无比。”菲利贝尔先生也低声说。

其他人都在小声交谈。吊灯光开始暗淡下来，在蓝色和深紫色之间摇曳，已分不清是谁的面孔了。“布利茨饭店越来越吹毛求疵了。”“别着急，只要我在那儿，你就一定会得到大使馆的空白信。”“亲爱的，只要格拉夫克鲁伯爵一句话，布利茨饭店就会永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跟奥托说说看。”“贝斯特博士是我的好朋友。要我跟他谈谈这件事吗？”“只要给德尔法娜打个电话，一切都没问题了。”“对我们的证券推销员得厉害点，否则他

们净钻空子。”“不能饶过他们。”“再说是我们保护着他们。”“他们该感谢我们才对。”“将来人家要找我们算帐，而不是找他们。”“瞧着吧，他们准会一推六二五！而我们却不得不……”“我们还没打出杀手锏呢。”“前线的消息非常好，好极啦！”

“亨利要得到朗巴勒的地址，”菲利贝尔先生重复说，“一狠心就行了，老弟。”

“你这样迟疑不决，我十分理解，”总督说话了，“你看这么办行不行：你首先告诉，我们今晚在哪儿可以抓获整个地下网的成员。”

“只不过是开头难。”菲利贝尔先生补充说，“接下去再告诉我们朗巴勒的地址，就容易得多了。”

“今天晚上一网打尽，好孩子，我们等着你呢。”总督仍然是小声地说。

一个黄记事本，雷奥米尔街买的。老板娘曾问我：您是大学生吧？（人们都对年轻人感兴趣。因为将来是属于他们的。人们愿意了解他们的打算，没完没了地向他们提问题。）该有个手电筒，才好找到那一页。光线这么暗，什么也看不见。只好把头埋到本子里，一页一页地翻了。第一个大写的地址是中尉——地下网的头头。尽量忘掉他那蓝黑色的眼睛，忘掉他说“还好吗，老弟”时的亲热口气吧。真希望中尉是个十足的恶棍，真希望他卑劣低下，自命不凡，是个地道的伪君子，这样事情就好办些了。然而在这晶莹明亮的水面上，却找不到一丝灰

尘。万般无奈，就想想他的耳朵吧。那软骨组织，只要看上一眼，就止不住想呕吐。人类怎么会有这样一对可怕的赘疣？想象一下中尉的双耳吧，就在那儿，写字台上，比实物还大，颜色猩红、血管纵横。于是，急促地说出他今晚要去的地方：夏特莱广场。随后，一切都再容易不过了。甚至不用再看记事本，就说出了十来个名字和地址，声调就如同一名优等生在背诵拉封丹的寓言一样。

“这回一网打尽，再漂亮不过了。”总督说。

他点了支烟，两眼看着天花板，吐出串串烟圈。菲利贝尔先生坐在写字台前，翻阅着记事本。肯定是在核对地址。

其他人仍然互相喋喋不休。“再跳跳舞吧，我的腿都麻了。”“要温柔的音乐，我们需要温柔的音乐！”每人都说出他喜欢的曲子来！伦巴：《节奏小夜曲！》、《我想象的爱情！》、《干椰子！》、《无论劳拉要什么！》、《美丽的幽灵！》、《你别不爱我！》。“玩捉迷藏怎么样？”有人鼓掌赞成。“行啊，就来捉迷藏！”黑夜里响起了他们的笑声，黑夜在颤抖。

几个小时前。布洛涅森林公园的大瀑布。乐队正在折磨着一首克里奥尔的华尔兹。一位头戴白毡帽，胡须花白的老者和一位穿深蓝色连衣裙的老

妇，坐到我们的邻桌。悬挂在树上的折纸彩灯被风吹得摇来晃去。科科·拉库尔抽着雪茄，埃斯梅拉达静静地喝着石榴果汁，谁也不讲话。正因为如此，我才喜欢他们。我很愿意仔细地描述他们：科科·拉库尔人高马大，红棕头发，暗淡无光的盲眼中，时而也闪现出无限的悲哀。他经常戴墨镜，把这一切隐藏起来。他动作笨拙迟缓，好似梦游者。埃斯梅拉达有多大年龄？她还是一个十分娇嫩的小姑娘。我本可以说出许多关于他们的感人细节，但是我太疲倦了，不想再说下去。对你们来说，知道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这两个名字也就够了，同样，他们无声地出现在我的身旁，我就心满意足了。埃斯梅拉达十分赞叹地注视着乐队的刽子手们。科科·拉库尔嘴里含着微笑。我是保护他们的天使。我们将今后每晚都来布洛涅森林，来到这个由绿荫笼罩的大小湖泊、林间曲径和茶社酒吧所组成的神秘王国，以便更充分地消受夏夜的美好时光。这里毫无变化，一如我们的童年时代。还记得吗？你曾沿着卡特兰草地的小径滚铁环。风吹拂着埃斯梅拉达。她的钢琴老师告诉我说，她有了进步。她正按拜厄的方法学习视谱，不久就可以演奏沃尔夫冈·阿玛多·莫扎特的小段乐曲了。科科·拉库尔腼腆地点燃雪茄，好像对不起人似的。我喜欢他们。我的爱中，绝无儿女情长！我在想，如果我不在，他们将被人践踏。多么可怜，多么弱小，永远无声无息。吹一口气，挥一下手，就足以使他们粉身碎

骨。和我在一起，他们什么也不用怕。有时，我也想将他们抛弃，但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比如今天晚上吧。我可以起身低声告诉他们："在这儿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科科·拉库尔会点点头。埃斯梅拉达会可怜地一笑。我只要走出十步别回头，然后，就顺其自然了。我会跑向汽车，把它旋风般地开跑。难就难在要咽气前的那几秒钟里，还要死死扼住不松手。不过，一旦那个身体一软，慢慢沉向深渊，你就会感到无限轻松，美不胜收。无论是在澡盆中施刑，还是在黑夜里保证回来之后又将某人抛弃的背叛行径，都是如此。埃斯梅拉达在玩弄吸管，朝中间吹气，使石榴果汁泛出了许多泡沫。科科·拉库尔抽着雪茄。当抛弃他们的念头诱惑我时，我依次观察他们，注意他们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留心他们脸上的每一种表情，就像是要抓住桥的栏杆一样。抛弃他们，我又像当初那样，孤独一人。我自我安慰地想，现在是夏季，所有人下个月就该回来了。当时确实是夏季，但这个夏季将浑浑噩噩地延续下去。巴黎市内不见一辆车，不见一个行人。寂静中只有偶尔传来的挂钟报时声。有时，即使是待在艳阳下的大街拐角，我也觉得是在做噩梦。七月，人们离开了巴黎。是夜，他们最后一次汇聚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茶座上。直到那时，我才真正体验到了夏天的凄苦。这本是放焰火的季节。在树叶浓荫和彩灯下边，将要永远离去的人最后一次大声地欢笑。他们摩肩接踵，高

声喊叫、嬉笑打闹，兴奋异常。只听一片碰杯声和车门声。大逃难开始了。整个白天，我在城中漫无目的地游荡。烟囱中冒着黑烟：他们逃跑前要烧掉所有文件，摆脱不必要的行李拖累。无数的汽车排成长蛇阵，涌向巴黎的城门。而我却坐在街头的长椅上。真想也随他们逃去，但我却没有什么值得挽救的东西。一旦他们走了之后，幽灵就会出现，将我团团围住。我会认出几张面孔。女人们都浓妆艳抹，男人们也像黑鬼一样，打扮得花里胡哨：穿着鳄鱼皮鞋和五颜六色的衣服，戴着白金戒指。有的人一说话，就露出满口金牙。如今我落到了这些小人手里：这些在鼠疫吞噬了市民之后占领城市的耗子们。他们发给我警察证和持枪证，要我潜入一个“地下网”，伺机瓦解它。自童年始，我已多少次食言、爽约，觉得再当什么正牌的叛徒，未免太“幼稚”了。“我等一会儿就回来……”我最后一次注视了这些面孔，黑夜将把他们吞掉……其中一些人根本无法想象我会离他们而去；另外一些人则目无表情地望着我，“你真的还回来？”我还记得我每次看表时那奇怪的揪心之感：他们已等了我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他们可能还未失去信心。我想赶紧去赴约，这种诱惑通常要持续一小时。告密却要容易得多了。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说出不少姓名和地址。不折不扣的暗探。假如他们愿意的话，我甚至还会成为杀人犯。我将用无声手枪打死那些受害者，然后观赏他们的眼镜、钥匙串、手绢、领带——

这些可怜的物品。这些东西本来只对所有者有意义，但比死者的面孔更能令我动情。要杀死他们之前，我的目光不会离开人身上最不起眼的地方：鞋。人们认为，第一次见面时，只有手的躁动、面部表情、眼光和声调才能激动人心，那可错了。对我来说，感人之处就在鞋上。我一旦悔恨杀了人时，不是回想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心地，而是回想他们的鞋。尽管这么说，这年头，干这种无耻警察的行当，还真来钱！我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我用这些钱保护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没有他们，我就会太孤单了。有时，我也想象他们并不存在。我就是这个红棕头发的盲人和这个孱弱的小女孩。真是自怜自慰的绝妙机会。再忍耐一会儿吧。泪水快涌出来了。我终于要体验到英籍犹太人所说的“自怜”这种感情的甜美了。埃斯梅拉达朝我微笑。科科·拉库尔吸着雪茄。白发老汉和蓝裙子老妇。四周的空桌椅。忘记关掉的吊灯……我时时害怕听见砾石上的刹车声。车门啪的一响，他们就会慢慢地、摇摇晃晃地向我们走来。埃斯梅拉达皱着眉头，吹出一串气泡，看它们上下飞舞。其中的一个碰到老妇人的脸，噗地破了。树枝在微颤。乐队奏起了恰尔达什舞曲。然后是狐步舞曲、军队进行曲。再过一会儿，就不知道演奏什么乐曲了。所有的乐器都气喘吁吁、抽抽噎噎。被他们拖进客厅里的那个人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他双手绑着一条皮带，先是想拖延时间，朝他们做逗人的鬼脸，似乎要使他们开

心。后来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千方百计去刺激他们：他向他们频频传递媚眼，一颠一颠地裸露出右肩，四肢乱抖，跳起了肚皮舞。这个地方真是一秒钟也不能多待了。音乐就要随着最后的噪响而消亡。吊灯也将熄灭。

“咱们玩捉迷藏吧？”“这主意太妙了！”“我们根本不用蒙眼睛。”“光线够暗的了。”“就由你开始吧，奥迪沙尔维。”“你们快散开！”

他们蹑手蹑脚。只听有人在开壁柜的门，肯定想藏到里边去。还能感觉到有人在写字台周围爬行。地板吱咯直响。有人撞在了家具上。窗前现出一个人的身影。低低的笑声，无声的喘息。动作加快了。准是跑了起来。“巴鲁兹，抓住你了。”“错了，我是海尔德。”“那是谁？”“你猜！”“罗森海姆。”“不对。”“科斯塔切斯科？”“不对。”“猜不出来了？”

“我们今晚要抓住他们，抓住中尉和地下网的全部成员。一个不落。这些人在坏我们的事。”总督一板一眼地说。

“你还没有说出朗巴勒的地址呢。还等到什么时候啊？说吧！……”菲利贝尔小声地说。

“让他喘口气吧，皮埃罗。”

灯光一下子明亮起来。他们不住地眨眼。全都

围到了写字台前。“我的嗓子直冒烟。”“朋友们，喝一杯吧，喝一杯！”“唱支歌吧，巴鲁兹，唱支歌！”“从前有一只小船”，“接着唱，巴鲁兹，接着唱下去！”“却没、没、没、没出过航。”“你们想看我的纹身吗？”弗劳·苏尔塔娜问。她扯开短上衣。两个乳房上各纹了一只猫。莉迪娅·斯塔尔男爵夫人和薇奥莱特·莫里斯将她掀翻在地，扒去上衣。她挣扎着，从她们手中逃了出去，还尖声尖叫地挑逗她们。薇奥莱特·莫里斯便满客厅地追她。吉也夫在客厅的一角嘣着鸡翅膀。“在实行配给制的时期，大吃大喝真是一种享受。你们知道我刚才干了什么吗？我对着镜子把脸上涂满了肥鹅肝！是一万五千法郎一片的肥鹅肝！”（他大声笑了起来。）波尔·德·海尔德问：“不再来点白兰地啦？再也弄不到了。四分之一升就卖十万法郎！想抽英国烟吗？这是我直接从里斯本弄的。两万法朗一盒。”

“用不了多久，就该称呼我警察局长先生了。”总督干巴巴地说。

他的眼神立刻又变得茫然了。

“为警察局长的健康干杯！”莱昂内尔·德·吉也夫叫嚷。

他踉踉跄跄，跌倒在钢琴上。手中的酒杯跌落了。早川保罗和巴鲁兹陪菲利贝尔先生查阅一份案卷。沙波乔尼可夫兄弟则围着唱机忙碌。西蒙娜·布克罗正对着镜子自我欣赏。

夜呵
音乐
还有你的唇

莉迪娅男爵夫人一边哼，一边用脚划着舞步。

“不来一回性与神的全面合作？”伊凡诺夫用他的公驴嗓吼叫。

总督愁眉苦脸地看着他们。“大家将称呼我局长先生。”他提高了嗓门：“警察局长先生。”并用拳头连连敲写字台。他的这通脾气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站起身，把客厅左边的窗户推开一半。“到我身边来，老弟，我身边需要你。你是一个多么富有感情的小伙子啊。多么善于理解人……你能使我的情绪稳定下来！……”

吉也夫正在钢琴上打鼾。沙波乔尼可夫兄弟不再鼓捣电唱机了，挨瓶地研究起花来。他们一会儿调整一下兰花的姿式，一会儿又抚摸一下大丽花的花瓣。还不时地朝总督转过身来，不无恐惧地望望他。西蒙娜·布克罗看来被镜中自己的脸蛋迷住了。她紫色的眸子张大，面色也越来越苍白。薇奥莱特·莫里斯挨着弗劳苏尔塔娜，坐到天鹅绒套的长沙发上。她们白皙的手心伸向会看相的伊凡诺夫。

巴鲁兹说：“钨的价格在涨。我可以给你低价弄一些。我与维尔居斯特街专卖行的居伊·马科斯合作。”

"我还以为他只搞纺织品呢，"菲利贝尔先生说。

"他改行了，"早川解释说，"他的库存卖给了马西亚——雷奥尤。"

"也许你更想弄点生牛皮？"巴鲁兹问，"铬鞣小牛皮已涨了一百法郎。"

"奥迪沙尔维跟我说过，他有三吨精纺羊毛要脱手。我想你会要的，菲利贝尔。"

"我明天一早就给你提供三万六千副纸牌怎么样？你可以把他们高价出卖。现在正是时候。他们月初开始了'重点行动'。"

伊凡诺夫仔细审视着侯爵夫人的手。

"别说话！"薇奥莱特·莫里斯吼叫着，"看相家在给她看相哪，别说话！""你对这些人怎么看？"总督问我，"伊凡诺夫用他那根儿轻金属魔杖弄得女人们团团转，都离不开他了。亲爱的朋友，他那是在愚弄她们。这个老奸巨滑的小丑！"他俯在阳台的栏杆上。下面是十六区所特有的那种寂静的广场。路灯把一种奇怪的蓝光洒向树枝和露天音乐台上。"我的孩子，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所在的庄园，战前属于德·贝尔-雷斯皮罗先生。"(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在一个柜子里，我发现了他写给他妻子、孩儿的信。他也有家庭情感！看，那就是他。"他指着挂在两扇窗户之间那幅真人大小的画像说，"这就是德·贝尔-雷斯皮罗先生，身穿北非骑兵的军官制服。看看那些勋章！这才叫法国人哪。"

"两平方公里的人造丝织物怎么样，我非常便宜地卖给你，"巴鲁兹推销地说，"就换你五吨饼干？车皮被卡在西班牙边境上了。但你会很快拿到放行证。我只收很少的一点佣金，菲利贝尔。"

沙波乔尼可夫兄弟在总督身边转来转去，但没敢跟他说一句话。吉也夫呼呼大睡。弗劳·苏尔塔娜和薇奥莱特·莫里斯由着伊凡诺夫哄骗他们：星宿流……圣五星图……沃土的麦穗……大地的长波……咒语的全诣……参宿四……西蒙娜·布克罗额头顶在镜子上。

"我对这些金钱交易没有任何兴趣。"菲利贝尔先生很干脆。

巴鲁兹和早川神色怏怏，走到莱昂内尔·德·吉也夫的沙发前，拍了拍肩膀，想把他叫醒。菲利贝尔先生手持铅笔，审阅着案卷。

"你知道吗，亲爱的老弟，"总督接着说(他真好像要潸然泪下了)，"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埋葬我父亲的时候，我孑然一身，晚上非常冷，我就睡在我父亲的坟上。十四岁时到爱丝教养院……然后是惩戒营……弗雷纳监狱……我遇到的尽是像我一样的流氓恶棍……人生呵……

"醒醒，莱昂内尔！"早川吼道。

"我们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巴鲁兹补充说。

"如果你肯给我们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万五千辆卡车和两吨镍。"吉也夫眨

了眨眼，用一块浅蓝色手绢揩了揩额头。“干什么我都愿意，只要能把肚皮撑得绷绷鼓就行。你们不觉得我最近两个月胖了吗？在全面实行配给制的时候，这真是莫大的享受。”他蹒跚地走向长沙发，伸手往弗劳·苏尔塔娜的上衣里边抓。后者挣扎着，狠狠扇了他一记耳光。伊凡诺夫嘿嘿冷笑。“干什么都行，我的活宝们，干什么都行。”吉也夫嘶哑地重复说。“那就说好了，明天早晨行吧，莱昂内尔！”早川接着问：“我可以告诉希尔第罗斯基了吧？我们额外送一车橡胶酬谢你。”

菲利贝尔先生坐在钢琴前，若有所思地按出了几个音符。

“不过，老弟，”总督又接着说，“我总是渴望着承担责任。请不要把我与在坐的那些人混为一谈……”

西蒙娜·布克罗还在对镜梳妆。薇奥莱特·莫里斯和弗劳·苏尔塔娜则闭目养神。看相的似乎正在向星宿乞灵。沙波乔尼可夫兄弟立在钢琴旁，一个在给节拍器上弦，另一个则递给菲利贝尔先生一本乐谱。

“就说莱昂内尔·德·吉也夫吧，”总督悄声说，“我可以讲出这个奸商的千万件丑事来！还有巴鲁兹！早川！所有其他人！伊凡诺夫吗？他是一个下流的诈骗者！莉迪娅·斯塔尔男爵夫人是个婊子……”

菲利贝尔先生翻着乐谱，不时地打打拍子。沙

波乔尼可夫兄弟恐惧地望着他。

“老弟，你看见了吧，”总督接着又说，“所有耗子见最近‘事件’有机可乘，纷纷窜上了地面。我自己也如此……只不过这是另外一码事！别光看表面！不久以后，我就会在这个大厅里，接待巴黎最受尊敬的人，他们将称我为局长先生。警察局长先生！你明白吗？”他转过身去，指着实体大小的画像说：“这就是我！西非骑兵军官！看看勋章！荣誉勋位勋章！圣墓十字勋章！俄国的圣-乔治十字勋章！门的内哥罗的达尼罗勋章！葡萄牙的塔和剑勋章！我用不着嫉妒德·贝尔-雷斯皮罗先生了！该让他羡慕我了！”

菲利贝尔先生的鞋后跟咔的响了一声。

立时一片寂静。

他弹起了华尔兹。音符的瀑布迟疑片刻，继而渲泄而下，在大丽花与兰花上溅起了一片珠玑。他昂首端坐，双眼微闭。

“你听到了吗，我的孩子？”总督问，“你看他那双手！皮埃尔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弹下去，既不卡壳，也不抽筋！真是一个艺术家！”

弗劳·苏尔塔娜的头轻轻晃动。音乐一起，她就不再迷迷糊糊了。薇奥莱特·莫里斯站起身，独自跳起华尔兹，直跳到客厅的另一头。早川保罗和巴鲁兹也不再言语。沙波乔尼可夫兄弟目瞪口呆，静静地聆听。看着菲利贝尔先生在键盘上飞舞的手指，吉也夫本人也好像被迷住了。伊凡诺夫扬着头，

盯着天花板。可西蒙娜·布克罗却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在威尼斯圆镜前继续化妆。

演奏者用尽力气弹着和弦，身躯前倾，双眼紧闭。华尔兹的舞曲越来越激狂。

“你喜欢吗，老弟？”总督问我。

菲利贝尔先生猛地盖上了钢琴。他站起身，搓着手走向总督。稍停了片刻后说：

“亨利，我们刚刚逮住一个人，是散发传单的。当场捉住。布鲁东和雷欧克卢正在地下室里审他呢。”

其他人仍然陶醉在华尔兹舞曲中。他们一言不发，手脚木然，音乐结束后仍呆在原地。

“我正跟他谈你呢，皮埃尔，”总督咕噜道，“我说你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一个举世无双的音乐家、艺术家……”

“谢谢，亨利，谢谢。你说得对，但我憎恶夸大其词！你应该告诉这个年轻人，说我无非是一名警察！”

“是法国的头号警察！一个部长说的！”

“亨利，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我真有点怕你呢，菲利贝尔警长！好家伙！我当上警察局长后要任命你为分局长，亲爱的！”

“别说了！”

“你还是喜欢我，是吧？”

一声惨叫。两声。三声。异常尖厉。菲利贝尔

先生看了看表，“已经四十五分钟了，嘴该撬开了！我去看看！”沙波乔尼可夫兄弟紧随其后。其他人——表面看来——什么也没听见。

“你真是绝色美人。”早川保罗吹捧着男爵夫人莉迪娅，递给她一杯香槟酒。“真的吗？”弗劳·苏尔塔娜和伊凡诺夫对上眼。巴鲁兹轻手轻脚，溜向西蒙娜·布克罗，吉也夫半路上使了个绊。巴鲁兹摔倒在地，碰翻了一盆大丽花。“都想卖弄风流啊？不再理睬我这个胖子莱昂内尔啦”？吉也夫哈哈大笑，用天蓝色的手绢扇着风。

“就是他们抓住的那个家伙，”总督小声说，“散发传单。够他受的。他早晚会招认的。你去看看吗？”“为总督的健康干杯！”莱昂内尔·德·吉也夫叫嚷。“也为菲利贝尔警官的健康干杯！”早川保罗边说，边抚摸男爵夫人的颈项。又是一声嚎叫。两声。长长的呜咽。

“不说就揍死他！”总督吼道。

其他人根本不理睬此事。只有对镜梳妆的西蒙娜·布克罗例外：她转过身，紫色的眸子大得吓人。下巴上还蹭了一道口红。

我们又听了几分钟音乐。当我们穿越瀑布处的十字路口时，音乐终止了。我开着汽车。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坐在前面。我们沿着湖边公路缓

缓行驶。一出森林，便来到了地狱：拉纳大道，弗朗德兰大道，亨利—马尔丹大街。这是巴黎最令人恐怖的居住区。从前，这里晚上8点钟以后，寂静得使人有一种安全感。因为这是布尔乔亚式的寂静，这里居民戴毡礼帽，穿天鹅绒服装，都有良好教育。可以想象晚饭后，全家人聚在客厅里。而如今，无人知晓那黑洞洞的门庭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不时，一辆不开车灯的汽车从我们旁边擦过去。我真害怕它会停下来，挡住我们的去路。

我们拐上了亨利—马尔丹大街。埃斯梅拉达开始打瞌睡：11点以后，年轻姑娘们就睁不开眼了。科科·拉库尔抚弄着仪表盘，扭动收音机旋钮。他们二人全都不知道，他们的幸福是那么脆弱。只有我一个人在忧虑。我们是三个幼童，坐在巨大的汽车里，正穿越不祥的黑暗。如果哪扇窗户有灯光，我就得提防着点。我非常熟悉这个地区。总督曾要我搜遍这些公馆，好抢夺艺术品：第二帝国时期的宅邸、18世纪的游乐场、1900年间有彩绘玻璃窗的府邸、哥特式的仿古城堡，等等。那里面只剩下了战战兢兢的看门人，他们被仓惶出逃的主人们丢在脑后。我敲开大门，亮一下警察证，便开始搜查整个宅邸。我忘不了这类的漫游：从马约城堡到姆埃特，再到欧特伊。我坐在栗子树荫下街头长椅上。街上阒无一人。我可以进入区内的每幢房屋。城市属于我了。

到特罗卡戴罗广场了。身边是科科·拉库尔和

埃斯梅拉达，两个石头伙伴。妈妈曾对我说："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朋友。"对此，我回答说：我不喜欢男人，他们太饶舌；我受不了他们嘴中涌出的嗡嗡乱叫的绿豆蝇。我听了头疼，喘不过气来了。比如这个中尉，就是伶牙俐齿。我每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总是站起身，以"我的年轻朋友"或是"我的小伙子"开头，继而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话以疯狂的速度奔涌，他几乎来不及一字字咬清楚。即使稍微缓一下劲，那也是为了接下来更汹涌的言语波涛将我吞没。他越说越声嘶力竭，以至最后乱叫乱喊，词卡住了喉咙。于是他就跳脚、挥臂、抽筋、打嗝，脸色铁青。过一会儿又单调地接下去。他最后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以这句话结尾："要有胆儿，老伙伴。"

起初，他对我说："我需要你，咱们一起会干得很出色。我的人都不脱离秘密状态。你的任务就是打入敌人内部，要特别小心谨慎，要告诉我们那些混蛋都想干些什么。"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纯洁和英勇归于他以及他的那个司令部，而卑下的密探行径和两面角色则属于我。那天晚上，我再次读了《叛徒》文选：《从阿尔西比亚德到德雷福斯》。看来，别管那么多了，脚踏两只船和叛卖——有何不可？——符合我的调皮性格。反正我的意志不够坚定，当不了英雄，同时又漫不经心和随随便便，也成不了十足的恶棍。不过，我倒非常机敏，好动，还特别热情。

我们又开上了克雷倍尔大街。科科·拉库尔呵欠不断，埃斯梅拉达的头歪在我的肩膀上。他们该去睡了。那天晚上我们离开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淡紫时光”酒吧后，也来到了克雷倍尔大街，走的是同一条路。当时在酒吧里，懒洋洋的人们粘糊在铺着红天鹅绒的桌子周围，或者坐在柜台前的高凳上，有莱昂内尔·德·吉也夫，科斯塔切斯科、吕萨茨、梅多德、弗劳·苏尔塔娜、奥迪沙尔维、莉迪娅·斯塔尔、奥托·达·西尔瓦、沙波乔尼可夫兄弟……酒吧内半明半暗，温暖湿润，散发着埃及香水的气味。就是这样，巴黎还留有一些孤岛，那里的人们充耳不闻“近来发生的灾难”，那里还滞留战前的奢华和轻浮生活。我看着这些面孔，心中反复默念我不知在那儿读到的这句话:“散发着背叛与暗杀恶臭的荒淫无度……”卖酒柜台的另一边，留声机正播放着乐曲:

晚上好
美丽的太太
我特意前来
祝您愉快……

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将我拖到街上。一辆白色的本特利牌汽车停在玛尔伯夫街角。我们坐到司机旁，我钻进了后排。街灯的光线很暗。

“没事儿，埃迪有夜猫子的眼睛。”总督指着司

机说。

“目前，”菲利贝尔先生拉着我的胳膊说，“青年的机会可真多。要好好选择，小伙子，我真想帮助你。我们处在一个危险时期。你的手细长白嫩，身体也很孱弱。千万要当心。奉劝你别充当英雄好汉。要安稳一点儿。跟我们干吧；对，不这样，就要当牺牲品，要不就是进疗养院。”总督问我：“比方说，干点打探的事，你愿意吗？”菲利贝尔先生补充说：“报酬很可观，而且完全合法。我们发给你一个警察证和一个持枪证。”“就是要你打入一个秘密组织，伺机瓦解它。你把那些先生们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只要小心一点，他们不会怀疑你。”“我觉得你面目和善值得信任。”“看来你不用烧香就能拜见真佛。”“你的微笑很讨人喜欢。”“眼睛也非常漂亮，小伙子！”“叛徒们总有一对明亮的眼睛。”他们的话越说越急。最后，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同时说话，从他们的嘴里涌出了大群蓝色的飞蛾……涌出了他们要你做的一切……作耳目眼线，当职业杀手。真愿他们时而住口不说了，让我睡一会儿。耳目眼线、叛徒凶手、飞蛾……

“我们带你到新总部去，”菲利贝尔先生作出决定，对我说，“就是契玛罗萨花园街3号乙的宅子。”“我们在那里庆祝乔迁之喜！所有的朋友都来。”总督补充说。“家哟，甜美的家……”菲利贝尔先生哼了起来。

当我走进客厅时，神秘的话语又在耳畔回响：

"散发着背叛与暗杀恶臭的荒淫无度。"所有刚才见到的人都在这儿。还不断地来人：达诺思、高德博、雷欧克卢、维达尔一雷卡、白脸罗伯特……沙波乔尼可夫兄弟为他们斟上香槟酒。总督小声叫我："我想跟你单独谈谈。印象如何？脸色那么苍白。喝点酒吧！"他递给我满满一杯玫瑰色的烧酒。他边推开落地窗，把我拉到阳台上，边对我说："你知道吗，自今日起，我就是一个帝国的主宰了。我们不单是个警察的附属部门，我们掌管着许多生意！我们拥有五百多经纪人！菲利贝尔帮我处理行政管理事务！我充分利用了最近几个月发生的非常事件。"客厅里非常湿闷，玻璃窗结了水汽。又送来一杯玫瑰色烧酒。我一饮而尽，强压下去一阵恶心。"而且，（他用手背拂弄着我的面颊）你可以给我提些建议，有时也可以指引我。我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十四岁时，我就去了爱丝教养院，接着是惩戒营、流放……但是，我渴望担负责任！你明白吗？"他的目光熠熠，有点狂怒了："我马上就要当警察局长啦！人们将称我局长先生！"他用双拳砸在阳台的边上。"局长先生。局一长一先一生！"他的目光忽又茫然了。

下边的广场上是湿淋淋的树木。我想走了，但是，恐怕为时太晚，他准会抓住我的手腕子不放。我即使挣脱，也还得穿过客厅，在密集的人中闯开一条路，顶住这成千上万的胡蜂的冲击，然后才能走出去。一阵头晕目眩。大大小小的光环围住我，越

转越快，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不舒服了？”他们扶住我的双臂，搀我坐到长沙发上。沙波乔尼可夫兄弟——到底是几个来着？——跑来跑去。巴鲁兹伯爵从一只黑皮包中抽出一叠钞票，给弗劳·苏尔塔娜看。稍远处，阿希德·冯·罗森海姆，早川保罗和奥迪沙尔维谈得正热闹。其他人我就看不太清了。只觉得这些人在就地瓦解；因为他们长嘴饶舌、喋喋不休，动作急促而又不连贯，浑身上下散发出浓郁的香水味。菲利贝尔先生递给我一个带有红色条纹的绿色证件。“你从现在起就是情报部门的人了。你的化名是‘斯温·特鲁巴杜尔’。”所有的人都高举酒杯围过来。“为斯温·特鲁巴杜尔干杯！”莱昂内尔·德·吉也夫对我说。他一阵大笑，脸憋得通红。“为斯温·特鲁巴杜尔干杯！”莉迪娅男爵夫人也尖声地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是在那时，我忽然想咳嗽。我又看见了母亲的面孔。母亲弯身向我，同每晚熄灯前一样，在我耳旁低声说：“你将死在断头台上！”“祝你健康，斯温·特鲁巴杜尔。”沙波乔尼可夫兄弟之一喃喃地说，怯生生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其他人也从各个方向拥向我，粘糊糊的，就像一群逐臭的苍蝇。

克雷倍尔大街。埃斯梅拉达正在梦呓。科科·拉库尔不停地揉眼。他们该去睡觉了。这两个人全然不知，他们的幸福是多么脆弱。三个人中只有我

在忧虑。

“很遗憾，我的孩子，”总督说，“让你听到了这种叫声。我也不喜欢暴力。但是这个人散发传单，非常可恶。”

西蒙娜·布克罗重新开始对镜梳妆。其他人又都松弛下来，亲切温和，与室内的装饰非常协调。我们在布尔乔亚式的客厅中，享受着晚饭后的陈年佳酿。

“喝点烧酒，振作一下吧，老弟！”总督向我建议。

“我们现在经历的‘混乱时期’，”巫士伊凡诺夫指出，“对妇女们有一种刺激性欲的影响。”“在目前物资匮乏的时候，”莱昂内尔·德·吉也夫冷笑着说，“大多数人都已忘掉白兰地的醇香了。他们真是活该！”“那让他们怎么办呢？”伊凡诺夫喃喃地说，“当世界误入歧途的时候……但别忘记，我的朋友，我并没有混水摸鱼。对我来说，一切都要建立在纯真的基础之上。”

“铬鞣小牛皮……”波尔·德·海尔德先说。

“整整一车皮钨矿石……”巴鲁兹接下去。

“百分之二十五的抽头……”让—法鲁克·德·梅多德说得更明确。

菲利贝尔先生神情严肃地走进客厅，来到总督跟前：“享利，一刻钟后我们就出发。第一个目标：那个中尉，夏特莱广场。然后是地下组织的其他成

员，按各自的住址去找。一网打尽！这个年轻人也同我们一起去。怎么样，我的小斯温·特鲁巴杜尔？准备准备吧！还有一刻钟！”总督仍然建议说：“喝几口白兰地，壮壮胆子，特鲁巴杜尔！”菲利贝尔先生接着说：“别忘了告诉我们朗巴勒的地址。明白吗？”

沙波乔尼可夫兄弟之一——他们一共是兄弟几人呢？——站在客厅中央，把小提琴放在颏下。他清了清嗓子，用动听的男低音唱起来：

千万
不必
为爱而哭泣①……

其他人随着节奏拍起手。琴弓缓缓地滑过琴弦，慢慢加速，再加速……节奏越来越快。

为了爱……

就像水中投进了一块石头，一圈圈的光环不断扩大。人们开始在小提琴手的脚下旋转起来，一直延伸到客厅的墙脚。

在尘世
还有……

---

① 以下歌词原文均为德文。

歌手喘不过气来，似乎再唱一句就会憋死。琴弓在弦上狂飞。他们会随着这节奏拍手，会长久地坚持下去吗？

在这尘世

现在客厅也旋转起来，不停地旋转，只有提琴手伫立不动。

不止小树林……

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坐回旋汽车，总是害怕，人们那越转越快的回旋汽车叫毛毛虫。

还有那么多的……

你大声叫喊，但无济于事，毛毛虫仍转个不停。

有那么多的……

可你非要骑毛毛虫，为什么呢？

我也说谎……

人们拍着手站了起来……客厅旋转着，旋转

着，似乎已开始倾斜了。这些人将失去平衡，那些花盆也将倾到地上摔得粉碎。小提琴手急速地唱。

我也说谎

你大声叫喊，但无济于事。在喧闹的集市上，没人能听得见。

那一定是谎言……

中尉的面孔出现了。接着是十个、二十个来不及一一辨认的面孔。客厅旋转得真快，就像当时卢纳公园的“西罗可”毛毛虫一样。

为我选择的……

有那么五分钟，毛毛虫旋转得飞快，根本看不清围观的人了。

今天是属于你的……

但在旋转中，有时也可以瞥见一个鼻子、一只手、一个笑靥、一口牙齿、或者是瞪得圆圆的一双眼睛。又是中尉的蓝黑色眼睛。十个、二十个其他人的面孔。是些刚刚被出卖了地址，马上就会在黑夜中被逮捕的人。幸运的是，这些面孔都一闪而

过，像音乐的节奏那样快，来不及仔细观察他们的相貌。

发誓要爱……

他唱得更加迅急，紧紧抓住小提琴，那惊恐的神态，就像海上遇难者。

我爱每一个人

其他人都拍手，拍手，再拍手，面孔肿胀，眼睛痴狂，肯定要中风而死……

我也说谎……

中尉的面孔。其他十个、二十个人的面孔现在也看得清了。他们一会儿就要被逮捕。他们现在像是来找我算帐。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你甚至并不遗憾出卖了地址。面对这些凝视你的英雄，你甚至想高声说出你的探子身分。慢慢地，他们脸上的彩绘龟裂了，失去了那种傲慢气，为他们添光加彩的美好信念也像吹熄的蜡烛一样消失了。一个人脸上流下了泪水；另一个人低下头，朝你递来凄然的眼神。还有一个人惊奇地看着你，似乎不相信你竟会干出这种事……

当她惨白的尸体在水里……

这些面孔也在旋转，旋转得很慢。旋转中，他们轻声地责怪你。之后，随着不断的旋转，他们的脸庞抽搐了，再也不注意你了，眼里嘴上显出极度的恐惧。肯定是想到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又变成了黑夜之中呼喊妈妈救命的幼童……

从书籍到大河……

你回想起昔日他们与你的亲密相处。其中一个人还把他未婚妻的来信念给你听。

当她惨白的尸体在水里……

有一个人穿着黑皮鞋。另一个人知晓所有星辰的名字。内疚。这些面孔今后会不停地在你眼前旋转，你从此再也不能安寝了。中尉的一句话又响起在你耳边："我们组织的成员，都信心百倍。如果需要，他们会从容就义，绝不肯泄露一点秘密。"那么太好了。这些面孔再次变得冷酷无情。中尉的蓝黑色眼睛。十对、二十对充满蔑视的眼睛。既然他们愿意英勇就义，那就让他们去死吧！

在有Rielen的河里……

他不再拉琴了，把琴放在壁炉上。其他人也慢慢静下来，变得无精打采，半躺半卧在沙发上……

“你的脸色很苍白，我的孩子，”总督低声说，“别太往这上用心思了，这次一网打尽，定会干净利索。”

来到阳台，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暂时忘却屋中令人眩晕的花香、饶舌和乐曲，多么惬意呵。这是一个温柔、宁静的夏夜，令人流连忘返。

“当然，表面看来，我们完全是强盗行径。我用的这些人，采用的这些残忍手段，以及把你这样一个令人喜爱的小天使派去当奸细，这一切都不会为我们带来好名声。是啊……”

广场上的树木、报亭沐浴在橙红色的光线里。

“还有这些奇怪的人，围着我叫作‘老巢’的东西转来转去。这是些奸商、风流女人、撤职的警长、离不开吗啡的瘾君子、夜总会老板、以及这些不在哥达贵族系谱上①的侯爵、伯爵、男爵、公主们……”

下面的街道边上，汽车摆成长龙。他们的汽车。在夜色里，一辆辆看似黑乎乎的斑点。

“我知道，这一切都会给有教养的年轻人以不好的印象。但是（他的声音变得愤愤然），既然今夜你已经同这些不值得称道的人在一起了，这就是说，别看你有一副可爱的嘴脸……（他的口气又缓和

① 哥达贵族系谱：登载全欧洲各系贵族的家谱。1764—1945年间在哥达陆续出版，故名。

了。)因为我们是一条路上的人，先生。”

吊灯光烤着他们，并像浓酸一样地腐蚀他们的面孔。这些人的脸庞凹陷下去，皮肤渐渐干硬，脑袋也马上就要变成希瓦罗人①的收藏品那般微小了。盆花和干瘪的皮肤都散发着香气。不要多久，这里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水潭上不断破裂的气泡。他们已经陷入紫黑色的泥淖中。泥淖在不断地上升、上升，已没了他们的膝盖。他们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

“老呆在这儿真无聊。”莱昂内尔·德·吉也夫说。

“该出发了，第一站是夏特莱广场，找中尉去！”菲利贝尔先生说。

“你也来吧，老弟？”总督问我。外面还像平时一样，实行灯火管制。他们碰上哪辆车上哪辆车。“夏特莱广场！”“夏特莱广场！”车门砰砰作响。车飞速开走。“别超过他们，埃迪。看着这些勇士，我就精神倍增。”

“这些人花天酒地，还不是靠我们！”菲利贝尔先生叹道。“稍微大度一点吧，皮埃尔。我们和他们一起干事业。他们全是我们的合作者。不管好坏，要同舟共济。”

克雷倍尔大街到了。他们不断地鸣笛，手伸向

① 希瓦罗人：生活在厄瓜多尔的安第斯山南麓的印第安人。他们好战，割下敌人的头颅，用烧热的石头使其充分干缩，并作为战利品悬挂。

车外，胡乱挥动。车摆来摆去，一侧的轮子发出吱吱的叫声，相互轻撞。在灯火管制下，大家竞相冒险，竞相喧扰。接着就是香榭丽舍大街，和谐广场，里沃利街。“我很熟悉我们要去的街区，”总督说。“那里有菜市场，我的整个青少年，都是跟车卸菜……”

其它车辆已经跑没影儿了。总督微微一笑，用他那支纯金的打火机点燃一只烟。卡斯蒂利奥内街到了。可以想见左边旺多姆广场上的圆柱。接着是金字塔广场。车速渐渐缓慢下来，就像来到了边境线上。卢浮宫街一过，城市就忽然显得矮了下去。

“我们进入‘巴黎之腹’了。”总督提醒说。

尽管车窗全都关着，但一股无法忍受的气味还是呛得人想呕吐，不过人渐渐也就习惯了。他们大概把菜市场变成屠宰场了。

“巴黎之腹。”总督重复道。

汽车在黏乎乎的街石上直打滑。有什么东西溅到了引擎盖上。是泥水，还是血浆？总之是一种热烘烘的东西。

穿过塞巴斯托波尔大道，我们来到一个大空场上。周围的房屋全被拆除，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飘着破烂的墙纸。从这些遗迹能猜出原来哪里是楼梯，哪里是壁炉，哪里是壁橱。猜得出房间的面积和放床的地方。这里曾放锅炉，那里曾安洗脸池。有人喜欢带花的墙壁纸，有人喜欢仿制的“如意”壁纸布。我甚至觉得能看出那面墙上曾挂着一幅彩

色石印画片。

夏特莱广场到了。那就是泽丽咖啡馆，中尉和圣一乔治半夜里要同我碰头的地方。等他们俩向我走来时，我该是一种什么举止呢？我和总督、菲利贝尔走进咖啡馆时，其他人早已在桌边落座。他们拥上前来，争着和我们第一个握手。他们抓住我们不放，又是拥抱，又是摇晃。一些人不停地吻我们；另一些人或着抚摸我们的后颈，或者亲热地揪我们的衣服翻领。我认出了让—法鲁克·德·梅多德，薇奥莱特·莫里斯和弗劳·苏尔塔娜。科斯塔切斯科问我："你好吗？"我们从聚集的人丛中挤出一条路来。莉迪娅男爵夫人把我拉到一张桌子前，那儿坐着阿希德·冯·罗森海姆，波尔·德·海尔德，巴鲁兹伯爵和莱昂内尔·德·吉也夫。"来点白兰地吧！"波尔·德·海尔德对我说，"巴黎已见不到这种酒了，四分之一升就要卖到十万法郎！来，喝吧！"他把细瓶颈塞到我的嘴里。接着，冯·罗森海姆往我嘴里塞进一支英国香烟，拿出一支嵌有祖母绿宝石的白金打火机给我点燃。灯光慢慢发暗，他们的言谈举止都融化在温润的昏暗中。突然，德·朗巴勒公主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异常清晰。一名国民自卫队队员来到福尔斯监狱① 把她叫

① 福尔斯监狱：巴黎的古老监狱，座落在巴莱地区。1780年时是债务监狱，后来在法国大革命时成了政治监狱（大福尔斯）和女犯监狱（小福尔斯）。1792年大屠杀时，那里杀了许多人，最有影响的是德·朗巴勒公主。1850年福尔斯监狱被拆毁。

了出去："起来吧，夫人。该到修道院去了。"眼前就是他们的梭标和面孔。她为什么没有高喊"祖国万岁"，就像人们要她做的那样？只要他们中的一个人用梭标划破我的头：吉也夫？早川？罗森海姆？菲利贝尔？总督？只要有那么一滴血，鲨鱼就会扑上来。不能再动了。我将高呼"祖国万岁！"让我喊多少次就喊多少次。把我衣服扒光也行。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罗森海姆又一次把一支英国烟卷塞进我的嘴里。也许是塞给死囚的烟？看来不是今晚行刑。科斯塔切斯科、吉也夫、海尔德和巴鲁兹都对我十分热情。问我身体如何。还问我零花钱够不够。当然够。供出中尉和他的地下网成员会给我带来十来万法郎的收入。我将用这笔钱在莎尔蔚店中买几条长围巾，还要买一件小羊驼毛大衣，以备寒冬。也许在此之前他们就把我结果了。人人都说，懦夫总不得好死。医生也告诉过我，任何人在临死时，都会变成一个八音盒；在一瞬间，人们能听到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完全体现他的一生、他的秉性和他的向往。有些人的音乐是风笛华尔兹，有些人的音乐是军队进行曲。也许还会哼出一支茨冈人的歌，结尾是一阵嚎哭或是恐惧的尖叫。你呢，小伙子，将听到半夜里朝空旷地方扔垃圾袋的声音。刚才从塞巴斯托波尔大道的另一侧穿过空地时，我就想："你的冒险将在这里结束。"我还记得走过的缓坡路，它把我一直带到巴黎这块最凄凉的地方。一切都开始于布洛涅森林公园。还记得吗？

你曾在卡特兰草地上滚过铁环。时间飞逝。如今你又沿着亨利一马尔丹大街来到特罗卡的罗广场。然后是星形广场。前面是一条大街，两旁的街灯忽明忽暗。在你看来，它象征着充满希望的未来——别人就是这么说的。跨上这皇家大道，你陶醉了。其实，那不过是香榭丽舍大街，到处都是国际性的酒吧、华贵的少妇，以及“克拉里齐”，这个斯塔威斯基的鬼魂常常出没的地方。还有忧闷的“丽多”、让人伤心的“富盖”和“高利泽”两处旅馆。一切都掺了假。那边是和谐广场。你穿着咧嘴的鞋，扎着白点领带，一副面首的嘴脸。经过和香榭丽舍大街一样龌龊的马德兰大教堂——歌剧院地区以后，你在里沃利街的拱廊下继续往前走，继续进行医学上称之为精神上的瓦解。洲际饭店、莫里斯、圣詹姆斯和阿尔巴尼旅店，我曾在这些地方当过旅店盗贼。有时，有钱的女客人允许我上楼到她们的房间里去。清晨时，我翻遍她们的手袋，盗走一些首饰。再远处就是充满腐肉香气的仑佩尔梅耶。还有那些半夜里在竞技场花园里被抢走背带和钱包的同性恋者。幻象突然更加清晰了：我在巴黎腹地像到了暖窝。哪里是巴黎的边缘呢？穿过卢浮宫街或王宫广场便是。你沿着臭气熏天的小巷，钻进这个菜场。巴黎的腹地是一个在五颜六色霓虹灯照耀下的野蛮场所。周围尽是些七倒八歪的菜筐和忙着装卸整扇牛肉的黑影。几个过分涂抹的灰白色面孔在我眼前闪过。从今以后，什么事都会发生。他们还将吸收

你参加最肮脏的工作，然后再彻底和你清算。如果你出于极度的狡猾和怯懦，要离开这伙藏在黑暗中的男盗女娼们，那也是找死。你会死在离塞巴斯托波尔大道不远的空场中央，死在那块荒地里。医生早就说过了。如今你已无路可走，后悔也来不及了。悔之晚矣。火车已停驶。我们星期日的环城散步。这条废弃不用的铁路线……

我们沿着这条巴黎的环城大道转悠。克里尼昂古尔城门，佩雷尔大道，太子城门。然后是雅威尔……沿线的车站都改成了仓库或咖啡馆。有些车站仍保持原样，看上去绝想不到早已没有火车进出了。五十多年来，只有那只大钟一直指着同一时刻。我对奥塞车站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温情，至今仍向往在那里等着登上天蓝色的普尔门式豪华列车，奔向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希望之乡。然而列车永远不会再来，我只得用哨吹着爪哇舞曲，穿过索尔费里诺桥。接着，我从钱夹里取出马塞尔·波蒂欧医生的照片。他正坐在被告席上沉思，身后摆放着许多手提箱。那是无数的希望和未能实现的计划。法官指着这些东西问我：“说啊，你怎样度过了你的青年时代？”而我的辩护律师（具体说就是我母亲，因为谁也不愿意为我辩护）则试图说服法官和陪审团成员：“他从前是个很有前途的小伙子，”“很有抱负，”是一个人人都夸“长大了会很有出息”的孩子。证据吗，法官先生，就是他身后的这些手提箱，全都质量优良。是俄罗斯皮革的，法官先生。

"这些手提箱的质量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它们根本就没有发出去。"一致判处我死刑。今晚可要早点睡了。明天该人声鼎沸了。别忘了你的化妆盒和口红。对着镜子再操练一下吧。你的秋波须要有天鹅绒般的温柔才行。你会遇到许多有各种怪癖的人，他们会向你提出难以想象的各种要求。这些淫棍荡妇们使我毛骨悚然。要是得罪了他们，我马上就会命归西天。她为什么不高喊"祖国万岁"？而我呢，他们让喊多少次我都喊。我是最最温顺的婊子。"喝吧！喝吧！"吉也夫十分殷勤地邀请我。薇奥莱特·莫里斯也问："来点音乐？"总督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再有十分钟中尉就到了。你要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和他打招呼。""来支感伤的情歌。"弗劳·苏尔塔娜要求说。"感—伤—的—情—歌！"莉迪娅男爵夫人也跟着嗥叫。"然后争取把他带出咖啡馆。""来支《黑色的夜》吧！"弗劳·苏尔塔娜又说。"好让我们更容易抓住他。接下去，我们到其他人家里去抓人。""《五呎二吋》，这是我最喜爱的歌。"弗劳·苏尔塔娜尖声尖气地说。"即将一网打尽。我谢谢你向我们提供了情报，老弟。""不，不，我想听《斯温·特鲁巴杜尔》！"薇奥莱特·莫里斯大声嚷着。沙波乔尼可夫兄弟摇动留声机的摇柄。唱片已被划伤，听起来让人觉得歌手的嗓子马上就要撕裂了。薇奥莱特·莫里斯划着拍子，跟着哼唱：

可是你的女友去游山玩水，
可怜的斯温·特鲁巴杜尔……

中尉。难道是劳累后的幻觉？有些日子，他叫我叫得更亲热了。他的傲慢消失了，面容变得模糊起来。我面前只剩下了一位年迈的老婆婆，十分温柔地看着我。

她采来春天的玫瑰花，
伤心地扎成一束。……

他显出了疲倦和恐慌，好像突然明白他奈何不了我了。他反复说："你这颗单纯的、单纯的少女之心……"他大概是想说我并不是一个"混蛋"(他的口头语)。当时，我真想谢谢他对我那样地亲热，而他平常是那般冷酷、专横。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半天才咕噜出一句："我的心留在芭蒂尼奥尔大道了。"但愿这句话向他揭示了我的真实性格：我是一个相当粗俗、多愁善感，不对，是一个积极活跃、微不足道、绝无半点恶意的小伙子。

可怜的斯温·特鲁巴杜尔
可怜的斯温·特鲁巴杜尔……

唱片不转了。"来杯马提尼干红葡萄酒，年轻人？"莱昂内尔·德·吉也夫问我。其他人也都问

我起来。“又不舒服了？”巴鲁兹伯爵也问道。“你脸色十分苍白。”“那让他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吧！”罗森海姆建议说。我没有发现柜台后面的波拉·奈格丽的巨幅照片。她的嘴一动不动，面庞滑润，神态安祥，毫无表情地看着这个场面。相片已发黄，她显得更远了。波拉·奈格丽对我也爱莫能助。

中尉来了。他和圣乔治如约在半夜时分走进了‘泽丽’咖啡馆。事情快就结束了。我向他们招了招手，但没敢正面看他们，把他们带出了咖啡馆。总督、古阿里和维达尔一雷卡持枪立刻围了上来。这时，我才正面看了他们俩。他们看着我，先是吃惊，然后是充满了喜悦的蔑视。维达尔一雷卡要给他们上手铐时，他们猛地挣脱，向林荫大道飞跑而去。总督开了三枪。他们倒在广场与维多利亚大街的拐角处。

接下去被捕的有：

科维萨尔：博斯凯大街2号；

佩尔耐蒂：沃吉拉尔街172号；

雅斯曼：巴斯德大道83号；

奥伯里加多：迪罗克街5号；

皮克皮斯：菲利克斯一富尔大街17号；

马尔伯夫和佩尔波尔：布罗多耶大街20号。

每次都是我去敲门，我报名字，他们没有片刻的迟疑。

他们在睡梦中。科科·拉库尔占了最大的房间。埃斯梅拉达被安顿在曾属于原主人女儿的蓝色房间内。6月份，“事变之后”，房主们都逃离了巴黎。他们会在旧秩序恢复之后归来，或许就在下个季度……会把他们从他们的宅邸中赶出去。在法庭上，我将承认我是破门而入的。总督、菲利贝尔以及其他人要和我一起出庭。世界将恢复旧观，巴黎将恢复光明之城的称号。法庭内听众们双手托腮，倾听公诉人列举我们的罪行：我们出卖同志、行凶施暴，还偷盗、暗杀，搞各种走私——在我写此文的时候，这全是家常便饭。有谁肯为我辩护呢？12月的某日凌晨，红丹山上的要塞。执刑队。马德兰·雅各布会写下我所有的可耻行为。（妈妈，你可别读那本书。）其实，在道德、正义、人性重新树立在阳光下之前，在他们将我驳得哑口无言之前，我的同伙就会把我给干掉了。我愿在身后留下一点纪念：至少是给后人留下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的名字。今夜有我照看着他们。但能持续多久？没有了我，他们将会怎样呢？他们是我唯一的伴侣。像羚羊一样，温柔、沉静而脆弱。我想起来，我曾在一本杂志上剪下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只刚刚被人从水中救起的小猫。浑身湿淋淋的，还淌着泥水。一条绳子一头拴住它的脖子，另一头拴着一块石头。我从未见过像它那样善良的目光。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就和那只猫一模一样。请你们听清楚：我并非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也不是人权组织

成员。那么我干什么呢？我走在遭受劫难的城市街道上。夜晚，城市在灯火管制下隐没，而总督、菲利贝尔和其他人将我围在中间。天气异常燥热。我必须找到一块绿洲，就是对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的爱，否则我会立刻死掉。我猜想希特勒也需要放松一下，抚摩他的狗。我保护着他们。谁若想伤害他们，就是想伤害我。我摸着总督给我的无声手枪。我的口袋里满是钞票。我有法国最美丽的名字(是窃取的，但在目前的境况下，这根本算不上是一回事)。我空腹体重九十八公斤。我有天鹅绒般的眼睛。是"前途无量"的小男孩。什么样的前途？所有的仙女都曾飞到我的摇篮前。她们可能是喝醉了。你们的对手可不是好惹的。你们可别碰他们俩一根毫毛！头一次碰见他们是在格雷耐尔地铁车站。我立刻明白，只要碰一下，吹一口气，他们就会粉身碎骨。我真奇怪是凭借哪种神奇力量，他们还活在世上。我想起了水中救起的那只猫。高个子棕红头发的盲人叫科科·拉库尔，小女孩——或是小老太婆——叫埃斯梅拉达。面对这两个生命，我萌生了恻隐之心。一股苦涩、凶猛的潮水将我淹没。然后是眩晕，像随之而来的拍岸巨浪将我攫获：把他们推到铁轨上去吧。我当时准是把指甲都攥进了手心肉里，浑身僵硬。潮水再次吞噬我，汹涌的浪头竟是那么温柔，我闭上了眼睛，陶醉在其中。

我每晚都极轻地推开他们的房门，看他们安睡。我感受到了第一次见他们时的眩晕：真想在兜

里抠响无声手枪，将他们击毙。我要砍断最后一根缆绳，抵达北极；在那里，人已无泪，因为泪水会冻在睫毛上。孤独感也不再能减缓了。一种干枯的悲伤。圆睁的双眼只能面对荒枯的植被。既然我还下不了决心摆脱这个盲人和这个小女孩——或这个小老太婆——，那么至少，我能出卖中尉吗？他的不利之点，是有勇气、自信心，以及一举一动所显出的威严。那直勾勾的蓝色目光使我恼火。他属于令人讨厌的那类英雄人物。但是，我却情不自禁把他看成是一个慈祥的老奶奶。我并不认真看待男子汉。终有一天，我看待所有男子汉，包括我本人，会用现在注视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的目光，那些最强硬、最自负的人，在我看来都要成为需要保护的残疾人。

他们睡前曾在客厅里玩了一阵麻将。柔和的灯光照在书橱上，照在德·贝尔-雷斯皮罗先生那张真人大小的画像上。他们轻轻地推动麻将牌。埃斯梅拉达低着头，科科·拉库尔则咬着拇指。我们周围是死一般寂静。我关上了百叶窗。科科·拉库尔很快入睡。埃斯梅拉达怕黑，我总是把她的门留一道缝，开着楼道的灯。我给她念大约一刻钟的书。常念的书是莱昂·都德夫人的《如何养育女儿》。是我们住进这座私宅时在她房间床头柜上发现的书：“特别是面对存放衣物的大衣柜时，小女孩才开始认真感受到家中的物品。存放单子、内衣的大衣柜，不正是家中安全与稳定的最有代表性的象征吗？

厚厚的柜门里，排列着一叠叠雪白的被单、缎纹的桌布、齐整的内衣。我认为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存放衣物的大衣柜更能使人感到舒适与安全了。”埃斯梅拉达睡着了。我在客厅的钢琴上按出了几个音符。我倚在窗台上。十六区常见的寂静的广场。浓密的枝叶摩挲着玻璃窗。我情愿把这里当作我的家。我对这里的大书柜、粉红色的罩灯和钢琴都已十分熟悉了。我很愿意像莱昂·都德夫人建议的那样培养日常生活的品德。但我没有这个时间了。

房主总有一天要回来。他们将把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赶出去。这点最令我悲伤。我对我自己没有一点怜悯。我只剩下了对同类的恐惧(我因此才会干出无数可耻的行为)和怜悯：虽然他们的狰狞面孔令我毛骨悚然，我也还是认为他们令人动心。我要在这些狂人中间度过整个冬天吗？我的脸色很难看。从中尉到总督，又从总督到中尉，在这两者之间来往穿梭，我已精疲力尽。我力图满足两方面(好使他们谁也不加害于我)。这种两面派的把戏需要有强壮的体力，而我却不具备。于是，真想大哭一场。无忧无虑已让位于英籍犹太人称作“精神崩溃”的状态了。我在思索的迷宫中左冲右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人虽分裂成了两个对立派别，但早已秘密结盟要毁掉我。总督和中尉不过是一个人。我自己不过是一只惊慌失措的飞蛾，从这个灯火飞向那个灯火。每次都烧焦点翅膀。

埃斯梅拉达哭叫起来。我马上赶过去安抚她，她

做恶梦，一会儿就好，很快就会重新入睡。我一边玩着麻将，一边等着总督、菲利贝尔和其他人的到来。我最后一次分析了形势。这边儿是“蜷缩在黑暗中”的英雄：中尉和他总部中勇敢的圣西尔军校学员。另一边儿是总督和他周围的匪徒。我在他们中间摇来摆去。我也有自己的抱负，虽然这种抱负并不远大：只是在巴黎近郊一家旅馆当一名酒吧招待。那里应有高大的门庭，鹅卵石甬道，周围到处都是绿草地，还有高大的围墙。天气晴朗时，从四楼顶上，可以望见远方地平线上矗立的埃菲尔铁塔。

酒吧招待。会习惯的，但有时心里也很痛苦，尤其人在二十岁左右，总以为能有些作为。我没那个命了。要干些什么呢？配鸡尾酒。星期六晚上的顾客很多，点菜要酒的速度越来越快。加泡金酒。亚历山德拉巧克力奶酒。玫瑰夫人酒。爱尔兰威士忌冲咖啡。柠檬片。两杯马提尼潘趣酒。越来越多的顾客坐在柜台前。我在柜台里把五颜六色的饮料混合在一起。可别让他们久等。我怕稍有懈怠，他们就会扑向我。我急忙添满他们的酒杯，完全是为了同他们保持距离。我不大喜欢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要波尔图——弗利卜酒？要什么就给什么。我给他们灌酒。这不过是防备自己同类、或者说摆脱自己同类的一种办法。来杯玛丽·布里扎尔酒？他们的脸已变成猪肝色，步履蹒跚，呆会儿就会烂醉如泥了。我将双肘撑在柜台上看着他们沉睡过去。

他们伤害不了我了。终于宁静下来。我的呼吸总是急促。

我身后的照片是亨利·加拉、弗莱德·布雷多耐尔和战前的另外几个明星。岁月使他们的微笑失去了光彩。手边放着一本画报，是诺曼底号邮船的专刊。烤肉餐厅和后边的座位。儿童游戏室。吸烟室。大客厅。5月25日为赞助海运事业由弗朗丹太太主持的晚会。整条船已沉没。我习惯了。提坦号失事时，我正好在船上。午夜12点了。我在听夏尔·特雷耐① 的老歌：

……晚上好，
美丽的太太……

唱片已划了多处，可我还是听不厌。有时我也换张唱片：

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了散步，
没有了春天，斯温·特鲁巴杜尔……

小旅馆就像是一艘海底观察船一样，停留在被淹没的城市里。这不是亚特兰蒂斯岛② 吗！溺水者

① 夏尔·特雷耐：法国作家、词作家、歌唱家。1913年生于纳博讷。

② 亚特兰蒂斯岛：柏拉图描述的神岛，约在9000年前存在于大西洋海格立斯擎天柱的另一边，在地壳的激变中沉入水下。又译大西洋岛（弗·培根：《新大西洋岛》）。

在奥斯曼大道上漂动。

……你的命运，
斯温·特鲁巴杜尔……

在伏盖咖啡馆里，他们围在桌子旁。其中的大多数已失去了人形。几乎看不清在花花绿绿的烂衣服下的五脏六腑。在圣拉扎尔站的候车大厅里，尸体成堆地漂游；还能看到不少尸体从郊区火车的车门钻出来。到阿姆斯特丹街了。尸体由“老爷酒馆”里涌出，泛着清绿色，可是却比先前的尸体保存得更完好。我继续走下去。爱丽舍——蒙马特尔。马奇克城堡。卢纳公园。里亚尔托舞厅。一、两万名溺水者的动作极度缓慢沉重，就像慢速放映的电影中的人物。死一般的寂静。有时他们也与海底观察船相碰。于是面孔贴在了舷窗上：黑洞洞的双眼，微微张开的嘴唇。

……斯温·特鲁巴杜尔……

我无法浮上水面。空气更加稀薄，小酒馆的灯光摇曳不定。我又回到了夏季的奥斯特里茨车站。人们奔向南方。他们在主要干线的售票窗口前拥挤；他们登上开往昂代的列车。他们将越过西班牙的边界。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有些人还在月台上转悠，但再过一会儿他们也会无影无踪了。是否要留

住他们？我朝巴黎的西部走去。夏特莱。王宫。和谐广场。天空蔚蓝，树叶嫩绿，都显得过分。香榭丽舍的花园就像是温泉浴场。

克雷倍尔大街。我转向左边。契玛罗萨广场。“十六区特有的寂静广场”。音乐亭早已废弃，杜桑-路维杜尔的雕像也长满了黑灰色的癞疤。乙3号的宅子原属于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夫妇。他们曾于1897年5月13日在此举办了一场波斯舞会。舞会上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先生的儿子身穿印度贵族的服装迎接客人。这个年青人第二天死于慈善市场的火灾。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夫人很喜欢音乐，尤其是伊西多尔·德·拉腊的《告别回旋曲》。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先生则在空闲中作画。我必须讲出这些细节来，因为世人早已将这些遗忘了。

八月的巴黎引起人们无限的回忆。明媚的阳光。空荡的街道。吟唱的栗树……我静坐在长椅上，注视着砖石建筑的门面。百叶窗长期关着。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的房间在四层。我住在左边的顶楼上。客厅里悬挂着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先生身着骑兵军官制服的真人大的自画像。我久久地注视着他的面孔和挂满勋章的前胸。荣誉勋位勋章。圣墓十字勋章。门的内哥罗的达尼罗勋章。俄国圣乔治十字勋章。葡萄牙塔和剑勋章。我趁此人不在而占用他的房间。我自言自语：恶梦终有一天要结束，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先生很快会回来将我们赶走。但他们还在折磨这个可怜的人，让他的鲜

血染红萨伏纳里地毯①。我住在乙3号的期间，那里边曾出现了许多怪事。有时，我半夜里被一楼痛苦的喊声、来回的脚步声惊醒。总督说话的声音。菲利贝尔说话的声音。我凭窗朝下看去。他们把两三个人推进楼前停放的汽车里。车门嘭嘭作响。引擎的吼声远去了。寂静无声了。我的睡意全无。我想起了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先生的儿子及其令人恐怖的暴卒。养育他之初绝不会想到这种结局。同样，如果提前几年就向德·朗巴勒公主描述她将遭暗杀，她一定会感到万分诧异。而我呢？又有谁能预见到我会与这群暴徒为伍呢？只要打开灯，下楼到客厅里去，事情就足以恢复其平淡无奇的表象。德·贝尔一雷斯皮罗的自画像仍挂在那里。墙壁里已浸透了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太太使用的阿拉伯香水的味道，会引你转过头去。女主人在微笑。我就是她的儿子，正在度假的马克西姆·德·贝尔一雷斯皮罗海军中尉，正在参加乙3号里艺术家与政界要人云集的一次晚会。参加者有：伊达·鲁宾斯坦，加斯东·卡尔梅特，弗雷德里克·德·马德拉周，路易·巴尔都，戈蒂埃一维拉尔，阿尔芒德·卡西维，布伏·德·圣布莱兹，弗朗克·勒·哈里魏尔，约瑟·德·斯特拉达，梅李·洛朗，米萝·达尔西耶小姐。我母亲在钢琴上弹奏《告别回旋曲》。突然我发现萨伏纳里地毯上有几小滴鲜血。一把路易十

① 萨伏纳里：法国一地毯厂名，意为肥皂厂，因该厂原为肥皂厂。

五时代的扶手椅已被撞翻。刚才喊叫的那个人肯定在毒打后瘫了下去。在角桌下扔着一只鞋、一条领带和一枝钢笔。这种情况下，再也没必要继续回忆乙3号里的美好聚会了。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已离开了屋子。我挽留客人。正在朗诵《金蜜蜂》选段的约瑟·德·斯特拉达惊愕地住了口。米萝·达尔西耶小姐晕了过去。布伏·德·圣布莱兹和戈蒂埃一维拉尔早已不知去向。弗朗克·勒·哈里魏尔和马德拉周已成了惊弓之鸟。阿尔芒德·卡西维和梅李·洛朗也忽地隐去了。只剩下我一人立在德·贝尔一雷斯皮罗的自画像下。我才二十岁。

外面还在灯火管制。总督和菲利贝尔还会乘汽车回来吗？真是的，我生来就不适于生活在这般黑暗的年代。我想法安下心来，搜遍全楼所有的柜橱，一直翻到拂晓。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先生临走时落下了一个红色本子，里面写的是他的一些回忆。有些夜里睡不着觉，我就反复翻看。“弗朗克·勒·哈里魏尔住在林肯街8号。他这个完美的骑士早已被人忘记。但以前曾在阿卡西亚林荫道上散步的人，可是太熟悉他的身影了……”“米萝·达尔西耶小姐是个非常迷人的少妇。那些常常光顾我们古老音乐厅的人，肯定还记忆犹新……”“约瑟·德·斯特拉达这位‘默默无声的隐士’，难道是埋没了的天才？如今已无人对此感兴趣了。”“阿尔芒德·卡西维在此死于孤独和贫困之中。”这个男人知道人生短暂。“谁还会记得阿莱克·卡特，这位杰

出的骑手？谁还会记得理达·戴尔·埃利多？”生活并不公正。

抽屉中有两三张发黄的照片和昔日的信件。德·贝尔—雷斯皮罗太太的写字台上留有一束干枯的花。在一只她没带走的箱子内，有不少沃思时装店的长裙。一天夜里，我穿上蓝色棱纹塔夫绸最漂亮的长裙：饰有极薄的透明罗纱和牵牛花边。那真是最漂亮的裙子了。我无意男扮女装，只是我当时的境况悲惨之极，身心也孤独之极，想借极端的轻浮来振奋一下情绪。面对着客厅里的威尼斯圆镜(我戴着一顶饰有羽毛和花边的朗巴勒帽)，我实在忍俊不禁。杀人犯利用灯火管制下的黑暗。中尉曾对我说，“你要假装与他们是一路货。”他明知我早晚会成为他们的帮凶。为什么要抛弃我？不该把一个孩子单独留在黑暗之中啊。开始时，孩子很害怕，但他能适应这种环境，最后会忘掉还有阳光存在。巴黎再也不是光明之城了。我身穿长裙，头戴花帽，连埃米丽雅娜·达朗松也会嫉妒我。我思考着我在人生道路上的轻率和漫不经心。不是吗？慈善、正义、幸福自由和进步都要人艰苦卓绝地奋斗，需要比我更富幻想的心灵。我一边这样想，一边动手化妆。我享用了德·贝尔—雷斯皮罗太太的脂粉、眼影和塞尔基丝，据说上这种口红苏丹后妃能有少女那般光滑鲜嫩的皮肤。我的化妆尽善尽美：脸上点了许多美人痣，有的像心，有的像弯月，还有的像彗星。然后我百无聊赖，坐在那里等着世界末日的

到来，一直等到黎明。

下午5点了。太阳仍高挂在天空。空荡的广场，周围一片死寂。唯一没关百叶窗的窗户里面，我似乎看见人影。现今谁还住在乙3号呢？我敲了敲门。有人从楼梯走下来。门开了一道缝。是位老妇人。她问我要干什么。我要看看房子。她说主人不在家不能进。说罢又关上了门。她的额头贴在玻璃窗上观察我。

亨利一马尔丹大街。布洛涅森林里的头几条林荫道。我们一直来到内湖的岸边。我和科科·拉库尔、埃斯梅拉达常来这个小岛。从那时起，我就只有一个理想：远远地观察人，越远越好，观察他们的蝇营狗苟，他们的恶毒诡计。小岛绿草茵茵，有中国亭阁，是极好的地方。再走几步吧。卡特兰草地。那一夜我供出地下网成员的地址后，我们曾到过此处。或许到的是大瀑布？乐队正在演奏克里奥尔华尔兹舞曲。邻桌的老叟和老妪……埃斯梅拉达喝着石榴果汁，科科·拉库尔吮着雪茄……待一会儿，总督和菲利贝尔会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我周围的人在跳轮舞，他们节奏越来越快，喧声越来越高。我最终会完全让步，为使他们让我安宁。在此之前，我得好好享受一下这暂时的停顿。科科·拉库尔在微笑，埃斯梅拉达在用吸管吹泡泡……我看着他们俩，就像看一张早期的达格雷照片。时光飞逝。我要是不写下他们的名字，他们俩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就不会流下任何痕迹了。

再往西走一点，就是大瀑布了。我们从未越过那里：叙雷讷桥上有哨兵把守。这恐怕是一场恶梦。此时，河边林荫道沿路，一切都异常宁静。一只驳船上有人向我挥手致意……我回想起我们当初信步走到这里时，我是多么悲伤。无法渡过塞纳河去。只好返回树林中。当时我就明白了，我们是围猎的对象，终将落入他们的重围。火车也不运行了，真遗憾。我本想彻底甩掉他们，到中立国家的洛桑去。科科·拉库尔、埃斯梅拉达和我一起沿莱蒙湖散步。到洛桑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这也是夏季的一个晴朗的下午，和今天一样。塞纳河大道。讷伊大街。马约城门。过去，我们离开树林后，时常在卢纳公园逗留一会儿。科科·拉库尔喜欢打枪游戏和哈哈镜廊。我们会登上越转越快的西罗可毛毛虫。到处是笑声、音乐声。一个场子上有霓虹灯招牌：《暗杀德·朗巴勒公主》。只见一个女人躺在那儿。床铺上方是红色的靶子。爱好打靶的人在那儿拼命地用手枪射击。一旦打中了，床就翻倒，女人便尖叫一声摔下去。还有其它吸引人的血腥的游戏。这一切都不适合我们的年龄。我们像三个被遗弃在魔鬼节日中的幼童，心里十分害怕。这种种疯狂、嘈杂和残暴的游戏，还剩下什么了呢？靠近古维庸一圣西尔大道的空荡荡的小广场。我熟悉这一带。我在阿卡西亚广场住过，是七楼上的一个房间。那时一切都尽如人意：我刚刚十八岁，每月用假证件从海军那儿领取养老金。显然没有人要损害我。我很少和

人交往，除了我的母亲、几只狗、两三个老人和莉莉·玛尔莱讷。整个下午都用来读书或是散步。其他那些与我同龄的人却是异常活跃，这使我吃惊，他们奔向生活，两眼兴奋得放光。而我却要求自己最好不要引人注意。要绝对谦卑。中性颜色的衣服。这是我过去的观点。佩雷尔广场。在季节宜人的夜晚，我常常坐在皇家一维利耶露天茶座上。旁边桌上有人向我微笑。抽支烟吗？他递过来一盒总督牌香烟。我们交谈起来。他和他的一位朋友指挥着一个私人警察组织。他们二人建议我加入他们的机构。他们喜欢我诚实的目光和端庄的举止。我负责跟踪。之后，他们派我重要用场，搞各种各样的调查、搜寻，和秘密任务。涅尔大街177号的公司总部里有一间办公室归我一人使用。这二位老板根本就没有一点让人称道的地方：亨利·诺尔曼，外号"总督"（因为他总是抽总督牌香烟），曾是一个惯犯；皮埃尔·菲利贝尔也是一个被解职的警长。我发觉他们交给我的任务"不大合乎道德"，但我一分钟也没有想过要放弃这种差事。我在涅尔大街办公室里才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第一是要保证我一无所有的妈妈能享受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真遗憾在此之前我把支撑门户这样重要的职责丢在了脑后。既然现在已找到了工作，报酬又颇为丰厚，那么从今以后可要做个孝子了。

瓦格拉姆大街。特尔纳广场。我的左边就是洛林啤酒馆。我与他的约会地点。他受人讹诈，要求

我们组织帮他摆脱这种处境。他眼睛近视，两手发颤，吞吞吐吐地问我有没有“证件”。我十分温和地说有，但必须交给我两万法郎。而且必须是现金。然后才能谈下一步。我们第二天又在老地方见了面。他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装着那笔钱。我没递给他什么“证件”，站起身跑掉了。刚用这类手段时还总是犹犹豫豫，但不久就习以为常了。在类似的买卖中，两位老板分给我百分之十的佣金。那天晚上我给母亲带回了一推车名贵的兰花。她看我这么富有，心里很不安。她或许已猜到，我正为了钞票毁掉自己的年华。她从未问过我一个字。《时间飞逝》：

你告别了一年又一年，
忽到翩翩少年的一天……

我本来想从事一项更崇高的事业，离开这种假警察组织。我对医学倒有兴趣。但不忍看伤口、血迹。然而我却能忍受道德上的丑恶。我生性多疑，善于从坏的方面来观察人和事，以防被人暗算。因此，我在涅尔大街感觉良好，尽管那里边整日谈论的无非是敲诈勒索、欺骗偷盗和各种各样的非法生意。那里边接待的顾客也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最后这一点上，我的老板们比他们毫不逊色。)唯一肯定的一点：刚才我已说过，我挣的钱真不少。我很看重这一点。那还是在皮埃尔一卡尤街的当铺里

（我妈妈和我以前常去那儿。他们拒收我们的假首饰），我就认定我将永世厌恶贫穷。有人会认为我缺乏理想。刚开始我的头脑也很天真烂漫。但这一切在人生路上丢掉了。星形广场。晚上9点了。香榭丽舍大街的路灯像从前那样闪现。他们没有履行诺言。远一望，这是最宏伟的大街，然而它却是巴黎最肮脏的地方之一。“克拉里齐”、“伏盖”、“汗加里亚”、“丽多”、“昂巴希”、“布太尔福里”等旅馆饭店……，每到一处都有新结识。科斯塔切斯科、德·吕萨茨男爵、奥迪沙尔维、早川、莱昂内尔·德·吉也夫、波尔·德·海尔德……冒险家、非法堕胎者、工商业骗子、可疑的记者、无执照的律师和会计，都围着总督、菲利贝尔先生打转。此外，还有一大群风流女人和翩翩的舞女、打吗啡的瘾君子……弗劳·苏尔塔娜、西蒙娜、布克罗、莉迪娅、斯塔尔男爵夫人、维奥莱特·莫里斯、玛各妲·德·安杜里安……两位老板把我引进这伙可疑的人群中。香榭丽舍。人们这样称呼那些有道德、大无畏的幽灵的栖身地。我奇怪我所在的这条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确实看到了一些幽灵，可那是菲利贝尔先生、总督及其追随者的身影。那不是，诺阿诺维希和德·卡格里奥斯特劳伯爵挽着胳臂从“克拉里齐”里走出来。他们一身白色套服，戴着白金戒指。小心翼翼穿过劳尔—拜伦街的年轻人叫欧仁·魏德曼。“庞一庞”门前一动不动的是泰蕊丝·德·帕耶瓦，第二帝国时期最漂亮的妓女。在

马伯夫街的拐角处，贝蒂欧医生在朝我笑。“高丽赛”的露天茶座上，黑市投机倒把商正狂饮着香槟酒。其中有巴鲁兹伯爵、沙波乔尼可夫兄弟、阿希德·冯·罗森海姆、让一法鲁克·德·梅多德、奥托·达·西尔瓦，数不胜数……我若能跑到圆点咖啡馆，就能摆脱这些鬼影。快。香榭丽舍的花园，寂静无声，树影婆娑。它时常令我流连忘返。我整个下午都消磨在这条大街的咖啡馆里。这也是职业需要（我和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会面谈“业务”）。事完后我来这个花园呼吸点新鲜空气。我找个长凳坐下，喘息不止。衣兜里装满钞票。两万法郎。有时是十万法郎。

我们这个机构即使没得到警察局的批准，那至少也得到了它的容忍：我们向它提供所需的各种情报。除此而外，我们还对上面提到的人施行勒索。这样他们就会放心地认为我们不会告发，而会保护他们。菲利贝尔先生与从前的同事们仍保持密切联系，诸如罗戴、达维德、加尔比、儒尔让、桑多尼、贝尔迷约、沙托斯基、弗朗索瓦、戴特马尔这些警长。我的任务之一是汇总勒索来的钱财。两万法郎。有时是十万法郎。这差使真累人。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我眼前又出现了他们的面孔：罪犯形体登记簿上浮肿发绿的脸。有些人一点也不想让步。于是我——生性那么胆小，那么多愁善感——就提高嗓门，大声地向他们喝道：如果还是不交款，我就立刻去巴黎警察局了。我还对他们说起我管理的那些卡

片，老板让我每日一清。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和履历都有记录。那些卡片可不大光彩。于是他们掏出钱包，说我是“告密者”。这个词刺痛我的心。

我又独自一人坐在长椅上了。有些地方适于思索。例如那些街头花园，是隐没在巴黎中的小公园，是尘世喧闹和人欲横流中的一块狭窄的绿洲。杜勒伊公园。卢森堡公园。布洛涅森林公园。但我在哪儿也没有在香榭丽舍花园里思考得多。到底我是干什么的呢？敲诈勒索者？还是警察局的探子？我点好钞票，拿出归我的百分之十。我要去“拉寿摩”店订一兜红玫瑰树，去“奥斯泰尔塔格”店选两件首饰。然后去皮凯、勒龙和莫丽诺店里买五十来条长裙。都送给妈妈。敲诈勒索者、流氓无赖、告密者、眼线，甚至杀人犯，全兼而有之，但却是个孝子。这是我唯一的告慰。夜幕降临了。孩子们坐完旋转木马，离开了花园。远处，香榭丽舍的街灯忽地亮了起来。我自言自语地说，还不如留在阿卡西亚广场呢。小心地避开喧闹的交叉路口和车水马龙的大道，省得碰上不该遇见的人。我这样小心谨慎、竭力避免引人注意，怎么会心血来潮，坐到皇家——维丽耶露天茶座上呢？可是，人总要进入生活啊。谁也无法脱离生活。生活会向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招募者：我赶上了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否则，我也许会在某个晚上遇见一些更体面的人，领我走上纺织工业或是文学的道路。既然我觉得自己毫无特长，那么就等待年长的人来替我谋个差

使。由他们去考虑我该以什么面目出现才会讨他们喜欢。主动权交给他们了。童子军？卖花商？网球运动员？不，都不是，只是一名假警察组织的雇员。干着勒索、告密、诈骗的勾当。对此我也不免奇怪。我并不具备这种行当所要求的恶毒、无所顾忌、追腥逐臭这类品质。但我却走上了这条路，就像别人争取锅炉专业技术证书一样努力认真。事情怪就怪在，像我这类青年，既可能成为英雄，死后葬在先贤祠，也可能成为败类，被处决后埋在替哀墓地。人们不会了解，成为败类者也无可奈何，是被拖进了罪恶的勾当里。别人只关注自己的集邮册，只关注自己能否安安静静地待在阿卡西亚广场上，自由自在地呼吸。

我目前的处境一点也不妙。我消极被动，在生活门口缺乏热情，自然就容易受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的影响。我反复念着住在阿卡西亚广场那里时，同层邻居、一位医生的话："人从二十岁起开始腐烂，神经细胞越来越少了，老弟。"我把这句话记在了一个记事本上，因为，必须利用比自己年长人的经验。现在我明白了他的看法很准确、我搞非法勾当，并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因而面色失去红润。将来又会如何呢？我会跑啊跑，一直跑到一个空场上。都来不及喘息一下，就被人架上了断头台。有人在我耳边说：你在生活中什么也抓不住，只有将你卷走的漩涡……越来越快的茨冈人音乐窒息我的喊声。今晚，这里确实很和煦。和从前一样，到这

一时刻，中心大道上的驴子开始回家去。它们驮着孩子奔跑了一天，现在消失在卡布里耶尔大街那一边。它们的辛劳永远也不会有人知晓。如此忍辱负重令我肃然起敬，驴子过去之后，我又恢复了平静与淡漠。我想集中一下思绪。然而这些思绪少得可怜，又都十分平淡。我太爱动感情，不善于思索。还很懒惰。努力思索了几分钟后，还是得出了同一结论：我迟早要死掉。精神细胞越来越少。长时间腐烂的过程。医生早就告诫我了。应该补充说一下，我的工作使我贪恋声色犬马：二十岁就当上了警察的密探，开始敲诈勒索，也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在涅尔大街177号，陈旧的家具和墙纸在空气中散发一种怪味。灯光始终昏暗。我在木制档案柜后面整理我们"顾客"的卡片。我用有毒植物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顾客"：墨黑的鬼伞菌、颠茄、撒旦牛肝菌、天仙子、青色伞菌……我同他们接触，身体组织也缺钙了。我的衣服上满是涅尔大街177号的浓厚气味。我任其疾病传染给我。是什么疾病呢？是一种衰老催化症，是像那位医生所讲的，道德上和生理上的腐烂。但我并不喜欢这污秽的处境。

一个小村庄

一座老钟楼

就足以满足我的心愿。可我偏偏生活在都市里，生活在巨大的卢纳公园里，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把我

从射击台前拽到了滑车上，又从恐怖宫里拽到了“西罗可”的毛毛虫上。最后我躺在长椅上了。我受不了这一切。我从没向别人提出过任何要求。他们是找到我头上的。

再走几步。左首是大使剧院。那里正上演《夜间巡逻队》，一部已被人遗忘了的轻歌剧。剧场内不会有多少人。也就是一对老年人，还有两、三个英国旅游者。我沿着一片草地、一片矮小的树林走着。到和谐广场了。街灯晃得我双眼生疼。我一动不动，连气也喘不过来。我的头上方，原马尔栗城堡的群马① 直立起来，正全力挣脱人类的羁绊，势欲穿越广场飞奔而去。真是个迷人的场所。没有一处能像此处这样给人以雄踞高山之巅的欢娱。石头与光构成的景象。远处，靠杜伊勒里公园的那一边就是海洋。一艘大邮船正驶向西北，带走了马德兰大教堂、巴黎歌剧院、伯力兹宫和圣三会教堂。我立在后甲板上。邮船快沉没了。明天，我们将葬身于五千米深的海底。我不再惧怕我的同伴了。德·吕萨茨男爵皮笑肉不笑；奥迪沙尔维目光凶残；沙波乔尼可夫兄弟阴险奸诈；弗劳·苏尔塔娜用根橡皮带系住左臂，往绷起的静脉内注射海洛因；吉也夫十分粗俗，金色的秒表挂在胸前，肥硕的手指上全是戒指；伊万诺夫离不开他那性与神的全面协调；科斯塔切

① 原马尔栗城堡牲畜饮水池的奔马雕塑。该城堡原在巴黎大区伊夫林省圣日尔曼昂莱区，为路易十四太阳王所建。毁于十九世纪。该城堡牲畜饮水池装饰有库斯图雕刻的群马，这群马现移于和谐广场的入口处。

斯科、让一法鲁克·德·梅多德、阿希德·冯·罗森海姆谈论着他们欺诈行为的败露；还有总督招募的充当打手的那些匪徒，有疯子阿尔芝、尤雷奥克多、多尼·布罗东、维达尔一雷卡、白脸罗伯特、古阿立、达诺斯、高德包……用不了多久，这些丑类都将成为章鱼、海鳝的腹中食。我将与他们共命运，而且还自觉自愿。很久以前的一天夜晚，当我无所事事地穿过和谐广场时，这一切就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眼前了。当时，我长长的身影一直抵到王室大街口，左手摸着香榭丽舍花园，右手碰着圣弗罗朗丹大街。我本可以想到耶稣—基督，但我却想到了加略人犹大，人们并不了解他这个人。一个人担起人类的卑鄙，这要承受多大耻辱，要有多大勇气才行。为此而献身。孤家寡人。如同一个伟大人物。犹大，我的兄长。我们都具有多疑的天性。无论对我们同类，对我们自身，还是对可能存在的救世主，我们都不抱任何希望。我有足够的勇气跟你走到底吗？艰难之路。天越来越黑。来，我充当暗探和讹诈者的角色，也渐渐熟悉黑暗了。我记下了同伙所有恶念和全部罪行。在涅尔大街紧张地工作了几周之后，我对什么都不觉得奇怪了。无论他们怎么变花样做怪态，也都是徒劳。我看着他们在甲板上沿着通道跑来跑去，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戏言。其实没有必要再这么办了，水已进入船底。马上就要漫到大吸烟室和客厅里。由于海难近在眼前，船上最疯狂的旅客也会引起我的同情。再等一会儿，希特勒

会像个孩子似的扑到我的怀里哭泣。里沃利街的廊柱。发生什么事了。只见环城大道上车辆摆起长蛇阵。人们纷纷逃离巴黎。肯定打仗了。一场出乎意料的大灾难。我在希尔蒂施—凯伊店中选中了一条领带。我走出店门，看着这一块男人们都挂在胸前的布料。这是一条蓝白条领带。这天下午，我也穿着这套浅灰褐色西装和绉胶底皮鞋。我的钱包里只有妈妈的一张照片和一张作废的地铁票。我刚理完发。谁对这些细节也不感兴趣。大家只想逃命。都自私自利。过了些时候，行人车马都无影无踪了。妈妈也走了。我欲哭无泪。这死一般寂静、这空空如也的城市，正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再次瞧了瞧我的领带，我的皮鞋。天空阳光灿烂。几句歌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孑然一身，
已很久很久……

世界的命运如何？我根本不看报纸的头版标题。再说也不会有报纸了。火车也不会再有了。妈妈就差点没赶上巴黎至洛桑的最后一列火车。孑然一人。

他天天苦闷
痛哭流涕
如巴黎的天空……

这正是我所喜爱的缠绵之歌。遗憾的是，此时不宜浪漫。我感到我们正处在一个令人悲伤的时代。周围的一切都在苟延残喘，就不该再哼唱战前的歌曲。我这种行为不合时宜。这是我的错吗？除了马戏、轻歌剧和音乐厅之外，我觉得什么都索然寡味。

走过卡斯蒂利奥内①街，天全黑了。身后有人快步跟了过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是总督。不出我所料，我们在这个地点、这个时间里见面了。这是一场恶梦。这场恶梦的全部情节变化，我事先就了如指掌。他拉着我的胳膊，引我上了一部汽车，然后驱车穿过了旺多姆广场。街灯射出不寻常的蓝光。大陆饭店有个窗户亮着灯。正施行灯火管制。小伙子，你要习惯这些。他突然大笑起来，扭开收音机的旋钮。

芬芳的香气令你陶醉，
这就是
蓝色花……

眼前是一个黑乎乎的建筑物。是歌剧院还是三圣大教堂？左边，“钬雷莱斯科”的招牌闪闪发光。我们过了毕加尔街。总督突然加大油门。

---

① 卡斯蒂利奥内：意大利外交官、作家，1528年发表的《侍臣论》是16世纪的杰作之一。

秀美的双眸使你神魂颠倒
这就是
蓝色花……

接下去又是一片黑暗。一盏大红灯悬挂在克利希广场的“欧罗巴店”门前。车灯忽然照亮了一扇大铁栅栏门和密密的枝叶。是蒙索大花园吧？

秋日的幽会
这就是
蓝色花……

他随着副歌吹起口哨，摇头晃脑地打着拍子。汽车飞速前进。老弟，知道我们在哪儿了吗？猛的一个转弯。我们的肩膀碰到了一起。吱——，车急急地刹住。定时开关不管用了，只好摸着扶手登上楼梯。总督划亮一根火柴，我瞥见门上大理石牌上写着:“诺尔曼—菲利贝尔”公司。我们迈步走进屋内。这里的气味比往常更加令人作呕。菲利贝尔先生站在前厅中央，嘴上叼着根烟卷，正等着我们。见了我，便朝我眨眨眼睛。尽管十分疲倦，我还是向他挤出个笑脸：我想到妈妈已经到达洛桑了。那边儿，她什么也不用怕了。菲利贝尔先生领我们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抱怨电压不足。青铜吊灯发出颤颤悠悠的光亮。对此我毫不奇怪。涅尔大街177号里永远如此。总督提议喝点香槟酒。说着就从左边

兜里掏出一只瓶子。显然，我们公司今后要有很大发展。最近的事态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已在契玛罗萨广场乙3号、一所私宅里安顿了下来。以星期为时间单位的零星小差事结束了。我们已负起了更大的责任。授与总督警察局长头衔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乱世，空缺有的是。我们干什么？搞各种调查、搜查、审讯和逮捕。契玛罗萨广场的机构兼有二职：一是警察机关；二是收购部，专门囤积一段时间里紧缺的商品和原材料。总督已物色了五十多人和我们一起干。都是些老相识了，涅尔大街177号的档案中有他们的名字和照片。说到这儿，菲利贝尔先生递给我们每人一杯香槟酒。为我们的成功干杯。据说我们将成为巴黎的主人。总督摸摸我的脸颊，将一叠钞票塞进我的兜里。他们二人谈论着，不时翻阅卷宗、记事簿，再不就是打电话。有时也能听见他们谈话的一些片断。但根本没法明白他们密谈的内容。我离开办公室，来到隔壁，即我们让“顾客”排队等候的客厅。顾客们曾坐在那些破旧的皮沙发里。墙上贴着许多彩色的石印画片，描绘收获葡萄的景象。还有一只油松木的大橱和几件同样木料的家具。里侧的门通向一间带洗澡间的卧室。夜间我曾独自一人在此整理卡片。就在这个客厅里。没人会想到这套住宅竟是警察机关的所在地。原来住在这里的是一对靠年金生活的夫妇。我拉开了窗帘。寂静得很。忽明忽暗的光线。凋谢物的那种香味。“幻想什么呢，小家伙？”总督大声

笑起来，正对着镜子戴毡礼帽。我们穿过前厅，来到楼道。菲利贝尔先生打亮了手电筒。今晚要在契玛罗萨广场乙3号庆贺乔迁之喜。房主已溜走。我们征用了他们的房舍。该庆祝一下。说干就干。朋友们都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淡紫时光”咖啡馆里等着我们……

接下去那一周，总督交给我一个任务，为我们“机关”了解一位名叫多米尼克中尉的所作所为。我们曾接到过有关这位中尉的指示：“要注意监视。”并附有地址和照片。我们必须利用某种借口接近这个人物。我来到了十五区布瓦罗贝特街的一所小房子门前。这就是他的住所。中尉本人为我开了门。我说要找亨利·诺尔曼先生。他说我找错了地址。于是我含糊不清地讲述了我的境况：我是逃出来的战俘。一位同志曾建议，我一旦逃出去，就到布瓦罗贝特街5号与亨利·诺尔曼先生接触，好找个藏身之处。看来那位同志记错地址了。我在巴黎无依无靠，又身无分文，真不知如何是好。为了使他相信，我还流下了几滴眼泪。他上下打量我一番，领我到他的办公室。他以悦耳的低音对我说：像我这般年龄的青年，国难当头，不该气馁。他再次审视了我一阵，突然问我：“你愿意同我们一起干吗？”他领导一伙“顶呱呱”的人。大多数人像我一样，是逃出来的战俘。有圣西尔军校的学员、现役军官，也有些不是军人。全都信心百倍。都是精兵强将。我们秘密地同目前得逞的强大的恶势力作

斗争。任务很艰巨。但是勇士所向无敌。仁慈、自由与道德会很快恢复起来。他多米尼克中尉可以打保票。我并不赞同他的乐观主义，心里想的是今晚要在契玛罗萨广场把报告交给总督。中尉还给我详细地讲述了其它情况：他称这个小组为地下骑士团。确实也无法地上行动了。只能地下斗争。会有人时时追捕我们。小组的每一名成员都用一个地铁站名作代号。他待会儿就向我介绍其中的几位：圣乔治、奥布黎加多、科尔维沙尔、贝尔内弟，还有其他人。至于我呢，我就叫“德·朗巴勒公主”吧。为什么叫德·朗巴勒公主呢？中尉一时高兴起的。“你准备加入我们的地下网吗？良心未泯的人都会参加的，你不该有丝毫的犹豫。你同意加入了，是吧！”我迟疑地回答说：“同意。”“小伙子，千万注意不能退缩。我知道，现实的确令人忧虑。匪徒们正耀武扬威。空气中弥漫着腐败的气息。这一切日子长不了。鼓起勇气来，朗巴勒。”他要我住在布瓦罗贝特街。但我立刻编了句谎话，说郊区有一位年迈的叔叔可以留我住宿。我们商定第二天下午，在金字塔广场的圣女贞德雕像下会面。“再见，朗巴勒。”他那变得细小的眼睛凝视着我。我无法忍受这明亮的目光。他又说了一遍：“再见，朗巴勒。”他用奇怪的方式重读了每一个音节：朗—巴—勒。他关上门。天黑了。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这个陌生的街区里。他们一定在契玛罗萨广场等着我呢。我告诉他们什么呢？说实话，多米尼克中尉是位英雄。他的

那些精兵强将也是英雄……但还是得给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一份详尽的报告。他们没料到会有这么大规模的地下行动，十分惊奇会有一个地下骑士团。“你要打进去。努力搞到他们的名单和地址。将来好一网打尽。”有生以来我头一次体验到了被称之为良心的谴责。但只是一刹那。他们递给我一张十万法朗。分期付款的期票，算是我提供情报的报酬。

金字塔广场到了。你想忘却过去，可是每次散步，你总不由自主地来到充满痛苦回忆的十字街头。中尉在圣女贞德雕像前来回踱步。他向我介绍了一位金黄色头发的高个儿青年，那个留着短平头，眼珠呈青莲色，名叫圣乔治，是圣西尔军校的学员。我们一起走进杜伊勒里公园，坐在旋转木马旁的卖酒柜台边上。童年时代的情景又历历在目。我们叫了三份果汁饮料。侍者把饮料送到我们面前，说是就剩下这一点战前存货了。不久以后，就再也喝不到果汁饮料了。圣乔治微微一笑：“那我们不喝就是了。”看得出，这位青年态度坚决。他问我：“你是逃回的战俘？哪团的？”“步兵第5团，”我声音有些不自然，“我再不愿提起这些了。”我拼命克制了一下自己，又接着说：“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英勇顽强地斗争下去。”看来我坚定的表白使他放了心。他赞许地同我握了握手。中尉说：“我邀集了几位地下网的成员与你见面，亲爱的朗巴勒。他们等在布瓦罗贝特街。”那里有科维萨尔、奥伯里加多、佩尔蔚蒂和雅斯曼。中尉用热情的话语赞颂我：失败后

的忧国之心。坚决重新投入斗争。从此成为地下骑士团的一员，这是我的光荣和欣慰。“那么，朗巴勒，我们交给你一项任务。”中尉对我说，在我们所处的这样混乱的时期，毫不奇怪，会有许多人趁机充分暴露出他们的恶劣本性。那些恶棍们逍遥法外，他们持有警察的证件和持枪证。他们疯狂地镇压一切爱国的和正直的人们，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征用了十六区契玛罗萨广场乙3号的一所私人住宅。他们的机关公开叫作“巴黎—柏林—蒙的卡罗交换贸易公司”。“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线索。我们的任务是立刻尽快地使这个机构中立化。全靠你了，朗巴勒。你打入这伙人中。把他们的一举一动告诉我们。看你的了，朗巴勒。”佩尔耐蒂递给我一杯白兰地。雅斯曼、奥伯里加多、圣乔治和科维萨尔向我微笑。过了一会儿，我们沿着巴斯德大道往回走。中尉坚持要陪我一直走到赛福尔—勒古尔博地铁车站。我们分手的时候，他直视我的眼睛：“朗巴勒，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某种形式上的两面派任务。时刻与我联系。祝你顺利，朗巴勒。”要是当时就向他说实话呢？已经太晚了。我想到了妈妈。至少她在安全的地方了。多亏了在涅尔大街挣的佣金，我才为她在洛桑买下了一座别墅。我本可以随她一起去瑞士，但不知是由于懒惰还是冷漠，我留了下来。我已说过，世界的命运与我无甚关系。我自己的命运也引不起我多大关切。我只求随波逐流。既无烦恼也无忧愁。那天晚上我告诉总督说，

我已结识了科维萨尔、奥伯里加多、雅斯曼、佩尔耐蒂和圣乔治，还不知道他们的地址但不久便能了解。我向他许诺，很快就能向他提供有关那些青年的一切情报，包括中尉还将向我介绍的其他人的情报。他兴奋地搓搓双手，不断念叨说，照这样干下去，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我早就知道，你这样一张小脸蛋，活脱是一个卖小石膏像的小贩，他们绝不会怀疑你。"我突然一阵眩晕。我对他说：正如我原来所想，中尉不是地下网的头头。"那是谁？"如果我再走几步，就一定会摆脱这个问题。"是谁？""一个叫朗一巴一勒的人，朗一巴一勒。""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你把他调查清楚。"我越陷越深了。是我的错吗？双方都让我当间谍啊。我不愿让任何人失望。既不想得罪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也不想惹恼中尉和圣西尔军校那些年轻学员。我思忖，该作出选择了。是当一名地下骑士，还是当一名契玛罗萨广场大楼雇用的打手？是当英雄，还是当警察的密探？非此也非彼。有那么几本书：《叛徒文选——从阿尔西比亚德到德雷福斯》，《杰阿诺维希真传》，《埃昂骑士的秘密》和《无影无踪的弗雷高里》，从而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但我不是玩世不恭的人。我也体验过人们所说的那种强烈的、无法抗拒的感情冲动。我十分熟悉的感情冲动是"恐惧"，它足以使我去移山倒海。巴黎曾淹没在死一般的寂静和宵禁之中。每当我提起这段时光，总感到是在同聋哑人谈话，或

者我的声音不够响。“我——怕——极——了。”地铁列车哐哐啮啮地爬上了帕西桥。赛福尔—勒古尔博——康伯罗纳——拉莫特—皮凯——杜布雷克斯——格雷奈尔——帕西。清晨，我乘相反方向的地铁，由帕西至赛福尔—勒古尔博。来往于十六区的契玛罗萨广场和十五区的布瓦罗贝特街之间，来往于中尉和总督之间。一个双重间谍的往来穿梭。疲惫不堪。无休无止。“要搞到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来个一网打尽。”“指望你了，朗巴勒。把这些匪徒的情况搞清楚。”我本想作个选择。但对我来说“地下骑士团”和“巴黎—柏林—蒙的卡罗贸易公司”，对我却无所谓。几个狂人向我施加彼此相反的压力，纠缠不休，搞得我疲惫不堪。我肯定是这些狂人的替罪羊。因为我是最弱小者，毫无获得拯救的希望。这种时代要求人们具有杰出的品质，不管是当英雄还是犯罪。而我与这两种品质却偏偏格格不入。墙头草、傀儡。我闭上眼睛，想重温那个时代的芳香和歌曲。是的，当时的空气中确有一种腐败的气味。尤其是傍晚时分。应该说我从未见到过那么美的黄昏。溽暑正在消退，街道上空空荡荡，是没有巴黎的巴黎。可以听到报时的钟声。还有那些建筑物和栗树叶都饱含了的这种气味。当时的歌曲是《斯温·特鲁巴杜尔》、《里约的星》、《我不知结局》、《雷齐纳拉》……想起来了吧。车厢里的灯都涂上了紫色，我几乎看不清其他乘客。左首是埃菲尔铁塔的光束。那么近。我正从布瓦罗贝特街返回。

地铁车辆停在帕西桥上。我真希望它再也不开了，真希望别把我从这河岸之间无人区里拉走。一动不动。无声无息。终于宁静了。我化进了夜色之中。我忘却了他们的吼叫，忘却了他们对我的抚摸，忘却了他们的左拉右拽。恐怖让位于一种无名的麻木状态。我盯着那光束。光束在旋转，好像一位更夫在吃力地巡夜。光束渐渐暗了下去，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几乎看不见的一条细线。我也是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巡逻和成千上万次的往返，最后消逝在黑暗中。为什么干这些，我一无所知。从赛福尔——勒古尔博到帕西。又从帕西到赛福尔—勒古尔博。上午10点来钟，我来到布瓦罗贝特街的总部。友好的握手。这些勇士们目光清澈，面带笑容。"有什么新闻吗，朗巴勒?"中尉问我。我提供的有关"巴黎—柏林—蒙的卡罗贸易公司"的情报越来越详尽。是的，这确实是个警察部门，从事非常"卑鄙的活动"。头领是亨利·诺尔曼和皮埃尔·菲利贝尔，他们网罗了一群歹徒：无耻的强盗、拉皮条的掮客和该流放的人。还有两三个死刑犯。每人都有警察证件和持枪证。这是一个以契玛罗萨广场这个洞穴为核心的走私公司。一群唯利是图的投机商、打吗啡的瘾君子、江湖术士和声名狼籍的风流女人，都是乱世中的魑魅魍魉。他们有恃无恐，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据说，如果塞纳地区的警察署和检察院还存在的话，他们的头头亨利·诺尔曼就可以在那里说一不二。我不停地说下去，看到他们脸上的惊

愕与憎恨的表情。只有中尉一人的神情难以捉摸。“干得好，朗巴勒！继续干下去。你要把契玛罗萨广场那个机关人员名单全开列出来。”

后来有一天上午，他们的表情比平时更加严肃。中尉清了清嗓子：“朗巴勒，你要去搞一次暗杀。”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话，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似的。“我们要靠你去除掉诺尔曼和菲利贝尔。要找个好时机。”接下来便是一阵沉默，圣乔治、佩尔耐蒂、雅斯曼和所有其他人都神情激动地看着我。中尉坐在办公桌后一动不动，科维萨尔递给我一杯白兰地。我想，这是给死囚犯的酒。我真切地看见了屋中竖起的断头台。中尉是刽子手。他的那些精兵强将们朝我怜悯地笑着；他们在一旁观赏行刑。“你看怎么样，朗巴勒？”“哦，好极了。”我回答说。我真想大哭一场，向他们诉说我十分微妙的、双重间谍的处境。可是有些事情只能存在心里，不能与外人道。我从不多说一句话。天生的不苟言笑。但是其他人却毫不犹豫地、翻来覆去地向我叙述他们的想法。我至今还记得和地下骑士团成员一起度过的那些下午。我们在布瓦罗贝特街附近的沃日拉尔瓦内散步，听他们东拉西扯。佩尔耐蒂想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他兴奋得双颊绯红。他从钱包中掏出罗伯斯庇尔和安德烈·布鲁东的照片。我假装对这两位人物十分赞赏。他不停地念叨“革命”、“觉醒”，“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干巴巴的调子直刺我的心。他抽着烟斗，穿一双黑色皮鞋——

这些细节使我动情。科维萨尔恨自己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里。他尽量忘记蒙索大花园、艾克斯—勒班的网球场，以及他每周在表姐家里品尝的那些普鲁维耶式葡萄干大蛋糕。他问我社会主义者可不可以同时又是基督徒。雅斯曼倒希望法国能绷紧一点儿。他崇拜亨利·德·布尔纳载尔，知道所有星宿的名称。奥伯里加多在写一份“政治日记”。他向我解释说：“我们要为历史作证。我不能沉默。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缄默不语是很容易学会的，只要有人朝你脸上踹两脚就行。皮克匹斯让我看他未婚妻的来信。按他的说法，只要再忍耐一点，恶梦就一定会消逝。我们不久就会生活在太平世界里。我们将向我们的孩子们讲述我们遭遇的苦难。圣乔治、马伯夫和佩尔波尔满怀尚武精神，走出了圣西尔军校，决心高唱着战歌去英勇牺牲。我呢，只想着我每日应该向契玛罗萨广场所作的报告。这些年轻人真幸运，可以自由地幻想。沃吉拉尔地区太适于幻想了。多么安静，多么安全，简直就像外省的小城镇。地名本身就意味着那绿叶、青藤和苔藓铺岸的小溪。他们在这样僻静的地方，尽可以幻想最英勇的业绩。毫无风险。被派去接触严酷现实，去蹚污泥浊水的是我。显而易见，崇高二字与我无缘。临近傍晚时，我在乘地铁之前，要在阿道夫—舍里乌广场的长椅上再休息一会儿，让这个村庄的温馨再浸浸我的心脾。一座带花园的小屋。是修道院还是养老院？我聆听林木的低语。一

只小猫从教堂前走过。不知从何处飘来了温柔的歌声。弗莱德·古安唱的《送花》。此时，我忘记了我已没有将来可言，觉得还能开辟新的生活道路。就像皮克匹斯说的，耐心一点，就能安然脱离恶梦。我会在巴黎郊区的一座小客栈里找到一个酒吧侍者的位置。酒吧侍者。这差使才合乎我的兴趣爱好，才能发挥我的才干。你站在大柜台的里边。别人不能侵犯你。再说他们对你也并无恶意，只会向你要酒。你服务得既快又好。最凶的人也向你表示感谢。这酒吧侍者的职业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高贵。唯独它能和警察、医生相比，这是三种格外引人注意的职业。具体干什么呢？配鸡尾酒。也可以说是美梦。是祛除病痛的良药。柜台上，他们低声向你恳求。柑香酒？玛丽·布里查酒？以太酒？悉听尊便。他们两、三杯酒下肚，就感伤起来，脚步蹒跚了，醉眼迷离，滔滔不绝地向你诉说他们的苦难，他们的罪恶，请求你安慰，直到天明。就连希特勒也会在打嗝的间歇里求你宽恕。“想什么呢，朗巴勒？”“没想什么，我的中尉。”有时候，他也把我留在他的办公室里，“单独”与我谈一会儿。“你务必要完成这次暗杀任务。这是我对你的信任，朗巴勒。”他说话的口气很威严，深蓝色的双眼紧盯着我。把真相告诉他？什么真相呢？双重间谍？还是三重间谍？我也不知自己是什么人了。我的中尉呵，我是个不存在的人。我根本没有身份证。他会认为在这种时代，人人都应坚强起来、都应显示出特殊品质，

真不该这样漠不关心。一天晚上，只有我和他在一起。疲劳就像是一只老鼠，把我周围的一切都啃得模模糊糊。看上去，四壁都忽然蒙上了深色的天鹅绒，浓雾弥漫了整个房间，写字台、座椅、诺曼底式的橱柜等家具的轮廓都朦胧不清了。“有什么新情况吗，朗巴勒？”他的声音显得那么遥远，吓了我一跳。中尉还像平常那样望着我，只是眼睛里没有了那种金属般的光泽。他坐在写字台后边，头歪向右侧，面颊几乎触到了肩膀，一副沉思与疲倦的神态，如同我见过的佛罗伦萨的天使。他又问：“有什么新情况，朗巴勒？”那声调就好像是在说：“是真的，这一点也不重要。”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目光十分温柔，十分忧伤，我甚至觉得多米尼克中尉理解并原谅了我：原谅了我所充当的双重（或三重）的间谍角色，原谅了我像暴风雨中一颗小草那样的惶恐，也原谅了我由于怯懦或疏忽而犯下的罪孽。头一遭儿，别人对我的遭遇，这还是头一回有了兴趣。这样温厚的态度令我心慌意乱。我想说几句感激的话，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中尉的眼神越来越温柔，脸上粗暴的表情荡然无存。他的身躯慢慢下沉。不一会儿，那充满高傲与活力的形象不见了，只剩下宽厚、疲倦的老妈妈。外界的喧嚣被覆盖着天鹅绒的墙壁挡住。我们在舒适的昏暗中下沉，进入无人惊扰的深邃的梦乡。巴黎也和我们一起沉降。我从驾驶仓里看到了埃菲尔铁塔的那束光：那是指示我们靠近海岸的灯塔。但我们永远也不会抵达岸边

了。无所谓。“该睡觉了，老弟。睡觉！”他喃喃地说。黑暗之中只有他的双眼闪着光。睡觉。“你在想什么，朗巴勒？”他摇动我的双肩，斩钉截铁地说：“快准备好去完成暗杀的任务。整个地下网的命运都操在你的手中。你绝不能退缩。”他神经质地来回大步走动。事物又都恢复了往日的冷酷。“勇敢点，朗巴勒，全靠你了。”地铁车厢起动了。康伯罗纳——拉莫特—皮凯——杜布雷克斯—格雷耐尔—帕西。晚9点了。在富兰克林和维诺兹两条街的路口，我找到了我停放在那儿白色奔特利牌汽车。这是总督奖励我的。地下骑士团的成员若是看见这辆车，准会十分反感。在这种年月开豪华车，这本身就意味没干什么好事。只有不法商人和挣大钱的密探，才能买得起这种豪华车。管他呢。我最后的一点顾忌，也随着身体疲倦的到来而无影无踪了。我缓缓驶过特罗卡的罗广场。引擎轻得没有一丝声响。全是俄罗斯皮罩面的座椅。我真喜欢这辆奔特利。我打开工具箱：车主的证件还都留在那儿。总之是一辆偷窃来的轿车。总有一天，别人要同我们算帐。到那一天，我站到法庭上，面对着被揭露的“巴黎—柏林—蒙的卡罗交换贸易公司”的罪行，我该采取何种态度呢？法官会说：这是群恶棍。他们利用国难和恐慌来谋取私利。马德兰·雅克布会这样写：一群“魔鬼”。我打开了汽车收音机。

今夜晚

我独对
这伤悲……

驶到克雷倍尔大街，我的心跳得更快了。巴尔的摩私宅的大门。契玛罗萨广场。乙3号的门前，总是高德包和白脸罗伯特站岗。高德包朝我微微一笑，露出满口金牙。我登上二楼，推开客厅的门。总督穿着一件暗粉色挖花丝织睡袍，用手向我打个招呼。菲利贝尔先生正在查阅卡片："我的斯温·特鲁巴杜尔，地下骑士团如何了？"总督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递过一杯白兰地："可不好买了。三十万法郎一瓶。别紧张。契玛罗萨广场不知什么叫定量配给。地下骑士团有什么新消息吗？"没有，我还没搞到"地下骑士"们的地址。我保证这个周末前一定弄到。"我们为什么不找一天下午，当'地下骑士团'的成员都在布瓦罗贝特街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呢？你看如何，特鲁巴杜尔？"我反对这个办法。还是一个个逮捕好。"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啊，特鲁巴杜尔。"我竭力劝他们耐心等待，承诺一定要搞到最关键的情报。等哪天，他们再这样纠缠不休，我要履行诺言。一定会"一网打尽"的。那时我就真的成为"告密者"了。一听到别人提起这个词，我就一揪心，感到一阵眩晕。告—密—者。但我还是尽量拖延，向两个头头说明"地下骑士团"没有什么危险，是一群幻想家、理想主义者，仅此而已。干吗不让那些可爱的傻瓜们去胡思乱想呢？

他们患有青年特有的狂热症，很快就会好的。再过几个月，他们就会恢复理智。中尉自己也会放弃斗争。再说这又是什么样的斗争啊！无非是狂热的喋喋不休：什么正义啦，进步啦，真理啦，民主啦，自由啦，革命啦，尊严啦，祖国啦等等。我看这一切都无碍大局。依我说，唯一危险的人物是朗—巴—勒，一个我还没搞清身份的家伙。此人无踪无影，无法捕捉。他会以最激烈的方式采取行动。在布瓦罗贝特街这里，人们一提起他，就会因为惧怕和羡佩而声音颤抖。朗—巴—勒！你是谁？当我问中尉时，他也支支吾吾。“现在让无耻匪徒和出卖灵魂的人占了上风，但朗巴勒绝不会饶过他们。朗巴勒会既快又狠地打击他们。我们无条件地服从朗巴勒。朗巴勒绝不会错。朗巴勒是个了不起的人。朗巴勒，我们唯一的希望……”我无法获得进一步的细节。再耐心一点，我们会挖出这个人来。我反复向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说，抓住朗巴勒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朗巴勒！至于其他人，根本无足挂齿。我要求放过他们。“看看再说吧。首先要搞到这个朗巴勒的情况。知道了吗？”总督阴险地咧了一下嘴。菲利贝尔一副沉思相，一边缕着小胡子，一边念叨：“朗巴勒，朗巴勒。”总督最后下了决心：“我要亲手干掉他，这个朗巴勒。伦敦、维希、美国人，谁也救不了他。白兰地还是克雷文酒？老弟，自己倒。”菲利贝尔说：“我们刚刚与塞巴斯蒂亚诺·德·皮昂波谈妥。这是给你的百分之十的佣金。”说着递

给我一个浅绿色的信封。“明天给我找几件亚洲的青铜器。我们要与一位顾客谈生意。”我对他们交给我的这项次要任务反而更有兴趣：去搜罗艺术品，立即带回契玛罗萨广场来。清晨，我来到那些事变后已逃离巴黎的富有人家。撬锁很容易，或是向看门人出示一下警察证件，拿了钥匙开门进去。仔细搜查每一间被放弃的房屋。房主离开时，屋里丢下了许多无足轻重的东西，如粉画、花瓶、小挂毯、书籍、手稿等等。但光这还不够，我还得搜遍那些家具贮藏室、一切在动荡时代可能藏匿价值连城的艺术品的地方。郊区的一间阁楼里，就曾藏着一批法国戈布兰挂毯和波斯地毯；在尚贝莱城门附近一座破车库里，还翻出了许多名画。奥多耶的一个地窖里有一个小箱子，锁着远古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珠宝。干这种劫掠行当，我心情挺愉快，甚至还有点兴高采烈。但将来上法庭，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偷盗、投机倒把已成了家常便饭。而且总督很有眼力，没让我去回收有色金属，而是派我去搜集艺术品。我对此很感激。我领略了审美中的无穷乐趣。比如，我站在戈雅那表现暗杀德·朗巴勒公主的画前，就是如此。这幅画的主人自以为万无一失，把它放在海尔德街3号，法一塞(尔维亚)银行的保险柜里。但我只挥了挥警察局的证件，就不费吹灰之力地拿到了这件杰作。我们把搞到的东西全卖了。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将把我造就成一个“不大光彩”的人物。“告密

者、抢劫犯、或许还是一个杀人犯。”但我并不比别人坏多少，我只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我对作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有一天，我遇到一位穿金戴银的老先生，他用假嗓子向我解释说，他从《神探》杂志上剪下那些罪犯的照片，觉得他们有一种“凶残”与“不祥”之美。他吹嘘这些人的孤寂是“始终不渝”和“崇高伟大”的。他跟我谈起其中的一个叫欧仁·魏得迈，说他是“冥间的天使”。这家伙是个文人。我对他说，魏得迈被处决时穿着一双绉胶底鞋。是他母亲在法兰克福给他买的。人若还有爱人之心，就要注意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其余事根本就不重要。可怜的魏得迈！在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希特勒吮着手指睡着了。我的目光瞥他一眼。他像正在做梦的小狗那样嘶嘶地叫着。他蜷曲着，缩小，又缩小。最后会变得能握在我手心里了。“斯温·特鲁巴杜尔，你想什么呢？”“想我们的元首，菲利贝尔先生。”“我们很快就要卖掉哈尔斯的画。你可以从中提取百分之十五的劳务费。如果你能帮我们把朗巴勒抓住，我给你五十万法郎的奖金。老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来点白兰地？”我的头都晕了。可能是花的香气熏的。屋内到处布满了大丽花、兰花。两窗之间的玫瑰花枝叶遮住了半截。德·贝尔一雷斯皮罗的自画像。晚上10点了。他们先后挤满了屋子。总督身着绿斑点的石榴红无尾常礼服迎接他们。菲利贝尔先生朝他们点点头，又继续翻阅他的卡片。他不时地走向某人，

短短地交谈一会儿，做做笔记。总督给他们端来烟酒和各式糕点。德·贝尔—雷斯皮罗夫妇看到他们的客厅里聚集了那么些人，定会十分吃惊。这里有莱昂内尔·德·吉也夫“侯爵”，他曾因偷盗、背信、窝藏、非法佩戴勋章等罪判过刑；有科斯塔切斯科，他曾是罗马尼亚的银行家，专搞交易所投机，欺诈性破产；有加埃唐·德·吕萨茨“男爵”，是热衷于上流社会的舞男，持有摩纳哥与法国的两份护照；有波尔·德·海尔德，是江洋大盗；有阿希德·冯·罗森海姆，是1938年的德意志先生、职业舞弊家；有让—法鲁克·德·梅多德，他拥有“秋日马戏团”和“淡紫时光”咖啡馆，靠作淫媒谋利，是英联邦国家不受欢迎的人；有费尔迪南·普佩，外号早川保罗，是保险经纪人、爱冒险的狂热人物，擅长伪造、使用假文书；有奥托·达·西尔瓦，是“富有的种植园主”，领取半饷的间谍；有巴鲁兹“伯爵”，他是艺术品专家、吸食吗啡的瘾君子；有达尔基耶，外号“德·贝尔普瓦”，是非法开业的律师；有“魔术师”伊凡诺夫，是保加利亚的江湖医生、“科普特派教会的正式纹身师”；有奥迪沙尔维，是白俄罗斯人中的警察密探；有米基·德·瓦赞，“聪明伶俐的贴身侍女”，是个同性恋卖淫者；有科斯坦梯尼，原飞行指挥官；有让·勒乌落，是个记者，曾任帕乌瓦俱乐部的司库，讹诈专家；还有沙波乔尼可夫兄弟，我始终不知他们的社会身分，也不知他们到底一共是兄弟几人。还有一些女

人：吕丽·翁斯坦，人称“弗劳·苏尔塔娜”，曾是理高莱特的有才能的舞蹈演员；有玛格妲·德·安杜里安，曾是帕尔米拉“风流与审慎”旅馆的老板娘；有薇奥莱特·莫里斯，女子举重冠军，她总穿着男子服装；有恩普罗希娜·马鲁西，拜占庭的公主，她嗜酒成癖，是女子同性恋患者；有西蒙娜·布克罗和伊雷娜·德·特朗蔡；前“一二二”剧团的领固定报酬的演员；还有莉迪娅·斯塔尔男爵夫人，她极喜爱香槟酒和鲜花。所有这些人都经常光顾乙3号。他们在宵禁、失望与痛苦的时代，一下子涌现出来，就像自然生出的一代人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巴黎—柏林—蒙的卡罗贸易公司”里任职。吉也夫、梅多德和海尔德领导皮货部。靠着他们那些上门推销员的油嘴滑舌，他们弄到了成车皮的铬鞣小牛皮，公司又转手把这些皮革十二倍的高价转手。科斯塔切斯科、早川和罗森海姆选择管金属、油料和石油；原指挥官科斯坦梯尼的管辖范围较小，但收益颇丰：玻璃制品、香水业、麂皮、干点心和螺钉、螺母。总督交给其他人一些更难处理的事务：吕萨茨负责照看和保护每天流到契玛罗萨广场的大笔金钱。达·西尔瓦和奥迪沙尔维的差事是收回黄金和外汇。米基·德·瓦赞、巴鲁兹和莉迪娅·斯塔尔“男爵夫人”负责将那些我可以从中找到艺术品的私宅一一编号。早川和让·勒乌落负责机关的帐目。达尔基耶是我们的顾问律师。至于沙波乔尼可夫兄弟，并没有明确职务，到处东奔

西跑。西蒙娜·布克罗和伊莱娜·德·特朗蔡是总督的贴身“秘书”。马鲁西公主是我们在上流社会和金融界里的同谋者。弗劳·苏尔塔娜和薇奥莱特·莫里斯充当告密者，得到了丰厚的酬金。玛格妲·德·安杜里安，一个有头脑又敢想敢干的女人，开发了法国的北部，为乙3号提供了不少平方公里的防雨布和精梳羊毛毯。最后，还不应忘记那些被赋与纯粹警察任务的成员：多尼·布鲁东，自作多情的美男子，曾任外籍军团的士官，是拷打人的老手；尤·雷欧克卢，妓院老板；维达尔—雷卡，人称“金面佛”，却是职业杀手；疯子阿尔芝，他的口头禅：“我要反击他们，反击他们，彻底反击他们！”高德包和白脸罗伯特，该流放的犯人，是我们的门房和保镖。达诺思，外号“毛象”和“大钟”；古阿里是“美国人”，一个持枪抢劫犯，窃贼……总督统治的这个小团伙在将来的法律编年史上会被称为“契玛罗萨广场的匪徒”。但在目前，一切都是那么妙不可言。吉也夫说要收买维多里纳(古巴)、爱尔多拉多(奥)和瓦格拉姆游乐场(巴黎)的电影制片厂；海尔德正创建一个“联合总公司”，把蓝色海岸的所有旅馆都垄断起来；科斯塔切斯科已购下了十来处房产；罗森海姆宣称：“我们马上就会用几个铜子把法国买下来，等着将来再把她卖个好价钱。”我耳闻目睹着这些狂徒的言行。吊灯下，他们脸上的汗水直往下淌，话语的速度越来越快：回扣、佣金、存货、车皮、赚头……沙波乔尼可夫

兄弟的数目越来越多，他们不知疲倦地给杯子斟满香槟酒。弗劳·苏尔塔娜摇动老式唱机的摇把。约翰·赫斯在唱：

尽情地
寻欢
忘记吧
忧烦……

她敞开怀，带头跳起了摇摆舞。其他人跟着跳了起来。高德包、达诺思和白脸罗伯特走进客厅，穿过跳舞的人群，来到菲利贝尔先生面前，朝他低语了一阵。我眼望着窗外。一辆不打车灯的汽车停在乙3号门前。维达尔—雷卡拿着手电筒，雷欧克卢打开车门。一个带手铐的男人走了下来。古阿里粗暴地把他推向台阶。我想起了中尉，想起了沃吉拉尔街的小伙子们。终有一天晚上，像现在一样，我看着他们被锁着走进来。布鲁东会让他们过电刑。然后……我能忍受这种悔恨而继续生活下去吗？佩尔耐蒂和他的黑皮鞋。皮克匹斯和他未婚妻的信。圣乔治的那双青莲色眼睛。他们全部美梦将在乙3号地下室那血迹斑斑的墙壁里化为泡影。这全是我的罪过。说到这儿，千万别以为我是在信口胡说什么“电刑”、“宵禁”、“告密者”、“职业杀人凶手”。我是在叙说我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没有丝毫修饰。没有一点夸张。提到的都是真

人真事。我甚至严谨到用其真名实姓。说到我的个人喜爱，我更喜欢蜀葵、月色下的花园，以及和平日子里的探戈。我有少女般单纯的心。但我时运不佳。可以听到地下室传来他们的阵阵呻吟。但敌不过播放的音乐声。约翰·赫斯还在唱：

既然有我在
就会有
节拍
旋律展双翅
送您上天外……

弗劳·苏尔塔娜尖声喊叫着撩拨众人。伊凡诺夫挥舞着他那根“轻金属魔棍儿”。这些人你拥我挤，气喘吁吁，脚步越跳越狂乱，撞倒了大丽花盆，但手舞足蹈跳得更欢。

音乐
就是
神奇的春药……

双门大开。高德包、达诺思架着他的双肩。他的手铐还未卸掉，满脸是血，步子踉踉跄跄，瘫倒在客厅中央。大家都静静地一动不动了。只有沙波乔尼可夫兄弟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在收拾花盆的碎片，重新把花盆摆好。其中一人轻手轻脚

地走向莉迪娅·斯塔尔，递给他一枝兰花。

"我们若总碰上这种好充硬汉的人，可不好办哪。"菲利贝尔先生说。"再耐心一点吧，皮埃尔，他会说的。""我看不会，亨利。""那也好，我们就让他做个殉道者吧。看来需要几个殉道者。""当殉道者才是傻瓜呢。"莱昂内尔·德·吉也夫咕噜道。"你不想说吗？"菲利贝尔先生问道。总督低声说："我们不想和你纠缠很长时间。如果你不回答，那就是说你是不知道了。"菲利贝尔先生又说："不过，如果你知道的话，那还是说出来的好。"

他抬起头。萨伏纳里地毯上、他额头挨着的地方，留下了一滩血迹。他那青莲色(和圣乔治的眼睛颜色一样)的眼睛里，露出一种嘲讽的光芒。或者说是蔑视。人可为其理想而献身。总督啪啪的抽了他三个耳光。但他仍然怒目而视。薇奥莱特·莫里斯朝他脸上泼去一杯香槟酒。占星家伊凡诺夫低低地问："先生，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左手？"人可以为他的理想而献身。中尉曾不断对我说："我们大家都准备为我们的理想而献身。你呢，朗巴勒？"我没敢向他承认，假如我要去死，那将是死于疾病，死于恐惧或是悲伤。"看头！"吉也夫大声嗥叫一声，用白兰地酒瓶朝他额头狠狠地砸去。"给我左手，你的左手。"伊凡诺夫还在要求。"他会说的，"弗劳·苏尔塔娜叹了一口气，"我敢保证他会说。"边说边裸露出她的肩膀，挑逗地笑着。"流了……这么多血……"，莉迪娅·斯塔尔男爵夫人结结巴巴

地说。他的额头再次摔到了萨伏纳西地毯上。达诺思将他拽起来，拖出了客厅。几分钟以后，多尼·布鲁东低低地宣布:“他死了。至死没开口。”弗劳·苏尔塔娜耸了耸肩膀，扭过身去。伊凡诺夫眼望着天花板，想着什么。“还真有了不起的家伙。”波尔·德·海尔德说。“你说的是些死顽固。”巴鲁兹“伯爵”反驳说。“我差不多有点肃然起敬了。这是我见过的头一个宁死不屈的人。”菲利贝尔先生也承认。总督说:“皮埃尔，像这样的小伙子会坏我们的事。”半夜12点了。大家都有倦怠之意，纷纷瘫坐在长沙发、软圆墩和安乐椅上。西蒙娜·布克罗走到威尼斯大镜子前修整她的化妆。伊凡诺夫认真地审视着莉迪娅·斯塔尔男爵夫人的左手。其他人随便聊着天。到了这时候，总督把我拉到窗户前，与我谈论他一定会获得的“警察局长”头衔。他早就梦想这一天了。当初，他还是个孩子、还待在爱丝少年管教所的时候，就有了这种念头。后来在巴特达夫和弗雷纳监狱时，也未曾放弃这一梦想。他手指着德·贝尔—雷斯皮罗的自画像，对我列数他胸前的各种奖章。“只要把我的脑袋换上去就行。给我找一个能干的画家来。从今开始，我就是亨利·德·贝尔—雷斯皮罗了。”他十分欣赏这一称号，不断地重复:“警察局长亨利·德·贝尔—雷斯皮罗先生。”这种想让人尊敬的愿望如此强烈，我着实吃惊，因为我也曾在我父亲亚历山大·斯塔威斯基的身上发现这一点。他自杀前写给我妈妈的信，我一

直带在身边。“我特别希望你做到的，就是要用荣誉与正直的情感来教育我们的儿子；并且要在他长到十五岁、进入青春期时，注意他常与谁接触，使他在生活中得到正确的指引，使他将来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我认为，他自己本来也愿意在外省的一座小城中度过他最后的日子。几十年嘈杂、晕眩、幻景和急速漩涡之后，是需要安宁。我可怜的爸爸。“你看吧，当我当上警察局长后，一切都会解决的。”其他人在低声闲扯。沙波乔尼可夫的一个兄弟端来一托盘桔子水。要不是地毯上有血迹，他们穿着色彩斑驳的衣服，你真觉得是在同正人君子在一起。菲利贝尔先生整理好卡片，坐到钢琴前，用手绢掸去琴键上的灰尘，打开一本曲谱。他弹起了月光奏鸣曲的柔板。总督小声对我说：“他特别喜爱音乐。手指尖都充满了艺术家的气息。这样有才能的小伙子，不知为什么也混在我们中间。”我极度悲哀，欲哭无泪，我极度疲倦，欲睡不能，只觉得双眼在无限地胀大，就好像在黑夜中，我一直伴随着这痛苦而又坚韧的曲调前行。左右两边的黑影攥住我的衣角，你拉我拽，一会儿喊我“朗巴勒”，一会儿叫我“斯温·特鲁巴杜尔”，把我从帕西推向赛福尔—勒古尔博，又从赛福尔—勒古尔博推向帕西站，我一点也不明白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真没办法，整个世界充满了喧嚣与疯狂。我僵硬得像个梦游者，在这种动荡中穿行。眼睛睁得大大的。最终一切都会平静下来。菲利贝尔先生弹奏的乐曲会一点

点地侵入世上的人和物。我对此坚信不移。他们离开了客厅。靠墙的桌子上有总督的留条："要尽快把德·朗巴勒供出来，不能再拖延了。"他们汽车的声音越来越远。于是我站在威尼斯大镜子前，一字一顿地说：我—就—是—朗—巴—勒—公主。我凝视镜中的我，额头顶着镜子：我就是德·朗巴勒公主。黑暗中，杀人犯在找你。他们摸索着，险些碰上了你，被家具磕磕绊绊。时间过得真慢。你屏住了呼吸。他们能找到开关吗？但愿结束吧。我将无法继续长时间忍受眩晕，会径直走向总督，睁大双眼，将脸贴向他：我—就—是—德—朗—巴—勒—公主，地下骑士团的头头。除非在这之前，多米尼克中尉突然站起来，神情严肃地说："我们中间有个奸细，一个名叫'斯温·特鲁巴杜尔'的人。""他就是我，中尉。"我抬起头。一只飞蛾在吊灯间飞来飞去，逃避遭焚的命运。我把灯关上。从来没有人这样温情地关注我。我只能自己闯过去了。妈妈远在千里之外的洛桑。真是她的幸运。我可怜的父亲，亚历山大·斯塔威斯基早已故去。莉莉·玛尔莱讷已把我忘却。我孤独一人。不管是布瓦罗贝特街还是契玛罗萨广场，哪儿也没有我的位置。在塞纳河左岸，我向地下骑士团勇敢的小伙子们隐瞒我的密探真面目；在塞纳河的右岸，"德·朗巴勒公主"的名字使我陷入严重的窘境。我到底是谁？有什么证件。只有一本假南森护照。到处都不受欢迎。处境岌岌可危，我无法入睡。没什么了不起。除了

我在契玛罗萨广场街里担任的“回收”艺术品的任务外，我还有一项附属的工作，在乙3号守夜。菲利贝尔先生、总督和他们的客人走后，我本可以回到德·贝尔一雷斯皮罗的卧室里去。但我留在了客厅。灯上那淡紫色的灯罩在我周围画了一个大圆光圈。我打开一本书：《埃昂骑士的秘密》。几分钟过后，书从我手中滑落。我忽然吃惊地认识到：我绝不会活着摆脱这种处境。那段柔板的悲伤旋律又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客厅里的花朵一片片地失去花瓣，我飞快地衰老了。我最后一次站到威尼斯大镜子前，在那里边看到了菲利普·贝当的面孔。我发现他眼光过分明亮，皮肤过于粉红。最后，我变成了李尔王。再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我自孩提时起就很少流泪。据说流泪就是在解除痛苦。但是尽管我日复一日地努力，我还是没有享受到这样一种幸福。于是泪水便像硫酸液一样，在内部腐蚀我。这就是我忽然衰老的原因。医生早就告诫我：你二十岁时就会像李尔王一样了。本来是希望显得更活泼潇洒一些。难道是我的错吗？刚开始时，我本有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但后来，却极度悲伤，乃致睡卧不安。一双眼老是睁着，变得特别大。大得都快挨着上唇了。还有，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让我看一眼或是碰一下，就会变得粉碎。在客厅里，花木凋零。香槟酒杯乱堆在角桌、写字台和壁炉上。这表明很久以前，这里曾举行过宴会。也许就是1896年6月20日那天，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先生为步态

舞女明星卡米尔·杜·加斯特举行盛大舞会后留下来的。这里是一只被遗忘的遮阳伞，那里是土耳其烟卷的烟蒂，还有一杯喝了一半儿的桔汁。刚才弹钢琴的人，是菲利贝尔先生还是六十年前死去的米萝·塔西耶小姐？斑斑血迹把我拉回到现时的忧虑中。我不知这位受难者的姓名。他有点像圣乔治。他遭受毒打时，丢下了一支钢笔和一块绣有C.F.两个字母的手绢：这是他在世上留下了唯一痕迹……

我推开窗户。外面夏夜非常蓝、非常温煦、令人流连忘返。天气这么好，我不由想起了“魂归西天”，“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词句。世界终将被耗竭。这是一种不大痛苦、极缓慢的死亡。防空笛声呜咽。接着，只能听到沉闷的击鼓声。这一切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到处是燃烧弹。晨曦微露时，巴黎将是一片瓦砾。活该。这个城市里我所喜爱的一切，早已不复存在了：比如小小的环城路，特尔纳的圆形山顶，庞培的别墅和中国式浴场。人们对事物的消逝已习以为常。轰炸机群什么也不会放过。我把这栋房主儿子的麻将牌排列在写字台上。墙壁在颤动。随时都可能倒塌。但我还是要争一争。从我的衰老和孤寂中会萌出某种东西，就像吸管头上出来的气泡。我在等待。它突然变成了一个人：棕红头发，又高又大，戴一副墨镜，肯定是个盲人。还有一个满脸皱纹的小女孩。我给他们取名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两个遭难的人，有残疾的人，总

是不言不语的人。吹一口气、挥一下手都能使他们粉身碎骨。没有了我，他们将会怎样呢？终于找到了一个活下去的充足理由。我爱他们，可怜的丑陋人。我来照看他们……不许人伤害他们。靠我在契玛罗萨广场作密探和强盗挣来的钱，供他们享有一切可能的安乐。科科·拉库尔。埃斯梅拉达。我选择了世上最穷困的二个人，但在我的这种爱中并无半点温情。谁若胆敢冒犯他们，哪怕是一点点，我非砸烂他的脑袋不可。就是想到这一点，我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气得七窍生烟了。任何人不许动我这俩孩子的一根毫毛。往日压抑住的悲伤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我的爱从中汲取了无限力量。没有谁能阻挡这种冲击。有了这种毁灭一切的爱，什么国王、战争狂人和"伟大人物"，在我眼中统统不过是些弱小的病孩：阿提拉、波拿巴、帖木儿、成吉思汗、哈伦·赖世德，还有其他那些曾被人吹嘘有过丰功伟绩的人。我看这些自称的"暴君"是那么渺小、可怜。根本伤害不了人。所以，我俯身面向埃斯梅拉达时，就心想我看到的是不是希特勒本人。她是个被人遗弃的小女孩。她用我刚送给她的玩具吹肥皂泡。科科·拉库尔点燃了雪茄。从我认识他们的那天起，他们就从未说过一句话。无疑是哑巴。埃斯梅拉达咧着嘴，看那些泡泡碰在吊灯上破碎。科科·拉库尔沉浸在喷云吐雾之中。微不足道的乐趣。我喜爱这两个低能儿。愿意同他们在一起。并非是因为这俩人比大多数人更令我伤感，更弱小可

怜。所有人都会使我产生母性的、痛苦的怜悯之情。但是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有一点不一样，他们不言不语。他们安坐不动。这是忍受了无数的、毫无用处的高声叫喊和指手划脚后的耳静身静。我觉得没必要同他们讲话。有什么用呢？他们是聋子。这样更好。假如我向一个同类诉说我的苦难，他会立刻离开我。我能理解。并且我的外表也会使“同类灵魂”泄气。一脸的大胡子，一双大眼又占去了半张脸。有谁能安慰李尔王呵？无所谓。对我重要的是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我们在契玛罗萨广场过着类似家庭的生活。忘记了总督和中尉。不管他们是匪徒还是英雄，这些家伙实在令我厌烦。我对他们的事情始终没有兴趣。我筹划将来。埃斯梅拉达要继续学习弹钢琴，科科·拉库尔跟我一起打麻将，学跳摇摆舞。我要厚待他们，我温柔的羚羊，既聋也哑的人。要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我的爱同我对妈妈产生的爱一个样。不管怎么说，妈妈没有危险，她在洛桑。至于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由我来保护。我们的住宅很安全。早已属于我所有了。我的证件？我的名字是马克西姆·德·贝尔一雷斯皮罗。面前就是我父亲的自画像。接着响起歌声：

回忆
在每个抽屉里
芳香

在所有柜橱里……

我们真没有什么好怕的。世上的喧嚣与疯狂都消失在乙3号的台阶前。时间悄悄流逝。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上楼就寝。很快就会进入梦乡。埃斯梅拉达吹出的肥皂泡中，还有一只仍飘浮在空中。它浮游不定，飞向天花板。碰。我屏住呼吸。它碰碎在吊灯上。于是，一切都完全结束了。世上从未没过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我独自一人，站在客厅中央，聆听似雨的燃烧弹。最后又动情地想了一下塞纳河岸码头、奥塞车站以及小环城路。继而，我又重新处于衰老的尽头。是在西伯利亚的堪察加地区。那里寸草不生。气候干冷。夜晚那么幽深，几成白色。在这个纬度口人无法生存。生物学家已经观察到，那里的人体将在止不住的狂笑中分化瓦解，笑声尖利得就像玻璃瓶碎片。原因是：在这极地的凄凉之中，你会觉得解脱了尘世的最后一点点联系。唯有一死。要大笑而死。凌晨5点了。或许是日暮。客厅的家具蒙上一层灰烬。我望着广场的报亭和图森—路维杜尔的雕像。我觉得眼前是一幅达格雷的照片。接着，我层层察看住宅。房间里到处都是零乱的箱子。都没来得及关上。一只箱子里面放着一顶克龙斯塔德帽、一套深灰色的哈味呢西服、一份发黄的旺他杜尔剧院节目单、一张有滑冰运动员古德里齐和柯蒂斯的签名照片、两本纪念册和几件旧玩具。我没敢翻别的箱子。我身

边的箱子越来越多：铁的、柳条的、玻璃纤维的、俄罗斯牛皮的。沿着楼道摞起了许多柜箱。乙3号成了巨大的火车站行包存放处。被遗忘的存放处。无人再对这些行李感兴趣。锁在里面的尽是些逝去的东西：同莉莉·玛尔莱讷在巴梯尼奥勒那边的两三次散步、我七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万花筒、不知是哪年妈妈递给我的一杯马鞭草茶……全是一生的细琐小事。我本想列出一个完整、详细的单子。可又有什么用呢？

光阴似箭
年复一年……
忽有一天……

我叫马赛尔·贝蒂欧。一个人立在这些行李之间。不必再等了。火车不会来了。我是一个毫无前途的小伙子。年轻时都干了些什么？只是胡乱地打发时日。装满了五十只箱子。箱子里散发出一种又酸又甜的气味，令我作呕。我要把箱子丢在这儿，让它们就地发霉。离开这所宅子，越快越好。墙壁已裂痕累累，德·贝尔—雷斯皮罗先生的自画像也化成飞灰。专心的蜘蛛在吊灯周围编织丝网。地下室里冒出青烟。准是什么人的残骸在燃烧。我是谁？贝蒂欧？朗德鲁？楼道里，绿色的水汽浸潮了柜箱。出发吧。我将驾驶着那辆昨晚停在台阶前奔特利。最后再看一眼乙3号楼房的正面吧。这是人人都幻

想安居其中的住宅。不幸得很，我是撬锁进去的。里面没有我的位置。无所谓。我扭开了收音机开关。

可怜的斯温·特鲁巴杜尔……

是马拉科夫大街。汽车引擎没有一点声音。我在平静的大海上滑行。树叶刷刷作响。我生平头一次感到完全失重的状态。

你的命运呵，斯温·特鲁巴杜尔……

我在维克多·雨果和哥白尼街的路口停下车。从兜里掏出一支手枪。手枪的象牙把上镶有绿色宝石，是我在德·贝尔一雷斯皮罗太太的床头柜上发现的。

……再没有春天了，斯温鲁特·巴杜尔……

我把枪放在车座上。等待着。广场上的咖啡馆都关了门。没有一个行人。一辆、二辆、三辆、四辆轻型 11CV 汽车，从维克多·雨果大街上开了过来。我心咚咚跳个不停。这四辆车朝我开来，减慢了速度。第一辆靠着我的奔特利停下来。是总督。车窗后，他车窗里的脸离我只有几厘米。他用温柔的目

光看着我。此时，我觉得我的双唇绷紧，想强作欢笑。一阵头晕。我咬字十分清楚，好让他看出我的嘴形来：我—是—德·—朗—巴—勒—公主。我—是—德·—朗—巴—勒—公主。我握住了手枪，摇下玻璃窗。他看着我，像早就理解我似的微笑。我扣动扳机，打中了他的左肩。现在，他们远远地跟着我。我知道逃不出他们的手心。他们四辆车齐头并进。其中的一辆车上有契玛罗萨广场的打手：布鲁东、雷欧克卢、高德包、白脸罗伯特、达诺思、古阿里……维达尔—雷卡驾驶着总督的11CV。我能看到后排坐的是莱昂内尔·德·吉也夫，海尔德和罗森海姆。我又上了马拉科夫大街，朝特罗卡戴罗开去。菲利贝尔的车：一辆浅蓝色的塔尔博特从洛里斯通街开了过来。接着又是前指挥官科斯坦梯尼的德拉海耶·拉布尔戴特的车。他们都是来赴约的。围猎开始了。我开得很慢。他们也不加速。可以说是一支送葬的队伍。我没有任何幻想：双重间谍可以凭借无数的来来往往、阴谋诡计、胡话谎言和各种杂技技巧来拖延时间，但总有一天必死无疑。疯倦来得非常快。下一步就是躺倒在地喘息，等着人们来算总帐。谁也摆脱不掉他人。亨利—马尔丹大街。拉讷大道。我漫无目的地开。其他人在五十米后跟着。他们会用什么办法来除掉我？布鲁东会给我施电刑吗？他们会认为抓住我是一个重大收获：我是“德·朗巴勒公主”，地下骑士团的首领。而且刚才还想暗杀总督。我的行为方式会令他

们十分不解：我不是把“地下骑士”成员都一一出卖了吗？我该把这点讲清楚。可我有这个力气吗？佩雷尔大道。谁又知道呢？也许过些年以后，哪个古怪的人会对这段历史有兴趣。他将关心我们经历的这个“乱世”，查阅旧报刊。他很难描述我是哪一种人。我在契玛罗萨广场、在法国盖世太保组织中最凶恶的一伙人里充当了什么角色？在布瓦罗贝特街，在地下骑士团的爱国主义者中又充当了什么角色？我自己也说不清。瓦格拉姆大街。

城市如木马转盘
每转一圈
我们就衰老一点……

我最后一次观赏巴黎了。每条街，每个路口都引起我的回忆。格拉夫，我在那儿遇见了莉莉·玛尔莱讷。克拉里齐旅馆，我父亲逃往沙摩尼克思前住的地方。马比耶舞厅，我常和罗西姐·赛尔让去跳舞。他们允许我继续游荡。他们决定什么时间干掉我呢？他们的汽车总在我身后五十多米处。我们沿着环城大道行驶。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夏夜。半掩的窗户中传出阵阵音乐。人们或是坐在露天桌旁喝咖啡，或是三三两两地沿街散步。全都漫不经心。路灯摇摇晃晃，忽地亮了起来。树枝上点亮了数不清的彩灯。差不多到处是欢声笑语。彩色的纸屑和手风琴奏起的华尔兹舞曲。朝东望去，礼花正迸放

出玫瑰红和天蓝色的花束。我觉得经历这一时刻像过去的事了。我们又沿着塞纳河岸行驶。左岸就是我和妈妈住过的房子。百叶窗关着。

她已离去
换了地址……

我们穿过夏特莱广场。我眼前又出现了在维多利亚大街路口被击倒的中尉和圣乔治，我过不了今夜要有同样下场。大家轮着来。塞纳河过岸，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是奥斯特里茨火车站。火车早就停驶了。拉佩河滨大街。贝尔西河滨大街。我们进入了十分荒凉的地区。他们为什么不乘机动手呢？所有这些货场、仓库——据我看来——都适于干掉一个人。月光如水，我们不约而同地闭了车灯行驶。沙昂东一勒蓬。我们已经离开巴黎了。我淌了几滴眼泪。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粉面的情人。马恩河畔尚皮尼。他们什么时候才动手啊？我想一了百了。我爱戴的那些人的面孔，最后一次在我眼前一一闪现。佩尔耐蒂：他的烟斗和黑色皮鞋怎么样啦？科维萨尔：那个使我激动的憨大个。雅斯曼：一天晚上我们一起穿过阿道夫一设里欧广场时，他指给我天上的一颗星，“那就是参宿四”。他还借给我亨利·德·布尔纳载尔的传记，我后来翻看时，从中发现了一张他身穿海军服的旧照片。奥伯里加多：一副忧伤的眼神。他

常常给我朗读他政治日记的片段。这些文字现时正在某个抽屉里发黄变霉。皮克匹斯：他的未婚妻怎么样啦？圣乔治，马伯夫和佩尔波尔。率直的握手。高贵的目光。在沃吉拉尔区的那儿次散步。圣女贞德雕像下面我们的第一次会面。中尉那威严的声音。卢瓦新城刚刚过去。其他面孔也出现在我的面前：亚历山大·斯塔威斯基，我的父亲。他会为我感到耻辱的。他本想让我上圣西尔军校。还有妈妈。她正在洛桑，我可以去找她。猛地一加速。我甩开要杀害我的凶手。我的兜里全是钞票。再严肃认真的瑞士海关官员，也会因此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我累坏了。我要休息。真正的休息。逃往洛桑也还不够。他们下决心了吗？我从反光镜中看到，总督的那辆 11CV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啊不是，车突然刹住了。他们就像猫，在吃掉老鼠之前要戏弄够。我听着广播以消磨时间。

今夜晚
我独对
这伤悲……

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并不存在。莉莉·玛尔莱汭被我给甩了。地下骑士团的小伙子们被我出卖了。路上丢掉了不少人。应该记住这些人的面孔，按时赴约，认真履行诺言。根本不可能。一会儿后我就出发了。逃跑罪。在这种游戏中，终要毁

掉自己。但归根结底，我从不知道我是谁。我愿意让我的传记作者称我是“某人”，并祝愿他有足够的勇气写这本传记。我本能放慢速度，匆匆忙忙，话太简短。作者搞不清这段历史。我自己也搞不清。我们谁也不欠谁的情。

拉伊莱罗斯。我们还穿过了其它地区。总督的11CV时而超了过去。有那么一公里，前指挥官科斯坦梯尼和菲利贝尔行驶在我的两边。我想最后的时刻来到了。还没有。他们任我往前走。我的额头顶在方向盘上。路边全是大杨树。只要稍有闪失就得撞上。我半睡半醒，继续向前行驶。

魔　　圈

王清　张燕　译

李玉民　校

P.Modiano:

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

根据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1972 年版译出

献给吕迪

献给多米尼克

若问我在法兰西历史长河的某一点有何经历！
没有，一无所有。

兰　波

三人中最胖的那个是我父亲，然而早年，他是多么苗条。米哈伊探着身，仿佛对他低声说什么。马什雷立在他们身后，倒背着手，微微挺胸，似笑非笑。他们头发和服装的颜色难以辨识。马什雷似乎穿一件肥大的浅色方格细呢上衣，他的头发好像是金黄色。应当指出，米哈伊两眼炯炯有神，而我父亲的眼睛却有不安的神色。看上去米哈伊又高又瘦，不过下颏儿已显臃肿。反之，我父亲整个儿是一副衰弱的形象，只有眼睛例外，那眼球几乎鼓出来。

细木护壁板和砖砌的壁炉，此间便是克洛-富克雷酒吧。米哈伊端着一杯酒。父亲亦然。不要忽略：米哈伊嘴上叼着香烟，而我父亲则把香烟夹在无名指和小手指间。懒散而做作。靠餐厅里端，有一个大半身的女人侧影：莫德·迦拉斯，克洛-富克雷酒吧老板娘。米哈伊和我父亲坐的太师椅肯定是皮面的。靠背上有一道微弱的反光，正好在米哈伊左手所按之处的下方。他的手臂绕过我父亲的脖颈，显出几分保护人的姿态。他手腕上赫然戴了一块方壳表。马什雷大块头所占据的位置，半遮住莫德·迦拉斯和一排排开胃酒瓶。不必仔细辨认就能

看清柜台后面墙上的日历。剪得整整齐齐，只见“14”这个数字。但是根本看不清哪年哪月。不过，仔细瞧瞧这三个男人和莫德·迦拉斯的模糊身影，就能想象这一场面已年深日久了。

这是一张老照片，是在抽屉顶头偶然发现的，并轻轻拭去了上面的灰尘。夜幕降临。幽魂们像往常一样进入克洛-富克雷酒吧间。马什雷坐到高脚圆凳上。其他两人则喜欢坐在靠壁炉的太师椅上。他们要了鸡尾酒，是莫德·迦拉斯由马什雷做帮手调制的，这种混合酒既令人恶心，又毫无益处。马什雷常跟老板娘开些低级趣味的玩笑，管她叫“我的胖莫德”，或者“我的东京美人儿”。老板娘并无愠怒之色，而当马什雷把手探进她的上衣里，抚摩她的乳房，而且总要嗷嗷嘶叫时，她却泰然自若，面带微笑，令人难以捉摸那是鄙夷，还是默契的表情。这女人四十岁左右，金黄头发，身体笨重，声音沉浊。一对明眸令人惊讶，说不准是幽蓝色还是深紫色。她经营这家酒吧之前，做什么行当呢？也许干同一行当，不过是在巴黎市内。她和马什雷经常提起“百乐门”，那是特尔纳区的夜总会，二十年前关闭了。他们俩低声谈话。从前究竟是酒吧女郎？还是游艺场的艺人呢？毫无疑问，马什雷早就认识她。她管他叫居伊。他们一边调制开胃酒，一边憋不住格格直笑，这时司厨长格雷夫进来，问马什雷：“伯爵先生等会儿想吃点什么？”马什雷总是照例回答：“伯爵先生想吃屁。”说着，他扬起下

颏儿，眯缝眼睛，餍足地绷紧脸。每当这时候，我父亲总是嘿嘿陪笑，以便向马什雷表明他欣赏这句风趣话，并认为他马什雷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马什雷见我父亲的这种反应，更是乐不可支，便招呼他：“我说得不对吗，夏尔瓦？”我父亲忙不迭地回答：“对极了，居伊！”对这种“幽默”，米哈伊却无动于衷。一天晚上，马什雷比平时精神兴儿大，撩起莫德·迦拉斯的裙子，高声宣布：“这，才叫真正的大腿！”米哈伊则尖声尖调，像在上流社会说话那样：“亲爱的朋友，原谅他吧，他总以为是在军队里。”（这一评语更点明了马什雷其人。）米哈伊总摆出一副绅士派头，谈吐极有分寸，声调抑扬顿挫，委婉动听，运用议会演说式的雄辩。他说话时还大做手势，动不动手指像扇子一样展开，同时毫不忽视下颏儿和眉毛的效果。他衣着讲究：英格兰面料、衬衣和领带，配成单一色调，显得十分素雅。可是，他周身为什么散发这么刺鼻的塞浦路斯香水味呢？为什么戴这只镌有徽纹的白金戒指呢？再来端详他一下：宽宽的额头、明亮的眼睛，一副开朗坦诚的模样儿。然而，下半张脸则不然，耷拉着的香烟愈发显示嘴唇的松弛。脸庞的轮廓，上面宽阔有力，下面到颌骨却变小，下巴缩得很短。再听听他的声音，有时也变得嘶哑了。总而言之，人们不免担心，他生性是不是跟马什雷一样粗鲁。

再观察一下他们二人晚餐要结束时的表现，这种印象就会得到证实。他们俩并肩坐在我父亲的对

面；我父亲是背向，只能看到看清颈项。马什雷嗓门极高，声音响亮，涨红着脸。米哈伊也不示弱，提高了调门，他的尖厉的笑声压过了马什雷喉音过重的笑声。他们相互递眼色，相互撞臂膀，心照不宣，而旁人却不知其所以然。除非和他们坐在一起，一字不漏地听他们谈话。离远一些，只能听到片言只语，杂乱无章而连不成意思。现在，他们又交头接耳，窃窃的私语声消失在这空荡的餐厅里。铜吊灯光线强烈，照着餐桌、细木护壁板、诺曼底式衣柜，以及镶嵌在墙上的鹿头和狍子头的标本。灯光也像棉花一样压在他们身上，窒息他们的话语声。没有一点阴影。只有我父亲的后背例外，令人纳罕：光线何以放过他。然而，在明亮的吊灯下，他的脖颈却十分醒目，那中间一小道粉红色伤疤甚至清晰可辨。好像引颈就诛，这脖子极度弯曲，伸向无形的断头机的铡刀。他全神贯注地聆听他们讲话，脑袋探到离他们的头只差几厘米，额头几乎要贴上米哈伊或马什雷的额头。我父亲的脸凑得太近时，马什雷便用拇指和食指夹住他的脸蛋，慢慢地拧。我父亲立刻往回缩，但是马什雷仍不松手，一连掐了几分钟，而且越来越用劲。我父亲肯定疼痛，放开一看，脸上掐出了红印子。他偷偷地伸手揉。马什雷对他说："夏尔瓦，这就是好奇的下场。"我父亲应道："是啊，居伊……是啊，没错……居伊……"还得陪笑脸。

格雷夫上酒，他那拘板守礼的举止动作，同这

三男一女的不拘形迹的放浪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米哈伊手掌托着下巴，眼神无精打采，给人一种完全懈怠的印象。马什雷解开了领带，全身重量靠在椅背上，因而只有两条椅腿着地，随时都可能失去平衡。再说我父亲，他执意要靠近他们，前胸几乎贴到餐桌上，只要被人轻轻推一把，就会倒在杯盘上。现在还能听到的，只是马什雷的寥寥数语，而且声音含混不清。过了一会儿，他就只发出腹鸣了。他们这样倦怠迟钝，是因为晚餐太丰盛（他们总是要加调味汁的菜肴和各种各样美味），还是因为太贪杯呢（马什雷总是点战前高浓度的勃艮第酒）？格雷夫笔直地站在他们身后，朝马什雷抛下一句话："伯爵先生还想要一瓶白酒吗？"并且把"伯爵先生"四字说得很重。然后，他更加重语气地说："好的，伯—爵—先—生。"莫非他想提醒马什雷规矩些，暗示他一位绅士不应该如此随随便便吧？

在格雷夫僵直身影的上方，一个鹿头从墙壁赫然而出，宛似船首头像；这只野兽用玻璃眼珠，完全漠然地注视着马什雷、米哈伊和我父亲。鹿角的影子投到天花板上，形同巨大的花体字。灯光渐暗。是电压不足？他们被昏暗吞噬，一个个神情沮丧，默默无言。这场面，重又给人以看一张旧照片的印象，直到马什雷霍地站起来为止。他起身极猛，以致撞到桌子。于是，整个场面又活跃起来。吊灯和壁灯重又大放光明。没有一点阴暗，没有一点虚影，每一件物品都十分清晰，乃至眩目。刚才懒洋洋的

动作又变得果断了。我父亲也站立起来，像听到"立正"的口令似的。

他们显然要走向柜台。要不然去哪儿呢？米哈伊嘴里叼着香烟，手亲热地搭在我父亲的肩上，正劝说他同意他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件事。马什雷已经坐到柜台前，他们俩则停在离柜台几米远处，米哈伊俯身向我父亲，拿出推心置腹的口气，仿佛提出叫人无法拒绝的保证。我父亲点点头，对方就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看来两个人终于取得一致意见。

现在，他们三人都坐在柜台前。莫德·迦拉斯把收音机的音响拧小，可是她一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儿，就立即放大音量。米哈伊要特别注意听晚11点的新闻报导，那个播音员一字字咬得很清，但声音毫无感情。然后播放结束曲，一小段哀婉的音乐。

又沉默半晌，他们才情不自禁地追维往事，娓娓交心。马什雷说他三十岁时身患痼疾，人就算完了。莫德·迦拉斯提起一天晚上，他穿着军服走进"百乐门"，茨冈乐队便奏起《荣誉军团赞歌》欢迎他的情景。她捻灭一支香烟，不无嘲讽地说，那是我们战前最美好的一个夜晚。马什雷抬起眼皮，好奇地注视她，说什么战争，他觉得无所谓。他，居伊伯爵，弗朗索瓦，阿尔诺·德·马什雷·德·厄，不想听任何人的教训。唯一令他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杯中闪亮的香槟酒"，他还一口香槟酒喷到莫德·迦拉斯的胸襟上。米哈伊说："算了，算了……"

不对，绝不对，他的朋友并没有完蛋。而首先，“完蛋”是什么意思呢？嗯？毫无意义！他断言他十分亲密的朋友还有几年光辉的历程。而且，他尽可以信赖“若望-米哈伊”的同情和支持。就说把侄女嫁给居伊·德·马什雷伯爵这件事，难道他“若望-米哈伊”有一瞬间的迟疑吗？嗯？他能把侄女嫁给一个完蛋的男人吗？嗯？他转向其他人，仿佛激他们提出相反意见。嗯？要表示信任和友谊，还能拿出更好的证据吗？完蛋啦？“完蛋”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完蛋”，就是……他戛然而止，想不出定义，只好耸耸肩膀。马什雷直瞪瞪地注视他。如果居伊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话，米哈伊高声说，好像突然来了灵感，那就让夏尔瓦·戴克凯尔当证人。米哈伊说着，指了指我父亲，我父亲立即容光焕发，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半个月后，就在克洛-富克雷咖啡馆举行婚礼。巴黎的朋友们也将来参加。一次小型的家宴，将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牢固。米哈伊-马什雷-戴克凯尔！三剑客！况且，一切顺利！马什雷毫无必要忧虑。“世态混浊”，然而“金钱哗哗流淌”。各种各样的联合已经初具规模，一个赛一个有趣。居伊也要得一份好处。“一口干掉。”咕嘟！伯爵为米哈伊的身体健康干杯（说来奇怪，他和米哈伊的年龄差不了十岁……），他举着杯，声称他能娶安妮·米哈伊，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因为“她的金黄色热乎乎的屁股，在巴黎无与伦比”。

莫德·迦拉斯醒来，问马什雷要送给新娘什么

结婚礼物。一件银色水貂皮袄、两只大环眼的金手镯，共花“六百万现钞”。

他从巴黎带来了满满一箱子外汇，以及奎宁。这该死的疟疾。

“没错儿，是应当说该死。”莫德说道。

他是在哪儿认识安妮·米哈伊的呢？什么？安妮·米哈伊？啊！他是在哪儿认识她的？哦，是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朗热餐馆。归根结底，他还是通过米哈伊的侄女认识米哈伊的！（他哈哈大笑。）真是一见钟情，两人便在金鱼餐馆一起度过后半个晚上。他详详细细地讲述，说话乱了套，随后又找到他这段故事的线索。米哈伊开头还兴趣盎然，专注地听着，现在他就同我父亲继续饭后开始的谈话了。莫德耐心地听马什雷讲述，然而，他的言语很快混乱，变成醉汉的呓语了。

我父亲轻轻摇晃着头，下面的眼囊也鼓胀起来，显得疲惫不堪。他在米哈伊和马什雷身边，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

夜深了。莫德·迦拉斯过去关了壁炉旁的大灯。无疑这是个信号，示意他们该走了。整个餐厅，只有里面墙的两盏红罩壁灯还亮着。我父亲、米哈伊和马什雷重又没入昏暗之中。

柜台后面还有一小圈亮光，莫德·迦拉斯站在亮圈中间纹丝不动。还听得见米哈伊的低语。马什雷的声音则越来越迟缓了。他从高脚凳上滑下来，刚好抓住我父亲的肩膀，才没有跌倒。他们步履蹒

跚地朝门口走去。莫德·迦拉斯一直送到门口。一接触户外的空气，马什雷又精神起来。他对莫德·迦拉斯说：亲爱的胖莫德，你要是感到孤单寂寞，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米哈伊的侄女的“金黄色热乎乎的屁股，在巴黎无与伦比”，而莫德·迦拉斯的大腿，是“塞纳-马恩最神秘的”。说着，他就搂住她的腰，又开始抚摩她，这时米哈伊插进来，连声说道：“得了……得了……得了……”莫德·迦拉斯这才返身进屋，关上了店门。

三人重又来到村子的中心大道上。路两侧浑重的房舍已然沉睡。米哈伊和我父亲走在前头，马什雷则以沙哑的嗓音唱着《驶过的驳船》。一扇百叶窗微微启开，探出一个脑袋。马什雷大骂那个好奇者，米哈伊则极力劝解，让他这未来的“侄女婿”平静下来。

“麦克图别墅”是左首最后一幢房子，紧靠着树林。从外观上看，这是平房和猎屋的混合体。房子正面有一条游廊。是马什雷把这命名为“麦克图别墅”，为纪念外籍军团的生活。大门刷了白灰，钉了一块铜牌，牌上用哥特字体刻有“麦克图别墅”。马什雷还雇人在花园周围修了一道柚木栅栏。

他们在大门前分手。米哈伊拍了拍我父亲的后背，说了一声：“明儿见，戴克凯尔。”马什雷也嚷道：“明儿见，夏尔瓦！”同时用肩膀撞开大门。二人走上林荫小道。我父亲伫立不动。他常常怀着崇

敬的心情抚摩那块铜牌，并用食指顺着哥特字体的笔画描下来。砂石路在那两个人的脚下咯咯作响。马什雷的身影还在游廊中间闪现一下，他又吼了一声："做个美梦，夏尔瓦！"随即哈哈大笑。继而听见关闭玻璃门声响。复归寂静。

我父亲又沿着中心大道返回，拐向左边，踏上一条缓坡的乡村土路。这是一条"分界道"，两侧是有大花园的豪华住宅。有时他放慢脚步，仰望天空，好似观察月亮星辰，或者头顶着铁栅门，窥视一所住宅的庞大黑影。然后，又继续往前走，但是步伐懒散，仿佛漫无目的。最好这时候上前同他搭话。

他停下脚步，推开"修道院"大门，这是一座新罗曼式的奇特的别墅。他迟疑一下，才走进去。这座别墅是他的吗？从何时起搬来的呢？他关上大门，缓步穿过草坪，走向房前台阶。这位胖先生，在夜色中弓着背，神色多么忧伤……

自不待言，这是塞纳-马恩地区环境最好、建筑最美的一个村庄，它坐落在枫丹白露树林边缘。有几个巴黎人在这里拥有乡间别墅，但是他们已无影无踪，无疑是"因为局势恶化，令人不安"。

克洛-富克雷的旅馆老板博西尔夫妇，去年就离开了。他们说是去卢瓦尔一大西洋省，到堂兄弟家

休假，不过大家都明白，他们去休假，是由于旅馆的常客越来越少了。然而，从巴黎来了一位妇人经营起克洛-富克雷，这令大家百思不得其解。还从巴黎来了两位先生，买下了树林旁边的拉米鲁太太的宅第（须知她将近十年没有来住了）。年轻的那个，似乎在外籍军团服过役。另一个据说在巴黎主办一份杂志。他们的一位朋友随后也来了，住到“修道院”，即居约家族的庄园。是租赁吗？还是趁主人不在而占用呢？须知居约全家已在瑞士长期定居。他们这位朋友是个东方型的肥胖家伙。他们三人收入丰厚，但都是近来发迹的。他们来此过周末，如同太平时代的资产阶级家庭。星期五晚上，他们就从巴黎赶来，在外籍军团服过役的那个人，驾驶着浅灰色塔博牌小汽车，风驰电掣般驶过中央大道，在克洛-富克雷旅馆的门前猛地煞住。过一会儿，另一辆小车也停到旅馆门前。他们邀请了客人。比方说，这个总穿马裤的棕发女子。星期六早晨，她去树林遛马，回到马厩时，马伕小伙子们立即围上来，大献殷勤，格外照看她的马。下午上街去，她牵了一条红色猎犬，猎犬的火红毛色，配她的黄褐色靴子、红棕头发，难道这算高雅？经常有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陪伴她，大概是那个报社社长的侄女，她总穿着毛皮大衣。两个女人走进布莱里欧太太的古玩店逛一会儿，挑几样首饰。棕发女人买下一个大衣柜，这个路易十五时代的中国式衣柜，因为价钱太高，一直没有买主。布莱里欧太太看到这位女顾

客递给她两百万现钞，还真有点不敢接。棕发女人把几叠钞票放到一个搁板上。不久，一辆小货车来拉货，把大衣柜送到拉米鲁夫人的别墅；报社社长和外籍军团的旧军人住进去之后，就改名为“麦克图别墅”了。人们注意到，这辆货车时常往“麦克图别墅”拉艺术品和绘画，全是棕发女人从这个地区的拍卖行搞来的。星期六晚上，她同报社社长乘车从默伦或枫丹白露返回，满载旧家具、餐具、吊灯和银器的小货车跟在后面，把这些旧货卸到别墅里。村里人不免感到诧异，很想多了解一点这个棕发女人。她不住在“麦克图别墅”，而住在克洛-富克雷旅馆。但人们猜测她和报社社长关系极为密切。是他的情妇？是他的女友？据说那个外籍军团的旧军人是伯爵。住在“修道院”的胖先生则称戴克凯尔“男爵”。他们的爵衔可信吗？这两位同人们头脑中的贵族形象相去甚远。他们的神态有点可疑，也许是外国贵族吧？有人不是听见有一天戴克凯尔“男爵”对报社社长说，而且声音提高了几度：“无所谓，我是土耳其公民嘛！”“伯爵”讲法语，略带巴黎郊区的口音。是不是在外籍军团养成的习惯？棕发女人似乎喜欢炫耀，否则为什么戴那么多首饰，同她的骑装不协调呢？再说这个年轻的金发女郎，6月份还捂着皮大衣，谁看见都不免奇怪。想必她受不了乡间的空气。有人在一份《电影宝鉴》上看到她的照片。她还当演员吗？她经常和这个外籍军团旧军人一起散步，让他挽着胳膊，脑袋偎在

他的肩上。他们俩可能订婚了。

还有一些人来这里过星期六和星期天。报社社长有时来客多达二十来位。人们渐渐熟悉了其中大部分人，但是见到每个身影很难叫出姓名。在这个村子里，最怪异的传闻也会不胫而走。报社社长在“麦克图别墅”组织了别出心裁的晚会。为此，“那帮活宝”才趋之若鹜，从巴黎赶来。在博西尔夫妇外出期间，经营克洛-富克雷的这个女人，无疑当过一家已经关张的店铺的老板。况且，克洛-富克雷旅馆招待这样一帮顾客，真有点像青楼妓院。戴克凯尔“男爵”通过什么伎俩把“修道院”弄到手，这也是村里居民纳罕的一件事。他那鬼样子倒像个间谍。“伯爵”当初参加外籍军团，恐怕就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报社社长伙同棕发女人干些肮脏的非法交易。他们俩组织一帮人花天酒地，报社社长也把他侄女拉进来。他毫不犹豫地把亲侄女投进“伯爵”的怀抱，或者投进他任何同谋的怀抱。总而言之，居民最后都认为，村子“落入一群强盗的手中”。就像在小说和案件笔录中读到的那样，一个明眼人看到报社社长及其一伙，很快就会联想起出入于香榭丽舍大街一些酒吧间的“混混”。他们一来，就闹得这里鸡犬不宁。有些晚上，他们人数众多，全在克洛-富克雷旅馆用餐，然后三五成群，队列懒懒散散地朝“麦克图别墅”行进。所有女人都是棕发或浅黄发，所有男人都穿得花枝招展。“伯爵”在前边开路，他胳臂上缠着一条白纱

巾，就好像刚刚在搏斗中受了伤。他这样是要标示他在外籍军团那段经历吗？他们把音乐放得很响，即使在中央大道上，也能断断续续听见一阵阵伦巴和爵士舞曲和歌声。假如在那座别墅附近停一停，就能看见他们在落地窗里面跳舞。

一天深夜两点钟，只听一声尖叫："混蛋！"忽见棕发女人跑出来，乳房袒露在外面。有人随后追赶。她又嚷了一声："混蛋！"随即放声大笑。

起初，村民还打开百叶窗瞧瞧，后来就习以为常，任凭这些新来的人喧闹了。我们生活在见怪不怪的时代。

这本画报创刊不久，才出了五十七期。刊名《如此生活》，黑白字体，十分醒目。封面登一幅女人身体照片，一副撩逗的姿势。如果不是"政治与社会新闻周刊"几个字标明画报的高调宗旨，读者还真会以为这是一本消遣性杂志。

扉页上印有社长若望·米哈伊的名字。在这一栏下印有主编和编委名单，共有十位，都是无名之辈。怎么搜索记忆，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们的签名，顶多对两个名字还有点模糊的印象。一个叫若望-德鲁勒，是战前的专栏作家，《士兵夏普佐》的作者；另一个叫穆利·德·默伦，是《名流》的贪婪的专栏记者。可是其他人呢？比如说，那个总在头

一页签名、主持春天万象更新专栏的若-日耳曼，他是谁呢？文章中的语言浮华藻饰，结尾总是一句命令："需要快活！"文章插图的几张照片，是几乎赤身露体的青年。

第二页为《姑安听之》栏。每一段都有一个哗众取宠的小标题。一个署名为罗贝尔·勒斯唐迪的家伙，使用最下流的语言，攻击政界、艺术界和戏剧界人士，甚至进行敲诈。有几幅用心险恶的"幽默"画，署名为勒·乌勒。后边还有奇文：政治社论、读者信箱，乃至"新闻报导"。五十七期社论通篇是谩骂和恫吓，出自一个叫"弗朗索瓦·热尔贝尔"的人之手。可以读到这样的词句："奴才很容易成为窃贼。"或者："其他责任者员应当抵偿。他们必将抵偿！"什么责任？"弗朗索瓦·热尔贝尔"并未说明。至于报导，都直接涉及最暧昧的问题。比如五十七期就向读者推荐："一位有色人种的姑娘在舞蹈和行乐世界中的传奇经历。巴黎、马赛、柏林。"《读者信箱》的格调也同样低下：有一位读者询问"把斑蝥煎剂搀入食品或饮料中食用，对性机能衰退者是否有立竿见影的作用"。若-日耳曼总是以优美的文笔回答这类问题。最后两页辟为《新奇事？》专栏。一个化名为"全巴黎先生"的人，详细综述了本周上流社会大事。上流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关于蓬蒂厄街的冉娜·斯蒂克咖啡馆重新开张一事（本栏编辑称这是本月最具"巴黎"特色的大事），"可以看到奥斯瓦尔多·瓦朗蒂和莫妮克·乔伊斯

到场祝贺”。“全巴黎先生”列举出席的“知名人士”中，有契尔尼切夫伯爵夫人、马戈·封唐日、维奥莱特·莫里斯；还有“《血的十字架》的作者，作家布瓦塞尔、驾驶飞机高手科斯唐蒂尼、名律师达尔齐埃·德·佩勒普瓦、人类学教授蒙唐东、马卢·盖兰、剧院经理代勒瓦尔和利奥奈尔·德·维埃、记者苏阿雷兹。摩拉兹和阿兰-洛伯罗”。然而据他称，最热闹的一桌，要算若望-米哈伊先生那一席，并配上一张照片以为佐证。照片上可以认出米哈伊、马什雷、总穿马裤散步的棕发女人(她叫西尔维娅娜·玗夫)，还有我父亲，笔者称之为“戴克凯尔男爵”。评论员指出：“由于所有这些人出席，冉娜·斯蒂克咖啡馆充满了巴黎之夜的热闹而诙谐的气氛。”另外两张照片则拍摄了晚会的全景。光线昏暗，参加庆宴的有一百来人，叼着香烟，衣裙的开领很低。每张照片下面都有一行题词：“舞台灯光亮了，幕布拉开，前台消失，出现一条站满舞蹈女演员的楼梯……《在我们镜中》歌舞开场了”；以及“华美、节奏、灯光。这就是巴黎！”不然。在这聚会中有可疑的成分。这些都是什么人呢？他们从何而来？比如说靠里边坐的那个戴克凯尔“男爵”，胖胖的脸蛋，在一个香酒桶后边，上身略有颓势，他是何许人呢？

“您对这感兴趣吗？”

在一张发白的照片上，一个成年人面对一个青年，但看不清那青年的面孔。我抬起头，只见他站到我面前：我没有听见他从“混乱”岁月的幽邃中走出来。他朝《新奇事？》专栏瞥了一眼，想了解是什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毫无疑问，我就像欣赏一幅版画珍品一样，鼻子几乎触到杂志上的时候，被他撞见了。

“您对社交生活感兴趣吗？”

“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先生。”我讷讷答道。

他把手伸给我。

“若望·米哈伊！”

我站起身，故作惊讶状：

“就是您主办……”

“正是敝人……”

我随口说道：

“幸会！”然后，又勉强地说：

“我非常喜欢您办的杂志。”

“真的吗？”

他微笑了。我说道：

“办得‘绝’了。”

我有意讲句行话，以便在我们之间达成默契，他听了这话微露吃惊之色。

“您的杂志，办得绝了。”我若有所思地重复道。

“您也是干这行的？”

“不是。”

他期待我进一步说明，而我却沉默了。

“抽烟吗？”

他从兜里掏出一只白金打火机，啪的一声打着火。香烟吊在他的嘴角，就好像永世吊在上面似的。

他沉吟一下，又问道：

“您看了热尔贝尔的社论啦？也许您不同意杂志的政治……倾向吧？”

“我不搞政治。”我答道。

“我之所以向您提这个问题，”他微笑着，“是因为我希望了解一下一位青年的看法……”

“承蒙美意。”

“这些编委是临时凑起来的……我们组成一个协调的班子。有从各方面来的记者：勒斯唐迪、若-日耳曼、热尔贝尔、乔治-昂克蒂……我也如此，不大喜爱政治。无聊，政治！”他嘿嘿一笑。“广大读者，只爱看逸文趣事和新闻报导。尤其是照片！照片！我选了一个口号……快乐的口号！”

“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需要松弛一下……”我指出。

“完全同意！”

我喘了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在贵刊上，我最爱看勒斯唐迪的《姑妄听之》，非常精采！非常生动！”

“勒斯唐迪那家伙不好惹。我并不总是同意他

的政治观点。您呢？”

这一下问得我措手不及。他的明亮的蓝眼睛盯住我，我知道必须赶紧回答，以免在我们之间产生尴尬的气氛。

“我吗？您想想，我的空闲时间，全用来写小说了。”

我自己都惊讶讲这话的语气竟如此沉着。

“哦，这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您发表了吗？”

“去年，在比利时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

“您是来度假的吗？”

他猛然提出这个问题，仿佛他对我突然产生了戒心。

“是的。”

我正要补充说，我们在酒吧间和餐厅已经碰过面。

“这地方很安静，对吧？”他使劲抽烟。“我在树林边缘买了一幢别墅。您住在巴黎市区吗？”

“对。”

“除了文学创作，”他把“文学”两字说得很重，令我听出他话里有嘲讽意味，“您还有固定工作吗？”

“没有。眼下难找工作。”

“我们处于一个奇特的时期。我常想这一切该如何了结。您呢？”

“应当及时行乐。”

他很欣赏这种想法，不禁哈哈大笑。

“我们死后，管他洪水滔天！”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今晚我请您吃饭！”

我们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我有意拉话，说这里傍晚空气和煦，而我在旅馆下榻的客房也极其遂意，正对着游廊。

我还说“克洛-富克雷”旅馆令我忆起童年，因为从前，我常随父亲来这里。我问他对这幢别墅是否满意。他说很想多来住住，可是报社事情太忙，难以脱身。况且，他也喜欢报社的工作。巴黎市区也不乏魅力。我们捡一张餐桌坐下。从花园看旅馆，觉得它像乡下的豪华建筑，我自然向他讲出这种看法。他对我说，女经理(他管她叫莫德)是他的老朋友。是莫德建议他买下这幢别墅的。我很希望他多向我讲些这女人的情况，但又怕我的好奇引起他的疑心。

我筹划已久，制定各种方案，好同他们接触。我首先打棕发女人的主意。我们俩的目光有好几回相遇。如果在柜台坐在马什雷的旁边，也很容易同他搭话。可是，我父亲生性多疑，难以单刀直入，同他接触。至于米哈伊，他令我望而却步。如何接近他呢？归根结底，倒是他解决了这个难题。我头脑中闪现一个念头。他主动跨出第一步，是不是要把握准确好对付我呢？三周以来，我在酒吧间或者餐厅，窥视他们每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他

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是不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呢？我想起我要当警察时，有人责备我说："老弟，您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出色的警探。您监视什么人，或者听人谈话时，一眼就会被人识破。您还是个孩子。"

格雷夫推着装满开胃酒的活动餐桌走过来。我们要了苦艾酒。米哈伊告诉我能在下周杂志上读到若-日耳曼的一篇"精采"文章。他说话语气亲热，仿佛早就认识我了。天色渐晚。我们都认为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

马什雷宽宽的后背。莫德站在柜台里边，她见我们进门，便向米哈伊招手。马什雷回头张望。

"怎么样，若望-若望？"

"挺好，"米哈伊应道。"我请来一位客人。老实说……"他皱起眉头瞧我，"我连尊姓大名还不知道……"

"塞尔日·亚历山大。"

我在旅馆登记簿上就是写的这个名字。

"好哇，亚历山大……先生，"马什雷拖着长腔说，"我敬您一杯波尔图白酒。"

"我不喝白酒。刚才喝了苦艾酒，我直想吐。"

"您错了。"马什雷反驳道。

"这位是朋友，叫居伊·德·马什雷。"米哈伊

介绍说。

"居伊·德·马什雷·德·厄伯爵，"那位纠正说，同时拉我作证："他不喜欢贵族姓氏的标志！先生是共和党人！"

"而您呢？是记者吗？"

"不是，"米哈伊回答，"他是小说家。"

"哦，真的吗？我本应当猜出来。像您这样的名字！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仲马①！真的，看样子您情绪不高，喝点儿白酒，保您来精神！"

他递过他的酒杯，几乎送到我的鼻子底下，并且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

"别害怕，"米哈伊对我说，"居伊是个大活宝。"

"亚历山大先生跟咱们一起吃晚饭吗？我能给他讲一大堆故事，他可以写进小说里。莫德，给这位朋友讲讲，我穿着军装走进'百乐门'时，引起多大的轰动。那次挺身而入，非常浪漫，对不对，莫德？"

莫德没有应声。他狠狠地瞪她，她也毫不示弱。他哼了一声，又说道：

"况且，这些都是老皇历啦！嗯，若望-若望？到别墅去吃晚饭吗？"

"对。"米哈伊冷淡地答道。

"和老胖子一起？"

① 即法国小说家大仲马。

“和老胖子一起。”

他们这样称呼我父亲。

马什雷站起身，对莫德·迦拉斯说：

“等一会儿，您要是想去别墅喝一杯，亲爱的朋友，请不要迟疑。”

她微笑了，目光落到我身上。我们俩还一直保持客客气气的关系。假如我看见她独自一人，我很想问问她关于米哈伊、马什雷和我父亲的情况。先跟她闲聊，谈天说地，然后，逐渐进入正题。然而我担心自已不够老练。她是否发现我在他们周围绕来绕去呢？在餐厅里，我总捡离他们最近的餐桌。当他们在柜台喝酒的时候，我就坐在一张皮椅上，佯装睡觉。我背对着他们，以免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过了片刻，我又担心他们会指我后背议论。

“晚安，莫德。”米哈伊说道。

我也向她深鞠一躬，说道：

“晚安，夫人。”

当我们重新来到大街上，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大街阒无一人。

“但愿您能喜欢‘麦克图别墅’。”米哈伊说道。

“这是本地区最美的建筑，”马什雷高声说，“我们只花几个小钱，就把它买下来了。”

他们慢腾腾地朝前走。我猛然感到要进入他们的圈套。把他们甩掉，逃跑还来得及。我两眼盯着树林边上几棵树，在我前方约一百米远，心想一个冲

刺就能跑到那里。

“您先请。”米哈伊对我说，语气中有五分嘲讽、五分客气。

我望见游廊正中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咦，”马什雷说，“老胖子已经到了。”

他微微倚着栏杆。她则穿着马裤，坐在白木扶手椅上。

米哈伊向我介绍：

“西尔维娅娜·玗夫……塞尔日·亚历山大……戴克凯尔男爵。”

他向我伸出软绵绵的手，我正面打量他。他认不出我了。

她向我们解释说，她骑马在树林遛了一大圈，刚刚返回，没有力气换衣服了。

“没关系，亲爱的朋友，”马什雷高声说道。“女人穿骑马服装，显得漂亮多啦！”

话题立即转到赛马上。她极力称赞跑马场主，那人从前是赛马骑师，名叫代代·威德梅。

我在克洛-富克雷旅馆的酒吧间遇见过那人：一副獒狗的面孔，皮肤红红的，特别爱穿杜博奈牌服装，如方格呢鸭舌帽和鹿皮外套。

“我们应当邀请他吃饭。您提醒我点儿，西尔维娅娜。”米哈伊说道。

他转向我：

“到时候您瞧，那是个人物！”

“对，是个人物。”我父亲怯声怯气地附和。

她向我们谈论她的马，说刚才她骑着跨越几处障碍，这就“非常说明问题”。

“对马不要姑息，”马什雷以行家口气说，“一匹马，就是用马刺和马鞭练出来的！”

他讲述一件童年往事：他那巴斯克伯父强迫他冒雨在马上呆七小时。他说：“你要是摔下来，就三天甭吃饭！”

“还真行，我从来没有从马上摔下来过。训练骑兵，”他声音变得庄严了，“就是用这种方法！”

我父亲轻轻吹了一声口哨，表示钦佩。他们还是谈论代代·威德梅。

“我真不明白，这个小矮子竟得到那么多女人的青睐。”马什雷说道。

“我觉得他的确很有魅力。”西尔维娅娜·玗夫指出。

“还有更精采的呢，”马什雷生硬地反驳。“据说威德梅‘开始吸毒’了……”

愚蠢的谈话，胡言乱语。一帮行尸走肉。然而，我却同这些幽灵为伍，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一个系着白围裙的老妪来通禀晚饭已备好。

“我们可以呆在游廊，今晚夜色美极了。”西尔维娅娜·玗夫提议。

马什雷却希望点着蜡烛就餐，不过最后他还承

认“沐浴我们的幽蓝的夜色确有魅力”。米哈伊给大家斟酒。想必一定是佳酿。

“真棒！”马什雷惊叹，他用舌头打了个响，我父亲立即响应。

我坐在米哈伊和西尔维娅娜·玕夫中间，后者问我是否来此度假。

“我在克洛-富克雷旅馆见过您。”

“我也见过您。”我对她说。

“我甚至有印象，我们的客房紧挨着。”

她眼神奇特，瞥了我一下。

“亚历山大先生非常爱看我的周刊。”米哈伊说道。

“真的吗？”马什雷十分诧异。“您可是独一份啊！如果您看了若望-若望收到的所有匿名信……在最近的一封信里，有人骂他是色鬼，是强盗！”

“我不在乎，”米哈伊说道。“您瞧见了吧，”他又压低声音说，“别人在新闻界把我的名声搞臭了。战前，甚至有人控告我私拆信件。我总是让伙计们眼红！”

最后几个字，他一板一眼，说得很重，而且脸上升起红晕。端上甜食了。

“您从事什么职业呢？”西尔维娅娜·玕夫问我。

“小说家。”我匆忙答道。

我后悔向米哈伊自我介绍时，安了这么一个怪头衔。

"您写小说？"

"您写小说？"我父亲重复道。

开始用晚餐以来，这是他跟我说的头一句话。

"对。您呢？"

他睁大双眼。

"我？"

"您到此地……是来度假的吗？"我有礼貌地问他。

他以困兽的目光盯住我。

"戴克凯尔先生，"米哈伊说道，同时指了指我父亲，"他住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名叫'修道院'，离这儿一百米远。"

"对……'修道院'。"我父亲说道。

"这名字比'麦克图别墅'响亮多了。要知道，那园子里还有小教堂呢。"

"夏尔瓦可虔诚啦！"马什雷说道。

我父亲捧腹大笑。

"对不对呀，夏尔瓦？"马什雷追问道。"什么时候穿上教袍给我们看看？嗯，夏尔瓦？"

"可惜呀，"米哈伊对我说，"我们的朋友戴克凯尔跟我们一样，他公务缠身，离不开巴黎。"

"什么公务？"我贸然问道。

"没多大意思。"我父亲回答。

"不对！"马什雷也说。"我敢肯定，亚历山大先生希望听你谈谈你所有的金融把戏。您大概不知道，"他使用挖苦的口气，"夏尔瓦是个企业家。

他可以指导巴齐尔·扎哈罗夫爵士①！”

“别听他的。”我父亲咕哝一句。

“我觉得您特别神秘莫测，夏尔瓦。”西尔维娅娜·玗夫合拢双手说道。

他掏出一块大手帕，拭拭额头；我猛然想起这是他的习惯动作。他不作声了。我也沉默下来。光线渐暗。其他三人在窃窃私语。我似乎听见马什雷对米哈伊说：

“你侄女给我来过电话。他妈的，在巴黎市区鬼混什么？”

听他说话这么粗鲁，米哈伊非常诧异。他，马什雷，一个德·厄家族的人，居然这样讲话！

“要是这样下去，”马什雷说，“我就解除婚约！”

“得了……得了……那可就失策了。”米哈伊说道。

西尔维娅娜趁大家沉默，讲起一个叫埃迪·帕尼翁的人，陪她在一家酒吧间喝酒，他突然举起玩具手枪，把顾客都吓坏了。埃迪·帕尼翁……这个名字好熟。是个人物吧？不清楚，不过，我喜欢这个掏出手枪威胁幽灵的人。

我父亲走过去，臂肘倚在游廊的栏杆上，我凑到他身旁。他点燃一支雪茄，若有所思地抽着烟。过了几分钟，他开始吐烟圈。其他人在我们身后低

① 扎哈罗夫（1849—1936），国际军火商兼金融家。他是世界著名富豪，被称为“死亡掮客”和“欧洲神秘人物”。

语，似乎把我们置于脑后了。即使我父亲，也无视我的存在，尽管我轻声咳嗽了好几回；我们呆了许久，他吐着烟圈，而我则注视烟圈造型的完美。

我们移入客厅，从游廊走一扇玻璃门，便进入客厅。房间很大，家具陈设是殖民地风格的。在里面墙上，贴了一张纸画，色彩柔和，画的是（米哈伊后来向我解释）《保尔和维尔吉妮》的一个场面。一把摇椅、几张小桌和几把藤椅。软垫东一个，西一个（听说是马什雷离开外籍军团时从布斯-比尔带来的）。三盏中国宫灯吊在天棚上，灯光暗淡。我看见搁板上放着几支大烟枪……这些古怪破旧的东西使人想到东京、南卡罗林的种植园主，想到上海的法国租界、利奥泰[1]管辖的摩洛哥。听米哈伊颇尴尬地对我说："这是居伊挑选的家具"，我恐怕未能掩饰住惊异之色。我坐得靠后一些。他们对着一个放酒水的托盘，低声说话。我从这次聚会一开始就产生的窘迫之感，越来越强烈，于是思忖是否最好告辞。然而我却动弹不得，就好像在恶梦中想逃离危险，又挪不动脚步一样。在晚餐过程中，由于暮色昏沉，他们的言语、动作，乃至面孔，都显得朦胧而虚幻；现在，在客厅更为幽暗的灯光下，一切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我想我的窘迫之感，正如一个

---

① 路易-于贝尔·贡扎尔夫·利奥泰（1854—1934），法国国务活动家、军人、元帅。1912年，他被任命为摩洛哥总驻扎官。中间有一年多被召回法国任陆军大臣，在摩洛哥任职至1925年。

人在黑暗中摸索，徒然寻找电灯开关。随即，我神经质地嘿嘿一笑，浑身乱颤，幸好其他人没有注意。他们继续交谈，但我一句也听不清意思。他们的衣着好似来乡下小住几日的巴黎富人。米哈伊穿一件粗呢外套；马什雷穿一件羊毛衫，棕褐色极为漂亮，肯定是开司米的；我父亲则穿一套法兰绒西服。他们的领口翻开，露出系得端端正正的丝巾。西尔维娅娜·玗夫的马裤，又给这一整体增添了运动的潇洒美。可是，这些装束，在这客厅里很扎眼：在这里本应看到身穿一套白麻布服装、头戴橄榄帽的人。

“您怎么离群儿啦？”米哈伊问我。“是我不好，实在不会招待客人。”

“亲爱的亚历山大先生，您还没有尝尝这醇美的白兰地呢。”马什雷说着，把一杯酒硬塞到我手里。“喝吧！”

我忍着恶心，强喝下去。

“您喜欢这间屋子吗？”他问我。“异国情调，对吧？我要带您看看我的卧室，我还在那屋挂了蚊帐。”

“居伊总怀恋殖民地生活。”米哈伊说道。

“那种地方讨厌极了，”马什雷说。他陷入沉思：“真有人劝我重返那里，我就再次从戎。”

他收住话头，就好像这方面他再怎么讲，也不会有人理解。冷场许久。西尔维娅娜·玗夫漫不经心地摩挲长统靴。米哈伊的目光追踪一只蛾子，最

后见它落到一盏中国宫灯上。再说我父亲，他那状态形同虚脱，令我不安。他的下巴几乎触到胸口，额头滚下豆大的汗珠。我希望一个仆人慢腾腾走来，收拾桌子。关掉电灯。

马什雷拿一张唱片，放到电唱机上。优美舒缓的旋律。我想这曲子名叫《九月之夜》。

"您跳舞吗？"西尔维娅娜问我。

她没等我回答，我们就已经翩翩起舞。我的头在旋转。我每转一圈，父亲就在我面前闪现一下。

"您应当骑骑马，"她对我说。"如果您愿意，明天我就带您去跑马场。"

他睡着了吗？我并没忘记，他经常合眼，但那只是装睡。

"到时候您瞧，在树林里遛马，简直痛快极啦！"

十年工夫，他胖了许多。一脸青灰色，他从前可不这样。

"您是若望的朋友吗？"她问我。

"还不是，但愿将来能成为朋友。"

她听到这种回答，露出惊奇之色。

"但愿您和我，我们也能成为朋友。"

"当然，我觉得您很迷人。"

"您认识这位……戴克凯尔男爵吗？"

"不太熟。"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不清楚；应当问问若望。”

“我觉得他人挺怪，这位男爵。”

“唔，他大概做生意吧……”

午夜时分，米哈伊要听听最后的新闻广播。广播员的声音比平时还要尖厉。他简短地播了几条消息之后，就开评论，声调随之变得歇斯底里。我想象他对着话筒的形象：形体瘦弱，扎条黑领带，只穿衬衣。他结束广播时，说了一声：“祝各位晚安。”

“谢谢。”马什雷说道。

米哈伊把我拉到一边，他搓了搓鼻子，把手搭到我的肩上，说道：

“对了……说说看……我刚想到一件事。您愿意合作办杂志呢？

“您认为行吗？”

我回答有点结巴，未免可笑：您认为——认为行吗？……

“当然，我非常希望您这样一位青年，参加《如此生活》杂志的工作。除非您讨厌记者生涯吧？”

“哪儿能讨厌呢！”

他沉吟一下，接着口气更加亲热地说：

“我并不想使您受到牵连，因为我的杂志的性质……有点特殊……

“我不害怕下水。”我对他说。

“您够有勇气的。”

“不过，您打算让我写什么呢？”

“哦，随您的便：一条新闻、一个专栏，或者‘见闻’一类的文章。您有的是时间。”

他说最后几个字，莫名其妙地加重语气，同时紧盯着我的眼睛。

“您同意啦？”他微微一笑。“您下水啦？”

“有何不可？”

我们回到其他人身边。马什雷和西尔维娅娜·玗夫在谈论若望-梅尔莫街刚开张的一家夜总会。我父亲也参加谈话：他特别喜欢瓦格拉姆林荫路的那家酒吧，老板原先是自行车运动员。

“你是说‘金光酒吧’吗？”马什雷问他。

“不对，那家叫‘仙境’。”父亲答道。

“你搞错了，老胖子！‘仙境’是在封丹街！”

“根本不对。”我父亲坚持。

“封丹街47号。去看看怎么样？”

“你说得对，居伊，”我父亲叹道。“你说得对……”

“你们熟悉‘巴迦泰勒城堡’吗？”西尔维娅娜·玗夫问道。“听说那里玩得挺快活。”

“在克利希街吗？”我父亲询问。

“哪儿是那儿！”马什雷嚷道。“在马热朗街！你又把它同‘马塞尔·迪厄多内’搞混啦！你全都弄混啦！最近一次，我们的约会地点是茹贝尔街的‘珠宝匣’，而先生却在阿诺夫尔街的‘塞札尔·勒奥纳’，一直等我们到半夜！对不对呀，若望？”

“没什么大了不起的。”米哈伊咕哝一句。

酒吧间和夜总会的名字，像连珠炮一样讲出来，足足列举了一刻钟，整个巴黎、整个法国，乃至整个宇宙，简直成了花街柳巷，成了露天大窑子。

“您呢，亚历山大先生，您常出来玩吗？”

“不常出来。”

“那好，亲爱的朋友，我们将邀请您去尝尝‘巴黎之夜的甜美’吧。”

他们一直边喝酒，边提起其它地方，名字不绝于耳：“阿尔莫里亚尔”、“扎尔达”、“火奴鲁鲁”、“舒伯特”、“吉普西”、“莫尼科”、“雅典人”、“梅洛迪”、“诙谐”。他们个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西尔维娅娜解开了衬衣钮扣。我父亲、马什雷和米哈伊的面孔也变了形，紫红得像猪肝，实在叫人担心。后来我只听见几个名字：“特里奥莱”、“基督山”、“卡普罗”、“瓦朗西娅”。我的头旋转起来，心想在殖民地，晚上聚会大概就像这样无休无止地延续。神经衰弱的种植园主反复咀嚼往事，极力跟抓住他们的恐惧搏斗，就怕下一次暴风雨袭击，全都完蛋。

我父亲起身，对他们说有点累了，今天夜里还有件工作要干完。

“你是去制造假钞票吧，夏尔瓦？”马什雷口齿不清地问道。“亚历山大先生，您不觉得他这嘴脸像个造伪币的吗？”

“别听他胡说。”我父亲说道。

他握住米哈伊的手，小声对他说：

“同意了，这事儿全包给我了。”

“全靠您了，夏尔瓦。”

当他过来向我告辞时，我对他说：

“我也该回去了。我们可以同行一段路。”

“很好，先生。”

“您这就是？”西尔维娅娜·玕夫问我。

“我要是您，一定防范他点儿。”马什雷指着我父亲，冲我来了一句。

米哈伊把我们送到游廊门口。

“我等着拜读您的文章，拿出勇气来！”他对我说。

我们默默地行走。我没有径直返回旅馆，而是同他走分界路，他流露惊奇之色，偷偷瞥了我一眼。他认出我来了吗？我本想问问他，但又想起他多会圆滑地回避难堪的问题。有一天，他不是对我说过“十个预审法官也拿我没辙”吗？我们经过一盏路灯，走出几米远，重又进入昏暗中。我所分辨出的房舍，似乎无人居住。风吹树叶沙沙作响。也许过去这十年，他已经忘记了世上还有我这一个人。为了能和此人并肩而行，花了多少心血，想了多少计谋……我眼前重又浮现“麦克图别墅”、米哈伊、马什雷和西尔维娅娜·玕夫三人的面孔，以及站在柜台里边的莫德·迦拉斯、穿过花园的格雷夫……在这漫长的几天里，举动、言语，以及我的警觉、窥伺和惊慌。一阵恶心……我只得停下喘口气。他

朝我转过身来，恰巧左首有一盏路灯，雪白的灯光将他罩住。他愣在那儿，一动不动，猛然，我差点摸摸他，好确认这并不是我的幻觉。我们继续朝前走，我想起从前我们一起在巴黎散步的情景。像今天夜晚一样，我们那时并肩闲逛。这次相识之后，我们也无非一起走走。只管走，我们谁也不打破沉默。这局面依然持续。拐个弯儿，对面便是“修道院”的铁栅门。我轻声说道：“今天夜色真美，对吧？”他心不在焉地答道：“对，夜色非常美。”离铁栅门有几米远，我等着他跟我握手告别。然后，我将目送他消失在黑暗里，而我则依旧站在路中间，呆若木雕，如同一个人错过了也许是一生难再的机缘。

“到了，我就住在这儿。”他对我说。

他怯生生地指给我看在林荫路尽头依稀可见的房子。在月光下，房顶微微闪亮。

“是吗？就在那儿？”

“对。”

我们俩挺尴尬。他无疑想让我明白我们该分手了，可又看到我还不肯走。

“看样子，那房子非常漂亮。”我说道，并摆出一副信服的样子。

“的确非常漂亮。”

我听出他的声音有点烦躁。

“您是最近买的吗？”

“对。也不对！”他结结巴巴地回答。他靠在

铁栅门上，身子没有动弹。

“这房子，您是租的吗？”

出乎我的意料，他的目光试图捕捉我的目光，而他是从来不正面看人的。

“对，是租的。”

一句话说得极轻，勉强听得见。

“您大概觉得我说话没有分寸吧？”

“绝无此意，亲爱的先生！”

他强挤出一个笑脸，也只是嘴唇颤动两下，就好像害怕挨上一拳，那样子真叫我可怜。此后，我一见到他就有这种感觉，乃致引起胸口灼痛。

“您的朋友都很可爱，”我说道。“今晚的聚会好极了。”

“但愿如此。”

这回，他向我伸出手来。

“我该回去工作了。”

“干什么？”

“没多大意思。算算帐。”

“打起精神干吧，”我低声说道。“希望近日还能见到您。”

“很高兴再见面，先生。”

当他推开铁栅门时，我感到一阵眩晕，真想拍拍他肩膀，向他解释为了找到他，我费了多少周折。何必呢？他沿着林荫路走去，脚步缓慢，显得疲惫不堪。他在台阶上停了许久。远远望去，我觉得他的身影难以确定。在疯狂之夜，那影子是人，还是

出现的怪物呢？

他是否思忖我伫立在铁栅门外，究竟等待什么呢？

我表现了极大的耐心，终于对他们有了进一步了解。7月份，巴黎的事务不忙，他们便到乡下“安享清闲”（正如米哈伊讲的这样）。我终日跟他们泡在一起，乖乖地聆听他们的谈话。我把搜集的情况记在小卡片上，但心里却明白，这些幽灵的简历没有多大意义，然而我今天不给他们立档，就无人来做这项工作了。既然我认识他们，那就责无旁贷，把他们从黑夜中拉出来，哪怕曝一下光也好。对我来说责无旁贷，这也是内心的需要。

“米哈伊”。青年时，他就在布雷邦咖啡馆同《晨报》一伙记者打得火热。他接受了他们的劝告，进入了报界。二十岁时，干些杂务，继而当了一个专事讹诈的刊物主编的秘书。他的信条是：“不用恫吓，只给点压力。”米哈伊到有关人的家中取信，他还记得常常受到冷遇，不过也有几个人极其热情，求他在老板面前美言几句，好让老板降低点要求。这些人做了“许多亏心事”。过了一段时间，

他升为编辑，但受命写的文章十分单调，开头千篇一律：“据可靠消息，某先生……”或者：“某先生何以……”再不然：“某先生果真……”接着便是“披露”，但他当了传播者，感到很惭愧。老板要求他总要用一小段弘扬道德的话结束全篇，诸如：“恶有恶报”，或者用他所称的“一线希望”结尾：“我们衷心祝愿某先生(或另一位先生)改邪归正。对此我们深信不疑，正如福音传教士所说：任何人处于黑夜，都要走向光明”，如此等等。米哈伊每月底领工资，心里总要难过一阵。再说，格拉蒙大街30号乙的办公室景象凄凉：褪了色的彩色壁纸、陈旧的家具、昏暗的光线。对他这样的小伙子来说，的确没有一点能令人振奋。他能在这鬼地方呆了三年，也只为领取丰厚的薪金。老板倒也慷慨大方，把红利的四分之一分给他。此公长相据说像雷蒙·普恩加来①，他还不乏情感，常常陷入极度悲哀，于是向米哈伊吐露心迹，他之所以成为敲诈者，是因为同胞令他失望。他原以为他们心地善良，但很快明白大谬不然，于是他毅然决定不断揭露他们的卑劣行径，而且迫使他们“出血”。一天晚上，心肌梗塞突发，他死在一家饭馆里。他临终的话是：“您要是了解！……”当时米哈伊年仅二十五岁。对他来说，那是艰难的岁月。他为几家报纸编电影和音乐厅专栏。

---

① 普恩加来（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2年至1920年他当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

他在新闻界，不久便声名狼藉：别人纷纷把他比作“朽烂的木板”。他自己也很苦恼，然而他既懒散，又图享乐，不能改过自新。他总怕过穷日子，一想到身无分文的境况，就不寒而栗。只要能捞钱，他什么都肯干，不亚于吸毒者要得到毒品。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春风得意，终于成了报社社长。“我们所经历的乱世”使他实现了这一梦想。他利用了混乱和黑夜。在这世风日下的社会中，他如鱼得水。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样一位仪表堂堂（凡是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称道他自然潇洒，目光明亮）、时有慷慨之举的人，何以寡廉鲜耻到这种地步。他身上有一点我很喜欢：他对自身绝不抱任何幻想。他那团的一个战友擦枪时不小心走了火，子弹穿进离他心脏几厘米的部位。这话他对我重复过多少回：“万一我被判处死刑而又不能减罪，行刑队可以节省一颗子弹，不必打十二发了。”

“马什雷”。生于特尔纳区。母亲是一位上校的遗孀，竭尽全力抚养儿子。这个未老先衰的女人深感受外界的威胁，盼望儿子进入修会，那样，至少他不会有什么风险了。从十五岁上起，马什雷只有一个念头：尽快离开索西埃-勒鲁瓦街的那套小房间，在那里，利奥泰元帅在镜框中，好像总以温柔的目光窥视他。照片甚至还有题词：“赠给德·马什

雷上校。俪安。利奥泰。”不久，母亲就有重大的理由替他担忧：学习一塌糊涂，好吃懒做。因为打破了一个同学的头，他又被学校开除了。此后经常出入于咖啡馆和寻欢作乐的场所，通宵达旦地打台球，打扑克。花钱越来越冲。母亲并未责备他。他没有罪过，全怪别人，怪那些坏蛋，怪那些共党分子和犹太人。她多么希望儿子呆在床上，躲在家里……一天傍晚，马什雷沿着瓦格拉姆林荫路闲逛，他感到的那种激情，是人在二十岁无所事事时常有的一阵阵冲动。他既后悔惹母亲难过，又因兜里仅有五十法郎而恼火……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他走进一家电影院，里边正放映《大显身手》，由皮埃尔·理查德-威尔姆执导的，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去参加外籍军团。马什雷在银幕上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形象。他一连看了两场，见那沙漠、阿拉伯城市和军服，简直着了魔。晚上6点钟，以外籍军团士兵自诩的居伊·德·马什雷，径直走向最近的咖啡馆，要了一杯黑茶藨子酒。接着又要了一杯。次日他就要入伍当兵了。

两年之后，他在摩洛哥听说母亲去世了。儿子不在身边，她始终非常想念。他向同室的伙伴，一个叫奥迪夏尔维的格鲁吉亚人诉说内心的痛苦；那人听了，立即拉他去布斯-比尔村的一家店铺，那是摩尔人开的咖啡馆兼窑子。晚会快结束时，那人灵机一动，举起酒杯，指着马什雷向人高喊：“为这个孤儿的健康干杯！”他说到点子上。孤儿，马什雷

始终是孤儿。他之所以参加外籍军团，也许是要寻觅父亲的足迹。然而他所到之处，唯见孤寂、荒沙和大漠的海市蜃楼。

他带着一只鹦鹉和满身疟疾返回法国。“在那种情况，最他妈叫人腻烦的，是车站没人接。”他对我解释。他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对耀眼的灯光、喧闹的人群，他已经不习惯了，连横穿马路都害怕，有一回到歌剧院广场，他简直惊慌失措，请一名警察拉着他过马路，到对面的人行道。后来，幸好碰见一名跟他一样的外籍军团老兵，那人在阿尔马耶街开了一个酒吧间。他们俩在一起回顾了往事。那人管他吃住，收养鹦鹉，这样，马什雷才多少恢复了生活的乐趣。他深得女人的青睐；那个时代（距今已很遥远），外籍军团着实能令人怦然心动。一位匈牙利伯爵夫人、一位大企业家的遗孀、一名“流浪艺人”酒吧舞女，总之，如马什雷所称，都是“金发女郎”，她们见到这个怀恋北非的小伙子，都被他的魅力所吸引，而他从她们的叹息声中，也大大地得到了实惠。出于职业观念，他经常穿着旧军服出入夜总会。像个活宝，令人开心。

“莫德·迦拉斯”。她的材料我掌握得很少。起初，她从事唱歌的行当，这种尝试毫无结果。马什雷告诉我，她曾在蒙索平原区的一家夜总会当老

板娘，而那里通常只有女顾客。米哈伊甚至说，由于窝藏罪犯一事，她被判处不得在塞纳省居住。她的一位朋友买下了博西尔的克洛-富克雷旅馆；多亏了那位有钱的保护人，她才得以经营这家旅馆。

"安妮·米哈伊"。她二十二岁，一头金黄秀发。如果真是若望-米哈伊的侄女吗？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她想当电影名星，想看到自己的名字"闪闪发光，到处皆是"。在扮演了几个小角色之后，她在《大搜捕之夜》中担任了主角，这部影片早已被人遗忘。我推测她跟马什雷定婚，是因为他是米哈伊的最好朋友。她对叔父(果真如此吗？)具有无限深厚的感情。如果说还能有几个人记得安妮·米哈伊的话，在他们的记忆中，她也只是一个命运不佳、但极为动人的青年女演员的形象……她要及时行乐……

关于西尔维娅娜·玕夫，我了解多些。出身微贱，父亲是桑松老厂的守夜工。她的青少年就是在一个小方块区域里度过的，北到多梅斯尼林荫路，南至拉佩和贝尔西码头。这地方的景色吸引不了多少散步游人。在这里经过某些地段，真以为深入偏远的省份；如果沿着塞纳河岸行走，又会觉得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港口。从贝尔西桥上通过的露天地铁、停尸间的建筑，给这里增添了无法改变的凄凉。

在这令人讨厌的环境中，却存在一块宝地，激发人的梦想，即里昂火车站。西尔维娅娜·玕夫每次出门，总要来到站前。16岁时，她就踏遍了站里的每个角落，尤为熟悉重要线路的发车站台。“国际列车软卧车厢”这几个字，使她脸蛋泛起红晕。然后，回到科尔比诺街的家中，还不断重复她永难游览的城市名称。博尔迪盖雷-里米尼-维也纳-伊斯坦布尔。她家大楼前有个花园街，黄昏时分，那里凝聚了十二区的全部烦闷和怅惘的魅力。她坐在街椅上。她何不闯一闯，登上一节车厢呢？她决心不再回家了，何况父亲整夜不归。她眼前海阔天空。

她从多梅斯尼林荫路，溜向人称“中国区”的胡同网(如今这个区还存在吗?一批亚洲移民在那里开了几家肮脏的酒馆、小饭馆，好像还开了好几家大烟馆)。车站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在这浊气冲天的小岛上挣扎，如同跋涉在沼泽地里。她去那里恰好找到她要找的人:“库克”办事处的一名旧职员。此人能说会道，仪表堂堂，靠各种非法生意混日子；对于这少女的前途，他立即有了一些很具体的方案。她渴望旅行吗？那就安排一下。他的表弟正巧是软卧车厢的检票员。两个男人送给西尔维娅娜一张巴黎—米兰往返票。不过在要发车时，他们给她介绍了一位肥头大耳、粉红脸膛的音乐家；一路上，她不得不满足这家伙的任性而复杂的要求。回程中，她又陪伴了一位比利时企业家。这对表兄弟成功地扮演了掮客的角色，从这种旅行卖淫中大捞油水。

他们全仗有一个人在软卧车厢供职，干起来得心应手，他在旅途中拉顾客。西尔维娅娜·玕夫记得有一回从巴黎到苏黎士，她在单间里连续接待了八个男人。当时她还不到二十岁。然而，应当相信的确有奇迹。在巴勒和拉绍德封区间的列车过道里，她结识了若望-罗捷·阿特梅。这个眼神忧郁的青年的家庭，在食糖和纺织品的生意界赫赫有名。他刚刚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却不知道如何支配。况且，他连一生如何打发都不清楚。他在西尔维娅娜·玕夫身上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对这姑娘十分敬慕，在四个月的共同生活中，对她从未有过放肆的行为。每到星期天，他都送给她一个小箱子，里面装满了首饰和银行支票，声音低沉地对她说："静观事变。"他希望她以后的生活"有保障"。阿特梅穿一身黑色服装，戴一副钢框眼镜，态度谨慎谦和，善气迎人，这种特点在老秘书身上时或见到。他对蝴蝶很着迷，并引导西尔维娅娜·玕夫也产生这种兴趣，但很快发觉这令她生厌。有一天，他给她留下这样一段话："他们要我参加家族的一次会议，肯定要把我送进一家疗养所里。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客厅左面墙上还有一小幅丁托列托① 的画。把它拿走吧。干脆卖掉吧。'静观事变'。"此后，她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音讯。多亏了这位有远见的青年，她在以后的日子里，才摆脱了物质生活的忧虑。她还

①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威尼斯画家。

有一些风流韵事，但我忽然感到气馁，实在没有兴致记录了。

米哈伊、马什雷、莫德·迦拉斯、西尔维娅娜·玕夫……我记下他们的简历，并非乐此不疲，亦非追求浪漫色彩，何况我缺乏想象力。我关注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生活在世外之人，正是要通过他们确认我父亲的不可捉摸的形象。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要编造出来。

我长到十七岁，才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我父亲。我在波尔多的圣安托万中学念书。有一天，总学监来通知我，说会客室里有人在等我。一位陌生的男子，皮肤黝黑，身穿深色法兰绒外套，他一见我进屋，便站起身。

“我是你爸爸……”

7月学年结束时的那天下午，我们又在校外相见。

“看来您通过了中学会考？”

他冲我微笑。我最后望了一眼我度过八年寒窗的寄宿学校的黄围墙。

如果再往前追寻我的记忆，我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位灰发妇人，父亲就是把我寄养在她家的。战前，她在格拉蒙街弗罗利克酒吧间照管衣帽间，退休后到利布尔讷定居。我就是在她家长大的。

后来，我就去波尔多上中学。

下雨了。父亲和我并肩行走，沉默不语，一直走到夏尔特龙码头大街，那里住着我的代家长佩萨克一家。(他们属于靠葡萄酒和白兰地发迹的显贵，我真盼那些显贵很快衰败。)在他们家度过的每天下午，是我最苦闷的时刻，我不愿提起。

我们登上宽大的楼梯。佣人来给我们开门。我径直跑到杂物间，我曾请他们允许把一只装满书籍的箱子放在那里(布尔热、马塞尔·普雷沃和杜维尔努瓦的小说，全是中学严禁看的书)。我突然听见佩萨克先生生硬的声音:“您在这儿干什么？”他是问我父亲。他又看见我拎着箱子，便皱起眉头:“您要走？唉，这位先生是谁？”我迟疑一下，接着嘟囔道:“我父亲！”显然他不相信，怀疑地问:“如果我看对了的话，您要像贼一样溜掉啦？”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们父子俩的确像当场被抓住的小偷。面对这个蓄留胡子、身穿褐色便袍矮个男人，我父亲不停地咬着雪茄，以掩饰窘态。我也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溜走。佩萨克先生转向我父亲，好奇地打量他。这时候他夫人也来了。接着，他女儿和大儿子相继出现。他们站在那儿，默默地端详我们，我就感到我们俩成了越墙而入，闯进这富户内宅的窃贼。当我父亲将烟灰抖在地毯上时，我看出他们的表情又鄙夷又开心。那女孩噗哧一声笑了。她哥哥，一个满脸疱疹的毛头小伙子，摆出一副英国人的潇洒派头(这在波尔多很流行)，

他居高临下地嚷了一声："先生也许要用烟灰缸吧？……""好了，弗朗索瓦、玛丽，"佩萨克夫人低声说道。"不要这么粗鲁。"她着重说出这句话，眼睛直盯着我父亲，仿佛要他明白"粗鲁"这个词是说给他听的。佩萨克先生仍就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态。我想是我父亲的浅绿色衬衫让他们不自在。面对这四个人的明显的敌意，我父亲好似一只被罩住的大蝴蝶。他摆弄着雪茄，不知该在哪掐灭好，于是朝门口退去。那些人伫立不动，恬不知耻地赏玩他的尴尬神态。我忽然对这个我还不大了解的人萌生了感情，朝他走去，高声对他说："先生，请允许我拥抱您。"拥抱完了，我又从他手指间拿过雪茄烟蒂，往佩萨克夫人十分珍爱细木雕上仔细捻灭。我扯了扯父亲的衣袖。

"这就够了，咱们走吧。"我对他说。

我们去"豪华"旅馆取他的行李，然后乘出租车到圣若望火车站。在火车上，我们开始交谈。他向我解释说，由于"生意"的原因，他没有跟我通音信，不过此后我们到巴黎一起生活，再也不分离了。我讷讷地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其实，"他出其不意地对我说，"您一定吃了不少苦头……"他让我不要再称他"先生"。我们在沉默中过了一小时。他要我陪他去餐车吃饭，我谢绝了；趁他出去的工夫，我翻看了一下他放在座位上的黑色皮包。里边只有一本南森的护照，跟我同姓，但有两个名字：夏尔瓦、亨利。他生在亚历山大，我想象当年

那座城市还有特殊的光彩。

他回到车厢，递给我一块巴旦杏蛋糕，这动作令我甚为感动。他问我是否已是“业士”了（他轻声说出“业士”，仿佛这个词令他敬畏）。他听了我肯定的回答，便严肃地点了点头。我贸然向他提出几个问题：他为什么到波尔多来接我？他是如何打听到我的踪迹的？每个问题他都避而不答，只是含混地打个手势，或者搪塞一句：“我以后向你解释……”，“以后你会明白的……”，“生活嘛，要知道……”。接着叹息一声，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态。

巴黎—奥斯特里茨。他犹豫了一下，才把地址告诉出租汽车司机。(后来还发生过类似情况，他让车把我们拉到格雷奈勒码头大街，而我们却住在凯勒曼桂荫大道。由于频繁迁居，我们往往把住址搞混，待明白过来，已是马后炮了。)眼下，则住在维拉雷—德约耶兹花园街。我想象那是个花园，泉水淙淙，鸟儿鸣唱。其实不然。原来是个死胡同，两侧排列豪华的大楼。我们那套房间在最顶层，临街的窗户造型奇特，宛如牛眼。三间屋子，天棚很低。“客厅”里只摆了一张大桌子、两张用旧的皮面扶手椅。墙上糊的是玫瑰主色调的壁纸，“如意”壁纸布的仿制品。一只青铜大吊灯(不过，我这种描写没有把握，维拉雷—德约耶兹花园街的这套房间，同菲利克斯—富尔林荫路的那套房有何差异，我分辨不清。两套房间里都散发着霉味）。父亲指定我

住小房间。席地铺了一张垫子。“实在抱歉，没有舒适设备。”他对我说，“再说，我们在这住不了多久。睡个好觉。”好几个小时我都听见他踱来踱去。我们的共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起初，他对我很客气；很难看到父亲对儿子这样彬彬有礼。当他同我讲话时，我觉得出来他尽量把话讲得准确精练，然而适得其反，他越来越咬文嚼字，结果绕在里边转不出来，总是一副抱歉和准备受责备的神情。他把早点送到我铺前，举止庄重，与这种环境极不相称，因为我房间的壁纸多处撕破，天棚吊着没有罩的灯泡，拉窗帘时则压得横杆渐渐沉下来。有一天，他直呼我的名字，立即感到无地自容。我为何如此受尊重呢？后来他亲自写信寄往波尔多，要求给我寄来文凭证书，我这才明白我受尊重多亏了我的“业士”文凭。证书一到手，他就让人镶在镜框里，挂在“客厅”的两扇“窗户”之间。我还发现他复制了一份，放在皮包里。有一天晚上散步，偶然碰上两名治安警察，让我们出示证件，我父亲见他们看着南森护照困惑不解，就把复制的文凭亮出来，说他“儿子是业士”，并重复了五六遍……晚饭之后（我父亲经常做一道他称为“埃及米饭”的菜），他点着雪茄，凝望我的文凭，目光变得越来越不安，最后干脆沮丧了。他的“生意”，他向我解释说，屡遭挫折。他是一个好强的人，从青少年起就同“严酷的生活现实搏斗，现在感到“疲倦”了，他讲“我灰心丧气了……”这话

的神态，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接着，他扬起头："然而您，您前途无量！"我礼貌地点点头……"尤其您有'业士'文凭……假如我交好运，有这样的文凭……"他的声音哽咽了，"'业士'文凭，毕竟是一种资历……"这句话如今还在我耳畔回响，令我激动不已，就好像听到一支往昔的乐曲。

至少过了一个星期，我还不知道他究竟干什么事。我听见他一大清早就出去，到做晚饭时才回来。他从一个黑色漆布袋里掏出食品：辣椒、大米、调料、羊肉、猪油、糖渍水果、粗面粉。然后，他系上围裙，褪下戒指，将带回的食品放到锅里，做好菜，便对着文凭坐下，并请我入座，我们用晚餐。

一个星期四下午，他终于要我陪他出去。他要去卖一张"极其难得"的邮票，为此兴奋不已。我们沿着"大军"林荫路走去，来到香榭丽舍。那张邮票用玻璃纸包着，有好几次他拿出来给我看。据他说，那是科威特唯一的一张，名为《拉齐德王子与万花景》。最后，我们到达马里尼方形广场。夹在剧院和迦布里埃尔林荫路之间的这个空场，正是邮票集市。（如今还存在吗？）人们三五成群，扎堆低抠交谈，打开小箱子，俯身察看里边的货色，翻阅邮册，手里挥动着放大镜和小钳子。这种居心叵测的骚动、这些形同外科医生与密谋者的人群，引起我极度不安。我父亲很快就挤进更加密集的一堆人里。十来个人围住了他，争相了解这张邮票是不是真货。四面八方提出问题，问得我父亲措手不及，答

不上一句话。他这张《拉齐德王子》为什么是橄榄茶色，而不是胭脂红色？真有有十三并十四边齿吗？有没有“更改票值的印记”？有没有丝线头？它不是属于“多种边框”一套的吗？是否检查了它“变薄”的情况？口气越来越激烈。那些人骂我父亲是“骗子”，是“无赖”，指责他要“兜售的蹩脚货”，连《世界之冠》目录中都没有列入。一个最激烈的家伙揪住我父亲的衣领，抡臂给了一个耳光。另一个接连给他几拳。为了一张邮票，他们肯定会要他的命（人心由此可见一斑），想到这一点，我忍无可忍，终于冲进人群。幸好我手里有把雨伞，乱抡几下，趁着吓退他们的工夫，把我父亲从这帮行凶的集邮者手中抢出来。我们一直跑到圣奥诺雷区。

由于我救了他的命，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就把他经营的“生意”向我和盘托出，并建议我当他的帮手。他的二十来个主顾，都是些轻率的人，分散在法国各地，他利用专业杂志同他们联系。那些人都收集成癖，迷恋五花八门的物品：旧通讯电话簿、胸衣、水烟筒、明信片、贞洁带、留声机、乙炔灯、艾奥瓦鹿皮鞋、薄底跳舞皮鞋……我父亲在巴黎到处搜罗这类旧货，打成邮包寄给有关主顾。他事先向他们索取的大笔汇款，同旧货的实际价格毫无关系。一个顾客预付给十万战前旧法郎。另一个顾客则付了三十万，要他把收集到的瓦尔德克·卢梭[①] 的半身像和头像，优先留给他……我父亲想

① 瓦尔德克—卢梭（1846—1904），法国政治家。

在这类“神经病人”之间争取更多的顾客，打算成立“法国收藏家协会”，自任主席，掌管财务，为此要求他们大量出资。然而，那些收藏家令他大失所望。他终于明白他们不会任他摆布。其实，那些收藏家头脑冷静，十分狡猾，而且寡廉鲜耻，冷酷无情。很难想象得出那些形容委琐的家伙所掩饰的计谋和残忍。为了一张黄褐色涂改票值印的邮票，或者一张日本的有打孔线的邮票，犯下了多少罪行。我父亲吃了一次亏，记住了自尊心所受的伤害，再也不想去马里尼广场进行可悲的冒险。起初，他用我跑跑腿，但我要显示主动性，向他谈起他还从未想到的一条财路：珍本爱好者。他挺赏识我的想法，并放手让我干。我还未涉世事，不了解生活，但是在波尔多，我啃过朗松编的文学史，熟悉所有法国作家，哪怕是最平庸、最无名气的作者。要不是经营书籍，我这点歪才能干什么用呢？然而不久我就发觉，极难廉价购到珍本。我只弄到一些二流作品的最初版本，有伏泰尔、菲尔南·格雷、欧仁·德莫尔德……偶然一次，我到茹弗鲁瓦渡口，花三点五法郎买了一本《材料与记忆》，翻开一看，扉页上有柏格森①给让·饶莱斯②奇特的题词：“你何时才不再称我小姐呢？”两位专家确认那是大师的手迹，于是这个珍本，我以十万法郎出手，卖给一位收藏家。

① 亨利·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

② 让·饶莱斯（1859—1914），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初次成功，我信心倍增，干脆亲手伪造题词，披露某一作者的隐私。我模仿手迹最得心应手的，莫过于夏尔·莫拉斯和莫里斯·巴雷斯。一本莫拉斯的作品，只因写上短短一句："献给列翁·布鲁姆，以示我仰慕之心。能否与您共进晚餐？人生如此短暂……莫拉斯。"就卖了五十万法郎。巴雷斯的一本《背井离乡》竟卖至七十万法郎，也无非伪造了给德雷福斯上尉的题词："勇敢，阿尔弗雷德。亲切地问候。莫里斯。"不过我已明白，最能吸引顾客的是作家的私生活，因此，我伪造题词的内容越来越下流，售价却越来越高。我选中了一些当代作家，由于有的还在世，为避免官司，我还是掌握分寸，适可而止。总之，我在他们身上赚了不少钱。

我们就是这样搞非法生意，买卖还挺兴隆，反正是盘剥那些头脑不健全的人。如今回想起那种手段，我心中不胜酸楚，真希望自己一跨入生活，就堂堂正正地做人。然而，一个青年无依无靠，在巴黎能有何作为呢？这个不幸者又有什么办法呢？

父亲自然花些钱买衬衣领带，而审美的眼光并不高明，但他也企图拿这资本到交易所去投机。我看见他倒在扶手椅上，一打打股票捧了满满一抱……他把股票堆在我们相继住的套间的过道里，经常查阅，挑选，登记造册。我终于弄清楚，这些股票都是一些倒闭的或早已不存在的公司发行的。然而他却坚信股票还有用，还能投入市场。"等我

们到交易所一开价……”他一副小调皮的样子对我说。

记得我们买了一辆廉价的老式小汽车，夜晚常驾驶那辆塔博牌旧车在巴黎街头兜风。出发之前，总是奉行抽签仪式。二十几张纸签摊在客厅里桌腿长短不齐的桌子上，随意抽出一张来决定我们的路线：巴蒂尼奥勒至格雷奈尔，欧特伊至庇克普，帕西至拉维莱特。再不然，我们就驱车去有秘密名称的一个街区，诸如云杉、白宫、仙境、美洲、冰川、乐园、小波兰……我的脚跟只要踏到巴黎某些敏感的地点，往事就像泉水一般喷出。例如，那个意大利广场，当初我们在兜风途中就曾停留过……那儿有家咖啡馆，打着“月光”的招牌。将近凌晨1点钟，音乐厅的所有落魄艺人，都在那儿粉墨登场：战前的手风琴手、头发斑白而神情倦怠、想在台上再现青年时灵活舞姿的探戈舞蹈演员、演唱弗雷埃尔或素西·索利道的全部曲目的涂脂抹粉、庸俗可笑的歌女。几个穷困潦倒的流浪艺人前来串场，在中间穿插些节目。坐在前排的那些先生头发油光锃亮，嘴上叼着香烟。这是我父亲喜欢的一个去处，他兴味十足地凝视那些幽灵。我始终没有弄清那是何缘故。

此外，那个地下妓院也不要忘记，它在雷伊林荫路73号，与蒙苏里公园毗邻。我父亲常去那里，同二鸨儿没完没了地密谈；那女人一头金发，有一张娃娃脸，和他一样，也是从亚历山大城来的。他

们俩追维往事，频频叹息，谈起西迪比什尔的晚会、帕斯特鲁迪酒吧间，以及许许多多如今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在巴黎十四区的这块埃及领土上，我们往往一直呆到拂晓。当然，我们游逛（或者逃避？），也到其它街区场所。米拉林荫大道有一家夜餐馆，座落在一群高楼中间；餐厅里总是空荡荡的，一面墙上挂了一幅达尼埃尔-罗普斯① 的大照片、不知是何用意。在马约和尚普雷之间，还有一家仿"美"式酒吧间，那是在赛马中下赌注者聚集的中心。有时我们一直闯到巴黎最北边，那是码头和屠宰场区，我们就到茹安维尔广场旁边、濒临乌尔克运河的"蓝牛"咖啡馆小憩。父亲偏爱那地方，因为那里颇像安特卫普市的圣安德烈区，令他想起他从前在安特卫普羁留的情景。有时我们往东南方向行驶，只见两侧绿树成荫，便知道快到万森树林了。多梅斯尼广场旁边的"雷莫"小吃店深夜还在营业，于是我进去歇歇脚。那个糕点冷饮店老板神情忧郁，是在温泉浴疗养地常见到的那种人，除了我们，似乎没有人认识他。还有一些地方如潮涌向我的记忆。我们的几处住址：凯勒曼林荫大道65号，举目便是让蒂伊公墓；勒迦尔街的那套房间，有一个原来房客丢下的八音盒，我卖了三万法郎；菲利克斯-富尔街的那幢豪华大楼，门房每次迎接我们都说："犹太人来啦！"再不然，就是位于冬季自行

① 达尼埃尔—罗普斯（1901—1965），法国作家、历史教授，1955年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

车赛场附近，在格雷奈尔码头大街的破旧三居室里所度过的夜晚。停电了。我们臂肘倚在窗台上，观看来来往往的露天地铁。我父亲穿着一件有破洞的便袍，他指着河对岸的帕希城堡，不容辩驳地说："有朝一日，我们要在特罗卡戴罗那区有个公馆！"但是在此之前，他常约我在各大饭店的门厅见面。在那种地方，他才觉得提高了身分，更能实现他的巨额生意的计划。他在大饭店一呆就是一下午，不知有多少回我去那里找他："壮丽蒂克"、"大陆"、"光明里"、"阿斯托里亚"等饭店……这些短暂逗留的场面，恰恰适合他那样一颗飘泊不定的脆弱的心灵。

每天早晨，他在圣保罗花园街的"办公室"接待我。那间屋很大，但只有一把柳条椅子和一个帝国时期式样的写字台。我们当天要寄走的包裹靠墙堆放着。我们把收件人的姓名地址登在目录簿上之后，便商量工作。我向他汇报我买下并标准出手的书籍，以及伪造题词的技术细节。不同作者的作品，要用不同的墨水、羽毛管笔或钢笔。我们核查帐目，仔细阅读《收藏家通讯》。然后，我们把包裹搬下楼，胡乱堆放在塔博牌车的后座上。干完这种装卸工的活儿，我就筋疲力尽了。

父亲去各火车站发运货物。下午，他去雅维尔街区，在他仓库的旧货堆里挑出二十来件能引起客户兴趣的器皿，运送到圣保罗花园街，再行打包。而后，他重新搜罗上货。客户的要求，我们必须尽

快答复。那些疯子总是急不可耐。

我则去干我的一摊，手拎箱子，直到天黑，就在共和国广场、林荫大道、歌剧院大街和塞纳河畔兜揽生意，但走到巴士底为止。这些街区各有魅力。圣保罗街区，是我梦想安度晚年的地方。只要开个小店铺，做点小买卖，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在巴[illegible]或西西里王街更好，命里注定，迟早要回犹太人区。在神庙街区，我就感到旧货商人的本能苏醒了。一到野径街区，我就想到可怜的父亲；这个东方的小公国包括开罗广场、尼罗街、本艾亚德路和阿布齐尔街。头四个区划分成许多省份，相互交错，我最终还是辨识了一条条无形的边界线。格雷内塔、马伊、圣厄斯塔什海角、维托利亚……我的最后一站，是维维埃娜商廊的小米里乌书店。到那儿已是黄昏时分，我巡视书架，坚信能找到所需要的书籍。小米里乌太太收藏了近百年的文学作品。多少作者，多少作品被不公正地遗忘……看着这情景，我们十分伤感。这些人花了多少心血，全付诸东流……她和我，我们只好聊以自慰，相互肯定说，世上还有皮埃尔·昂普、若望-若译·弗拉帕的崇拜者，而且迟早有一天，菲斯歇兄弟能出十八层地狱，得见天日。说完这些慰勉的话，我们就分手了。维维埃娜商廊的其它店铺，似乎关闭了一个世纪。有一家音乐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三份已经发黄的奥芬巴赫的乐谱。我坐在箱子上，时间停止在七月王朝与第二帝国之间的某一点上。在通道的尽头，

书店里射出微弱的灯光，我勉强看清小米里乌太太的身影。她守店铺要到什么时候呢？可怜的老哨兵。

再往远看，是故宫的空寂的拱廊。想当年，那里歌舞升平。俱往矣。我穿过故宫花园，周围一片岑寂，夜色柔和，回想起逝去的年代和未履行的诺言，不禁感到痛心。法兰西剧院。路灯眩目。如同猛然浮出水面的潜水员。我要到香榭丽舍的一家客店去见“爸爸”，我们好跟往常那样、驾驶塔博牌小汽车在巴黎街头兜风。

歌剧院林荫路在我面前展开，并宣告其它林荫路、其它街道；它们就要把我们投向各个方位基点。我的心跳加速。种种情况捉摸不定，而我的唯一的基准点，唯一坚实的场地，就是这座城市的十字街头和人行道；毫无疑问，我最终还要在这里踽踽独行。

不管多么心酸，现在我还要讲到“乔治五世地铁的那段痛心事”了。几周以来，我父亲对“小环线”极感兴趣，这条巴黎环城铁道早已废弃。莫非他打算通过认购股票使环铁重新营运呀？或许向银行贷款吧？每逢星期天，他就要我陪他去郊区，沿着旧铁道徒步走去，沿线各车站已经弃置不用，或者改为仓库了。荒草覆盖了铁轨。我父亲不时停下，

在记事本潦草地写几笔，或者画个不像样的图形。他还在做什么梦？也许他在等待一列永远不会驶过的火车吧？

6月17日这个星期，我们沿小环线穿过十二区。一路并不顺利。快到蒙唐普瓦夫街时，小环线同万森铁道相连接，结果我们迷失了，在这铁道的迷魂阵里转了三个小时，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决定乘地铁返回。看样子父亲对这一下午很不满意。通常我们探路回来，他总是情绪高涨，并让我看他的笔记。他向我解释说，很快就能搞出小环线的可靠材料，并转给当局。

“就等着瞧吧。”

瞧什么？我不敢问他。然而，6月17日那个星期天傍晚，他的一腔热忱焕然冰释。在万森-讷伊的地铁车厢里，他一页页扯下记事本，并撕成碎片，随撕随抛散，如同抛彩纸屑。这种梦游人一般的举动，这种既狂怒又细心的表现，是我在他身上从未见过的。我极力劝他冷静下来，对他说因为一时冲动，毁掉如此重要的工作成果，实在可惜，我完全相信他有组织才干。他那无神的目光盯着我。我们到乔治五世车站换车，在站台上等待。父亲还在我身后赌气。等车的人渐渐多起来，跟乘车高峰时差不多。这些人都是在香榭丽舍大街散完步，或是看完电影准备回家的。人挨人，十分拥挤。我站在道边头一排，无法后撤。我转身看看父亲，只见他脸上淌汗。地铁列车进站的隆隆声。就在车进站的一

刹那，有人在我背上猛推一把。

后来，我发觉自己躺在车站的长椅上。一小堆人围着我看热闹，他们议论纷纷，其中一个俯身对我说我“幸免于难。”另一个戴制帽穿制服的人（无疑是地铁职员）说要去“报警”。我父亲缩在后面，不时干咳几声。

两名治安警察扶我站起来，架着我的双臂穿过车站。行人纷纷回头看我们。我父亲脚步迟疑，跟在后面。我们上了停在乔治五世林荫路旁的囚车。富凯咖啡馆露天座上的顾客，正在享受夏日的美好黄昏。

我们并排坐着，父亲垂着头，两名警察坐在对面，一言不发。车开到克莱芒-马罗街5号警察分局门前停下。我父亲犹豫一下，才跟着走进去，他的嘴唇向外翻，神经质地翕动。

两名警察和一位瘦高个儿的人交谈几句。是警长吧？他要我们出示证件。我父亲显然很勉强地把南森护照交给他。

“是难民？”“警长”问道……

“不久我就能获准加入国籍，”我父亲低声回答，这种回答肯定是他事先想好的。“不过，我儿子是法国籍。”他声音极轻地加了一句：“还是业士……”

警长转向我：

“您险些摔到地铁车轮底下吗？”我沉默不语。“幸好有人拉住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的确，在我失去平衡的一瞬间，有人眼疾手快，刚好抓住我，救了我一命。但那一时刻的情况，我记忆很模糊。

“当您被人抬到车站的长椅上时，”警长又说，“您怎么会连喊好几声‘杀人犯’呢？”

随即他又问我父亲：

“您儿子患有迫害恐惧症吗？”

不待我父亲回答，他又转向我，出其不意地问：

“也许有人在背后推了您一把？好好想想……不要着急。”

在办公室里侧，一个年轻人正在打字。警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正查阅一份材料。我和父亲坐在椅子上等待。我以为他们把我们忘记了，但警长终于抬起头，对我说道：

“如果您有什么话要讲，请不要犹豫。我在此就是处理这种事情的。”

那个年轻人不时给他送来一张打好字的公文纸，他用红墨水改几笔。要把我们留到何时呢？警长指着我父亲：

“是政治难民还是普通难民？”

“普通难民。”

“那就好。”警长说道。

说罢，他又全神贯注地看起材料。

时间慢慢过去。我父亲显得很烦躁，用力搓手，现在想来，他恐怕手皮都搓破了。总而言之，他在

我的掌握之中，而且深知这一点，否则他为什么几次向我投来不安的眼色？我应当承认明显的事实：有人要把我推下火车道，让列车把我辗成肉饼。推我的人，正是坐在我身边这个南美人模样的先生。证据：当时我感到他的戒指触到我的肩胛骨。

警长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漫不经心地问我一句：

“您同您父亲相处得好吗？”

（有些警察有明察秋毫的天赋。比如，一位情报局的便衣警探退休后，便男扮女装，号称“杜巴伊夫人”，开办了“先知先觉”咨询所。）

“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回答说。

“您有把握吗？”

他提问时神情倦怠，并立即打呵欠。我确信他已完全清楚，但对此案并不感兴趣。一个青年被父亲推下地铁，类似的案件他无疑见得多了。寻常公事。

“再说一遍，如果您有话要对我讲，我洗耳恭听。”

然而我明白，他这样问我，纯粹出于礼貌。

他打开写字台上的灯。那人还在打字。显然他想把工作赶完。啪啪的打字机声响像催眠曲，我的眼皮直打架。为了克制睡意，我就仔细观察这间办公室各个角落。墙上挂着一份派出所一览表和共和国总统照片。杜梅？麦克马洪？阿贝尔·勒布伦？那是一台老式打字机。我断定6月17这个星期日，

将是我一生重要的一天；我暗暗转向我父亲，只见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鬓角滚下来。其实，他并没有杀人犯的那种恶相。

警长俯在那个年轻人的肩头上，看他打字进展如何，并小声指点几句。三名警察突然进来。也许他们要把我们送到拘留室。这种可能性于我倒无关痛痒。其实不然。警察眼睛盯着我：

“怎么样？没什么要说的？”

我父亲呻吟了一声。

“好吧，先生们，请自便吧……”

我们信步走着。我不便贸然要求他解释。到特尔纳广场，我凝望着“洛林啤酒店”的霓虹灯招牌，尽量以平淡的声音说：

“总之，您是要杀害我……”

他没有回答。我担心他像不让人靠近的鸟儿一样惊慌失措。

“要知道，我并不怨恨您。”

我指着啤酒店的露天座：

“去喝一杯好吗？该庆贺一下！”

最后这种讲法，引他露出一点笑容。我们入座时，他有意不坐在我对面，而且姿势跟在囚车里一样：弓着背，低着头。我给他要了两杯“波旁”，他爱喝这种美国威士忌酒；我自己则要了一杯香槟酒。我们碰了杯，但并非衷心祝愿。出了地铁这件遗憾的事件，我本希望我们之间把事实澄清。不可能。我面对的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只好不再坚持了。

邻桌的顾客聊得正起劲。空气和煦，令人心旷神怡。人人都感到轻松舒适，感到生活的乐趣。而我，年仅十七岁，父亲却要把我推到地铁车下，可谁也不关心这种事。

到了涅尔林荫路，我们又进了“佩特里桑”的那家别有风味的酒吧，喝了最后一杯酒。一位老叟步履蹒跚地走进来，坐到我们餐桌，并向我谈论弗兰格尔① 部队。我想他从前准是那支部队的军人。回忆起那段军旅生活，他伤心极了，以致潸然泪下。他不肯离开我们，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俄国人过了半夜，总像这样黏黏糊糊，激动不已。

我们沿着林荫路朝特尔纳广场走去。我父亲离开我们几步，走在前边，好像同这样寒酸的人为伍他感到耻辱。他加快脚步，我眼看他钻进了地铁入口。当时我想，此后再也不会见到这人了。我确信无疑。

这个老军人抓住我的胳膊，伏在我的肩头哭泣。走到瓦格拉姆林荫路，我们坐到街椅上。他非要向我详细讲述不可，讲述白军的苦难历程、朝土耳其的大溃败。最后，那些英雄军装褴褛，流落到君士坦丁堡。多悲惨啊！据说，弗兰格尔男爵将军身高超过两米。

---

① 弗兰格尔男爵（1878—1828），俄国将军，曾率一师哥萨克骑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他先后成为白军副统帅、统帅，向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进攻。

您变化不大。刚才，您走进克洛-富克雷，那步伐姿态还同十年前一样。您坐到我对面，我都准备给您要两杯美国威士忌，然而我认为这样未免失礼。您还认得我吗？跟您在一起，永远也了解不到什么情况。摇动您的肩膀，盘问您，又有什么用呢？我心里琢磨您配不配我对您这样感兴趣。

有一天，我猛然下决心去寻找您。我情绪低落到极点。须知局势恶化，令人担忧，山雨欲来风满楼，大祸将至。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期”。无所依托。于是我想起还有个父亲。当然，我经常想到“乔治五世地铁车站的痛心事件”，但我对您并无丝毫怨恨。对有些人，什么都可以原谅。十年过去了。您的情况如何？也许您需要我。

无论见到茶馆女招待、酒吧侍者还是饭店门卫，我都要打听，是从“银环”酒吧的弗朗索瓦那儿了解到您的行踪。据说，您同一帮快活的夜猫子打得火热，那团伙的头面人物是米哈伊和马什雷两位先生。后者的名字我不熟，但知道前者的名声：一个兼搞敲诈与秘密经营的记者。一周之后，我看见您走进克莱伯林荫路的一家餐馆。您会原谅我的好奇心，我也跟了进去，坐到您的邻桌。又找到您，我很激动，想上前拍拍您的肩膀，但是再一观察您的几位朋友，我就放弃了这种念头。米哈伊坐在您左首，他那一身华丽的穿戴，一眼望去就令我生疑，显然他是“附庸风雅”之徒。马什雷向周围的人宣称“这里的肥鹅肝难以下咽”。我记得还有一位棕

发女郎和一个金黄鬈发的男人，二人浑身上下无处不散发道德的腐臭。至于您，很抱歉，您在我看来状态也不佳。(是由于您那打了发蜡的头发、您那比往常更茫然的目光吗?)我看到您同这种“朋友”结成一伙，我感到很别扭。那个黄鬈毛炫耀着大把钞票，棕发女人则粗鲁地斥骂司厨长，马什雷更是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玩笑。(后来我就习以为常了。)米哈伊谈论他的乡间别墅，说在那里“度周末无比惬意”。我终于听明白，这伙人每周都在那里聚会。您也是其中一位。于是我情不自禁，渴望到那迷人的度假胜地去找您。

现在，我们对面坐着，怒目而视，我可以从容地端详您，“我害怕”。您在塞纳-马恩省的那个村庄，跟这伙人干什么呢？首先，您是如何认识他们的呢？我确实由于爱您、才会在这崎岖的路上追随您的足迹。您却毫无感激之情！也许我搞错了，但我实在觉得您的生活极不安稳。我推想，您还一直没有国籍，“在这种年头”，这种状况会带来极大的麻烦。我本人也丢了身份证，只剩下您视若至宝的这个文凭，然而今天我们正经历史无前例的“价值危机”，这文凭也就一钱不值了。我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冷静。

再说马什雷，他拍着您的肩膀，管您叫“我的夏尔瓦老胖子”。他却对我说：“晚上好，亚历山大先生，您来杯美国威士忌吧？”我怕惹他不快，才勉强喝下这令人作呕的饮料。我真想了解是什么利

害关系，把您和这个外籍军团的老兵结合起来。倒卖外汇？您从前经营过的股票交易？“再来两杯美国威士忌！”他冲司厨长格雷夫喊了一声，然后转向我：“这酒像乳汁一样好喝，对吧？”我一喝，可把我吓着了。别看他表面那么乐和，我倒怀疑他特别危险。可惜我们，您和我的关系没有超出纯粹客气的界限，因为，我总想让您提防这家伙。也提防米哈伊。“爸爸”，您跟这种人来往，实在不应该。他们迟早要把您耍了。我这守护天使的角色，能否有力量担当到底呢？我徒然地窥伺您友善的一眼神、一个手势（您即使没有认出我来，总可以向我多表示一点关切吧），但什么也不能扰动您这土耳其式的冷漠。我都考虑我是否有必要留在这里。首先一点，在这儿酒喝多了，毁了我的健康。其次，这仿乡村的环境中，我的情绪也沮丧到极点。马什雷劝我尝一尝一种“玫瑰夫人”酒，从前在“布斯-比尔兵营”，他让“所有朋友”领略了这种鸡尾酒的美味。我真怕他又要向我唠叨外籍军团和他的疟疾。不料他却转向您：

“怎么样，夏尔瓦，您考虑了吗？”

您回答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考虑过了，居伊。”

“那就对半分啦？”

“包在我身上，居伊。”

“我跟男爵商谈大宗买卖，”马什雷对我说。“对不对，夏尔瓦？应当庆贺一下！格雷夫，请拿

三杯苦艾酒来！”

我们碰了杯。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为我们头一个亿万富翁庆贺啦！”

他在您背上狠拍了一巴掌。我们应当尽快离开此地。然而去哪儿呢？您和我这种人，说不定在哪个街头就可能被抓起来。下火车出站，电影散场，离开饭店，没有一天不碰见大逮捕。千万避开公共场所。巴黎好比遍布陷阱的幽暗的森林，只能摸索着行进。您将承认，的确要有钢铁般的意志。炎热也欺人太甚。我从未经历过这么酷热的夏天。今天晚上特别闷热。要把人闷死。马什雷的衣领被汗水湿透了。您也汗流满面，汗珠在下颏儿颤动一瞬间，便有节奏地掉在餐桌上，而您干脆不擦脸了。酒吧的窗户全关上了，没有一丝风。我的衣裳贴在身上，就好像刚被暴雨淋过。我无法站起来。在这蒸汽浴室里，我只要动一动，就会完全溶化了。而您看上去并不感到特别不适；想必在埃及，您经常碰上这样的溽暑天气吧？再说马什雷，他明确对我说，“同北非地区相比，这里冷得要命”，于是又劝我喝另一种酒。不行了，我真的不能再喝了。算了，亚历山大先生……一小杯美国威士忌……我怕醉得不省人事了。现在，我就是透过一层水雾，看见米哈伊和西尔维娅娜·玕夫朝我们走来。如果是幻景那又当别论。（我很想问问马什雷，海市蜃楼是否就像这样透过水汽出现的，但我没有勇气开口。）米哈伊朝

我伸过手来。

“您觉得怎么样，塞尔日？”

这是他头一回直呼我的名：我总提防这种亲热的表示。他跟往常一样，穿一件深色羊毛衫，围一条领巾。西尔维娅娜·玗夫的乳房从上衣露出来，我发现她因为天热没戴乳罩。可是，为什么她还穿着马裤和长统靴呢？

“我们入座用餐吧？”米哈伊提议。“我简直饿极了。”

我总算站了起来。米哈伊搀着我的胳臂：

“您想过我们的计划？再说一遍，我让您全权处理。随您写什么。我这杂志的栏目为您开放！”

格雷夫在餐厅里等候我们。我们的餐桌正摆在吊灯下方。自不待言，全部窗户都关着。这里比酒吧间还热。我坐在米哈伊和西尔维娅娜·玗夫之间。您坐在我对面，但我能预料到您会躲避我的目光。马什雷点菜。他所点的菜肴似乎同周围的气温不大协调：蟹虾汤、浇汁煎肉和蛋奶酥。不能拂他的意。美食术似乎是他的不容他人染指的领地。

“我们先喝波尔多白葡萄酒！再喝佩特吕古堡陈酿！行吗？”

他用舌头打了个响。

“今天上午，您没有去跑马场，”西尔维娅娜·玗夫对我说。“我还以为您准去呢！”

两天来，她越来越主动接近我。我使她一见钟情，却不知是何缘故，是由于我这有教养的年轻人

的外表吗？还是看中我这结核病患者的脸色呢？抑或是她想刺激米哈伊吧？（她果真是米哈伊的情妇吗？）有一阵，我以为她和代代-威德梅调情；从前代代·威德梅是赛马骑师，因中风而改行，现在经营赛马场。

“下一次，您可要遵守诺言。您应当求得原谅……”

她的嗓子勒成小姑娘的声音，我生怕别人也注意到了。幸好没有。米哈伊和马什雷正在窃窃私语。您呢，目光茫然。吊灯宛似探照灯，光线强烈，就像一件铅制的斗篷压在我头上。我的手腕呼呼冒汗，感到血管都张开了，鲜血汩汩流出。格雷夫端上来的蟹虾汤滚烫，我怎么喝得下呢？马什雷忽地站起来：

“朋友们，我向诸位宣布一条重大新闻：三天后我结婚！夏尔瓦将作我的证婚人！礼遇要同地位相称嘛！没问题吧，夏尔瓦？”

您挤出一个笑脸，低声回答：

“我非常荣幸，居伊！”

“为我未来的叔父，若望·米哈伊的健康干杯！”马什雷挺胸叠肚地嚷道。

我随大家举起酒杯，但马上又放下了。我心里明白，只要再沾一点这波尔多白葡萄酒，我就会呕吐。要保存全部力气对付蟹吓汤。

“若望，能娶您的侄女，我三生有幸，”马什雷宣称，“她那腰身下部是巴黎最迷人的。”

米哈伊哈哈大笑。

“您认识安妮吗？”西尔维娅娜·玗夫问我，“比较她和我，您更喜欢哪一个？”

我沉吟一下，终于说道：“您哪！”这种故作风雅的调情，还能持续很久吗？她两眼直勾勾地瞧着我。然而我此刻的模样，恐怕不大好看……汗水顺着衣袖往下淌。这份儿罪要受到什么时候呢？其他人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米哈伊、马什雷和西尔维娅娜·玗夫的脸上，根本没有汗迹。您也只是鬓角流儿滴汗，这不要紧……您把蟹吓汤喝得一干二净，那劲头就好像寒冬在瑞士高山的木屋里。

“您怎么不吃，亚历山大先生？”马什雷怪道。“不喝白不喝！这浓汤味道好极啦！”

“我们这位朋友热得难受，”米哈伊说道。“塞尔日，但愿这不妨碍您写一篇妙文……我先跟您说下，我下周要用。您心里有谱儿了吧？”

我若不是处于这种受罪的状态，非扇他耳光不可。这个无耻之徒，怎么会以为我欣然答应同他的报社合作，和这伙告密之徒同流合污呢？两年来，《如此生活》杂志每页上都有这些诈骗者、文痞的签名，他们却逍遥法外。哈！哈！他们就等着大捞油水。无赖、败类、流氓、恶棍、缓刑的死犯。米哈伊不是给我看了他收到的恫吓信吗？他害怕了。

“我还想这件事，”他对我说，“您能不能给我炮制一篇小说？”

“可以！”

我竭力装出最兴奋的口气。

“写点黄色的东西，您明白吗？”

“完全明白！”

气温太高，难以讨论。

“不要赤裸裸的淫荡，而是要轻浮的东西……略带色情……您以为如何，塞尔日？”

“乐意效劳。”

他要求什么都可以。既然要有求于人家，首先我得向他表示出诚意来。他期待我透露点构想，好吧！

“我建议您分期连载……”

“好主意！”

“要用‘忏悔录’的形式。这更有刺激性。比如：《一个花花司机的忏悔》。”

我刚好想起在战前一本杂志上见到的这个题目。

“妙极啦，塞尔日，妙极啦！《一个花花司机的忏悔》！您身手不凡啊！”

他简直欣喜若狂。

“第一部分何时交稿？”

“三天之后。”我对他说。

“您能让我先睹为快吗？”西尔维娅娜·玗夫悄声问我。

“我呀，”马什雷以教训人的口气宣称，“我就爱看偷鸡摸狗的故事。就瞧您的了，亚历山大先生！”

格雷夫端上来浇汁肉。不知是由于闷热，还是由于强光照透我脑袋的吊灯的缘故，我一见这油腻的食物摆在面前，突然发出一阵狂笑，身体都为之抖动，但随即又陷入极度颓唐的状态。我试图捕捉您的目光，但是徒劳。我不敢转向米哈伊或者马什雷，怕他们跟我说话。万般无奈，我的注意力就集中到西尔维娅娜·玕夫嘴角的美人痣上。我边等边想，恶梦也许快要结束了。

终于，米哈伊提醒我。

“您在构思小说吧？可是，我不希望这倒您的胃口！”

“边吃边来灵感嘛。”马什雷也发表看法。

而您呢，哑然一笑，我就不该期待您会有别的表示。您同这些流氓沆瀣一气，我是世上唯一想帮您的人，而您却一向无视我。

“尝尝这蛋奶酥，”马什雷对我说。“一到嘴里就化！地道的美食！对不对，夏尔瓦？”

您依阿取容的口气令我伤心。就应当丢下您不管。有时候，“爸爸”，我真想打退堂鼓。我抱着腰扶住您。如果没有我，您会如何呢？如果不是我忠诚，不是高度警惕，您会如何呢？如果我撒手不管，您就会颓然倒下去。我们试试怎么样？当心啊！我已觉得一种轻微的麻痹之感侵入我肌体。西尔维娅娜·玕夫解开两个上衣扣子，转过身偷偷让我看她的乳房。瞧瞧又有何妨？米哈伊懒洋洋地摘下领巾，马什雷手托下巴，若有所思，连连打呃儿。当

初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一张张灰不溜秋的长脸，像獒狗一样对您怒目而视。席间谈话令我厌烦。米哈伊和马什雷的声音，就像从转速变慢的唱片里发出来的。声腔拖长，变调，最后沉入黑水中。由于汗水蜇眼睛，我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灯光暗下来，暗下来……

“喂，亚历山大先生，您不至于昏倒吧！……”

马什雷用湿毛巾敷在我的额头和太阳穴上。过去了。片刻不适。我已有言在先，“爸爸”。下一次我万一缓不过来呢？

“好些了吗，塞尔日？”米哈伊问道。

“睡觉之前，我们一起散散步。”西尔维娅娜·玗夫对我耳语。

马什雷又武断地说：

“来白兰地和土耳其咖啡！灵极了，您一喝就能振作起来！您就信我的好了，亚历山大先生！”

总而言之，唯独您不关心我的身体，看到这情景，我更加伤心。但是我仍坚持到晚餐结束。马什雷要了一种“助消化酒”，接着又谈起他的婚事。有一件事，他一直举棋不定：谁当安妮的证婚人？他和米哈伊举了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名字。继而，他们又开列宾客名单。每写上一个名字，就评论几句。我担心他们要一直干到拂晓。米哈伊疲惫地摆了摆手。

“不等到那时候，我们全要被枪毙。”他说道。

他看了看表。

“我们去睡觉吧？您说呢，塞尔日？”

我们走进酒吧？撞见莫德·迦拉斯和代代·威德梅。他们俩倒在扶手椅上，男的紧紧搂着女的，女的则假装挣扎。看来他们喝多了。我们从旁边走过时，威德梅扭过头，目光诡谲地瞥了我一眼。我们两个不大投合，我对这个老骑师甚至本能产生一种厌恶。

到户外又能畅快地呼吸，我很高兴。

“您能一直陪我们到别墅吗？”米哈伊问我。

西尔维娅娜·玕夫挽住我的胳臂，我不好拒绝。您却驼着背，走在米哈伊和马什雷中间，就好像被两名警察押送，您的手表在月光下闪亮，也像是戴着手铐。您在大搜捕中被抓住，被押往拘留所。这就是我幻见的情景。“在这年头”，这是极其自然的事。

“我等着《一个花花司机的忏悔》，”米哈伊对我说，“就看您的了，塞尔日！”

“您要给我们写一篇屁股的有趣故事，”马什雷也说，“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给您出些主意。明天见，亚历山大先生。还有你，夏尔瓦，做个好梦。”

西尔维娅娜·玕夫对米哈伊耳语几句。(我很反感这样议论我，也许是我搞错了。)米哈伊点了点头，动作轻微得难以觉察。他推开大门，扯着马什雷的衣袖，只见他们走进了别墅。

您、她和我，我们默默地站了片刻，然后掉头返回克洛-富克雷旅馆。您走在后面。她又挽起我的胳臂，头倚在我的肩上。实在抱歉，让您，让您看这一场面，但是我不愿意拂她的意。在我们这种处境，“爸爸”，最好顺从一点！到了十字路口，您非常客气地向我们道了“晚安”，便走上分界路，把我只身丢给西尔维娅娜。

她向我提议散散步，“以免辜负美好的月色”。我们第二次经过“麦克图别墅”的门前。客厅里一灯荧然，一想到在这装饰成殖民地风格的环境里，马什雷还在喝最后一杯白酒，我就感到脊背发凉。我们沿着树林边缘的跑马道漫步。她解开了上衣扣子。树叶飒飒的声响和淡蓝色的幽光，愈加使我头脑昏沉。经过晚餐的折磨，我已疲惫不堪，现在一句话也不讲了。我作出超人的努力张开口，却发不出声来。幸好她开始讲述她爱情生活的纠葛。不出我所料，她是米哈伊的情妇，不过，他们二人都“思想开放”。比如，他们特别喜欢参加放荡的聚会。她问我对此是否反感。我回答说，当然不反感。又问我已经“尝试”过吗？还没有，但如果有机会，我何乐而不为。她向我保证，下一次一定“吸收”我。米哈伊有一套十二间屋的寓所，那里常举办这类聚会。莫德·迦拉斯也参加。还有马什雷。还有米哈伊的侄女，安妮。还有代代·威德梅。还有其他人，人数众多。这种时候在巴黎寻欢作乐，简直是发疯了。米哈伊曾向她解释过，在大难降临之前，

人总是这样。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呢，对政治毫无兴趣，一心想寻欢作乐，及时而纵情行乐。在这原则声明之后，她又向我吐露了隐私。在伊埃娜林荫路上一次舞会上，她结识了一位年轻人。那相貌，兼有马克斯·什姆林和亨利·迦拉两人的特点。思想么，那是个机灵鬼。他参加了这几个月来不断扩大的警察预备队，并嗜好乱放手枪。这种英雄行为并没有使我诧为奇事。在这年头儿，我们不是要时时祈祷上苍，保佑我们不要中流弹吗？她同他一连厮守了两天两夜，她还讲了许多细节，但我根本没听。我刚刚认出，在右首大栅栏里面，那幢窗户呈尖形穹窿、屋顶象清真寺尖塔的房子，正是您的“别墅”。从这个角度，比在分界路上看得更清楚。我甚至觉得依稀望见您在阳台上的身影。我们相距五十米，我只要穿过这荒芜的园子，就能到您的面前。我犹豫了片刻，本想招呼您或者向您招招手。但是都不行。我的嗓音嘶哑，恐难传到，而且胳膊也抬不起来，从晚上聚会一开始，我就感到麻木不仁。是由于月光的缘故吗？“您的”别墅沐浴在北极夜光之中，好像飘浮在地面上的一座纸板造的宫殿，而您就像一个肥胖的苏丹王。您嘴唇松懈，眼神茫然，倚着栅杆，同树林默默相对。我想到我为了接近您所做出的牺牲，只想告诉您：不要再为“乔治五世地铁车站那段痛心事件”耿耿于怀了。置身于这种有损我身心健康的氛围中，忍辱受屈同这些败类为伍，日日夜夜坚持不懈地守候着您。这一切，

难道只为了眼前这幻景！不过，我还要坚持追踪到底。我对您很感兴趣，“爸爸”。人总有寻根的兴趣。

现在夜色暗下来。我们抄一条近路回村子。她还向我谈论米哈伊在伊埃娜林荫路的住所。夏天夜晚，他们就呆在露天平台上……她的脸靠近我的脸。我的脖颈感到她的气息。我们摸索着穿过克洛-富克雷旅馆的酒吧间，我走进她的客房，这我早有预料。床头柜上的台灯安着红色灯罩。屋里有两把椅子和一张写字台。四壁镶着黄绿条纹的缎子。她打开收音机，嘈杂声中传来安德烈·克拉沃的歌声，显得十分遥远。她横躺在床上。

“劳驾，帮我脱掉靴子好吗？”

我照办了，但一举一动却像梦游人。她递给我一个烟盒，我们一起抽烟。显而易见，克洛-富克雷旅馆的所有客房都一色装饰：帝国时期风格的家具、表现狩猎场面的英国版画。她拿起枪把镶嵌贝壳的小手枪，摆弄着玩，我思忖道：我答应米哈伊的那篇《一个花花司机的忏悔》，这场面恐怕就算第一章吧。在强烈的灯光下，她的面容显得比我想的要老些，脸庞因疲倦而肿胀，下颏儿上蹭了一抹口红。她对我说：

“靠近点儿。”

我坐到床沿儿上。她用臂肘支起身子，直盯着我的眼睛。这时，电压一定是降低了。黄色纱幕罩住了房间，如同旧照片的色调。她的脸变得朦胧，

家具的轮廓也模糊不清了。克拉沃还在低声唱歌。我突然提出一开始就如梗在喉的问题，生硬地说：

“请门，关于戴克凯尔男爵，您了解什么吗？”

“戴克凯尔？”

她叹了口气，扭头面壁。几分钟过。她似乎把我遗忘了，于是我又追问道：

“那个戴克凯尔，是个怪人，对不对？”

我等待着。她毫无反应。于是，我又一板一眼地重复道：

“那个戴克凯尔，是个怪—人！……”

她却一动不动，显然睡着了，我绝得不到答复。忽然，我听她咕哝道：

“他引起您的兴趣，那个戴克凯尔？”

如同夜晚灯塔的闪光，十分微弱。她声音懒懒地又说：

“您管那个人干什么？”

“没什么……您早就认识他吧？”

“那家伙？”她讲“那家伙”时，语气加重，就像醉汉总是重复同一个词时那样。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试探着说，“他是米哈伊的朋友吧？”

“是他的心腹！”

我正要问她所说的“心腹”是什么意思，但又一转念，还是伺机以动为好。她尽讲些离题的话，然后缄默不语，接着又嘟嘟囔囔，话语不清。我已经习惯于这种摸索揣摩，深知在这种耗力的捉迷藏

游戏中，您再怎么伸出胳臂，也是两手空空，抓不住东西。我试图引她回到问题的要害上，但相当费劲。谈了一小时，我总算从她嘴里掏出一些具体情况。是的，您充当米哈伊的“心腹”，充当他的代理人和杂务总管，出面去经营一些可疑的交易。黑市？上门兜售？最后，她打着呵欠对我说：“况且，若望打算尽快甩掉他！”这下子情况明了了。接着，我们又天南地北地闲聊。她走过去，从写字台上取来一只小皮箱，给我看米哈伊送给她的首饰。他挑送的尽是镶嵌宝石的大首饰，因为据他说，“在卖主遭难的时候，很容易讨价还价”。我对她说，“在我们这种时期”，这种想法非常对路。她问我在巴黎是否经常出门。有许多精采的演出：罗杰·迪歇斯纳和比利·波旁正在“俱乐部”咖啡馆献艺。塞许·阿亚卡瓦在昂比居剧院再度公演《渎职》；在“沙皮托”开胃茶馆里，可以看到米歇尔·帕尔姆和斯卡金斯基的乐队的演出。然而，我却在考虑您，“爸爸”。如此看来，您只是个傀儡，用完时就一脚踢开。您跟苍蝇一样，消失了不会引起一点反响。二十年后，谁还会记得您呢？

她拉上窗帘。我只能分清她的脸庞和棕发了。我回想这一晚上的一幕幕情景。没完没了的晚餐、月光下的漫步、米哈伊和马什雷回到“麦克图别墅”的场面。还有您在分界路上的身影。是的，所有这些影影绰绰的景象，都已成为过去。我又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寻觅追踪您的足迹。那是什么年

代？哪个时期？过的是什么生活？在您还未成为我父亲的时候，多亏了什么奇迹，我就认识了您呢？在散发茴鱼和皮革气味的酒馆里，当一名自编自演的歌手演唱《犹太人的故事》时，我怎么会在一群古怪的顾客面前做出那么大努力呢？我为什么要那么急于当您儿子呢？她关上，床头灯。隔壁传来吵闹声。是莫德·迦拉斯和代代·威德梅。他们对骂了好一会儿，后来又是叹息，又是呼呼的喘息声。收音机的杂音停止了，弗雷德·阿迪松演奏一曲之后，又播放了最后一次新闻报导。在黑暗中，听到总是歇斯底里的播音员，的确够瘆人的。

我还真得有耐心！马什雷把我拉到一边，开始一家一家向我描述卡萨布兰卡的妓院区，他说在那里度过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忘不了非洲！它给人留下印记。满是梅毒的大陆。我出于礼貌，表示感兴趣，听凭他一连几小时扯那“婊子非洲”。他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他的皇家血统。他自称是路易十四的私生子德·曼恩公爵的后裔。他的“德·厄伯爵”的爵衔就是佐证。每次，他都要用纸笔画出家族谱系，向我讲解，连画带讲直到天亮。他常常弄混，划掉一些名字，又添上另一些名字，结果字迹难以辨认。最后，他把纸撕得粉碎，恶狠狠瞪着我：

“您不相信吗，嗯？”

在另外几个夜晚，又提起疟疾以及和安妮·米哈伊即将举行的婚礼。他犯病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然而根治不了。而安妮又一向我行我素。他只是出于对米哈伊的友谊才娶她。维持不了一个星期……想到这些事，他心里酸楚，再借着酒劲，就显得咄咄逼人，说我是“毛孩子”、“黄口小儿”。说代代·威德梅是“拉皮条的”，说米哈伊是“浪荡鬼”，说我父亲是“唯利是图的犹太人”。他逐渐平静下来，请我原谅。我们最后再喝一杯苦艾酒好吧？这是消愁的最灵药方。

米哈伊向我谈起他的杂志。他要增版，将《如此生活》增加到三十六页，开辟新专栏，以便让各方逸才大显身手。不久就要庆贺他从事记者生涯五十周年，届时将举行午宴，大部分同仁会光临祝贺：莫拉兹、热尔贝尔、勒乌勒、勒斯唐迪……还有其他重要人物。他将给我引见。他乐于帮助我。假如我缺钱，那就不要犹豫，跟他说一声就行：他可为我即将发表的小说预先付款。时间慢慢过去，他那自信和保护人的腔调，渐渐让位于越来越强烈的烦躁情绪。他向我透露，他每天收到一百来封匿名信。有人想要他的命，他不得不申请携带武器证。总而言之，值此大多数人“谨守观望主义”的时期，他却大肆参与，从而受到谴责。至少他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白纸黑字，难以抹煞。迄今为止，他一直站在当权者一边，然而形势的发展也许对他和他的朋友们不利。到那时候，就不会有人给他们送礼

了。不过眼下，他不要听任何人的教训。我对他说，这也正是我的看法。我脑海里闪过古怪的念头：这家伙对我没怀戒心（至少我这样认为），干掉他易如反掌。跟一个“叛徒”或“卖国贼”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机不可失。他冲我微笑。老实说，我对他有好感。

“亲爱的，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他爱过冒险的生活。在下一期的社论中，他还要大“冒风险”。

西尔维娅娜·玕夫每天下午都带我去跑马场。我们遛马的时候，时常碰见一位气度不凡的六旬老者。如果不是他向我们投来的鄙夷目光令我惊奇，我还不会特意留心他。自不待言，他认为“在这种悲惨的年代”还骑马遛弯儿，追求消遣，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在塞纳-马恩省会留下很坏的印象。西尔维娅娜·玕夫的举止只能坏事，不能争取别人对我们的好感。我们沿大街返回时，她高声说话，敞声大笑。

难得有点清静的时刻，我就动笔撰写“连载小说”，应付米哈伊。他对《一个花花司机的忏悔》完全满意，又向我预约了三篇。我已经交给他一篇《一位古板摄影师的忏悔》。还有两篇《途经莱斯沃斯岛》和《单间套房夫人》，我要尽快写出来。这就是我所经受的考验。以期同您接触。色情小说、面首、一个酒鬼和一个讹诈者的心腹，您还要把我拖到什么地步呢？是否还沉下更深些，才能把您从泥潭中拉

出来呢？

现在想来，我的行动徒劳无益。关切一个早已消失的人。想要询问认识他的人，不过他们的踪迹和他的一样泯灭了。关于他从前的生活，只掌握一些非常模糊、又往往相互矛盾的情况，了解两、三点标记。物证吗？一枚邮票和一枚伪造的荣誉团勋章。因此，只能靠想象了。我闭上眼睛。克洛-富克雷酒吧间和“麦克图别墅”殖民地风格的客厅。多少年过去了，家具覆盖了灰尘。霉味直呛嗓子。米哈伊、马什雷、西尔维娅娜·玕夫都伫立不动，宛似蜡人模特儿。而您，坐在软垫上，双目圆睁，面部凝滞。

要搅动所有这些死物，的确是个非常可笑的念头。

第二天就要举行婚礼，可是安妮却无影无踪了。米哈伊拼命打电话找他。西尔维娅娜·玕夫翻看记事本，告诉他“那个傻瓜”可能去的几家夜总会的电话号码：“东东之家”，三圣街87.42、“博斯弗尔”，黎塞留大街94.03、“雄山鹑”，万蒂米尔大街30.54、“火花”……马什雷一声不吭，接连干掉几大杯白兰地。米哈伊在两次拨电话之间，还劝他耐心一点儿，现已得知安妮的行踪：11点左右，她到过“基督山”夜总会。运气再好些，也许

就能在“吉贵特”或者“纹章”夜总会“逮住”她。但是马什雷再也不信了。算了，电话再打下去也白费劲。

而您，坐在墩垫上，竭力摆出一副愁苦的样子。您终于怯声怯气地说：

“拨拨‘金鱼’夜总会试试：奥德翁90.95……”

马什雷抬起头：

“嘿，夏尔瓦，不用你多嘴……”

于是，您敛声屏息，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您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米哈伊则越来越焦躁，不停地拨电话：“总督”，歌剧院大街95.78、“卡雷尔之家”，巴尔扎克大街59.60、“三曲华尔兹”，凡尔纳大街15.27、“海阔天空”……

您轻声重复说：

“也许在‘金鱼’夜总会：奥德翁90.95……”

米哈伊嚷道：

“住口，夏尔瓦，听见没有？”

他挥动电话筒，就像挥舞狼牙棒，只见他的手指骨节都失去血色了。马什雷慢慢喝完一杯白兰地，然后说：

“他再吭一声，我就用刀片割掉他的舌头！……说你哪，夏尔瓦……”

我趁机溜到游廊上，深深地吸气。宁静、清爽的夜晚。终于单独呆一会儿。我定睛望着停在大门里的马什雷的塔博车，只见车身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他总是把钥匙忘在仪表盘上。无论是他还是米

哈伊，都不会听到马达声响。只用二十分钟，我就能开进巴黎市区，回到我在古维翁-圣西尔林荫大道的小房间。我要闭门不出，静候好日子。不再参与己无关的事情，不再无谓地冒风险。您自己想法应付吧。自顾自吧。然而，把您一个人丢给他们，我一想到这一点，就感到左胸挛缩疼痛。不行，这种时候，不能抛掉您。

我身后有人推开玻璃门，坐到游廊上的扶手椅上。我回头一看，认出您在幽暗中的身影。老实说，我没有料到您到这儿来找我。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朝您走去，如同捕蝶人接近一只随时可能飞走的珍奇蝴蝶。还是我打破了沉默：

"怎么样，他们找到安妮了吗？"

"还没有。"

您哑然一笑。透过玻璃，我望见米哈伊站在那儿，肩头和腮帮子中间夹着电话听筒。西尔维娅娜·玗夫在电唱机上放了张唱片。马什雷像个机器人，自斟自饮。

"您的朋友挺怪。"我说道。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只是……生 意 上 的 关系。"

您找火点烟，我主动把西尔维娅娜·玗夫给我的白金打火机递给您：

"您做生意？" 我问道。

"没别的办法。"

又是哑然一笑。

“您同米哈伊一起干吗？”

他沉吟一下，才答道：

“对。”

“顺利吗？”

“马马虎虎。”

我们可以做竟夜长谈了。我渴望已久的“接触”终于实现了。我坚信这一点。从大厅里传来探戈歌手的低沉声音：

在小油灯的灯光下……

“我们何不活动活动腿脚？”

“有何不可呢？”您回答说。

我最后又朝玻璃门瞥了一眼。玻璃附了一层水汽，我只能影影绰绰看见隐没在黄色雾中的三个黑影。也许他们睡着了……

在小油灯的灯光下……

走到小径的末端，仍能听到这歌声的片断，我不禁感到困惑。我们究竟是在塞纳-马恩省，还是在哪个热带国家？圣萨尔瓦多？布兰卡港？我打开大门，抚摩塔博车顶。我们不用开车，只要大步一跨，一个箭步，就可以回到巴黎市区。我们像失重一般，沿中心大街飘然而去。

“他们要是发现溜掉了呢？”

“无所谓。”

您在他们面前总是那么胆战心惊，唯唯喏喏，有这样一句回答，实在令我吃惊……您这是头一回显得放松了。我们走上分界路。您轻声吹起口哨，甚至还滑了几下探戈舞步；而我，也被一种不稳定的和谐所感染。您对我说：“去看看我的别墅吧”，好像这事极其自然。

从这一刻起，我明白是在作梦，极力不做突然动作，以免惊醒。我们穿过荒芜的园子，步入门厅，您锁上门。您指着堆放在地上的几件外衣对我说：

“穿上点儿，这里冷。”

不错，我冷得牙齿打战。您还不大熟悉这地方，费了半天劲才摸到电灯开关。一个长沙发、几张安乐椅、几把带套的扶手椅。大吊灯上缺几个灯泡。两扇窗户之间的五斗橱上，摆着一束枯萎的花。想必是您平时不进客厅，而今夜要对我尽地主之谊。我们站着一动不动，都有点发窘。终于，您对我说：

“请坐，我去烧点茶。”

我坐到一张安乐椅上。椅子罩着套，必须坐稳，以免滑下来。我面前有三幅版画，是18世纪的田园景色，但玻璃蒙上了灰尘，看不大清楚。我等待着，看着这陈旧的装饰，不禁想起庞蒂埃夫尔街的一位牙科医生的客厅，我曾躲在那里，以便逃避一次身份证检查。那里也一样，椅子都有套。我隔窗

望见警察封住街道，因车停在不远的地方。无论牙科医生还是给我开门的老妇人，都一点动静也没有。晚上将近11点，我蹑手蹑脚离开那里，从空荡荡的街上逃窜。

现在，我们面对面坐着，您给我斟了一杯茶。

"是格雷伯爵村①产的茶。"您悄声对我说。

我们穿着这种外套，样子怪里怪气。我身上这件驼绒长袍，又肥又大。我注意到您那件的翻领上有荣誉军团的玫瑰花结，大概是房主的衣物。

"也许您要吃几块饼干吧？我想还有一些……"

您打开柜橱的一个抽屉。

"给，尝尝这个……"

原来是奶油蜂窝饼，叫作"普卢姆-普卢维埃"。这种令人作呕的糕点，您吃起来没个够，我们常到维维安娜街那家面包铺去买。归根结底，毫无变化。您想想看。那地方和这里一样凄清，我们一起度过漫长的夜晚。菲利克斯-富尔林荫路64号的"起居室"和里面的樱桃木家具……

"再来点茶？"

"好的。"

"请原谅，我这没柠檬了。再来一块'普卢姆'？"

真遗憾，我们在肥大的长袍里缩头缩脑，却讲些寒暄的套话。我们肚里有多少话要相互倾诉！"爸

---

① 加拿大地名。

爸”，这十年来，您都做了些什么？说起我，要知道，熬过来不易啊。有时我还伪造题词，直到有一天，我向一位主顾兜售阿贝尔·博纳尔给亨利·波尔多的一封情书，他发觉上了当，要拉我去打官司。显然，我最好逃之夭夭。后来，在萨尔特省的一所中学当学监。学校死气沉沉。同事们庸俗不堪。一班班的半大小子又固执又爱胡闹。晚上，就和体育教师逛酒吧，他要说服我相信自然体育锻炼法，并给我讲述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

您呢？您是否还给法国和海外的收藏者邮寄包裹？有好几回，我都想从外地给您写信。然而寄到何处呢？

我们两人倒像窃贼。我想象这里主人要是瞧我们在他们客厅里喝茶，一定会大惊失色。我问您：

“您买下这住宅了吗？”

“这住宅……没人住了。”您斜眼看我。“房主人宁肯走掉……时局所迫。”

我就是这么想的。他们在瑞士或葡萄牙等待好日子。唉，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可就不在这迎接他们了。到那时，一切又要恢复旧观。他们会发现我们来过吗？甚至毫无觉察。我们跟老鼠一样小心谨慎。除非掉点碎碴儿，落下一个杯子……您缩手缩脚地打开小酒柜，就好像怕被人抓住似的。

“来点威廉姆斯梨酒？”

好哇。不喝白不喝。今天晚上，这房子就属于我们了。我注视您衣领上的玫瑰花结，但根本不艳

羡：我这大衣的翻领上也饰有粉红金黄小绶带，这无疑是军功的标志。谈点令人欣慰的事情吧，好吗？谈谈应当除掉杂草的花园，谈谈在灯光下极美的这尊巴尔伯迪埃娜青铜像。您是森林的开发者，而我，您的儿子，则是现役军官。我请假回到温暖的家庭，重又感受熟悉的气息。我的房间没有变样。在壁橱里头，仍放着方铅矿矿石收音机，早年的铅制士兵人和金属结构装配玩具。妈妈和热内维埃芙上楼歇息了。我们男人还留在客厅里。我喜欢这种时刻。我们小口喝着梨酒。然后，我们以同样动作装上烟斗。我们很相像，爸爸。两个农民，如您所说，两个不安分的布列塔尼人。窗帘已然放下，炉火发出轻微的劈啪声。我们像两个老搭档，摆起龙门阵吧。

“您早就跟米哈伊和马什雷有来往吧？”

“从去年开始的。”

“您跟他们合得来吗？”

您佯装没听明白，干咳几声。我却紧追不舍：

“依我看，对这些人，应当提防点儿。”

您眯缝着眼睛，不动声色。也许，您把我看成是挑唆者。我凑到您面前。

“请原谅，我不该插手与我无关的事情，但我觉得他们要损害您。”

“我也有这种感觉。”您答道。

我以为您突然产生了信任感。您认出我来了吗？您给我们的杯子斟满酒。

“可以干一杯。”我说道。

“好啊！”

“为您的健康干杯，男爵先生！”

“也为您的健康干杯，亚……亚历山大先生！我们生活在非常艰难的时期，亚历山大先生。”

这话您重复了两三遍，算是开场白，随即向我解释了您的状况。我听不清楚，如同在电话里交谈似的。由于距离遥远，岁月悠久，声音掩抑而细微。我不时捕捉住只言片语：“动身”……，“边境通道”……，“黄金和外汇”……这些就足以把您的经历重新串起来。米哈伊知道了您当经纪人的才干，就安排您领导一个所谓的“法国订货公司”，目的是囤积居奇，而后高价出售。他把四分之三的利润据为己有。起初，一帆风顺，您在拜伦爵士街有一大间办公室，非常满意。但是近来，米哈伊不再需要您为他效力，认为您碍手碍脚了。在这种年头，要甩掉您这样一个人，易如反掌。您没有国籍，没有公司名称，没有固定住址、您面临重重障碍。只需通知特别警察队干劲十足的警探就行了……除了一个名叫“蒂蒂科”夜总会的门房，您孤立无援。那门房愿意引见您认识一个“关系户”，以便帮您偷越比利时边境。约定三天后见面。您仅有一千五百美元的旅费，但还携带一粒玫瑰钻石、一些便于隐藏的小黄金叶子。

我感到是在写一部“拙劣的惊险小说”，不过，我没有胡编乱造。胡编乱造不是这样，绝不是……

肯定有证据，一个从前认识您的人，就能证明所有这些情况。这无关紧要。反正有我在您身边，并一直守您到本书结束。您目光惊恐，不时望一望正门。

“放心吧，”我对您说。“他们不会来。”

您的神情渐渐放松了。我一再对您说，我要一直陪您到本书结束，这是关于前半生的最后一本书，不要以为我是出于兴趣才写的，其实我别无选择。

“真有意思，亚历山大先生，我们居然在这个客厅里相聚。”

座钟敲了十二响。那是个庞然大物，摆在壁炉上，钟盘两侧各有一只青铜狍子。

“房主一定喜欢座钟，二楼还有一个，是仿韦斯特明斯特教堂的排钟。

您噗哧一声笑出来。我对这种突然发笑的现象已习以为常。当初我们住在维拉雷-德约耶兹花园街，处处碰壁的时候，深夜我就听见您在隔壁房间大笑。再如，您腋下夹着满是灰尘的大叠股票回来，也是这种样子。您把股票扔在地上，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我这些东西，在交易所永远也抛不出去了。”您一动不动，失神地凝视撒了满地的战利品。继而，您突然大笑，越笑越狂，肩头都为之抖动，无法止住。

“您呢，亚历山大先生，您以什么为生？”

如何回答您呢？我的生活？同您一样，“爸爸”，飘泊不定。正像我对您讲的，在萨尔特省当了十八个月的学监。到雷恩、利摩日、克莱蒙费朗，

仍然当学监。我选择了教会学校。在那里更安全些。这种校内工作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平静。我的一个同事热心于童子军组织工作，他在塞庸森林建了一个少年营地，要物色辅导员，也就把我拉了进去。于是，我穿上了海蓝色高尔夫球裤、浅黄褐色皮护腿。我们6点起床，白天上体育课和劳动，晚上唱歌。全是激动人心的民俗活动：蒙卡尔姆峰、拜亚尔山口、拉摩里西耶尔地区、《再见，美丽的弗朗索瓦丝》、长刨、雕刻刀、猎人精神。我在那里呆了三年。那是个安全的、便于隐蔽的藏身之所。可是，唉！我的劣根性又占了上风。我逃离了那块栖身的绿洲，回到了巴黎东站，连贝雷帽和领章都没有顾得摘下来。

我在巴黎逡巡，想找份固定的工作，找一种我能为之献身的事业。徒劳无益。大雾尚未消散，道路仍然湿滑。我的脚步越来越不稳。在恶梦中，我不停地爬行，以便恢复脊梁骨的力量。我在马让塔林荫大道住的那间阁楼，还是画家多梅尔戈成名之前的画室。我竭力把那里察看一个吉兆。

现在想来，那个时期我做的事印象模糊：好像给一个S医生当过"助手"，他在吸毒者中间招募顾客，以极其昂贵的价钱给他们开药方。我大概是他的经纪人。似乎还给一位英国女诗人当过"秘书"，她特别崇拜丹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①。

① 丹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1828—1882），英国画家、雕刻家。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我只记得我在巴黎街道的徘徊，只记得那个重心、那块我总去而复返的磁铁：警察局。我无论怎样远远离开，几小时之后，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那里。有一天夜晚，我比往常情绪更低落，走到宫殿林荫大道，真想请门卫放我进去。我弄不清为什么警察局对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首先想道，这大概像在桥上倚栏俯视所产生的眩晕，然而还有别的原因。对我这样精神脆弱的青年来说，警察局具有坚固和威严的意义。我梦想成为警察。我有幸结识了一个风化便衣警察西埃菲，就向他推心置腹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听我讲下去，嘴角露着微笑，不过倒像慈父般地关切，表示愿意录用我。有几个月的工夫，我跟踪盯梢而不计报酬。我要跟踪各种各样人，并记下他们的时间表。在这种跟人游逛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多少令人激动的秘密……一个蒙索平原区的公证人，在皮迦勒街却撞见他头戴棕色假发，身穿丝缎长袍。本来一些无足挂齿的小人物，随时可能化装成恶梦中的煞神或悲剧中的英雄。近来一个时期，我真以为自己神经错乱。我与所有这些陌生人同化了。我紧追不舍地正是“我自己”。身披雨衣的老者，是我，身穿本色哔叽服的妇女，是我。我向西埃菲谈了这情况。

“不要逞强了。您业余干干还行，老弟。”

他把我一直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

“放心吧。我们还会见面的。”

他声音低沉地又说：

“迟早会见面，不幸的是，全要到拘留所里相会……”

我真心喜欢这个人，觉得他值得信赖。当我向他解释我的精神状态时，他总是以忧伤而热情的目光注视我。如今他怎么样啦？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吧？经过这一小段警察生涯，我并没有振作起来。我再也不敢出门，总守在马让塔林荫大道的那间阁楼里。一种威胁在头上盘旋。于是我想到您，预感到您在某地处境堪虞。每天夜晚，在凌晨三、四点钟之间，您都向我呼救。我渐渐打定主意，要去寻找您。

您并没有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然而事过十年，就不值一提了，我绝不记恨“乔治五世地铁车站那段痛心的事件”。我们要再次提起这个话题，但那将是最后一次了。二者必居其一：第一种，是我错怪了您。果真如此，那就接受我的歉意，并将这一过错归咎为我的谵妄状态。第二种，如果您真想把我推到地铁车轮下，我也甘心情愿认为您情有可原。是的，您的举动并不特殊。父亲要杀掉或摆脱儿子，我认为这完全是当前社会价值大混乱的表现。从前还出现过相反的现象：儿子为了验证自己强壮而杀害了父亲。然而现在，我们该打击谁呢？我们这样的孤儿，认幽灵为父紧紧跟踪，却被判处有罪。那幽灵总是回避，无法接近。老胖子，这太辛苦了。我做出多大想象的努力，还要我对您讲吗？

今天晚上，您面对着我，眼珠子鼓得快要冒出来。您的样子无异于陷入困境的黑市投机商，而您的“男爵”头衔也骗不了人。我推想，我选择这一头衔，是希望它能赋予您坚定与尊严。在我们之间，这种作戏毫无意义。我认识您为时太久。还记得吧，男爵，我们星期日的散步。一股来自巴黎腹心的神秘潮流，把我们一直带到环城大道。市区把垃圾和泥沙抛向那里。苏尔、马塞纳、达沃、凯勒曼①。为什么要用胜利者的名字，给这些尚未定型的地点命名呢？我们的家园，就在那里。

一切照旧。十年之后再见面，我觉得您还是原来的样子：窥视客厅的门口，好似一只受惊的老鼠。而我，则抓住长沙发的扶手，以防套子滑下去。我们将空忙一场，永远也得不到安宁，体验不到事物的静止美。我们将在流沙上走到底。您会吓得冒冷汗。要镇定，老朋友。有我在您身边，有我在黑暗里拉着您的手。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要与您同舟共济。眼下，还是看看这地方。从左边的门，我们走进一间小屋。皮椅子，正是我喜爱的。深色木制的办公桌。您翻过抽屉吗？如若翻过，我们就会潜入房主的私生活，从而渐渐产生是这家成员的感觉。楼上是否还有我们可以翻找的抽屉、柜橱和衣兜呢？我们有几小时的喘息时间。这间屋比客厅舒服，有一股粗花呢与荷兰烟草味。书架上的书籍排

① 法国第一帝国时期的元帅和将军。现为巴黎的一些街道的名称。

列整齐，有阿纳托尔·法朗士全集、醒目的黄色封皮的《面具》丛书。请您坐到办公桌后面，身子坐直。我们在这种环境生活的过程中，可以毫无限制地幻想。终日看书或聊天。养一条德国牧羊犬来守门，吓退不速之客。晚间，我们同我的未婚妻一起打牌。

电话铃声。您跳了起来，脸都变形了。老实说，这种夜半铃声，绝不会有什么好事。证实您在家，天亮好逮捕您。您拿起听筒还未讲话，对方就挂断了。西埃菲经常使用这种办法。我们一步登几级上楼，磕磕绊绊，两个人摔在一堆，又赶紧爬起来。必须穿过一串房间，您却不知道开关在哪儿。我绊到一件家具上，您摸黑找电话听筒。原来是马什雷，他和米哈伊都纳罕为什么不见我们了。

他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听来很奇特。他们刚到高马尔当街，在"莫斯科大隐士院"夜总会找到安妮。她喝醉了，但还是保证次日三点整赶到市政府门前。

他们交换戒指时，她拿起戒指，摔到马什雷的脸上。市长佯装视而不见。居伊大笑，试图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

婚礼仓促而草率。查查当时的报刊，也许能找到有关报导。记得安妮穿一件毛皮大衣，时值8月

中旬。她那身打扮更增添不安的气氛。

在返回的路上，他们没有交谈一句话。她挎着她的证婚人，“杂耍演员”吕西安·雷米(这是在宣读结婚证书时我所听到的)；而您，马什雷的证婚人，您被冠以如下头爵：“夏尔瓦·亨利·戴克凯尔男爵，企业家。”

米哈伊为了缓和气氛，忽而到马什雷这边，忽而到侄女那边，赶着说些笑话，但是毫无作用。最后他也厌倦了，干脆不再说话。您和我，我们跟在这奇特的一行人后边。

晚宴定在克洛-富克雷的餐厅。将近5点钟，专程从巴黎市区赶来的好几个过从甚密的朋友，围坐起来喝香槟酒。格雷夫把餐桌摆在花园中间。

我们二人稍微离开他们一点儿。我在观察。事过许多年，那些面孔、动作、声调仍然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有乔治·勒斯唐迪，他每周都在米哈伊的杂志的头一页上，散布恶毒的“姑妄听之”和他的指控。他肥头大耳，说话趾高气扬，略带波尔多口音。林荫路剧院经理罗伯尔·代勒瓦尔，年已六旬，头发银白，他吹嘘自己是蒙马特尔区“公民”，致力于民间艺术。米哈伊的另一位合作者弗朗索瓦·热尔贝尔，他专写火力猛烈的社论，鼓吹凶杀。他是神经过敏一类的青年，说话“兹”、“四”、“十”不分，愿意充当狂热分子或法西斯突击队员。他离开高等师范学校时，已经受了政治毒素的侵害。他虽然还保持外省人的本色，但却忠于乌尔

姆街① 的精神；人们感到诧异的是，这个三十八岁的法国高师文科预科生竟然如此残忍。

还有吕西安·雷米，新娘的证婚人。从表面上看，他是个颇有魅力的流氓，牙齿洁白，头发油光锃亮。常可以听到他在巴黎广播电台节目中的演唱，他是在流氓帮和歌舞厅中发迹的。当然，莫妮克·茹瓦斯也来了。她年方二十有六，棕色头发，总是故作天真之态。起初她登台演出，但在戏剧界没有留下什么声望。米哈伊挺崇拜她，经常把她的照片登在《如此生活》的封面上，还刊载不少报导她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称她是“蓝色海岸最风流的巴黎女郎”。自不待言，西尔维娅娜·玕夫、莫德·迦拉斯和威德梅也在其列。

同所有这些人一接触，安妮·米哈伊情绪好转了。她拥抱了马什雷，请求他原谅，并且郑重其事地把结婚戒指戴在他手指上。大家热烈鼓掌，又频频碰杯，大喝香槟酒。他们相互打招呼，三三两两凑成几堆。勒斯唐迪、代勒瓦尔和热尔贝尔向新郎祝贺。米哈伊在一个角落同莫妮克·茹瓦斯交谈。吕西安·雷米深得女人的青睐，人们从西尔维娅娜·玕夫的眼神里就能看出这一点。不过，他的微笑主要是给安妮·米哈伊送去，安妮也始终紧紧地偎在他身上，使人感到他们俩亲密无间。莫德·迦拉斯和中过风的威德梅充当主人，巡回给大家倒

①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所在街名。

酒，送小蛋糕。婚礼的所有照片，都在我这薄薄的皮夹里，刚才拿出来看，直到双眼发酸，泪水模糊。

他们已把我们置于脑后。我们靠后坐着，一动不动，没人注意我们。我感到我们是误入了这奇特的花园舞会中。您跟我一样不知所措。本来我们应该尽快溜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当时我所受到的诱惑：我丢下您，不由自主地朝他们走去。

有人在我背上推了一把。原来是米哈伊。他拉着我，走到热尔贝尔和勒斯唐迪的面前。米哈伊介绍我是“他刚聘用的有才华的年轻记者”。勒斯唐迪马上以半庇护半嘲讽的口吻，赏赐给我一句：“十分荣幸，亲爱的同事”。

“您有什么大作？”热尔贝尔问我。

“小说。”

“很好哇，小说，”勒斯唐迪评道。“没有风险，中立地区。您说呢，弗朗索瓦？”

米哈伊早已溜掉。我也很想走开。

“咱们私下讲，”热尔贝尔说道，“您认为生活在这个时期，还能写小说吗？拿我说，就一点想象力也没有了。”

“但有特别辛辣的文笔！”勒斯唐迪高声说道。

“因为我不想自寻烦恼。我只管乱叫乱咬，仅此而已。”

“棒极了，亲爱的弗朗索瓦。说说看，下一期

社论，你想给我们炮制点什么？”

热尔贝尔摘下玳瑁宽边眼镜，用手绢慢悠悠地擦拭镜片。对这举动所产生的效果，他胸有成竹。

“味道十足的东西。题为《您要打犹太网球吗？》我要用三栏讲解运动规则。”

“你的‘犹太网球’，究竟是什么东西？”勒斯唐迪咧嘴笑着问道。

于是，热尔贝尔详细讲解。据我理解，有两个赛手，他们在散步或坐在露天咖啡馆时，谁先发现一个犹太人，就应当告发，因而得十五分。如果对手也发现一个，同样得十五分。如此类推。谁认出的犹太人多，就是赢家。就像网球比赛一样计分。热尔贝尔认为，要训练法国人的反应，舍此别无妙法。

“想想看，”他若有所思地又说，“我不必瞧他们面孔，从背后就能认出他们！我敢跟你们说这大话！”

他们还交换了其它看法。有一件事叫勒斯唐迪寝食不安：那些“混蛋”居然还在蓝色海岸逍遥自在地生活，在戛纳、尼斯或马赛的“王宫式的府第”里喝着开胃酒。关于这种情况，他准备写一系列“姑妄听之”，还要指名道姓。向主管部门报警，这事责无旁贷。我扭过头，看见您仍未动地方，很想对您做出友好的表示，又怕被他们发现，定会问起坐在花园里端的那位胖先生是何许人。

“我刚从尼斯回来，”勒斯唐迪说，“看不到

一张人脸，全是一群畜生。真叫人恶心得要呕吐……"

"总而言之，"热尔贝尔提议，"只要把他们的住房号报告给鲁尔局。这样，警察局干起来就方便了……"

他们活跃起来，越讲越激烈。我在一旁听着，不置一词。老实讲，他们令我厌烦。这两个人貌不出众，中等身材，一如街头的芸芸众生。勒斯唐迪穿着有背带的裤子。换了另外一个人，早就让他们闭起臭嘴了。然而我却胆小如鼠。

我们喝了好几杯香槟酒。勒斯唐迪又向我们谈起一个叫茨洛斯布洛的人，是个电影制片人，"棕紫头发的犹太鬼"，在英国人散步场被他认出来。勒斯唐迪发了誓，绝不会放过那家伙。太阳西沉。宾客从花园移到旅馆的酒吧里。您也随大溜儿进来，坐到我身边……这时，仿佛有一股电流突然从我们每个人身上通过，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一种神经质的快乐。应马什雷的请求，代勒瓦尔为我们模仿了阿里斯蒂德·布吕昂的表演。但是，蒙马特尔并不是他唯一的灵感来源。他在街头学校受过熏陶，向我们显示嘴皮子功夫，大讲文字游戏和俏皮话。他那西班牙猎犬般的脑袋、那精美的小胡子，又浮现在我眼前。他期待着听者发笑，那副贪婪相让我作呕。一旦达到目的，他就耸耸肩膀，反倒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轮到吕西安·雷米，他给我们唱了一支那年不

绝于耳的抒情歌曲：《我不知道终局》。安妮·米哈伊和西尔维娅娜·玕夫，都直勾勾地看着他，恨不能把他一口吞下去。我也仔细端详他，尤其觉得他的下巴可怕，显示一种罕见的懦弱，因而预感到他比其他人更危险。必须提防这类在“动乱时期”经常亮相的油头粉面的家伙。接下来，理所当然要请勒斯唐迪出个节目。他按照所谓的“自编自唱的传统”，十分得意地露一手，从头至尾背诵下来《棕红色月亮》和《两头驴》。各有所好，各有拿手活。

代代·威德梅登上一把椅子，向新婚夫妇敬酒。安妮·米哈伊的脸靠在吕西安·雷米的肩头上，对此马什雷并不介意。在他身边的西尔维娅娜·玕夫，则使出浑身解数，力图引起“魅力歌手”的注意，莫德·迦拉斯也不示弱。代勒瓦尔在柜台旁边，正同莫妮克·茹瓦斯交谈。他显得越来越急切，叫她“我的宝贝”。她面对这种亲近，格格大笑，摇晃着秀发，仿佛在无形的摄影机前表演。米哈伊、热尔贝尔和勒斯唐迪越喝酒谈兴越浓。他们议论要在瓦格拉姆厅组织一次集会，《如此生活》的主要撰稿人都要在会上发言。米哈伊透露他最热衷的题目：《我们并非胆小鬼》；勒斯唐迪则戏谑地改为：《我们并非犹太化者》。

下午是雷阵雨天气，远处雷声隆隆。如今，这些人不是匿影藏形，就是被枪毙了。我想没人对他们感兴趣了。我仍然摆脱不掉这些记忆，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马什雷朝我们走来，把杯里的香槟酒泼在您脸上，当时我几乎失去冷静。您向后闪了一下。他生硬地对您说：

“让您头脑清醒清醒，嗯，夏尔瓦？”

他叉着胳臂站在我们面前。

“比淋雨强多了，还直冒泡！”威德梅带着沉浊的喉音说道。

您掏手绢要擦一擦。代勒瓦尔和吕西安·雷米也挖苦您几句，惹得女宾们格格大笑。勒斯唐迪和热尔贝尔眼神古怪地打量您，我明白这天晚上，他们没有认出您这颗脑袋。

“意外的淋浴，嗯，夏尔瓦？”马什雷说着，拍了拍您的脖颈，就好像抚摩狗的脖子。

您挤出一丝苦笑。

“对，痛快的淋浴……”您咕哝一句。

最可悲的是您一副抱歉的样子。

他们又聊起来，边喝酒边说笑。在一片喧哗声中，勒斯唐迪讲了一句话“请原谅，我要去遛遛弯儿”，怎么那么巧让我听见了呢？还未待他离开柜台，我却抢先赶到旅馆门前的台阶上。我们碰到一起，他对我说要去活动活动腿脚，我则尽量以自然的口气问他，能否陪他走走。

我们沿着跑马道走去，继而钻进灌木林。在这黄昏时分，夕阳的余辉撒在山毛榉树林中，具有克洛德·洛兰的画面的忧伤色调。他对我说我们是该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他非常喜欢枫丹白露树林。我

们随便闲聊，谈到幽静深邃和林木之美。

“多高的乔木啊！……这些也有一百二十年了。”他笑起来。“我敢打赌，我活不到这岁数……”

“那怎么说得准呢？”

他指给我看前边二十米远处，有只松鼠正横过林荫道。我的双手潮乎乎的。我对他说，我很爱看他在《如此生活》上发表的每周“姑妄听之”，并说依我看，他在勇敢地致力于“公共卫生”的美好事业。他“嗳”的叫了一声，回答说这话不敢当。他不喜欢犹太人，仅此而已，米哈伊的杂志给他提供了正面论述这个问题的场地。新闻一改旧观，不像战前那样腐败了。当然，米哈伊唯利是图，处世圆滑，肯定是“半个犹太人”，但是不要很久，就得把米哈伊“清洗掉”，以维护一伙“纯粹分子”的利益。诸如阿兰-洛伯罗、泽茨歇尔、塞吉勒、达尔齐埃，还有他本人。尤其是热尔贝尔，他们之中最有才华的人。

“您呢，对政治感兴趣吗？”

我回答感兴趣，并说需要挥一下扫把。

“恐怕是说挥舞大棒吧！”

还是举例说明，他又向我提起茨洛斯布洛，那个玷污英国人散步场的家伙。哼，那个茨洛斯布洛已然回到巴黎，他勒斯唐迪知道他躲在哪套房子里。只要发一条“姑妄听之”，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就会找上门去。对这种义举，他事先就感到欣慰。

天色向晚，暮色渐浓。我决定突击行事。我最后看了勒斯唐迪一眼。此公心旷体胖，绝对是个美食家。想象得出，他的餐桌上摆着普罗旺斯奶油烙鳕鱼。我又想到热尔贝尔，想到他那巴黎高师学生的错误发音、晃来晃去的屁股。算了，他们无论哪个都不是勇将，我不能让他们吓住。

我们穿行的矮树林越来越密。

“为什么要追踪茨洛斯布洛呢？”我说道，“犹太人，我们手心掌握不少……”

他没明白我的话，疑惑不解地看了我一眼。

“刚才迎面浇了一杯香槟酒的那位先生……您还记得吧？”

他哈哈大笑。

“是啊……我和热尔贝尔，我们觉得他是一副奸商相。”

“是犹太人！真奇怪，您竟然没看出来！”

“那他到我们中间来干什么呢？”

“我也正想了解呢……”

“我们去让那坏蛋给我们看看证件！”

“毫无必要！”

“您认识他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

“他是我父亲。”

我掐住他的脖子，拇指都掐痛了。我想到您，以便增添勇气。他停止挣扎了。

其实，干掉这个胖家伙，也未免太愚了。

我回到旅馆酒吧，看见他们还在，进门时，正好撞见热尔贝尔。

“您看见勒斯唐迪了吗？”

“没有哇。”我漫不经心地答道。

“他能到哪儿去呢？”

他目不转睛地打量我，并拦住我的去路。

“一会儿他就能回来，”我以假嗓音说道，但我当即清了清嗓子，纠正了声音。“他大概在树林里散步呢。”

“是吗？”

其他人都聚集在酒吧柜台周围，而您，仍坐在壁炉旁边的一把扶手椅上。光线昏暗，我看不清您的面孔。酒吧里只有另一侧亮着一盏灯。

“您看勒斯唐迪这人怎么样？”

“不错。”

热尔贝尔缠住我。我实在躲避不开这个讨厌的家伙。”

“我非常喜欢勒斯唐迪。他不同凡响，正像我们在‘高师’讲的，他是‘入学考试的状元’。”

我轻轻点头附和。

“他这个人不够细腻，但我却毫不在乎！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吵架的干将！”

他说话越来越快。

“世人也过分讲究细腻入微，讲究把一根头发破成四根的艺术！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践踏花坛的野蛮青年！”

他每根神经都震颤起来。

“杀人凶手的时代来临啦！我欢迎他们！”

他讲这话时，拿出疯狂挑衅的口吻。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我觉出他想对我说什么，可又不敢讲。他终于说：

“您长得跟阿贝尔·普雷让像极了……”他忽然忧郁起来，“从来没人对您说，您酷似阿贝尔·普雷让吗？”

他的声音压抑，柔和细微，几乎听不见。

“您还使我想起我学生时代的挚友，一个非常棒的小伙子。他参加了弗朗哥的阵营，1936年死了。”

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显得越来越绵软无力。他的头恐怕要歪到我的肩上。

“我希望在巴黎市区再见到您。您说可以吧，对不对？”

他那潮湿朦胧的目光罩住我。

“我得去写我那玩笑文章了……您知道……那篇《犹太网球》……您对勒斯唐迪说，我不能再等了……”

我送他上了车。他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讲些没头没脑的话。我真感到诧异，转瞬之间，他竟然变得像个老妇人。

我扶他坐到驾驶座上。他摇下车窗玻璃。

“您去我家吃晚饭吧，拉托街……”他探出头来，那张浮肿的脸一副哀求的表情。

“您不会忘记吧，嗯，老弟……我感到十分孤独……”

随后，他驾车全速开走了。

您始终没动地方，靠在椅背上，只见黑乎乎的一团：照明昏暗能使人产生错觉。那究竟是人还是一堆衣裳？他们把您置于脑后。我怕把注意力引到您的身上，只好避开您，加入他们的圈子。

莫德·迦拉斯解释说，威德梅烂醉如泥，她不得不安顿他睡下了。这种情况每星期至少发生三次。他那人，简直在糟踏自己的身体。早在他在所有大赛中夺魁的那时候，吕西安·雷米就认识他。有一天在欧特伊，赛马迷们扎过去，把他抬起来欢呼。大家称他是“马怪”。在那时期，他滴酒不沾。

“凡是这类青年，一旦卸甲离开比赛场，就变得神经衰弱了。”马什雷评论一句。

他还举了一些老运动员的例子，诸如维拉普拉讷、托托·格拉散、卢·布鲁雅尔……

米哈伊耸了耸肩膀：

“我们也不例外，想想看，我们也很快要退出

比赛了。带着刑法七十五条和十二颗子弹。”

此话有因，他们是听了当天的最后一次新闻广播，消息“比往常更令人惶恐不安”。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代勒瓦尔说道，“我们应当准备好在行刑队面前要讲的话……”

他们以此为戏，闹了将近一刻钟。代勒瓦尔认为到时喊一句：“天主教的法兰西万岁！”会产生最佳效果。马什雷决心要喊：“不要毁了我的容貌！对准心脏，它悬挂在这儿，瞄准吧！”雷米则要唱《烛光下夜宵》，如果有时间，就再唱《一了百了的时候……》，米哈伊要拒绝蒙上眼睛，并声明他“要一直看完这出喜剧”。

“非常遗憾，”他最后说，“在安妮大喜的日子，大家却讲这种蠢话……”

为了缓和气氛，马什雷又抛出他常挂在嘴边的玩笑话，即“莫德·迦拉斯的乳房是塞纳-马恩省最能撩拨人的”。说着，他就解开了她的上衣。莫德·迦拉斯臂肘拄在柜台上，由他摆布，毫不反抗。

“瞧啊，瞧这绝妙的宝贝儿！”

他乱摸着，又拉下乳罩，让乳房袒露出来。

“您根本不用羡慕她的，”代勒瓦尔对莫妮克·茹瓦斯说，“根本不用，宝贝儿，根本不用！”

代勒瓦尔也力图把手从她衬衣开领伸进去，但她格格轻笑，有些神经质，阻止了他。安妮·米哈伊极度兴奋，不觉撩起了长裙，吕西安·雷米也就

能抚摩她的大腿了。西尔维娅娜·玕夫则用脚轻轻踢我。米哈伊给我们斟酒，懒洋洋地说我们迎接枪决，状态不错。

“真的，你们就没有看见这对奶子嘛！”马什雷重复道。

他转到柜台里面要去搂莫德·迦拉斯，不慎将灯打翻。一片惊叫，随后又是喘息声。大家都趁黑亲热。终于有人提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米哈伊说的：到房间去要痛快多了。

我摸到一个电灯开关。壁灯光亮耀眼。除了您我二人，全都走了。凝重的护壁板、大皮椅子和凌乱的酒杯，令我油然而生忧伤之感，收音机还开着，声音低沉：

“Bei mir bist du schön…”

而您却睡着了。

“这话意思是……”

您张着口，头歪在一边。

“你对我来说……”

您的指间还夹着熄灭的雪茄。

“生死伴永世。”

我轻轻拍了拍您的肩膀。

“我们走好吗？”

塔博牌小车停在“麦克图别墅”大门口，马什雷还跟往常一样，把车钥匙落在仪表盘上了。

我驶上国家公路。时速表针指到一百三十公里。由于车速高，您闭上了双眼。您坐车总是提心吊胆，我把糖盒递给您，好让您提提神。我们穿过被人抛弃的村庄：夏伊-昂比埃尔、佩尔特、圣索沃尔。您蜷缩在我身边的座位上。我本想劝您放心，然而一过蓬蒂耶里，我觉得我们的处境堪忧：我们谁也没有证件，连开的车也是偷的。

科尔贝伊、里斯-奥朗日、拉伊-莱罗兹。终于驶到灯光昏暗的意大利城门。

一路上，我们始终缄默无语。这时他转向我，说我们可以给“蒂蒂科”打电话，那人主动提出帮您偷越比利时国境。他给您留下了电话号码，以备不时之需。

“当心，那家伙会告密。”我以平淡的口气说道。

您没有听见。我又重复一遍，仍然徒劳。

我们停到儒尔当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门前。我看

见守柜台的女招待递给您一枚打电话的筹码。露天座上还有几位迟迟未归的顾客。附近有一个地铁小车站和一座公园。看到蒙苏里这个街区，我就想起我们在勒伊林荫路那所窑子所度过的夜晚。那个埃及鸨儿还在世吗？她还记得您吗？她浑身还散发同一香水味吗？您打电话回来，带着满意的笑容。"蒂蒂科"说话算数，他于晚11点半，在金字塔广场的杜伊勒里-瓦格拉姆饭店大厅等我们。事已至此，无法改变。

您注意到了吗，男爵，今夜巴黎多么宁静？我们沿着空荡荡的街道悄然行驶。树木窸窣微颤，枝叶在我们头上交织成护拱。时而望见一幢大楼有一扇窗户亮着灯，大概是人走时忘记关掉。后来，我又徒步穿过市区，觉得街道同今天一样虚幻。为了寻找您的踪影，我会迷失在这大街小巷的迷魂阵里，直至消融在里边。

夏特莱广场。您对我解释说，美元和玫瑰色钻石都缝在您外衣的衬里之中。没有行李。是"蒂蒂科"嘱咐您这样做的。越境行动方便。我们把塔博车丢在里沃利和阿尔及尔两条街路口。我们早到了半小时，于是我提议到杜伊勒里宫花园去散散步。我们听见鼓掌声，便绕过大水池。绿茵剧场上正在演出。是一出化了妆的话剧。我想是马利伏① 的作品。在蓝色的灯光下，演员正在谢幕。我们随着人

① 马利伏（1688—1763），法国剧作家。

流涌向酒吧间。树叉间挂着彩灯。一位昏昏欲睡的老先生，坐在右侧柜台旁边的一架钢琴前，在演奏《佩德罗》。您要了一杯咖啡，并点燃了一支雪茄。我们俩都保持沉默。从前在类似的夏季夜晚，我们也时常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我们闲看周围攒动的人头、大道上来来往往的汽车，但我想不起一句我们交谈的话，只记得您把我推下地铁轨道的那天……父子之间恐怕没有什么可讲的。

钢琴师开始弹奏《我梦中的庄园》。您摸了摸外套的衬里。约会时间到了。

我眼前又浮现在杜伊勒里-瓦格拉姆饭店大厅里，您坐在苏格兰呢面沙发上的形象。守夜的门卫在看一本画报。我们进来的时候，他连眼皮也没有抬。您瞧了瞧手表。这家饭店的门厅，跟您从前约我见面的所有那些饭店门厅差不多，诸如“阿斯托里亚”、“壮丽蒂克”、“终点”……您还记得吧，男爵？您那副模样还像过境旅客，等待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客船或列车。

您没有听见他们走过来。一共四个人，身穿风衣个子最高的那人要您出示证件。

“也不跟我们打声招呼，就想溜到比利时去？”

他撕开您外衣的衬里，掏出钞票仔细点数，然后塞进衣兜里。玫瑰色钻石滚落在地毯上，他哈腰拾了起来。

“你是从哪儿偷来的？”

他扇了您一记耳光。

您脸色惨白，穿着衬衫站在那里。我发现从一出事，您就一下子老了三十岁。

我站在大厅里端，挨着电梯，他们没有发现我。我可以按一下电钮上楼，等待。然而，我却走向他们，走到穿风衣那家伙面前。

“这是我父亲。”

他耸了耸肩膀，打量我们二人，无精打采地也扇了一个耳光，好像例行公事，然后对其他人说：

“你们把这败类给我押上车。”

他们用力推动转门，我们出门时跌跌撞撞。

囚车停在里沃利街靠北一点儿。现在，我们并排坐在木椅上。车里黑洞洞的，我弄不清开往哪里。柳林街吗？德朗西街？凄凉别墅？无论如何，我也要陪您到底。

每逢车拐弯，我们就相互碰撞，但我很难看清您的面孔。您究竟是谁？我白白日复一日地追随您，对您却一点也不了解。宛似如豆灯光下的朦胧身影。

刚才上车时，我们被他们揍了几下，现在的样子一定很狼狈，如同从前在梅德拉诺那两个小丑……

毫无疑问，那是塞纳-马恩省环境最好、建筑最美的一个村庄，正坐落在枫丹白露树林边缘。上世

纪，一群画家到那里隐居，如今成了旅游胜地。有些乡间别墅的主人就是巴黎市民。

在中央大道的尽头，则是门面具有盎格鲁-诺曼底建筑风格的克洛-富克雷旅馆。外观大方质朴，吸引来不少尊贵的客人。近午夜时分，只剩下旅馆酒吧招待，他叫格雷夫，继续摆放酒瓶，倒掉烟灰缸里烟蒂。这种营生他已干了三十年。此人轻易不开口，但是，对他的态度要是蔼然可亲，并请他喝默兹产的黄香李酒，他还是乐意回顾往事的。是的，他认识我提及姓名的那些人。然而我如此年轻，怎么会跟他谈论那些人呢？“哦，我嘛……”他把烟灰缸里烟蒂倒进长方形的纸箱中。不错，很久以前，那一小伙人经常出入这家旅馆。莫德·迦拉斯、西尔维娅娜·玕夫……他也寻思她们情况究竟如何。那种女人，谁知道呢。他甚至还保存一张照片。瞧，这个瘦高个儿，就是米哈伊，任报社社长，被枪决了。在后边这个，挺胸叠肚，拇指和食指间掐着一朵兰花，他就是居伊·德·马什雷，人称伯爵先生。是外籍军团老兵。也许他又返回殖民地了。的的确确，这些人全不在了……在他们前面，坐在扶手椅上的这个最胖的人，称什么“男爵”，有一天失踪了。

他见过几十个这种人，常来此处，臂肘倚在柜上，胡思乱想一阵，而后便销声匿迹了。难以想起所有那些面孔。总之……是的，如果我想要这张照片，他就送给我。不过他说我年纪轻轻，最好还是想想将来吧。

寻　我　记

李玉民　译

P.Modiano：

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根据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献给吕迪
献给父亲

一

我飘飘无所似，不过幽幽一身影。那天晚上，我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等待雨停。滂沱大雨，从我跟于特分手时起就来势汹汹。

几小时之前，我跟于特最后一次在事务所见面。他虽像往常一样，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边，却穿着大衣，可见真的要动身了。我坐在他对面顾客专用的皮椅上。乳白色玻璃罩灯射出强烈的光线，令我目眩。

“好啦，就这样，居伊……结束了……”于特说着，长叹一声。

写字台上摊着档案材料，大概就是那个脸庞臃肿、眼神惶恐、棕发矮个儿的男人委托办的案子。那男人请我们跟踪他妻子，说是当天下午，她要去保罗-杜梅林荫路毗邻的维塔尔街的一座公寓，跟另一个脸庞臃肿、棕发矮个儿男人幽会。

于特捋着胡子，若有所思。他那短短的花白胡子，几乎吞掉了面颊；那双通常明亮的大眼睛，此刻也茫然若失了。写字台左侧摆着我上班时专坐的

柳条椅子。于特身后有一排木制深色书架，占了半面墙。书架上摆着近五十年来各种版本的年鉴、电话通讯簿。于特常对我说，这些工具书他离不开，什么也替代不了。他还说，这些年鉴和电话通讯簿，是人所能得到的最珍贵、最生动的图书资料，因为那一页一页汇编了许多人和事，以及唯余这点佐证的消失的世界。

“这些电话通讯簿，您要怎么处理呢？”我伸臂一指书架，问于特。

“就放在这里吧，居伊。这套房间，我还保留租契。”

他迅速环视一下周围。通隔壁小间的两扇门敞着，只见里面已旧的天鹅绒面长沙发、壁炉，以及映现一排排年鉴、电话通讯簿和于特面孔的一面大镜子。顾客来办事，常在小间等候。那屋地板铺着波斯地毯；靠近窗户的墙上，悬挂一幅东正教圣像。

“您想什么呢，居伊？”

“没想什么……这么说，房子您还租下去？”

“对。我要时常回巴黎，就在事务所落脚。”

他把香烟盒递给我。

“让事务所原封不动，我才不至于太伤心。”

算起来，我们共事已八年有余。1947年，他创建了这家私人侦探所，在我之前有过不少同事。我们的作用，就是向顾客提供于特所说的“上流社会情报”。他经常好这样重复：全发生在“上流社会

人物”中间。

“到尼斯那里去住，您认为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您不会感到无聊吧？”

他喷了一口烟雾。

“人总有退休的一天，居伊。”

于特费力地抬起沉重的身子。他身高有一米九五，体重一百多公斤。

“我那趟火车晚上8点55分开。咱们还有时间去喝一杯。”

他走在前面，我们穿过走廊到门厅。门厅呈椭圆形，造型颇为奇特，浅灰褐色墙壁已显陈旧。地下扔着一个黑色公文包，由于里面的东西塞得太满，连盖子都合不拢了。于特拾起公文包，只好用手托着走。

“您没有行李吗？”

“全都托运走了。”

于特打开通楼道的门，我关掉门厅的灯。在楼道里，于特迟疑片刻，然后才把门重新关上。撞锁咔嚓一声，狠狠揪住我的心。这声音标志我的一段长期生活结束了。

“还真叫人有点难过呢，对吧，居伊？”于特对我说道，他已经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绢，擦了擦额头。

门上依然镶着那块长方形黑色大理石板，上面刻有金光闪闪的两行字：

C·M·于特
私人侦探

“牌子还留在这儿。”于特对我说。

接着，他把钥匙插进锁眼拧了一圈。

我们沿着涅尔林荫路，一直走到佩雷尔广场。时已入冬，夜幕又降，但是天气温和。来到佩雷尔广场，我们在绣球花咖啡馆露天席落座。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这里客座是藤椅，“跟从前一样”。

“您呢，居伊，今后有什么打算？”他喝了一口兑水的高级白兰地，便问我说。

“我吗？我正追踪一条线索。”

“一条线索？”

“对，了解我过去的一条线索……”

我讲这话口气未免夸张，他听了不禁微微一笑。

“我始终相信，迟早有一天，您能找到自己的过去。”

他这回态度严肃，令我感动。

“不过，听我说，居伊，这事儿我还在琢磨，是否真的值得……”

他沉默下来，心里想什么呢？是想他自己的过去吗？

“给您一把事务所的钥匙。您常去看看。这样我会高兴的。”

我接过他递来的钥匙，放进我的裤兜里。

“往尼斯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关……您过去

的情况……”

他站起身，紧紧握住我的手。

“要我送您上车吗？”

“嗳，不必……不必……分手太难过……”

他头也不回，一个箭步离开咖啡馆。我顿时感到怅然若失。此人对我恩重如山。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真不知道我会落到何等地步。须知十年前，我突然得了遗忘症，陷入了迷雾中。正是他可怜我的境况，依仗关系多门路广，甚至还给我弄了一份户籍。

“给您，”当时他对我说，同时打开一个大信封，只见里面装着一个身份证和一份护照。“现在，您叫‘居伊·罗朗’了。”

当初，我就是前来请教这位私人侦探，请他运用神思妙算，找到了解我过去的证人和踪迹。他给我身份证和护照时，还说道：

“我亲爱的‘居伊·罗朗’，从现在起，您就不要往后看喽，只管现在和将来。我建议您来跟我一道干吧……”

他同情我自有缘故。我后来了解到，他也遗忘了自己的踪迹，他生活的整整一个时期倏忽消失，没有留下丝毫线索，也没有留下一点还可能使他与过去沟通的关系。的确，我目送的这个身穿旧外套、手捧黑色大皮包、在夜色中离去的饱经风霜的老人，跟从前波罗的海海滨那个网手球、金发英俊的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二

“喂，您是保罗·索纳奇泽先生吗？”

“是我。”

“我是居伊·罗朗……您也知道，就是……”

“是啊，我知道！我们见见面好吗？”

“看您的安排了……”

“这样行吗……今天晚上9点钟左右，到阿纳托尔·德·拉福日街？……您看行吗？”

“就这样定了。”

“我等着您。一会儿见。”

对方戛然挂断电话，汗珠立刻顺着我的两颊滚下来。打电话之前，我喝了一杯白兰地壮胆。拨个电话号码这样的区区小事，我何以如此费难和恐惧呢？

阿纳托尔·德·拉福日街的酒吧里，一个顾客也没有。他穿着一身便服，站在柜台后面。

“您来得正巧，”他对我说，“每个星期三晚上，我都休息。”

他迎上来，搂住我的肩膀。

“我非常想念您。”

“谢谢。”

“的确叫我担心，要知道……”

我很想对他说，不必挂念我，但是话没有讲出口。

“总之我相信，您可能就是一个人交际圈的成员，在一段时间，我经常见到这人……他到底是谁呢？”

他摇了摇头。

“您能提示我一下吗？”

“不能。”

“怎么不能呢？”

“我全不记得了，先生。”

他以为我开玩笑，仿佛这是游戏或猜谜语似的；于是，他说道：

“那好吧。我自己想法弄清楚。这事儿您就完全委托给我啦？”

“随您怎么办。”

“那么，今天晚上，我要带您去一位朋友家吃晚饭。”

出门之前，他动作利落地拉下电表闸门，再关上厚实的木门，把钥匙插进锁眼里拧了几圈。

他的汽车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是一辆黑色新轿车。他客气地给我打开车门。

“我那位朋友开了个餐馆，顾客挺喜欢，就在达弗雷古城和圣克卢门交界处。”

“我们要去那么远吗？”

“对。”

车子从阿纳托尔·德·拉福日街驶入大军林荫路。猛然间，我真想跳下车去。要一直到阿弗雷古城，我觉得受不了。还是要鼓起勇气才对。

在到达圣克卢门这段路上，我不得不克制惊惧的心情。我不大了解这个索纳奇泽，别是他引我入圈套吧？不过，听他谈话，我也就慢慢定下神儿来。他向我讲述他一生干事的各个阶段：先是在俄国人开的夜总会当招待，继而转到香榭丽舍花园的朗热餐馆，复又到卡斯蒂利亚旅馆混事，再几经辗转，最后才到阿纳托尔·德·拉福日街，经营这家酒吧间。每回找事儿干，他总要碰到若望·厄尔特尔，因此二十年间，他们成了老搭档。厄尔特尔的记忆力也很好。二人合力，定能解开我设的“谜”。

索纳奇泽开车十分小心，用了将近三刻钟，我们才到达目的地。

这是一座带游廊的平房，左翼有一株垂柳掩映，右侧有一片灌木丛隐约可见。餐厅里端灯光强烈，一个男子从那里朝我们走来。他向我伸出手，说道：

“认识您很高兴，先生。我叫若望·厄尔特尔。”

继而转向索纳奇泽：

“你好，保罗。”

他带我们走向餐厅里端，只见那里一张桌上放

了三副餐具，正中还摆着一束鲜花。

他指着一扇落地窗，对我说道：

“另一间餐室里还有客人，是婚宴。”

“您从未来过这儿？”索纳奇泽问我。

“没有。”

“那好，若望，让他开开眼。”

厄尔特尔带我走上一条俯临池塘的游廊。左首有一座中国式的小拱桥，通向池塘对岸的一幢平房。落地窗里灯火辉煌，只见一对对身影从窗前飘然而过。里边正在跳舞，传出一段段乐曲声。

“他们人不多，”他对我说，“我感到婚宴结束，他们要在一起寻欢作乐。”

他耸了耸肩膀。

“您应当夏天来。在游廊上用晚餐，那才痛快呢。”

我们回到大餐厅，厄尔特尔关上落地窗。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顿便餐。”

他示意请我们坐下。他们俩并排坐在我的对面。

“您喜欢喝点什么酒？”厄尔特尔问我。

“客随主便。”

“来点帕特吕古堡牌葡萄酒，怎么样？”

“好极了，若望。”索纳奇泽说道。

一名身穿白罩衫的小伙子伺候我们用餐。壁灯正冲着我，令我目眩，而他们却背着光，这种安排无疑是为了更仔细地辨认我。

“若望，怎么样？”

厄尔特尔已经开始吃肉冻，他不时向我投来敏锐的目光。他的头发是棕色的，也像索纳奇泽一样染过。他的皮肤粗糙不平，面颊肌肉松弛，薄薄的嘴唇具有美食家的特征。

“不错，不错……”他喃喃自语。

我被灯光晃得直眨眼睛。他给我们斟了酒。

“不错……不错……我觉得我曾经见过先生……”

“这位才捉弄人呢，”索纳奇泽说道。“他先生就是不肯给我们指点一下……”

他仿佛灵机一动。

“对了，也许您不愿意我们再提这事了吧？恐怕您情愿‘隐姓埋名’吧？”

“绝无此意。”我微笑道。

青年招待端牛犊胸腺①。

“您从事什么职业？”厄尔特尔问我。

“我在一家私人侦探所干了八年，就是C·M·于特办的事务所。”

他们愕然地注视我。

“其实，这同我从前的生活毫无关系。干脆，你们不要考虑这个情况。”

“真奇怪，”厄尔特尔凝视着我，说道：“说不上您有多大年纪了。”

---

① 西餐的一种美味佳肴。

"大概是因为我留了胡子吧。"

"要是没留胡子，"索纳奇泽说，"我们也许立刻会认出您来。"

他伸过来一条胳臂，把手平放在我的鼻子下方，遮住我的胡子，如同肖像画家观察模特儿一样，眯起眼睛打量我。

"我越看越觉得，这位先生曾是一伙夜游神成员……"厄尔特尔说道。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索纳奇泽问道。

"唔……很久了……算起来，保罗，咱们不再到夜总会混事儿，已经有好久了……"

"照你看，那是在塔纳格拉夜总会时候的事儿啦？"

厄尔特尔目光越来越专注地凝视我：

"劳驾，"他对我说，"您能站起来一下吗？"

我站起身，他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反复端详我。

"不错，这样一瞧，我就想起来一名顾客。您这身材……请等一等……"

他举起手，又静止不动，仿佛要抓住随时可能消失的东西。

"请等一等……请等一等……行了，保罗……"

他得意地微笑起来。

"您可以坐下了……"

他乐不可支，确信他会一鸣惊人。他十分殷勤地给我和索纳奇泽斟酒。

“是这样……从前有个男人同您形影不离，那人有您这么高……也许还略高些……怎么样，保罗，你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吗？”

“你讲的到底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索纳奇泽问道。

“当然是在塔纳格拉那时候的事儿啦……”

“个头儿跟他一样的男人？”索纳奇泽自言自语。“在塔纳格拉那时候……”

“你没印象啦？”

厄尔特尔耸了耸肩膀。

现在，该轮到索纳奇泽得意了，他微笑起来，点了点头。

“我想是……”

“是谁呀？”

“斯蒂奥巴……。”

“对啦。正是斯蒂奥巴……”

索纳奇泽转身对着我：

“您认识斯蒂奥巴吗？”

“可能认识。”我谨慎地答道。

“肯定认识……”厄尔特尔说。“那时候，您经常跟斯蒂奥巴在一起……这我敢打保票……”

“斯蒂奥巴……”

听索纳奇泽的发音，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个俄国人的名字。

“正是他，总让乐队演奏《阿拉维尔迪》……”厄尔特尔说道，“那是一首高加索民歌……”

“您还记得吗?”索纳奇泽用力握着我的手腕，问我说，“《阿拉维尔迪》……”

他两眼炯炯有神，用口哨吹出这首歌的曲调。我也猛然心有所感。这曲调，我似乎熟悉。

这时，伺候我们用餐的青年招待走到厄尔特尔跟前，用手给他指了指餐厅里端的什么东西。

昏暗中，有个女子在一张餐桌旁边独坐；她身穿浅蓝色连衣裾，两只手掌托着下颏儿。她在想什么呢?

“那是新娘。”

“她坐在那儿干什么?”厄尔特尔问道。

“不清楚。”青年招待答道。

“您没有问过她想要点什么吗?”

“问过，她什么也不要。”

“其他人呢?”

“他们又要了十来瓶克吕格牌香槟酒。”

厄尔特尔耸了耸肩膀：

“这我管不着。”

索纳奇泽丝毫没有注意那位新娘，也没有留心他讲什么，只是对我重复道：

“这么说……斯蒂奥巴……您想起了斯蒂奥巴了?”

我见他如此激动，便故意神秘地微微一笑，回答说：

“对，对。想起一点儿……”

他转过身，用郑重其事的声调对厄尔特尔说：

“他想起了斯蒂奥巴。”

“不出我所料。”

身着白装的青年招待一动不动，仍然站在厄尔特尔面前，样子显得很为难。

“先生，恐怕他们要开房间了……该怎么答复呢？”

“我早有所料，”厄尔特尔说道，“婚宴完了没好事儿……算了，老弟，随他们闹去，这个咱们管不着……”

新娘仍坐在那边桌旁，叉着胳臂一动不动。

“真不明白，她干吗一个人呆在那里，”厄尔特尔说道，“反正，这个咱们一点也管不着。”

他反掌一挥，仿佛要驱赶一只苍蝇。

“言归正传，”他又说道。“这么说，您承认原来认识斯蒂奥巴啦？”

“是的。”我叹道。

“因此，你们是一帮的……一帮活神仙，对吧，保罗？……”

“可惜呀……！他们全都仙逝了。”索纳奇泽声音凄然地说道，“唯有您还健在，先生……我真喜出望外，最终……最终‘确认’了您当年的生活环境……您属于斯蒂奥巴那一帮的……祝贺您……那年头，可比今天快活多了，尤其那时候的人品，也比今天强……”

“尤其是，那时候咱们更年轻。”厄尔特尔笑道。

“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我问他们，只觉心怦怦直跳。

“我们那些日期，已经乱成一团麻了，”索纳奇泽说道，“不管怎么说，那是好早好早以前的事儿了……”

忽然，他神情沮丧了。

“事情往往是巧合。”厄尔特尔说道。

他起身走向餐厅一角的小酒吧柜台，拿回来一份报纸，一张一张地翻看。最后，他把报纸递过来，指给我看这则讣告：

我们受死者亲友的委托，特此宣告：

玛丽·德·雷桑于10月25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兹定于11月4日16时，在圣日内维耶夫·德·布瓦公墓小教堂举行终天圣事和遗体安葬仪式。

忌九弥撒将于11月5日在巴黎十六区克洛德-洛兰街19号东正教教堂举行。

谨此讣告，不另行通知。

委托人：死者的女儿、儿子、孙子孙女、侄儿侄女和侄孙侄孙女。

死者的朋友乔治·萨歇和斯蒂奥巴·德·加戈里耶夫。

“这样看来，斯蒂奥巴还活着？”索纳奇泽说

道。"您还跟他见面吗？"

"不见面。"我答道。

"您做得对。人应当生活在现时。若望，你给我们斟白酒，好吗？"

"这就拿去。"

从这一刻起，他们对斯蒂奥巴和我的过去，似乎完全失去了兴趣。不过，这无关紧要，反正我总算掌握了一条线索。

"这份报纸，您留给我行吗？"我若无其事地问道。

"当然可以。"厄尔特尔答道。

我们频频碰杯。这样看来，在这两个酒吧招待的记忆里，我的过去只剩一个模糊的影子，而且还被一个叫斯蒂奥巴·德·加戈里耶夫的影子遮住一半。再者，关于这个斯蒂奥巴，如同索纳奇泽所说的，他们"好早好早"就没有他的音信了。

"这么说，您是私人侦探喽？"厄尔特尔问我说。

"现在不是了。我的老板刚刚退休。"

"您怎么样，还继续干吗？"

我耸耸肩膀，不置可否。

"不管怎样，若能再见到您，我会很高兴的。您随时都可以光临。"

他站起身，向我们伸出手。

"实在抱歉……不得不赶你们走，我还要结帐……那些人，还在这寻欢作乐……"

说着，他朝池塘方向指了指。

“再见，若望。”

“再见，保罗。”

厄尔特尔若有所思地注视我，慢声慢语地说：

“您这一站起来，又使我想起点什么……”

“想起什么啦？”索纳奇泽问道。

“咱们在卡斯蒂利亚干活那时候，有位客人每天晚上回来很迟……”

索纳奇泽也从头到脚打量我。

“总而言之，”他对我说，“您从前可能是卡斯蒂利亚的房客……”

我尴尬地笑一笑。

索纳奇泽挽上我的手臂，我们并肩走过餐厅，餐厅里比我们到时昏暗多了。身穿浅蓝色连衣裙的新娘已不在那张桌旁了。走到外面，我们听见池塘对岸传来阵阵乐曲和笑声。

“劳驾，”我问索纳奇泽，“请您提醒我一下，那是什么歌曲啦，那个……那个人总点唱……”

“那个斯蒂奥巴？”

“对。”

他用口哨吹那支歌曲的头几个音节，继而停下来。

“您要再见见斯蒂奥巴？”

“有可能。”

他紧紧地搂住我的手臂。

“请您转告，索纳奇泽还常想着他呢。”

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滞留：

“其实，若望可能是对的。您从前是卡斯蒂利亚旅馆的客人……您好好回想一下……卡斯蒂利亚旅馆，在康蓬街……”

我转过头去，打开车门。前座上蜷缩着一个人，额头顶在玻璃上。我俯身一看，原来是新娘。她睡着了，浅蓝色的裙子撩起，露出半截大腿。

“得把她弄出来。”索纳奇泽对我说。

我轻轻地摇摇她，可她沉睡不醒。无奈，我只好搂住她的腰，总算把她拖出车来。

“总不能把她扔在地上啊。”我说道。

我一直把她抱进饭店。她的头在我肩上晃动，金发拂着我的脖颈。她身上馥郁的香气，令我想起点往事。到底是什么呢？

三

6点差一刻，我让出租汽车司机在夏尔-玛丽-维多尔小街等着我，我则安步当车，沿小街一直走到克洛德-洛兰街，见到这里的俄国教堂。

这是一座两层的楼房，窗户拉上了薄纱窗帘。教堂右侧有一条很宽的林荫道。我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伫立。

我首先看到两个女人停在教堂临街的门前：一个棕发很短，肩上搭一条黑色羊毛披巾；另一个满头金发，一脸脂粉，戴一顶类似宫廷骑卫军帽的灰色筒帽。我听到她们用法语交谈。

继而，一个体态臃肿的老头儿，艰难地从出租车里爬出来，他已经谢顶，眼睛有蒙古人褶纹，下方鼓起两个泡囊。他踏上林荫路。

在教堂左侧，有五个人从布瓦洛街朝我这边走来。走在前头的两个中年妇女搀扶着一个老翁，那老翁脸上毫无血色，身体十分虚弱，看上去真像一尊枯干的石膏像。跟在后面的两个男子一个长相，显然是父子；二人都穿一身剪裁讲究的灰色条纹西

装，父亲昂昂然一副炫耀仪容的神态，儿子则有一头鬈曲的金发。恰好这时，驶到这群人身边的一辆小车戛然停下。车上下来另一位老翁，只见他披了一件罗登厚呢斗篷，灰发理成平头，身板挺直，动作利落，一派军人风度。难道他就是斯蒂奥巴？

他们沿林荫路走去，全从侧门进入教堂。我很想跟进去，但又怕我出现在他们中间会引起他们注意。我越想越担心，唯恐确认不出斯蒂奥巴。

右侧稍远处，刚刚停下一辆轿车，先后下来两男一女。有个男子个头很高，穿一件海军蓝呢大衣。我横过马路去等他们。

他们走近了，越来越近，在走上林荫道之前，那位高个儿男人似乎打量了我一眼。对着林荫道的彩绘玻璃窗里面，点着一些大蜡烛。这扇门太矮，那高个儿男人只好弯下腰跨进去。我确信他就是斯蒂奥巴。

出租车的发动机没有熄火，但驾驶盘前却没有人。一扇车门虚掩着，就好像司机随时要回来似的。他能到哪儿去呢？我四处望望，决定绕这些房舍转一圈寻找他。

我走到不远的夏尔东-拉加什街，果然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了他。他已在餐桌就座，面对一杯啤酒。

“您还要呆很久吗？”他问我。

“唔……还要二十分钟吧。”

司机皮肤雪白，脸蛋儿滚圆，一头金发，蓝眼睛鼓出来。我想从未见过哪个男人有这样肥厚的耳垂。

“我开着计程器，没关系吧？”

“没关系。”我答道。

他和气地微笑。

“您就不怕有人偷走您的车？”

他耸了耸肩膀。

“要知道……”

他要了一份熟肉酱三明治，一边细细地吃着，一边用沉郁的目光凝视我。

“您到底等什么呀？”

“等一个人，他要从不远的俄国教堂出来。”

“您是俄国人吗？”

“不是。”

“真傻……早该问问他们几点钟出来嘛……这样，您也少花点车费呀……”

“我认了。”

他又叫了一杯啤酒。

“您能帮我买份报吗？”他问我。

他伸手装样子要在外衣口袋里摸零钱，让我拦住了。

“别客气了……”

“那就谢谢了。请给我买份《刺猬》。唔，再次

感谢……”

我转悠许久，才在凡尔赛林荫大道发现一个报贩。《刺猬》是一种用略呈绿色的纸张印刷的报纸。

司机皱着眉头，用舌头舔着食指，一页一页地翻看。我在一旁瞧着这个金发蓝眼睛、白白胖胖的人翻阅略呈绿色的报纸。

我不便打断他阅读。终于，他看了看他那只微型手表。

“该去了。”

到了夏尔-玛丽-维多尔街，他坐到小车的方向盘前，我请他等我。我又到俄国教堂前面伫立，不过这回是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阒无一人。也许他们都走了吧？那我就错过机会，再也找不到斯蒂奥巴·德·加戈里耶夫的踪迹了，因为这个名字没有收入巴黎的电话通讯簿里。朝向林荫道的彩绘玻璃窗里面，一直点着大蜡烛。此刻大家为之做弥撒的老妇人，从前我认识吗？如果那时候我经常和斯蒂奥巴来往，那么他很可能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当然会包括这位玛丽·德·雷桑。那时候，她要比我们年长许多。

他们走的那扇门，一定通向举行圣事仪式的小教堂，因此，我目不转睛盯着它，忽见它打开，门口出现那位戴高筒帽的金发女郎，戴黑披肩的棕发女人紧随其后。接着走出那对身穿灰色条格西装的父子，他们搀着“石膏”老人，那人正对蒙古人脸型的秃顶胖汉说话。胖汉则倾着身子，耳朵几乎贴

到老人嘴上："石膏"老人的声音，想必只剩下一口气了。其他人也鱼贯走出。我的心怦怦直跳，窥伺着斯蒂奥巴。

他终于随最后一批人出来。他身材魁伟，又穿件海军蓝呢大衣，因此，虽然人很多，少说有四十来个，我也不至于失去他的目标。他们多数年事已高，不过，我也注意到有几位青年女子，甚至还有两名儿童。他们全停留在人行道上，相互交谈。

此刻，林荫道真像外省学校课间活动的院子，脸色白如石膏的老翁被人扶着坐到一张街椅上，大家依次来向他问候。他是何许人？就是报上讣告中提到的那个"乔治·萨歇"吧？或许是少年侍从学校老校友吧？在天崩地拆①之前，他在彼得堡或黑海之滨，同这位玛丽·德·雷桑也许还有过一小段罗曼史呢？那个眼睛有蒙古人褶纹的秃顶胖汉，周围也有不少人。那对身穿灰色条格西装的父子，则在一伙一伙人中间走动，活像在餐桌之间翩翩起舞的两位绅士。他们俩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态，父亲还不时仰头大笑，那样子在我看来实在失礼。

斯蒂奥巴则一本正经，同那位戴灰色高筒帽的女士交谈，他以恭敬亲切的姿势，搂着她的胳臂与肩头。当年他准是个美男子，估计现在已年逾古稀。他的脸庞略显臃肿，头顶完全秃了，但鼻子相当大，昂首的姿态显得十分高雅。至少，这是我从远处观

① 指俄国1917年10月革命。

察所得的印象。

时间慢慢过去。将近半个小时了，他们还一直在谈话。我怕他们最终有人注意到我总站在人行道上。还有，那个出租汽车司机呢？我大步流星赶到夏尔-玛丽-维多尔街。马达一直在响，司机坐在驾驶盘前，正埋头看那份略呈绿色的报纸。

“怎么样？”他问我。

“说不准，”我答道。“也许还要等一个钟头。”

“您的朋友还没有从教堂里出来吗？”

“出来了，可是，他又同别人聊起来了。”

“您就不能请他过来一下吗？”

“不行。”

他那双蓝色大眼睛盯住我，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您不必担心。”我对他说。

“我是为您考虑……我不得不让计费器继续走……”

我又回到俄国教堂对面的窥伺地点。

斯蒂奥巴已经朝前走了几步。的确，他离开了林荫道里端，上了人行道了；只见他周围形成一个圈子，有头戴高筒帽的金发女郎、肩搭黑披巾的棕发女士、眼睛有蒙古人褶纹的秃顶男子，以及另外两个男子。

这回，我横过街道，走到他们附近，但是背对着他们。娓娓的俄国人话语声包围我，这个更为低

沉、更为洪亮的声音，莫非就是斯蒂奥巴？我转过身去。他久久地紧紧拥抱那位头戴高筒帽的金发女郎，几乎是在摇晃她的身子，只见他脸庞抽搐，强颜苦笑。接着，他又以同样方式，依次拥抱那个眼睛有蒙古人褶纹的秃顶胖汉和其他人。我心想：准到了分手的时候。于是，我跑回去，跳上出租汽车。

"快……照直走……开到俄国教堂前面……"

斯蒂奥巴还在同人说话。

"现在怎么办？"司机问我。

"您看见穿海军蓝呢大衣那个高个儿了吗？"

"看见了。"

"等他一上车，我们就在后面跟踪。"

司机回头凝视我，那双蓝眼睛快要鼓出来。

"先生，但愿这没有什么危险吧？"

"您就放心吧。"我对他说。

斯蒂奥巴离开人群，走出几步，挥动手臂，但是没有回头。戴灰色高筒帽的女郎站得稍微靠前些，她昂首挺胸，宛似古帆船头的雕像，帽子上那大羽翎在风中微微拂动。

他好半天才打开车门，想必他拿错了钥匙。等他坐到驾驶盘前，我就探身对出租汽车司机说：

"穿海军蓝呢大衣那人上去了，跟住那辆车。"

但愿不会跟错人，老实讲，并无确凿证据表明，此人就是斯蒂奥巴·德·加戈里耶夫。

四

他的车子开得很慢，不难跟踪。到了马约门，他闯了红灯，而我的出租汽车司机却不敢那样干。不过，到了莫里斯-巴雷斯林荫大道时，我们又追上了。我们两辆车子并排停到人行横道线跟前。他瞥了我一眼，那漫不经心的目光，是交通阻塞时并排等待的开车人所常有的。

他的车子开到里夏尔-瓦拉斯林荫大道，停在最后几幢楼房的前面，这里已临近普托桥和塞纳河了。他步行拐进于连-波坦路。于是，我也付了车费。

“祝您走运，先生，”司机对我说。“要当心……”

我也拐进于连-波坦路，猜得出司机还盯着我的背影。也许他替我担心吧。

夜幕降临。这条马路很窄，两侧楼房是两次大战之间建造的，式样雷同，一长串门面浑然一体，从马路一头延伸到另一头。斯蒂奥巴在我前边约有十米，他拐上右首的埃内斯特-德卢瓦松街，走进一

家食品杂货店。

时机到了，应当上前搭话。然而我生性胆怯，这样做极为犯难，怕自己结结巴巴，话不连贯，让人当成疯子。除非他立即认出我来，那样的话，我就由他讲了。

他走出食品杂货店，手里拎着一个纸口袋。

“是斯蒂奥巴·德·加戈里耶夫先生吧？”

他着实吃了一惊。我们二人头个儿一般高，这更令我局促不安。

“是我。不过，您是哪位？”

完了，他没有认出我来。他讲一口地道的法语。还要再鼓勇气。

“我……我……早就……想见您了……”

“为什么，先生？”

“我正在写……正在写一部关于流亡的书……我……”

“您是俄国人吗？”

这是第二次有人这样问我了。出租汽车司机也向我提过这个问题。事实上，也许我原来就是俄国人。

“不是。”

“而您却对流亡感兴趣？”

“我……我……我正在写一部关于流亡的书。是……是……是一个人建议我来见您……那人叫保罗·索纳奇泽……”

“索纳奇泽？……”

他以俄语拼音习惯讲出这个名字，听来如风戏枝叶间的飒飒声，十分悦耳。

“这是格鲁吉亚人的名字……我不认识……”

他皱起眉头。

“索纳奇泽……不知道……”

“我并不想打扰您，先生，只想提几个问题。”

“乐意效劳……”

他淡淡微笑，神色凄然。

“流亡，这可是个悲剧性的题材……对了，您怎么知道我叫斯蒂奥巴呢？……”

“我……不……我……”

“直呼我斯蒂奥巴的人，大多已经去世了。余下的人也屈指可数了。”

“就是……那位索纳奇泽……”

“不认识。”

“我可以……向您……提几个……问题吗？”

“可以。您到寒舍去好吗？我们坐下谈谈。”

我们通过一道通车的大门，再穿过一个大楼环绕的街心广场，又回到于连-波坦路。我们乘上两扇对开门并安装铁栅的木制电梯，里面狭小，而我们个头儿又高大，只好转身弯腰面壁，以免额头相撞。

他住在六层上，两室的套房。他把我引进卧室，便歪在床上。

“请原谅，”他对我说。“天棚太低了，人站着就透不过气来。”

的确，我的头盖骨离天棚只差几公分，不得不低头弯腰。而且，两间屋相通的门洞也比我们矮一头，想象得出，他经常要碰破头的。

“您要是愿意……干脆也躺下吧……”他指了指靠窗口的一张淡绿色天鹅绒面小长沙发。

“请随便些……您躺下会舒服多了……即使坐着，也会感到自己关在一个特别小的笼子里……别客气，别客气……还是躺下吧……”

我遵命躺下。

他打亮床头柜上的一盏橙红色灯罩的台灯，灯光投到天棚上，映出一个柔和的光点和周围的暗影。

“这么说，您对流亡感兴趣喽？”

“很感兴趣。”

“然而，您还挺年轻嘛……”

年轻？我从未考虑过自己可能还年轻。我身边的墙上，正好挂着一面金黄框子的大镜子。我照了照自己的面孔。年轻吗？

“嗳……我可没那么年轻了……”

一阵沉默。我们在房间里各躺一边，形同两个大烟鬼。

“我刚参加丧礼回来，”他对我说。“实在可惜，您没有见过那位年事很高的老妇人，她去世了……要不然，她能向您讲述许多事情……她是流亡中最杰出的一个人物……”

“是吗？”

“一位勇气十足的女人。起初，她在蒙塔博尔街开了一个小茶馆，帮助过所有人……当时非常艰难……”

他弓着背，叉着手臂，坐在床沿上。

“那时我才十五岁……细数一数，那一代人所剩无几了……”

“还有……乔治·萨歇……”我顺口说道。

“也不久于人世了。您认识他吗？”

是那个“石膏”老人呢？还是那个蒙古脸型的秃头胖子呢？

“请听我说，”他对我说道，“这些事我不能再谈了……提起来太伤心……干脆吧，我让您看些照片……照片背面都注明了姓名和日期……您自己想法理出个头绪吧……”

“您这样费神帮忙，实在太热心了。”

他冲我笑了笑。

“我有几大摞照片，背面注明了姓名和日期，因为，过后什么都会忘记……”

他站起身，弓着腰走进隔壁房间。

我听见他打开一个抽屉。继而，他捧着一个红色大盒子回来，随即背靠床沿坐到地下。

“请过来，坐到我身边，这样看照片方便些。”

我照办了。盒盖上用哥特字体刻着糖果商的名字。他打开盒子，里面满满的全是照片。

“您瞧，”他对我说，“主要流亡者的照片，全在这里了。”

他一张一张递给我照片，并告诉我他在背面看到的姓名和日期。这种叙述本来冗长单调，幸而俄国人名字抑扬顿挫，奇妙无比，忽而声如铙钹，十分响亮，忽而幽幽怨怨，如泣如诉。特鲁别茨阔依、奥别利亚尼、切列麦捷、加利金、埃里斯托夫、奥鲍伦斯基、巴格拉钦、恰夫恰瓦杰……有时，他又向我要回一张照片，重新看看姓名和日期。那是些节庆的照片。十月革命以后很久，鲍里斯大公爵在巴斯克城堡举办的盛大宴会。这张黑白照片摄于1914年的一次晚宴上，宾客济济一堂……还有一些照片，是彼得堡亚历山大中学一个班级的学生。

"这是我哥哥……"

他递给我照片的速度越来越快，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显然，他急于要了结这件事。我的目光蓦地停在一张照片上，这张相纸显得厚些，背面毫无注释。

"怎么啦？"他问我，"您看到什么，这样惊奇，先生？"

这张照片的近景，有一位面带微笑、笔挺坐在扶手椅上的老人，他身后站着一个明眸金发女郎。他们周围有几伙人，但大多背对着镜头。靠左侧有一个男子，三十岁左右，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蓄留细胡，穿一套浅色方格细呢西装，左手搭在那个金发女郎的肩上，右臂则没有照上。我真相信此人就是我。

我凑近他。我们肩挨肩，背靠着床沿，腿平伸

在地上

“请告诉我，这些人是谁？”我问道。

他接过照片，懒洋洋地瞧着。

“他嘛，叫吉奥尔吉亚泽……”

他指给我看坐在扶手椅上的老人。

“当时他在格鲁吉亚驻巴黎领事馆……直到……”

他话说了半截，就好像我会立即明白下半截话似的。

“她呢，是他的外孙女……名叫盖伊……盖伊·奥尔洛夫……她曾随父母流亡美国……”

“你对她熟悉吗？”

“不太熟悉。不熟悉。她在美国住了很久。”

“那么这个人呢？”我指着照片上的我问，说话的声音都走调了。

“问他？”

他皱起眉头。

“他……我不认识。”

“真的吗？”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您不觉得他像我吗？”

他瞥了我一眼。

“像您？不像。干吗问这个？”

“随便问问。”

他又递过来一张照片。

“瞧……无巧不成书……”

这是一张小姑娘的照片，她长长的金发，身穿白色连衣裙，背景有几个更衣室、一片海滩和大海，可见是在一个海滨疗养地拍摄的。照片的背面用紫墨水写着：嘉丽娜·奥尔洛夫——雅尔塔。

“您瞧……是同一个人……就是盖伊·奥尔洛夫……她名叫嘉丽娜……当时还没有起美国名字呢……”

另一张照片仍然在我手里，他指给我看上面的金发女郎。

“我母亲收藏了所有这些东西……”

他猛然站起来。

“到此为止，您不介意吧？我头晕了……”

他用一只手抚摩额头。

“我去换换衣裳……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就一起吃晚饭……”

我还独自坐在地下，整理散放在我周围的照片，放回红色大盒子里，只留下两张放在床上：一张是我同盖伊·奥尔洛夫以及吉奥尔吉亚泽合拍的，另一张盖伊·奥尔洛夫在雅尔塔的童年照。我站起身，走到窗口。

户外夜色苍茫。对面是另一个楼房环绕的街心广场。远处则是塞纳河，左侧横着普托桥。江岛伸延。过桥的车辆排成长串。我观望这些楼房的门面和窗户，全跟我眼前这扇窗户一模一样。就在这些迷宫般的楼梯电梯之间，在这些酷似蜂房的数百套房屋里，我发现了一个男子，也许他就是……

我脑门儿顶在玻璃窗上，只见下面每幢楼门口有一盏昏黄的灯通宵照亮。

"餐馆就在旁边。"他对我说。

我拿起放在床上的两张照片。

"德·加戈里耶夫先生，"我说道，"您能行行好，把这两张照片借给我吗？"

"我送给您好了。"

他给我指了指盒子。

"这些照片全送给您。"

"这怎么……我……"

"拿着吧。"

这是命令的口吻，我只好遵命。

我们下楼，我们沿着柯尼格将军河滨大道走去。

我们下了一条石台阶，便到了塞纳河边，看见一幢砖结构的建筑物，门上方一块招牌："河岛酒家"。我们走了进去。餐厅天棚很低，餐桌铺着洁白的纸台布，座位是柳条椅子。从窗口望去，可以看见塞纳河，以及普托桥上的灯火。我们走到餐厅里端坐下。我们是唯一的顾客。

斯蒂奥巴摸了摸衣兜，掏出来我看见他在食品杂货店买的那个小包，放在桌子中央。

"跟平常一样吗？"招待问道。

"跟平常一样。"

"这位先生呢？"招待指着我问道。

"这位先生也跟我吃一样的东西。"

招待很快给我们端上来两盘波罗的海鲱鱼，在有酒盅大小的玻璃杯里给我们倒满矿泉水。斯蒂奥巴从放在桌子中央的小包里拿出黄瓜，要跟我分着吃。

"对你口味吗？"他问我。

"挺好。"

我已经把那个红盒子放在身边一张椅子上。

"您真的不想保留所有这些纪念品了吗？"我问道。

"不要了。现在全归您了。我把火炬传给您。"

我们默默地进餐。一条驳船在河面滑行，近在咫尺，容我从窗口看清船上的人：他们也围着一张餐桌正在吃饭。

"还有这个……盖伊·奥尔洛夫？"我又问他。"您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吗？"

"盖伊·奥尔洛夫？我想她已经去世了。"

"去世啦？"

"好像死了。我大概见过她两三次……我跟她不熟……主要是我母亲跟老吉奥尔吉亚泽有交情。再来点黄瓜？"

"不要了。"

"我想她在美国的生活一定非常坎坷……"

"您不知道谁能向我谈谈这个……盖伊·奥尔

洛夫吗？”

他同情地望了我一眼。

“我可怜的朋友……没有了人……也许有一个，在美国……”

又有一条驳船经过，它黑乎乎的，行驶缓慢，仿佛弃置无人。

“餐后水果，我总是吃一根香蕉，您呢？”他问我。

“我也一样。”

我们吃了香蕉。

“还问一句，这个……盖伊·奥尔洛夫的父母呢？”我问道。

“大概也死在美国了。要知道，流离失所，葬身异国……”

“吉奥尔吉亚泽在法国没有别的亲人了吗？”

他耸了耸肩膀。

“真的，为什么您对盖伊·奥尔洛夫这么感兴趣呢？她是您的姐妹吗？”

他冲我亲切地微笑。

“喝杯咖啡好吗？”他问我。

“不喝了，谢谢。”

“我也不要了。”

他要付钱，被我抢先付了。我们走出“河岛酒家”，上码头台阶时，他抓住了我的胳臂。起雾了，雾气柔和而清爽，沁人心脾，给人感觉如腾云驾雾。在码头大街的人行道上，我连几米远的楼房都几乎

看不清了。

我像领一个盲人似的，一直把他领到街心广场。广场四周楼梯口的唯一座标，就是昏黄的光点。他握住我的手。

“还是尽量想法找到盖伊·奥尔洛夫，”他对我说，“既然您非要找不可……”

我目送他走进大楼亮灯的门厅。他止住脚步，冲我挥了挥手。我像吃完生日蛋糕回来的儿童，腋下夹一个红色大盒子，呆站在那里；我肯定当时他还对我讲了什么话，但他的声音被雾气掩盖了。

五

明信片上夏景，是英国人散步场。

亲爱的居伊：

惠书收到。此地生活天天相似，不过尼斯这座城市非常美。您一定要来瞧瞧我。说来也怪。有时我在街头拐角，会突然碰见一个阔别三十年的人，或者一个我以为早已死掉的人。我们彼此都大惊失色。尼斯城充满幽灵和鬼魂，但愿我不会马上加入他们行列。

至于您寻找的那个女人，最好打电话跟贝尔纳迪联系，他的电话号码是：Mac Mahon 00-08。他跟各种服务机构的人保持密切关系。他会高兴向您提供情况。

亲爱的居伊，尼斯晤面，翘首以待。

您的非常忠诚而殷勤的

于特

您知道，事务所的房子由您使用。

——又及。

六

1965年10月23日

姓名：奥尔洛夫，嘉利娜，别名“盖伊”·奥尔洛夫。

出生时间与地点：1914年于莫斯科（俄国）；父为基里尔·奥尔洛夫，母为伊琳娜·吉奥尔吉亚泽。

国籍：无国籍。（奥尔洛夫小姐父母及其本人因系俄国流亡者，没有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承认为侨民。）奥尔洛夫小姐只有一份普通居民证。奥尔洛夫小姐约在1936年从美国移居法国。

在美国期间，她同一位叫瓦尔多·布兰特的先生结婚，后来又离婚了。

奥尔洛夫小姐先后居住的地点：

巴黎八区马戏场街18号夏多布里盎饭店；

巴黎八区蒙田林荫大道56号；

巴黎二六区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大道25号。

奥尔洛夫小姐移居法国之前，在美国可能是个舞女。

在巴黎，她的经济来源不明，但过着奢侈的生活。

奥尔洛夫小姐因服巴比妥酸剂过量，于1950年死于她的寓所，即巴黎十六区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大道25号。

她的前夫瓦尔多·布兰特先生，于1952年移居巴黎，在几家夜总会里演奏钢琴。他是美国公民，1910年9月30日生于芝加哥。

居留证号码：534HC828。

这是一份打印材料，还有若望-皮埃尔·贝尔纳迪的一张名片和附言：

掌握的情况全部在此。谨致崇高的敬意。请问候于特。

七

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海报："钢琴演奏家瓦尔多·布兰特，于每日18时至21时，在希尔顿饭店酒吧间演奏。"

酒吧间里满座了，仅有一个空位置，就是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日本人桌边的一把扶手椅。我俯过身去，请他允许我坐下，他却没有听懂我的话。于是，我坐下来，他也丝毫未予理睬。

美国与日本顾客相继进来，相互打招呼，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他们就站在桌子中间，有些人手里拿着玻璃杯，靠到椅背或扶手上，有个年轻女人甚至坐在一个灰头发男人的大腿上。

瓦尔多·布兰特迟到了一刻钟，他到钢琴前落了座。他是个矮胖子，已经秃顶，蓄留一抹小胡，身穿一套灰色西装。他先扭头环视周围挤满了顾客的餐桌，继而伸右手抚摸一下琴键，又信手弹了几个和声。我运气不错，正巧坐在邻近他的一张餐桌。

他开始弹奏一支乐曲，我听着像《在古老巴黎的

码头上》，可是顾客谈笑喧声太大，几乎淹没了乐曲声。我尽管坐在钢琴附近，也不是每个音符都能听清楚。他却上身挺直，头微微前倾，镇定自若，继续弹奏。我真为他难过，心想他一生也有那么一个时期，别人聚精会神地听他演奏。但是后来，这种持续不断喧哗总要把琴声淹没，他不得不适应这种场面。此刻，他若听人讲出盖伊·奥尔洛夫的名字，会说什么呢？也许，这名字能使他摆脱一会儿他弹琴时的冷漠状态吧？或者，就像琴声沉入滚滚的谈话声浪中一样，这名字再也不能唤起他任何记忆了吧？

酒吧间里的顾客陆续散去，只剩下我、戴金丝边眼镜的日本人，以及那个曾坐在一个灰头发男子大腿上的年轻女子。此刻，她又坐到一个身穿浅蓝色西服的红脸胖汉的身边，他们在讲德语，声音很高。瓦尔多·布兰特演奏一支节奏缓慢的乐曲，是我熟识的。

他朝我们转过身来。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要我弹点什么特殊的乐曲吗？”他冷淡地问道，讲话微带美国口音。

坐在我旁边的日本人毫无反应。他僵直不动，面无表情，不啻一具经过防腐处理的干尸，我真怕稍微来一阵穿堂风，就会把他从椅子上吹翻在地。

“请弹《告诉我为什么》①。”坐在酒吧间里端的

---

① 歌曲名原文为德文。

女人声嘶力竭地喊道。

布兰特略一点头；便开始弹奏《告诉我为什么》。接着，灯光暗下来，就像某些舞厅在演奏慢狐步舞曲头几个节拍时那样。他们趁机抱在一起，那女人的手伸进红脸胖汉的衬衣领口，又向下滑去。日本人的金丝边眼镜不时闪耀一下。布兰特在钢琴前像个自动木偶，身子一蹿一跳，因为按照《告诉我为什么》这支乐曲的要求，琴师必须不断用力地弹出和声。

就在此刻，布兰特背后那个红脸胖汉正在抚摩一个金发女郎的大腿，而那个经过防腐处理的日本人干尸，几天来一直坐在希尔顿酒吧间的椅子上，这位琴师在想什么呢？我敢说他什么也没有想。他在越来越稠的混沌状态中漂浮。难道我有权利把他从这种状态中猛拉出来，唤起他一些痛苦的往事吗？

红脸胖汉和金发女郎离开酒吧间，准是去要客房了。男的拽着女的胳臂，弄得她差点绊了一跤。现在只剩下我和日本人了。布兰特再次转过身来，冷淡地问我们：

“你们还要再弹一支别的乐曲吗？”

日本人眼睛也不眨一下。

“先生，请弹《我们的爱情还剩下什么》吧。”我对他说。

他弹起这支乐曲，但速度特别缓慢，旋律仿佛松弛，陷入沼泽里，一个个乐音艰难挣扎。他不时

停止演奏，好似一个精疲力竭、趔趄而行的路人。他看了看表，霍地站起来，冲我们点点头。

“先生们，21点了，再见。”

他走出酒吧间，我紧跟上去，让那个经过防腐处理的日本人干尸留在地穴里。

他沿着长廊走，又穿过阒无一人的大厅。

我快步赶上了他。

“瓦尔多·布兰特先生……我想同您谈谈。”

“谈什么？”

他瞟了我一眼，那目光宛如遭围捕的野兽。

“谈谈您的一位熟人……一个名叫盖伊的妇女，就是盖伊·奥尔洛夫……”

他身子钉在大厅中央。

“盖伊……”

他睁大眼睛，就好像探照灯光射到他的脸上。

“您……您认识……盖伊？”

“不认识。”

我们走出饭店。一长队男女正等候出租汽车；他们穿得花枝招展，晚礼服颜色扎眼：绿色或天蓝色长袍、石榴红色小礼服。

“我并不想打扰您……”

“您也没有打扰我，”他心事重重地对我说，“很久没人向我提起盖伊了……不过请问，您是哪位？”

“是她的一个表兄弟……我希望能了解到她的一些详细情况……”

“详细情况？”

他用食指揉了揉太阳穴。

“您要我对您说什么呢？”

我们拐进一条沿饭店通向塞纳河的小街。

“我得回去了。”他对我说。

“我陪您走走。”

“这么说，您真的是盖伊的表兄弟？”

“是的。我们家里的人希望了解她的情况。”

“她早已去世了。”

“我知道。”

他脚步很快，我跟着颇为吃力，尽量保持和他齐头并进。我们来到布朗利码头。

“我住在对面。”他指着塞纳河对岸，对我说道。

我们登上比尔-哈凯姆桥。

“我无法向您提供很多情况，”他又对我说。“我是很久以前认识盖伊的。”

他脚步放慢，仿佛感到安全了。也许他以为有人跟踪，才走得飞快。要不然，是想甩掉我。

“我不知道盖伊家里还有人。”他对我说。

“有……有……吉奥尔吉亚泽方面的……”

“您说什么？”

“吉奥尔吉亚泽家……她外祖父姓吉奥尔吉亚泽……”

“哦，好嘛……”

他停下脚步，身子靠到大桥的石栏杆上。我要

学他的样子，会头晕目眩，只好站在他面前。他尚在迟疑。

“您知道……我跟她结过婚吗？……”

“知道。”

“您是怎么知道的？”

“是登记在旧材料上的。”

“当时在纽约，我们都进了一家夜总会……我弹钢琴……她要跟我结婚，仅仅是想留在美国，又免得移民局找麻烦……”

他回忆这段往事，连连摇头。

“她是个古怪的姑娘。后来，她跟吕基·吕西亚诺来往密切……她是到帕姆群岛的游艺场时认识他……”

“吕西亚诺？”

“对，对，叫吕西亚诺……他在阿肯色州被捕的时候，正好跟她在一起生活……后来，她遇见一个法国人，我知道他们俩是一道来法国的……”

他眼神闪亮一下，又冲我笑笑。

“能跟您谈谈盖伊的情况，先生，我很高兴……”

一辆地铁从我们头上经过①，驶向塞纳河右岸。接着又来一辆，朝相反方向驶去。隆隆声响淹没了布兰特的话语。看他嘴唇翕动，才知道他还在对我诉说。

---

① 巴黎地铁有些地段在地面上行驶。

"……她是我认识的最漂亮的姑娘……"

我捕捉到的这片言只语，令我十分气馁。在这深更半夜，我同一个素味平生的男子站在一座桥中央，力图从他嘴里掏出点情况，以助于了解我自己，而在隆隆的地铁声中，我又听不清楚。

"我们再往前走一走好吗？"

他凝神专注，没有回答。毫无疑问，他已有很久没有这样想盖伊·奥尔洛夫，现在关于她的往事一桩桩浮现在脑海，犹如吹来一阵海风，他如醉如痴了。他呆呆然，倚着桥栏杆伫立。

"您真的不想往前走一走吗？"

"您认识盖伊？您遇见过她吗？"

"没有。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了解具体些。"

"她碧眼……金发……那头金发……非同寻常……怎么向您解释呢？金黄色……又发灰……"

一位发灰的金发女郎。也许，她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应当仔仔细细地看她的照片，慢慢地就会全想起来。当然，他若能向我提供一条更清楚的线索，那就更好了。找到这位瓦尔多·布兰特，就够走运的了。

我们不能总这样呆在桥上，我挽起他的胳臂，又沿着帕西码头大街走去。

"您在法国又见到她了吗？"我问道。

"没有。我到法国时，她已经死了。她是自杀的……"

"为什么要自杀呢？"

“她经常对我说，她怕人一旦老了……”

“您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她同吕西亚诺分手之后，又遇见那个法国人。那阵子，我们见过几次面……”

“您认识他吗，认识那个法国人吗？”

“不认识。她对我说，她跟那人结婚，也是为了取得法国国籍……能有个国籍，这是她念念不忘的问题……”

“当时你们已经离婚了吗？”

“当然离了……我们的婚姻仅仅维持半年，刚好哄过要把她驱逐出美国的移民局……”

我要全神贯注听他讲，不能放过她经历的一条线索。况且，他的声音又非常低沉。

“她去法国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直到获悉……她自杀的消息……”

“您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是一位认识盖伊的美国朋友告诉我的，当时他正在巴黎，便给寄来一张剪报……”

“您还保存着吗？”

“对。肯定在我住所，放在一个抽屉里。”

我们走到了特罗卡戴罗花园。园中喷泉映着灯光，行人熙熙攘攘。旅游者聚集在喷泉前面和伊埃纳桥上。别看这是10月里的一个星期六夜晚，但是天气温和，木叶未脱，真像春天的一个星期六夜晚。

“再往前走一点儿，就是寒舍……”

我们过了花园，踏上了纽约林荫大道。我产生了做梦的不快之感，就好像我已去世，现在只是个幽灵，在周末夜晚的温和空气中飘荡。为什么还要重新接上已经断了的关系呢？为什么还要寻觅早已隔绝的踪迹呢？我也难以相信，走在我身边的这个留小胡子的胖男人是个真人实体。

“怪了，我猛然想起盖伊在美国认识的那个法国人的名字……”

“他叫什么？”我问道，连话音都发抖了。

“奥瓦尔……这是他的姓……不是他名字……请等一等……奥瓦尔什么的……”

我站住，俯过身去。

“奥瓦尔什么呀？……”

“德……德……德·吕兹。吕……兹……奥瓦尔·德·吕兹……奥瓦尔·德·吕兹……这个姓给我的印象很深……一半英国……一半法国……或者西班牙……”

“那么名字呢？”

“这个嘛……”

他打了个爱莫能助的手势。

“您不知道他的相貌特征吗？”

“不知道。”

我想要给他看看那张照片：上面有盖伊、老吉奥尔吉亚泽，以及我认为是我本人的那一位。

“那个奥瓦尔·德·吕兹，他从事什么职业呢？”

“盖伊说他出身贵族世家……他什么也不干。”

他轻轻一笑。

“哦……哦……也干过事儿……等一等……想起来了……他在好莱坞呆了很长一段时间……盖伊对我说过，他是演员约翰·吉尔伯特的跟班……”

“约翰·吉尔伯特的跟班？”

“对……那是在吉尔伯特的晚年……”

小轿车在纽约林荫大道上飞驰，却听不见发动机的声响，这就更加增强了我所产生的梦幻之感。小轿车川流不息，悄然无声，仿佛在水面上滑行。我们走到阿尔马桥前边的渡桥口。奥瓦尔·德·吕兹。有可能这正是我的姓氏。奥瓦尔·德·吕兹。对，这些声音唤起我某种记忆，犹如一件物体反射一下月光那样倏忽而逝。如果我就是这个奥瓦尔·德·吕兹，那么，我在生活里，一定显得有些古怪，因为我要做事，挑什么体面的、有吸引力的职业没有，却偏偏去当什么“约翰·古尔伯特的跟班”。

快到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时候，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街。

“我就住在这里。”他对我说。

电梯里的照明灯坏了，我们刚要跨进去，楼道的定时灯不巧又灭了。黑暗中，传来欢笑声和音乐。

电梯停了，我感到身边的布兰特在摸索寻找门把手。他终于打开门，楼里伸手不见五指。我推着

他走出了电梯。欢笑声和音乐正是从我们这层楼发出来的。布兰特拿钥匙开门。

我们走进门厅，他没有随手把门带上。门厅天棚上吊着一只没有罩的电灯泡，光线微弱。布兰特停在门厅中央，一时呆若木鸡。我心里合计是否应当告辞。音乐响声震耳欲聋。一位棕发的青年女子走出套间，用惊讶的目光打量我们两个。她穿一件非常宽松的红色浴衣，露出了一对乳房。

“这是我妻子。”布兰特向我介绍。

他妻子向我微微颔首，同时伸手把浴衣的领子往上提一提。

“我不知道你要回来这么早。”她说道。

我们三人都木然不动，站在昏暗的灯光下，脸庞都映得灰白。我转向布兰特。

“你应该事先跟我打声招呼嘛。”他对妻子说。

“我事先也不知道……”

她垂下了头，像一个撒谎当场被识破的女孩。震耳的音乐戛然而止，随后是一支用萨克管吹奏的轻音乐，旋律十分优美纯正，在空中缭绕飘逝。

“你们人多吗？”布兰特问道。

“不，不多……只有几个朋友……”

门缝里探出一个脑袋，是个女人，金发剪得很短，口红淡淡的，呈粉红色。继而又探出一个脑袋，这回是个男人，头发棕褐，肤泽无光。在灯光下，两张面孔都像假面具；棕褐头发的男人面带微笑。

"我该回到朋友中间去了……你过两三个小时再回来吧……"

"好吧。"布兰特说。

那两个人先进去，她也离开门厅，关上了房门。只听里面格格大笑和打闹追逐的声响。继而，又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

"请跟我来！"布兰特对我说道。

我们回到楼道里，布兰特打开楼梯灯，坐到梯级上，并招手让我坐在他身边。

"我妻子比我小得多……相差三十来岁……绝不能娶年龄太小的女人……绝不能……"

他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两个人处不好……年龄相差悬殊的夫妇，没有和睦的……记住这一点吧，老弟……"

楼梯定时灯熄灭了。看来，布兰特无意再去打开。我也如此。

"盖伊要是看到我这样子……"

他一想到这点，便哈哈大笑。多奇特的笑声，在这黑暗之中。

"她不会认出我来……从那以后，我的体重至少增加了三十公斤……"

又是哈哈大笑，但与前次不同，声音更显得神经质而不自然。

"她会大失所望……您明白了吗？一个在饭店酒吧间里弹钢琴的……"

"为什么会大失所望呢？"

"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失业了……"

他抓住我的上臂：

"盖伊认为我能成为另一个科尔·波特①呢……"

突然响起女人尖叫声，是从布兰特的家里传出来的。

"出了什么事儿啦？"我问他。

"没什么，他们那是寻欢作乐。"

一个男人的吼声："你给我开门不？你给我开门不，达妮？"又是哄笑声。一扇房门啪的一声响。

"达妮，就是我的妻子。"布兰特悄声对我说道。

他站起身，打开楼道定时灯。

"我们出去透透气吧。"

我们穿过现代艺术博物馆前面的广场，到台阶上坐下。我望见地势稍低的纽约林荫大道上车辆往来，这是尚有生活的唯一标志。我们周围一片寥落死寂。就连塞纳河对岸的埃菲尔铁塔，平时那么令人慰藉，此刻也像烧焦的废铁架了。

"这里呼吸畅快些。"布兰特说道。

的确，广场上清风徐徐，吹拂着投影斑斑的雕像，吹拂着幽邃的大圆柱。

① 科尔·波特（1892—1964）美国作曲家和抒情诗人。他是显赫的百老汇剧作家，他的剧作有：《快活的离婚者》、《巴拿马草帽》、《康康舞》等。他还创作了大量电影歌曲和抒情歌曲，广为流传。

“我想给您看几张照片。”我对布兰特说。

我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把它打开，抽出两张照片来：上面一张，盖伊·奥尔洛夫同老吉奥尔吉亚泽，以及我看像我本人的男子的合照；下面一张，则是盖伊的幼年照。我把第一张照递给他。

“这里什么也看不清楚。”布兰特咕哝道。

他拨弄打火机，可是刚打着就被风吹灭，不得不拨弄好几回。他用手掌挡风，将火苗移近照片。

“您看到照片上的一个男人吗？”我对他说。“就是左边……最左边这个……”

“看到了。”

“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

他凑近照片，手掌搭在额前，好护住打火机的火苗。

“您不觉得他像我吗？”

“看不出来。”

他又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照片，然而还给了我。

“我跟盖伊结识那时候，她就是这副模样。”他伤感地对我说。

“喏，还有一张，是她的幼年照。”

他接过另一张照片，手掌还是搭在额前，借着打火机的火光细瞧，那姿势就像一个在干精确度极高的活儿的钟表匠。

“当年，她是个俊俏的小姑娘，”他对我说，“您还有她别的照片吗？”

“可惜，没有了……您有吗？”

“原先有一张，是我们的结婚照，可是在美国时让我给弄丢了……刊登她自杀的那份剪报，也不知道在不在了……”

他的美国口音，起初细微难辨，现在却越来越重了。是疲惫的缘故吧？

“您经常要这样等候，才能进家门吗？”

“越来越经常了。其实当初挺和美……那时候她对我挺体贴的……”

因为有风，他好不容易点着一支烟。

“盖伊要是看见我落到这种地步，一定会非常诧异……”

他凑过来，一只手搭到我肩上。

“她要及早离开人世，您不认为她做得对吗，老弟？”

我定睛看他。他的每个部位都是圆的：脸庞、蓝眼睛是圆的，小胡子也修成弧型。还有那张嘴、那双手，都是圆滚滚的。我联想起孩子拉着的拴在一条线的气球，他们有时松松线绳，看看气球能升多高。瓦尔多·布兰特这名字也鼓起来，像一只气球。

“实在抱歉，老弟……未能向您提供多少关于盖伊的情况……”

我感到他因疲倦与沮丧而昏头昏脑，便紧紧地盯住他，担心广场上吹过一阵微风，他也会无影无踪，抛下我独对我这些问题。

八

林荫路正好沿欧特伊跑马场旁边伸延，路一侧是一条跑马道，另一侧则有一排由小花园隔开的式样雷同的建筑物。我从这些豪华的住宅前面走过，停在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路25号的前面，这就是盖伊·奥尔洛夫自杀的地方。到底是哪一层楼呢？这期间肯定换了门房。木楼里的房客，也许还有当年在楼梯上碰见过盖伊·奥尔洛夫，或者与她同乘过电梯的人吧？也许还有当年看见我常来这里，现在能认出我来的人吧？

当年有些夜晚，我一定到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路25号，上楼时心怦怦直跳。她在等我。她房间的窗户正对着跑马场。从楼上观看跑马，一定很奇特：微小的马匹和骑师向前推进，宛如造型靶子拉成一列；从一端移向另一端，谁能击中所有靶位，就会中头彩。

当时，我们用什么语言交谈呢？用英语吗？她和老吉奥尔吉亚泽的合影，就是在这套房间拍摄的吗？里面家具陈设如何呢？一位叫奥瓦尔·德·吕

兹——是我吗？——“出身贵族世家”，又是“约翰·吉尔伯特的跟班”，而另一位生于莫斯科，曾当过舞女，在帕姆群岛认识了吕基·吕西亚诺，这两位彼此能谈些什么呢？

怪人。经历很快烟消云散。我和于特，我们经常谈起这些踪迹泯灭的人。忽有一天，他们走出虚无，只见衣饰闪几下光，便又复归沉寂。绝色佳人、美貌少年、轻浮之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即便在世的时候，也不过像一缕蒸汽，绝不会凝结成型。于特给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即他所说的“海滩人”。此公在海滩上，游泳池边度过了四十个春秋，他笑容可掬，同避暑的游客和无所事事阔老搭讪闲聊。在成千上万张暑假照片的一角或衬景里，总能看到他穿着游泳裤，混迹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谁也叫不上来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呆在那里。有朝一日，他又从照片上消失了，同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不敢对于特明讲，我认为我就是那“海滩人”。况且，即使我向他承认了，他也不会感到惊奇。于特曾一再强调，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拿他的话说，“我们在沙子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

这座楼房的一侧临街头公园，看上去已经荒废，树木荆棘丛生，草坪久未修剪。在夕阳残照中，一个孩子独自安静地在沙子堆边玩耍。我坐到草坪边上，举目仰望楼房，心里琢磨盖伊·奥尔洛夫的房间窗户，究竟朝向何方。

九

夜间，在私人侦探所里，乳白色玻璃罩灯的强光，投射到于特的写字台皮面上，现出一个耀眼的光斑。我坐在写字台后面，阅着着陈旧的和稍新的电话通讯簿，查到情况便抄录下来：

奥瓦尔·德·吕兹(若望·西姆蒂)♉和夫人(原姓名玛贝尔·道纳玉)奥瓦省瓦尔布勒兹，电话21号；雷务阿尔街23号，电话AUT 15-28。

——全满部——蓝艇部△

刊载这项内容的上流社会的电话通讯簿，距今已有三十来年。他就是我的父亲吗？

后来几年的电话通讯簿，也有同样的记载。我又查了图例和略语表。

♉＝十字军功章。

全满部＝全满旗帆船俱乐部

蓝艇部＝蓝色海岸摩托快艇俱乐部
△＝帆船船主

十年之后，“雷努阿尔街23号，电话AVT15-28”的字样不见了。“全满部和蓝艇部△”也同样消失了。

在下一年的电话通讯簿里，只剩下：

奥瓦尔·德·吕兹夫人，原名玛贝尔·道纳玉，奥恩省瓦尔布勒兹电话21号。

后来，就没有一字记载了。

接着，我查阅近十年的巴黎年鉴。每查到奥瓦尔·德·吕兹这个姓氏，总是这样内容：

奥瓦尔·德·吕兹，克。亨利·帕泰广场3号。电话：MOL50-52。

他是我的兄弟，还是堂兄弟呢？

在这几年的上流社会的电话通讯簿里，却没有同样内容的记载。

十

"奥瓦尔先生正在等您。"

说话的女人一头棕发，蓝色眼睛，想必就是巴萨诺街这家餐馆的老板娘。她打了个手势，叫我跟她走。下了一道楼梯，她把引向餐厅的里端，停到一张餐桌前。一个独自坐在那里的男人站了起来。

"我是克洛德·奥瓦尔。"他对我说。

他给我指了指他对面的座位。我们落了座。

"我迟到了，请原谅。"

"没关系。"

他好奇地端详我。莫非认出我来了吗？

"接到您的电话，我很惊讶。"他对我说。

我向他挤出笑脸。

"尤其是您对奥瓦尔·德·吕兹家族这么感兴趣……而我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代表了，亲爱的先生……"

他讲这句话是挖苦的口气，仿佛是要自我解嘲。

"而且，我只让人叫我奥瓦尔，这样方便些。"

他递给我菜谱。

“您不必跟我吃同样的东西。我是美食专栏编辑……这家餐馆的各种风味都要品尝……就像牛犊胸腺和美味鱼汤……”

他叹了口气，真是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

“实在受不了……不管生活中碰到什么事，我也总是被迫吃呀吃呀……”

招待已经给他端上来一份馅饼。我要了一份色拉和水果。

“您运气好哇……可我呢，我得硬往里塞……今天晚上我还写篇文章……我刚参加了吃肠金奖大赛……我还是评委呢。要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吞下一百七十根肠……

我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他那背头是棕褐色的，眼睛呈栗色，尽管脸色苍白到极点，脸型却有点黑人的特征。设在地下的这个餐厅，四壁装有浅蓝色的细木护板，餐桌铺着缎子台布，摆的玻璃器皿，则像18世纪的劣货。当时，只有我们俩在这地下餐厅用餐。

“您在电话里问我的事，我考虑过了……您感兴趣的那个奥瓦尔·德·吕兹，只能是我的堂兄弟弗雷迪……”

“您真的这样认为吗？”

“肯定是。不过，我不大了解他……”

“他叫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

“对。我们幼年时曾在一起玩耍。”

“您没有他的照片吗？”

“一张也没有。”

他吞了一口馅饼，强忍住一阵恶心。

“甚至连堂兄弟都算不上……还是往上推两三代的亲戚……奥瓦尔·德·吕兹家族的人，当时所余无几……我想只有爸爸和我，以及弗雷迪和他祖父……要知道，我们原是毛里求斯岛上的一个法国家族……”

他厌腻地一把推开餐盘。

“弗雷迪的祖父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美国女人……”

“名叫玛贝尔·道纳玉吧？”

“正是……他们在奥恩省有很大一份产业……”

“是在瓦尔布勒兹吧？”

“咦，亲爱的，您是一部活词典啊。”

他惊奇地瞥了我一眼。

“后来嘛，我想他们家产全部丧失……弗雷迪去了美国……我无法向您提供详细情况……这些情况我也是全听说的……我甚至想，弗雷迪是否还活在世上……”

“怎么能了解到呢？”

“我父亲要是活着嘛……家族的情况，全是他告诉我的……不幸的是……”

我从兜里掏出盖伊·奥尔洛夫和老吉奥尔吉亚泽的合照，指着那个像我的棕发男子问他：

“您不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您看他不像我吗？"

他凑近仔细瞧瞧。

"也许像点儿。"他并无把握地说道。

"这个金发女子呢，您不认识她吗？"

"不认识。"

"她可是您堂兄弟弗雷迪的女朋友。"

他好像猛然想起什么来。

"等一等……我想起来了……弗雷迪去了美国……他似乎当上了演员约翰·吉尔伯特的跟班……"

约翰·吉尔伯特的跟班。这一情况，已是第二次有人向我提供，但事情并没有多大进展。

"当时，他从美国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我才知道……"

"您还留着吗？"

"没留，不过，写的话我还记得：

一切均好。美国是个美丽的国家。我找到了工作，当了约翰·吉尔伯特的跟班。问候令尊。此致

弗雷迪

这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他回法国后，您没有再见到他吗？"

"没有，我都不知道他回国了。"

“如果现在他坐在您面前，您能认出他来吗？”

“也许认不出来了。”

我不敢向他暗示，我就是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我还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但仍然满怀希望。

“我认识弗雷迪那时候，他才十岁……我父亲带我去瓦尔布勒兹同他玩耍……”

餐馆的饮料总管停在我们餐桌旁边，等待克洛德·奥瓦尔挑选饮料，而克洛德·奥瓦尔没有发觉，害得这个人像个哨兵，笔直地站在那里。

“说到底，先生，我觉得弗雷迪已经死了……”

“还不能这样说……”

“您对我们不幸的家族这么关心，诚挚可感。我们命途多舛……恐怕我是家族唯一的幸存者，瞧瞧我为了生计，得干些什么营生……”

他用拳头敲了敲桌子，招待便端来鲜味鱼汤。餐馆老板娘来到我们身边，一副殷切的笑脸。

“奥瓦尔先生……今年的吃肠金奖大赛，组织得不错吧？”

然而，他没有听见她的问话，而是探身对我说道：

“按说，我们当初就不应该离开毛里求斯岛……”

十 一

火车站又小又旧，黄不棱登，灰不溜秋，两侧都竖着水泥栏杆。栏杆里面，就是上下车的月台。我下了轮胎火车，只见车站广场冷冷清清，一个孩子穿着旱冰鞋，在大树下的平地上独自滑行。

我想，很久以前，我也在这里玩耍过。这个平静的广场，确实唤起我某种回忆。是我祖父奥瓦尔·德·吕兹乘火车从巴黎来接我，还是我去巴黎看他呢？夏天傍晚，祖母玛贝尔·道纳玉常带我去接站，到月台上等待他。

走出不远，便是一条跟国家公路一样宽的大街，但行驶的车辆却寥寥无几。我顺着公园的水泥栏杆走去，这趟栏杆跟我在车站所见是同样制品。

街道另一侧有几家商店，都搭了顶棚。一家电影院。接着，又是一家客栈，它有树木枝叶遮掩，座落在缓缓上坡的林荫道的拐角。我仔细查过瓦尔布勒兹的街市图，因此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这条林荫路。走到这条由树木夹护的路的尽头，迎面一道围墙和铁栅门。门上挂着一块朽了的木牌，尚可认出

半数字迹："国有财产管理处"。铁栅门里边展现一片荒芜的草坪。最里端有一长排砖石结构楼房，这是路易十三时代风格的建筑，正中的楼阁高出一层，显得突兀，正面两侧各有一座圆顶小楼。所有百叶窗都关上了。

惆怅之感油然而生：我眼前这座宅邸，也许正是我度过童年的地方。我推推铁栅门，并不费力就打开了。已有多久我没有跨进这门限啊？我注意到右首有一座砖房，大概是马厩吧。

草长平膝，我尽量加快速度穿过草坪，走向古宅。宅院如此阴森沉寂，我心中惴惴不安，唯恐发现楼后面杂草丛生，垣残壁断。

忽听有人叫我，我回头望去，只见一个男人在马厩门前向我挥手。他朝我走来。我站在赛似热带丛林的草地中央，木然地望着他。那人颇为高大壮实，穿一身绿丝绒衣裳。

"您有何贵干？"

他离我几步远停下。他留着胡子，头发棕褐色。

"我想打听一下奥瓦尔·德·吕兹先生的情况。"

我迎上去。也许他会认出我来吧？我每次都抱着同一希望，而每次都失望了。

"哪位奥瓦尔·德·吕兹先生？"

"名叫弗雷迪的。"

我急不可待地抛出"弗雷迪"三个字，就好像

多年遗忘之后，我讲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睁开了眼睛。

“弗雷迪……”

此刻，我真以为他是直呼我的名字。

“弗雷迪？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没有，他并没有认出我来。谁也没有认出我。

“您到底有什么事？”

“我想了解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的情况。”

他满腹狐疑地打量我，一只手插进裤兜，要掏家伙威胁我吧？嗳，哪里，他掏出了一条手绢，擦了擦脑门儿。

“您是谁呢？”

“很久以前，我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现在很想了解他的情况。”

他听了我的谎言，脸色豁然开朗。

“在美国？您是在美国认识弗雷迪的？”

“美国”一词仿佛引起他的幻想。他十分感激我在“美国”认识了弗雷迪，看他那样子，简直要拥抱我。

“在美国？这么说，您认识他的时候，他当上了跟班，给……给……”

“给约翰·吉尔伯特当跟班。”

这一下，他的疑云焕然冰释。

他甚至抓住了我的手腕。

“从这边走。”

他把我引向左首，沿围墙走。这里杂草较矮，想必从前是一条路。

“我很久也没有弗雷迪的音信了。”他声音低沉地对我说。

他的绿丝绒衣服已经很旧，多处快磨透了，肩头、双肘和两膝都加了皮子。

“您是美国人吗？”

“是的。”

“弗雷迪还从美国给我寄来好几张明信片呢。”

“您还留着吗？”

“当然了。”

我们走向古宅。

“您从未到过这儿吗？”他问我。

“没有。”

“那您是怎么了解到地址的呢？”

“通过弗雷迪的一个堂兄弟，克洛德·奥瓦德·吕兹……”

“不认识。”

我们来到一座圆顶楼阁前面，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长排古宅正面两端的侧楼。我们绕过去，他指着一扇小门对我说：

“要进去，只能走这扇门。”

他用钥匙开门。我们走了进去。他带我先是穿过一个黑洞洞的空房间，继而沿走廊行去，最后来到一个有彩绘玻璃的厅室，样子像个小教堂或玻璃暖房。

“这原是夏季餐厅。”他告诉我。

厅里只有一张红色天鹅绒面的破旧长沙发。我们坐到沙发上，他从兜里掏出一只烟斗，悠闲地点燃。阳光从彩绘玻璃照进来，把他映成淡蓝色。

我抬头看到，天棚也是淡蓝色的，有几处颜色更淡，大概是云彩。他也顺着我的目光观望。

“天棚的墙壁，都是弗雷迪粉刷的。”

厅里只有一面墙粉刷成绿色，画的是一棵棕榈树，但色彩已经模糊，难以辨认了。我极力想象我们从前在这个餐厅吃饭的情景。我把天棚漆成蓝天，在绿色墙壁上画了这棵棕榈树，好增添一点热带的色彩。透过彩绘玻璃的蓝光，照在我们脸上。然而当时，这几张面孔，究竟都是谁呢？

“这是唯一可以进来的房间了，”他对我说。“其它房门都贴了封条。”

“为什么？”

“这幢楼房查封了。”

这话令我寒心。

“整个宅子都查封了，却还让我呆在这里。要呆到什么时候呢？

他吸着烟斗，摇了摇头。

“管理处不时派个人来查看一下。看样子，他们还没有决定下来。”

“谁呀？”

“国有财产管理处。”

我不大明白，但想起那块朽木牌子的字样：“国

有财产管理处”。

“您来这里很久了吧？”

“哦，是啊……还是在奥瓦尔·德·吕兹先生去世那年来的……就是弗雷迪的祖父……我经管大花园，同时给夫人开车……就是弗雷迪的祖母……”

“请问，弗雷迪的父母呢？”

“我想，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是祖父母抚养弗雷迪长大的。”

这么说，我是由祖父母抚养长大的。祖父谢世之后，我就和祖母玛贝尔·道纳玉，以及这个男子，单独在这里生活。

“请问您的姓名？”我问他。

“我叫罗贝尔。”

“弗雷迪怎么称呼您？”

“他祖母是美国人，叫我鲍勃①。弗雷迪也叫我鲍勃。”

鲍勃这个名字，没有使我想起什么事儿。而他呢，说到底，也认不出我来了。

“后来，他祖母也去世了。至于财产嘛，剩不下多少了……弗雷迪的祖父把妻子的财产都挥霍光了……那是从美国带来的一大笔财产……

他悠闲地抽着烟斗，缕缕蓝色的烟雾冉冉飘向天棚。这间厅室有大块彩绘玻璃，墙壁和天棚上有弗雷迪的画——我的画吧？——这无疑是他经常躲人的地方。

① 罗贝尔的昵称。

"后来，弗雷迪不见了……不辞而别……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反正，他们把整个宅院查封了。"

再次出现"查封"一词，就好像你要跨进去的一扇大门，迎面"啪"的一声关上了。

"打那以后，我就等着……心想他们会怎么安置我……还不至于把我赶出门去吧。"

"您住在哪儿呢？"

"住在原先的马厩里。那是弗雷迪的祖父雇人修缮好的。"

他叼着烟斗，端量着我。

"您哪？向我谈一谈，您在美国是怎么认识弗雷迪的吧。"

"哦……说来话长……"

"我们走一走好吗？我领您去看看那边的园子吧。"

"好吧。"

他打开一扇玻璃门，我们走下几级石阶，只见对面一块草坪，跟我刚才想来主楼要穿过的草坪类似，只是草没有那么高。有一点我非常惊讶：楼阁的背面是灰石构造，跟正面完全不同。房顶也不一样，下面有隅角斜面和人字墙。因此，乍一看，这楼阁是路易十三时代的建筑，背面却像 19 世纪末期的海水浴疗养院。这类式样的疗养院，在比亚里茨① 还残留几所。

① 法国位于加斯蒂涅湾的滨海城市，海水浴与温泉疗养胜地。

“我尽力把这边园子经管好些，”他说，“但是一个人干也太难。”

我们走在一条石子路上，路右侧是草坪，左侧是一人高的灌木丛，都已精心修剪过。他指着灌木丛对我说：

“那是‘迷宫’。树全是弗雷迪的祖父当年栽植的。我尽心管理。总得留下点原样的东西。”

我们从旁边一个出入口走进“迷宫”。但是枝叉交错形成的拱顶太矮，我们不得不低头弯腰。里面小径纵横，千变万化：十字路口、圆点空场、环形弯道、直角岔路、死胡同、摆着青木长椅的林荫小径，一应俱全……我小时候，一定和我祖父，和年龄与我相仿的小朋友，在这里玩过捉迷藏游戏。这里散发着女贞树和松树的清香。也许正是在这座“迷宫”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出来时，我不禁对这位向导说：

“真奇怪……这迷宫唤起我一些记忆……”

他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

草坪边上竖着秋千架，铁架已生锈，但还有两副秋千。

“对不起……”

他坐到一副秋千上，又点燃了烟斗。我坐到另一副秋千上。夕阳的余辉，将迷宫灌木丛笼罩在柔和的橙黄色彩里。楼阁的灰石上，也有这种光辉的斑斑点点。

我选择这一时刻，把盖伊·奥尔洛夫、老吉奥

尔吉亚泽和我的合影递给他。

“您认识这些人吗？”

他始终叼着烟斗久久地端详照片。

“这个人，我挺熟悉……”

他食指压在盖伊·奥尔洛夫脸庞的下方。

“俄国女人……”

他的声调沉思而喜悦。

“您还想我是不是认识她，这个俄国女郎……”

他格格笑了两声。

“最后那几年，弗雷迪常带她来这里……真是个出色的姑娘……一头金发……告诉您吧，她喝酒可是海量……您认识她吧？”

“认识，”我回答。“在美国，我看见她跟弗雷迪在一起。”

“他是在美国认识这个俄国姑娘的，对吧？”

“对。”

“她可能告诉您，眼下弗雷迪在哪里……还是去问问她吧……”

“还有这个棕色头发的人，站在俄国姑娘身边，他是谁呀？”

他凑近照片仔细瞧。我的心跳得发慌。

“哦，对了……我也认识他……等一等……哦，对了……他是弗雷迪的朋友……他和弗雷迪、俄国姑娘，以及另外一个姑娘，他们常到这里聚会……我看，他是南美洲一带的人……”

“您不觉得他像我吗？”

“像……怎么能说不像呢？”他并无把握地说道。

这回清楚了，原来我不叫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我望了望只有边缘还映照落日余辉的荒草坪。我从未挎着一个美国人祖母的胳臂，沿着这块草坪散步。童年时，我也从未在这“迷宫”里玩耍。这副锈迹斑斑的秋千架，也根本不是为我竖立的。实在遗憾。

“您是说，他是南美洲人？”

“对……不过，他讲法语跟您我一样流利……”

“您经常看见他来这里吗？”

“多次见过。”

“您怎知道他就是南美洲人呢？”

“因为有一天，我开车去巴黎接他来这儿。他约我到他工作的地方见面……那是南美洲的一个驻巴黎大使馆……”

“哪国使馆？”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我必须适应于这种变化。我不再是列入几本旧的上流社会电话通讯簿，甚至列入同年的年鉴的那个家族后裔，而是一个踪迹更加难寻的南美人。

“我认为，他是弗雷迪的童年朋友……”

“他常同一位女子到这里来吗？”

“对，来过两三回。一位法国女子。还有那个俄国姑娘和弗雷迪，他们四个人一道来……那是在祖母死后的事了……”

他站起来。

“我们进屋去好吗？外面有些凉了……”

天色几乎黑下来，我们回到了“夏季餐厅”。

“这是弗雷迪喜欢的屋子……晚上，他和俄国姑娘、那个南美人，以及另外一个姑娘，一直呆到深夜……”

长沙发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天棚上影子斑驳，呈现出菱形和方格状。我力图捕捉我们当年夜晚聚会的回声，但是徒劳。

“他们曾在这里安了一个弹子台……那个南美人的年轻女友，特别爱打弹子……她每次准赢……我跟她打过好几盘，所以能向您讲讲这情况……对了，弹子台还一直放在那儿呢……”

他带我走进一条昏暗的走廊，打亮手电筒，我们来到一个石板地大厅，大厅有一座高大的楼梯。

“这就是正门……”

我果然发现楼梯脚下有一张球台。他用手电筒照上去，只见台子中央有一个白色球，就好像这一局暂时中断，随时会接手打下去似的，就好像盖伊·奥尔洛夫、或者我，或者弗雷迪，或者陪我前来的这个神秘的法国姑娘，或者鲍勃，已经俯身瞄准了。

“您瞧，弹子台原地未动……”

他用手电筒扫了一下高大的楼梯。

“上楼去白费劲儿……房间全上了封条……”

我心想，楼上有弗雷迪的卧室：从儿童到青

年，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一定有书架，墙上一定贴了照片，也许有一张是我们四人的合影，或者是我和弗雷迪挎着胳臂的合影，谁知道呢？鲍勃又点着了烟斗，身子靠在弹子台上。我不禁欣赏起这座高大的楼梯，现在上楼已毫无意义，因为房间全已“查封”。

我们从小角门出来，他用钥匙锁上门。户外一片漆黑。

“我得乘火车回巴黎。”我对他说。

“请跟我来。”

他握住我的胳臂，领我沿围墙走去，来到原先的马厩门前。他推开一扇玻璃门，点亮了煤油灯。

“他们早就把电掐断了……还好，他们忘了切断自来水。……”

这间屋子中央摆了一张深色木桌、几把柳条椅子，墙上挂着彩陶盘子和铜盘，窗户上方镶嵌一个野猪头标本。

“我要送您一样东西。”

他走向靠房间里端的大柜子，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只盒子，放到桌子上。盒盖上印有“南特—勒菲弗尔·于蒂尔饼干厂”的字样。然后，他站到我面前。

“您是弗雷迪的朋友，对吧？”他对我说，声音听来很激动。

“对。”

“那好，我把这送给您……”

他向我指了指盒子。

“这是弗雷迪留下的念心儿……是他们来查封时，我抢出来的一些小东西……”

他的确很激动，现在我还认为他眼里涌出泪水。

“当时我很喜欢他……从他少年时我就认识他了……他特别爱幻想，总跟我唠叨将来要买一只帆船……他对我说：‘鲍勃，到时候，你就当我的大副……’天晓得现在他在哪里……是不是还活在世上……”

“会找到他的。”我对他说。

“要知道，他被祖母宠爱坏了……”

他拿起盒子递给我。我立即想到斯蒂奥巴·德·加戈里耶夫：他也给我一个红盒子。显而易见，人的踪迹，最后都装在巧克力或饼干的旧盒子里。或者雪茄烟的旧盒子里。

“谢谢。”

“我送您上火车。”

我们走在树林的小径上，他用手电照着路，他不会走错路吧？我觉得我们正向密林行进。

“我要好好想想弗雷迪的那位朋友的姓名。就是您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的那位……那个南美人……”

我们穿过林间一块空地，只见月光皎然，照得荒草荧荧闪亮。这里有一小片意大利五针松，周围明亮如白昼，他熄了手电。

“当年，弗雷迪同另一位朋友，就是在这里跑马……那位是赛马骑师……弗雷迪从未向您提起那个骑师吗？”

“从未提过。”

“我想不起他名字来了……当年他挺有名气……给弗雷迪的祖父当过骑师，那时候老人家有一马厩赛马……”

“那个南美人也认识这个骑师吗？”

“当然认识。他们经常一道来这儿。骑师跟其他人一同打台球……我敢说，就是他把那俄国姑娘介绍给弗雷迪的……”

我担心记不住所有这些情况，真应当立即记到小本子上。

小径微微上坡，而且覆盖一层厚厚的枯叶，我走起来颇为吃力。

“怎么样，想起那个南美人的名字了吗？”

“等一等……等一等……就要想起来了……”

我把饼干盒紧紧按在髋骨上，恨不得马上看看里面装着什么。也许，我能从里面找到我的一些问题的答案。例如，我的姓名，或者那个赛马骑师的姓名。

我们走到一面斜坡的上端，下去就是火车站广场。望下去，广场空空荡荡，候车大厅里荧光灯通明。一个人骑自行车缓缓穿过广场，到站前停下。

“等一等……他名叫，名叫……彼得罗……”

我们停在斜坡的上方，他又掏出烟斗，用一个

古怪的小物件剔掉烟灰。我反复默念我生下时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在我的一段生活里，别人就这样称呼我，对一些人来说，一提起这名字，就想起了我的相貌。彼得罗。

十 二

饼干盒里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个士兵击鼓的铅像，表皮已然脱落、一根贴在白信封上的四片叶的三叶草①，还有几张照片。

其中两张照片上有我。毫无疑问，这正是站在盖伊·奥尔洛夫和吉奥尔吉亚泽老人身边的那个人。他一头棕发，高高个头儿，无疑是我，只差没留小胡子。另一张是我跟一个小伙子的合影；他的年龄身高跟我一样，但是头发色浅，大概就是弗雷迪吧？没错儿，照片背面用铅笔注明："彼得罗、弗雷迪，于拉博勒②"。是在海边上照的，我们穿着游泳衣。照片看来很旧，已有年头了。

第二张照片上有我们四人：我和弗雷迪、我一眼便认出的盖伊·奥尔洛夫，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女子，大家席地而坐，背靠着夏季餐厅的那张红丝绒面长沙发。可以看出左侧是那张球台。

第三张照片上就是在夏季餐厅里同我们合影的

① 四片叶的三叶草是吉祥物。
② 法国大西洋海岸的浴场，靠近南特港。

那个青年女子。她站在球台前，两手拿着一根弹子棒，浅色长发垂过肩头。她是否就是我带到弗雷迪宅邸来的那位姑娘？在另一张照片上，她用臂肘撑在游廊的栏杆上。

还有一张印有纽约港景色的明信片，上写“奥恩省瓦尔布勒兹，奥瓦尔·德·吕兹府邸，罗贝尔·布伦先生收”。正文写道：

亲爱的鲍勃：我从美国寄函问候，可望不久见面。 弗雷迪。

此外，还有一份奇特的文件，笺头印有：

阿根廷共和国
总领事馆
第106号

阿根廷共和国驻法国总领事馆，既负责代管占领区的希腊利益，兹确证1914年至1918年大战期间，萨洛尼卡市政府的档案材料已于战火中焚毁。

负责代管希腊利益的阿根廷共和国总领事。

1941年7月15日，于巴黎。

下面还有一行签字：

总领事R·L·奥利维拉·塞扎尔

是我吗？不对，他不叫彼得罗。

还有一小条剪报：

奥瓦尔·德·吕兹财产查封处通告：

应国有财产管理局的申请，决定于4月7日至11日，在瓦尔布勒兹镇（奥恩省）的圣拉扎尔古堡，由官方拍卖以下物品：

重要动产

新旧艺术品与陈设品

绘画——瓷器——陶器

地毯——床上用品——家庭布制品

埃拉尔牌三角钢琴

电冰箱 等等。

展出日期：4月6日（星期六）

14:00—18:00

拍卖日期：4月7日至11日

上午10:00—12:00。

我打开贴有四片叶的三叶草的信封，只见里面装着四张尺寸与“快照”相同的小相片：一张是弗雷迪，一张是我，第三张是盖伊·奥尔洛夫，第四张是浅色秀发的年轻女子。

我还发现一份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空白护照。

我随手翻过浅色秀发的青年女子照片背面，看到一行蓝墨水的字：“彼 得 罗：ANJou15-28”，字迹潦草，和寄自美国那张明信片是同一笔体。

十　三

我这从前的电话号码，还能在多少人的记事本上查到呢？也许仅仅是我下午才当班的那间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吧？

我拨了ANJou15-28号码。电话铃声阵阵，但是无人接。今天晚上，电话铃徒然地响着，在那空空如也的套房里，在那久无人居的房间，是否还残留我这过客的痕迹呢？

甚至不必给问讯处打电话，我只需小腿稍一用劲，在于特这把皮椅中转个方向就行了。我面前是一排排通讯簿和年鉴，其中一部比其余的尺幅小些，浅绿色山羊皮面。这正是我要查询的。三十年间巴黎的电话号码及其相应的用户地址，全汇编在这卷里。

我翻找页码，心怦怦直跳，终于查到了：

ANJou15-28——第八区康巴塞雷街十号乙。

然而，同年按街道汇编的电话通讯簿上，却没有刊载这个电话号码，只查到下列电话：

第八区

康巴塞雷(街)十号乙：

钻石商联谊会	MIR18-16
法希翁时装店	ANJ32-49
埃莱娜·皮勒格朗	ELY05-31
雷班德(公司)	MIR12-08
收容所	ANJ50-52
税务研究所公司	
	MIR74-31
	MIR74-32
	MIR74-33

十 四

一个名叫彼得罗的男子。电话号码ANJou15—28。第八区康巴塞雷街十号乙。

看来，他曾在一个南美国家公使馆里工作。于特留在办公桌上的座钟时针指着凌晨两点。楼下的涅尔林荫大道上车辆已然稀少，我几次听见在红灯前刹车发出的磨擦声响。

我翻看旧电话通讯簿，每卷开头列出大使馆、公使馆及其工作人员名单。

多米尼加共和国

第八区梅西纳林荫大道。电话CARnot10—18。

N…特使、全权公使。

古斯塔沃·J·恩里凯兹博士先生，一等秘书。

萨尔瓦多·E·帕拉达斯博士先生（及夫人），二等秘书，寓所第十区阿尔萨斯街41号。

比安维尼多·卡拉斯科博士先生。专员。寓所第十六区德康街45号，电话TRO 42—91。

委内瑞拉：

第十六区哥白尼街。电话PASsy72—29。

使馆办公处：第十六区拉蓬普街115号。电话PASsy 10—89

卡尔洛·阿里斯蒂穆诺·科尔博士先生，特使、全权公使。

杰姆·彼孔·菲夫雷斯先主，参赞。

安东尼奥·马图里布先生，一等秘书。

安东尼奥·布里乌诺先生，专员。

H·洛佩斯-芒戴兹上校先生，武官。

彼得罗·萨洛阿加先生，商务专员。

危地马拉：

第七区若夫尔广场12号。电话SEGur 09—59。

亚当·莫里斯克·里奥斯先生，临时代办。

伊斯梅尔·冈萨雷斯·阿雷瓦洛先生，秘书。

弗雷德里克·穆尔戈先生，随员。

厄瓜多尔：

第十七区瓦格拉姆林荫大道91号。电话ETOile17—89。

贡萨尔·扎尔敦比德（及夫人），特使，全权公使。

阿尔贝托·普伊格·阿罗斯梅纳先生（及夫人），一等秘书。

阿尔弗雷多·甘戈特纳先生（及夫人），三等秘书。

卡洛斯·古兹曼（及夫人），专员。

维克多·泽瓦洛斯（及夫人），参谋。寓所第十六区伊艾娜大街21号。

萨尔瓦多：

里凯兹·维加，特使。

J·H·维绍（及其女儿），武官。

F·卡普罗，一等秘书。

路易……

文字在眼前跳舞。我是谁呢？

十　五

您向左拐，看到这段康巴塞雷街空寂无人，准会十分诧异。一辆汽车也没有。我从一家旅馆门前经过，门厅吊灯的所有水晶玻璃光彩夺目，令我眼花缭乱。阳光灿烂。

10号乙是一幢狭窄的五层楼房。二楼窗户高大。对面人行道上有一名值勤警察。

楼门只开了半扇，楼道的定时灯亮着。门厅狭长，墙壁呈灰色。里端有一扇小格玻璃门，安有自动关门装置，我相当费力才打开。楼梯上没有铺地毯。

我在二楼的门前停下，决定问问每楼的住户，在一段时间里，哪家电话曾用过ANJou15—28的号码；但我明白这种行为未免古怪，难以启齿。这扇房门上镶了块铜牌，上面刻着："埃莱娜·皮尔格拉姆"。

门铃用得过久，尖细的声音断断续续传出来。我用食指按了好长时间。门终于开了一条缝，探出一张女子的脸，她的短发已经花白。

“太太……想打听点事儿……”

她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三十岁，还是五十岁？

“请问，您的电话号码，从前是不是ANJou15—28？”

她皱起眉头。

“是啊。您打听这个干什么？”

她把门完全打开了，只见她身穿一件男式黑缎便袍。

“您为什么问起这个呢？”

“因为……我在这里住过……”

她走近前，在楼道里一个劲儿打量我，忽然睁大了眼睛。

“哎呀……您不就是……麦克沃伊先生吗？”

“对。”我顺口答道。

“请进吧。”

看来她的确很激动。我们走到门厅中央，面对面站着。地板已经磨损，有些板条换上了铺地漆布。

“您的样子变化不大。”她笑呵呵地对我说。

“您也没怎么变。”

“您还记得我吗？”

“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答道。

“谢谢……”

她的目光温柔，久久停留在我身上。

“请过来……”

她领我走进一个房间，只见屋子宽敞，天棚很高，窗户正是我在街上注意到的。地板也像门厅一样损坏了，有几处补了白羊毛毡子。秋天的太阳透过玻璃窗，映得屋里一片琥珀色。

“请坐……”

她给我指了指靠墙的长椅。椅子上有丝绒座垫，她坐到我的左首。

“这样……猛丁一见您，还怪有意思的。”

“我正好路过这条街。”我说道。

我觉得比起刚才我在门口看到的，她此刻显得年轻些：唇边、眼角和额头上，没有一丝皱纹，面颊滑润，与花白的头发很不相称。

“给我的印象，您好像染了发。”我贸然问道。

“哪里……我二十五岁时头发就白了……我还是愿意保留这种颜色……”

除了这张铺了丝绒座垫的长椅，房间里就没有什么家具了。对面墙还摆了一张长方形桌子。两扇窗户中间有一个旧人体模型，它的上身披了一块肮脏的本色布料，立在那里极不协调，就好像这里是服装加工车间。况且我还发现，屋角台子上安了一台缝纫机。

“您还认得这套房间吧？”她问道。“您瞧……这些东西，我全保留着……”

她抬起胳臂，指了指时装模特儿。

“全是戴尼丝留下来的……”

戴尼丝？

"的确，"我说道，"房间里变化不大……"

"戴尼丝呢？"她急切地问我，"她的情况怎么样？"

"唔，她呀，"我答道，"我也很久没有见到她了……"

"啊哈……"

她流露出失望的神色，摇了摇头，就好像她明白不便再提这个"戴尼丝"。要知趣。

"真的，"我问她，"您很早以前就认识了戴尼丝吧？……"

"对……是莱翁介绍我认识她的……"

"莱翁？"

"莱翁·冯·阿伦。"

"唔，那当然了。"我立刻说道，觉出她的口气有几分责备的意味，因为一听她提起"莱翁"这个名字，我没有当即想到这个"莱翁·冯·阿伦"。

"莱翁·冯·阿伦，现在他怎么样啦？"我问道。

"哦……我也有两三年没有得到他的音信了……他去荷属圭亚那，到了帕拉马里博城……在那里办了一所舞蹈学校……"

"舞蹈学校？"

"对。莱翁到服装厂干活之前，是从事舞蹈工作的……您不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一时忘了。"

她朝后一仰，背靠墙上，紧了紧便袍的腰带。

"那么您呢，情况怎么样？"

"哦，我吗？……没什么好讲的……"

"您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公使馆工作了吧？"

"不在那儿了。"

"当初您还劝我弄一份多米尼加护照，您还记得吧？您说生活中要多加防范，总得弄几国护照……"

想起这段往事，她很开心，不禁笑了一下。

"您最后一次……得到戴尼丝的音信，那是什么时候？"我又问道。

"是您同她去默热沃①那时候，她从那里给我寄来一封短简。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她用目光询问我，显然不敢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问题。这个戴尼丝是何许人呢？她在我的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吗？

"您想想看，"我对她说，"有些时候，我就觉得眼前一片迷雾……记忆出现了许多空洞……忧伤的时期……因此，我经过这条街时，就冒昧地……上楼来……想寻回……寻回……"

我徒然思索，却找不出准确的字眼；不过这无关紧要，反正她微笑起来，表明她对我这行动并不感到奇怪。

"您的意思是：寻回美好的时光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美好时光……"

---

① 法国上萨瓦省山区一个城镇，是冬季体育运动胜地。

她从长椅一头的矮桌上拿起一只镀金的盒子，把它打开，里面装满了香烟。

“谢谢，不吸烟。”我对她说。

“您不吸烟啦？这是英国香烟。我记得您爱吸英国烟……从前，您、我和戴尼丝三个人，每次在这里聚会，您总要给我带来满满一袋子英国烟……”

“啊，对，那倒是……”

“您在多米尼加公使馆，还不是要多少就能弄多少……”

我的手伸向镀金的烟盒，用拇指和食指夹起一支香烟，怀着几分恐惧放到嘴边。她先点着自己的香烟，然后把打火机递给我。我拨了好几次，才打着火，吸了一口烟，喉咙立刻奇痒，不禁咳嗽起来。

“我已经没这个习惯了。”我对她说。

我无法处置这支烟，只好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任其燃掉。

“这么说，”我又问道，“这套房间，现在您住啦？”

“对。戴尼丝断了音信之后，我就又搬回来住了……况且，她动身之前对我说过，我可以收回这套房间……”

“她动身之前？”

“是啊……在你们去默热沃之前……”

她耸了耸肩膀，就好像对我来说，这事儿再明显不过。

“在我的印象里，这套房间我没有住多久……”

“您和戴尼丝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那么您呢，在我们之前，您就住在这儿吗？”

她愕然地凝视我。

“嗳，当然啦……本来就是我的住房……我要离开巴黎，才把房间借给了戴尼丝……”

“请原谅……我一时走神儿了。”

“对戴尼丝来说，这里比较适用……有地方，可以安放缝纫机……”

是个裁缝女工？

“我还在想，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这套房间呢？”我对她说。

“我也想……”

她又向我投来探询的目光。然而，我如何向她解释呢？我还不如她，这些事情已经遗忘殆尽。烟蒂烧到手指，我终于把它扔在烟灰缸里。

“我们搬这儿来住之前，曾经见过面吗？”我试探着问道。

“见过面，有两三回，是在您的旅馆里……”

“哪家旅馆？”

“康蓬街，卡斯蒂利亚旅馆。您和戴尼丝住的那个绿房间，还记得吧？”

“记得。”

“您认为卡斯蒂利亚旅馆不够安全，就离开了……不是这个缘故吗？”

“是啊。”

"那个时期的确很怪……"

"哪个时期？"

她没有回答，又点燃了一支烟。

"我想让您看几张照片。"我对她说。

我从上衣里兜掏出那个装着全部照片、不再离身的信封，先给她看在"夏季餐厅"拍摄的一张，就是我和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盖伊·奥尔洛夫、那个陌生青年女子的合影。

"您能认出我吗？"

她转过身，对着阳光看照片。

"这是您和戴尼丝，另外两个人，我可不认识……"

这么说，她就是戴尼丝。

"您不认识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吗？"

"不认识。"

"也不认识盖伊·奥尔洛夫？"

自不待言，人们的生活相互隔离，他们的朋友相互之间也不认识。实在遗憾。

"我还有两张她的照片。"

我递给她那张证件小照和靠在游廊栏杆上拍的那张。

"我见过这张照片，"她对我说。"我甚至还记得，她从默热沃给我寄过一张……可是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

我从她手里拿回照片，又仔细地端详。默热沃。戴尼丝身后有一扇木制小百叶窗。对，看这百叶窗

和栏杆，很可能就是山上那座小木屋。

“动身去默热沃，这毕竟是个怪点子，”我猛然说道。“戴尼丝跟您谈过她的想法吗？”

她还仔细端详那张证件小照。我心怦怦直跳，等待她乐于回答。

她重又抬起头。

“是的……她向我谈起过……她跟我说，默热沃那地方安全……您总会设法越过边境的……”

“是啊……那当然……”

我不敢深谈下去。为什么一接触到萦绕我心头的问题，我就畏葸不前了呢？我从她眼神看出，她也一样，很想让我作出解释。我们二人都默默无言。终于，她忍不住了：

“在默热沃，究竟出了什么事？”

她问得如此急切，以致我头一回感到气馁，不止气馁，干脆绝望，这种心情，正是一个人竭尽努力，发挥才干，百折不回，仍碰到无法克服的障碍时所体会到的。

“改天……我再向您解释吧……”

我的声调或者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有点失去常态，否则她不会抓住我的胳臂，仿佛要安慰我似的说道：

“请原谅，我不该冒冒失失，问您这种事儿……不过……我总归是戴尼丝的朋友……”

“我理解……”

她已经站起身。

"请稍等……"

她离开房间。我注视阳光在我脚下白羊毛地毯上形成的光斑，继而又瞧地板木条、长方桌，以及属于"戴尼丝"的旧模特儿。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难道最终还会认不出来吗？

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点东西。是两本书、一个记事本。

"这是戴尼丝走时落下的，喏……都交给您吧……"

我颇感意外，她没有像斯蒂奥巴·德·加戈里耶夫，或者弗雷迪祖母的从前花匠那样，把这些纪念物装进盒子里。总之，在我寻觅的过程中，这还是头一回有人不是给我盒子。想到这点，我笑起来。

"有什么事儿，您这么开心？"

"没什么。"

我观赏书的封面。其中一个封面上，有一张蓄小胡子、戴瓜皮帽的中国人的脸，背景则是一片蓝色的薄雾，书名叫《陈查理》。另一本书黄色封皮，下方画了一个插支鹅毛笔的假面具，书名为《匿名信》。

"戴尼丝竟然看这种侦探小说！……"她对我说。"还有这个……"

她递给我一本鳄鱼皮封面的记事本。

"谢谢。"

我翻看记事本。里面什么也没有写，没记一个

名字，也没记一次约会。只有日期月份，却没有年份。最后，我发现里面夹了一张纸，打开一看，只见上面抄录：

法兰西共和国

塞纳省政府

巴黎第十三区出生证原件摘抄

1917年

1917年12月21日15时，戴尼丝·伊韦特·库德勒兹，女性，生于奥斯特利茨码头大街9号乙，父保罗·库德勒兹，母亨利爱特·博加埃尔，均无职业，住址同上。

1939年4月3日在巴黎第十七区，同吉米·彼得罗·斯特恩结婚。

原件摘抄

1939年6月16日，巴黎。

“您看到这个了吗？”我问道。

她惊奇地朝这张出生证摘抄件瞥了一眼。

“您认识她丈夫吗？那个……吉米·彼得罗·斯特恩？

“戴尼丝从未跟我说过她结了婚……您呢，您知道吧？”

“不知道。”

我把记事本、出生证摘抄件，以及装有照片的

信封，全塞进上衣里兜里。不知为什么我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一旦有可能，我就把所有这些宝物缝进上衣夹层里。

“谢谢您给了我这些纪念物。”

“不客气，麦克沃伊先生。”

听她又称呼我的姓氏，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她第一次称呼时，我没有听清楚。我很想当即把这姓名记下来，但又不知道如何拼音。

“我爱听您叫我名字的声调，”我对她说。“难得一个法国人……不过，您是怎么写的呢？一下笔往往出现拼写错误……”

我是一种调皮的口气。她微笑起来。

“M……C……大写的 E，V……O……y……”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下来。

“是连在一起吗？您有把握吗？”

“完全有把握。”她答道，就好像她识破了我设的圈套。

这么说，就是麦克沃伊了。

“真棒。”我对她说。

“我从来不犯拼写错误。”

“彼得罗·麦克沃伊……反正我的名字挺怪，您不觉得吗？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大习惯……”

“给您……我差点儿忘了……”她又说。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

“这是戴尼丝给我寄来的最后一封短信……”

我打开信，念道：

亲爱的埃莱娜：

事情决定下来，明天我们和彼得罗一道穿越边境。到了那里，我尽快给你写信。

我给你一个人在巴黎的电话号码，眼下我们可以通过他联系：

奥列格·德·弗雷德AUTeuI54—73。

拥抱你

戴尼丝

2月14日，于默热沃。

“那您打过电话吗”

“打过，可是每次，接电话的人都对我说，那位先生不在。”

“这个……弗雷德，是什么人？”

“不知道。戴尼丝从未向我提起过……”

阳光渐渐从房间移走。她打开长椅旁边矮桌上的小灯。

“如能重睹我从前住过的房间，我会非常高兴的。”我对她说。

“当然可以……”

我们沿过道走去，她打开右首的一扇门。

“就这儿，”她对我说。“这间屋我不用了……我现在睡在客房里……您知道……就是朝院子的那间屋……”

我停在门口。天色还很亮。窗户两侧悬挂着酒

糟色窗帘，墙上糊了浅蓝色绘花壁纸。

"您认出来了吧？"她问我。

"认出来了。"

靠里侧墙放着一张床绷，我走过去，坐到床沿上。

"我能单独在这儿呆几分钟吗？"

"当然可以。"

"这样，我可以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她忧伤地瞥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我去烧点茶……"

这间屋的地板也损坏了，有几处缺了板条，但漏洞没有堵塞。窗户对面墙有一个白色大理石壁炉，壁炉上方悬挂一面镜子，镀金镜框四角各镶嵌一个贝壳。我横躺到床绷上，凝望天花板，继而目光移向壁纸的图案。我的前额几乎贴到墙上，好看清壁纸的细花纹。绘的是田园风光。戴假发荡秋千的少女。身穿灯笼裤、手弹曼陀铃的牧童。树林月色。这些图景唤不起我任何回忆；按说我曾睡在这张床上，应该熟悉这些图案啊。我搜寻天棚、墙壁和门旁，想找到点印痕踪迹，但又说不清是什么。可是，没有一样东西引起我的注意。

我站起身，走到窗口，向下望去。

街道已无行人，天色比我进楼时黑多了。那名警察仍在对面人行道上值勤。我探出头去，就能望见左侧的广场，那里也有值勤警察，同样没有行人。夜幕降临，仿佛这些楼房的窗户吸足了暝色，一扇

扇黑洞洞的，显然无人居住。

这时，我好像咔的一声开了窍。这房间的景象引起我不安的感觉，是我已经体验过的一种恐惧之感。这一幢幢楼房的正面、这空荡荡的街道、这些在暮色中值勤警察的身影，令我心烦意乱，就好像我听到一首原先熟悉的歌曲，或者闻见一种原先熟悉的香味时，所产生的感觉。我确信从前，也是在这一时刻，我常常站在这里窥视，一动也不动，连灯也不敢打开。

我回到客厅时，以为没有人了，原来她躺在丝绒垫子的长椅上睡着了。我蹑手蹑脚走过去，坐到长椅的另一头。一个装着茶壶和两只杯子的茶盘，放在白色羊毛地毯中间。我轻轻咳嗽两声。她没有醒。于是，我往两只杯里斟上茶。茶水已然凉了。

由于灯在长椅的一头，屋里很大一部分光线昏暗，几乎看不清“戴尼丝”丢在这儿的桌子、模特儿和缝纫机。当初在这间屋里，我们是如何度过夜晚的呢？怎么才能了解清楚呢？

我小口品茶，倾听她的气息，那呼吸的声息细微难辨，不过房间极静，哪怕有一点声响，多轻微的私语，听来也真切得令人惴惴不安。何必唤醒她呢？她不能告诉我重要情况了。我将茶杯放到地毯上。

我离开房间，走进过道时，地板咯咯响起来。

我摸索着开了门，又打开楼道里的定时灯，然后尽量放轻动作把门关上。我刚一推开通门厅的小格玻璃门，便又像站在窗口向外张望时那样，心中顿有所悟。门厅的球形吊灯光线雪亮，我渐渐适应了强烈的灯光，伫立在那里，观察灰色墙壁和晶莹反光的小格玻璃。

一种感觉穿过我的躯体，如同人醒来要追寻整个梦境而力图捕捉的转瞬即逝的片断。我幻见自己走在巴黎黑暗的街道上，推开康巴塞雷街这幢楼房的楼门，眼睛突然被晃花，在几秒钟内什么也看不见，因为门厅雪亮的灯光同外面的黑夜，明暗对比过分强烈。

这情景要追溯到什么时期呢？追溯到我名叫彼得罗·麦克沃伊、每天晚上返回这里的那个时期吗？我能认出这楼门、这大块长方形擦鞋垫、这灰色墙壁，以及套有铜环的球状吊灯吗？我透过小格玻璃门，看见楼梯脚，真想慢步上楼，重复过去做过的动作，再踏上我以往的足迹。

我相信在这些楼房的入口处，仍能听到曾经出入这里、而后消失之人的足音。他们走过之后，还有物品继续震动，声波越来越微弱，不过只要留心，还能捕捉到。也许，我根本就不是那个彼得罗·麦克沃伊，也许我什么也不是，仅仅时弱时强的声波透过我的躯体，飘浮空间，渐渐凝聚，这便是我。

十　六

康蓬街，卡斯蒂利亚旅馆。接待室对面有个小客厅。玻璃书橱里陈列着L·德·维埃尔-卡斯泰尔撰写的《法国复辟王朝历史》。一天晚上，我上楼回房间之前，也许拿了一卷去看，用一封信、一张照片或一份电报当书签，忘记抽出就还回去了。不过，我不敢请管理员允许我把这十七卷全翻一遍，好找回我本人的这个遗迹。

旅馆有个幽深小院，围着爬满常春藤的栅栏，地面用赭色方石铺成，颜色就像网球场的沙地。庭院还摆了几张桌椅。

看来，我和那个戴尼丝·库德勒兹曾在这里生活过。我们的房间是朝康蓬街，还是朝庭院呢？

十 七

奥斯特利茨码头大街19号。这幢楼房有四层，楼门敞开，通一条黄墙走廊。有一间咖啡厅，牌子上写着“海员之家”。玻璃门里面挂着一块牌子，只见上写一行鲜红的字：“MEN SPREEKT VL-AAMCH”。

十来个人挤在柜台的前面。我在一张空桌旁坐下，只见里侧墙上挂着一个港口的大幅照片，下面书写：安特卫普。

柜台前的顾客在高声讲话。大概他们全在这一带工作，傍晚来喝点开胃酒。他们都穿着羊皮里上衣、半短皮外套或者工作服。而独独有一个身穿一套海军蓝西装、打着领带的男子，却显得很突出，他站在靠近门口的电动弹子台前，一只手灵活地拉动弹簧竿，沉稳地玩着。

顾客有的抽香烟，有的吸烟斗，烟雾弥漫，呛得我睁不开眼，连声咳嗽。空气中还飘散着猪油味。

“您要点什么？”

我没有看见有人走近我。我甚至想这张餐桌靠里端，无人发现我，谁也不会来问我要吃什么。

“一小杯浓咖啡。”

此人个头矮小，六旬上下，满头白发，面颊通红，大概多贪了几杯开胃酒。红脸膛把他一双浅蓝色眼睛衬得彩色更淡了。这白、蓝、红三色搭配，好似陶器彩釉的色调，十分悦目。

“请问……”在他要返回柜台时，我问他，“门上那行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MEN SPREEKT VLAAMSCH？”

他声音宏亮地讲出这句话。

“是吗？”

“此处讲佛兰德语。”

说罢，他丢下我，步履蹒跚地走向柜台，用胳膊肘粗暴地推开挡路的顾客。

他伸着手臂，双手捧着一杯咖啡送来，就好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杯子才没有失落。

“来喽。”

他将杯子放在餐桌中间，累得气喘吁吁，就像刚跑到终点的马拉松运动员。

“先生……库德勒兹……您还有什么印象吗？”我突兀地问了一句。

他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叉起胳臂。

他一直气喘吁吁。

“问这干吗？您认识……库德勒兹吗？”

“不认识，不过，我听家里人讲过。”

他的脸变成暗红色，鼻头沁出汗珠。

“库德勒兹……从前他就住在楼上，在三楼……”

他讲话略带乡音。我喝了一口咖啡，决意让他说下去，怕再问一句会把他吓跑。

“他在奥斯特利茨码头工作……他老婆和我一样，也是安特卫普人……”

“他有个女儿，对吧？”

他微笑起来。

“对，是个漂亮的姑娘……您认识吗？”

“不认识，但是听人说过……”

“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也正想了解她的情况。”

“从前，每天早晨，她来这里给她爸爸买香烟，库德勒兹爱抽劳伦斯牌烟，是比利时产品……”

他沉浸在这段回忆中，我觉得他跟我一样，再也听不见身边的谈笑声，以及电动弹子的嗒嗒响。

“库德勒兹，是个爽快的人……当年，我常上楼，跟他们一起吃晚饭……还跟他老婆讲佛兰德话……”

“您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吗？

“他去世了……他老婆回安特卫普老家……”

他一巴掌扫过桌面。

“这要追溯到蒙昧时代，这一切……”

“您说她常来给她父亲买烟……已经忘了，是什么牌子的？”

"劳伦斯牌。"

但愿我能记住这个牌子。

"那小姑娘真逗……刚十岁，她就能跟我的顾客打台球……"

他指给我看咖啡厅里侧的一扇门，无疑是通向台球室的。看来，她是在这里学会打台球的。

"等一下，"他对我说，"我要给您看样东西……"

他费力地起身，走向柜台，又用胳臂扒拉开挡路的人。现在，大多数顾客戴着船员的鸭舌帽，讲一种奇特的语言，大概是佛兰德语。我猜想，这是下边奥斯特利茨码头上，停泊着来自比利时的驳船的缘故。

"喏……请看……"

他坐到我对面，递给我一本旧的时装画报。封皮上有一位少女：栗色头发，浅蓝色眼睛，脸型有一种难以描摹的亚洲人特点。我一眼便认出来，正是戴尼丝。她穿一件黑色无袖短上衣，手里拿着一束兰花。

"这就是戴尼丝，库德勃兹的女儿……瞧见了吧……这姑娘多漂亮……她当过模特儿……她还是小丫头那时，我就认识了……"

画报封皮贴了透明胶条，已有污痕。

"我嘛，每当她来买劳伦斯牌烟时，我总能见到她……"

"她没有当过……裁缝吗？

"没有，我想没有。"

"您真的不了解她后来的情况吗？"

"不了解。"

"您没有她母亲在安特卫普的地址吗？

他摇了摇头，一副伤心的样子。

"老兄啊，所有这一切，全结束了……"

为什么呢？

"您不愿意把这画报借给我看看吗？"我问他。

"可以，老兄，但您要保证还给我。"

"保证还您。"

"我很珍惜，把它看成家里的一个念心儿。"

"那时候，她几点钟来买烟？"

"总是8点差一刻，去上学之前。"

"哪所学校？"

"在杰奈街。有时候，我还同她父亲一起送她上学。"

我伸过手去，一把抓住画报，迅速拉过来，心头怦怦直跳。他确实可能突然变卦，不肯借出去了。

"谢谢，明天就还给您。"

"千万还回来，嗯？"

他满脸狐疑地看着我。

"真的，为什么您对这感兴趣呢？您是她的本家吗？"

"对。"

我不由自主地观赏画报的封皮。这上面的戴尼丝，比我那几张照片上的显得年轻。她戴着耳环，半截脖颈被高出她手中兰花的几根蕨枝遮住。背景是一尊木雕天使像。封皮下方，即在照片的左下角，黑色无袖外衣上，有一行醒目的红色小字："若望-米歇尔·芒苏尔拍摄"。

"您不要喝点什么吗？"他又问我。

"不了，谢谢。"

"那好，咖啡算我请客。"

"承蒙招待，不胜感谢。"

我拿着画报站起身。柜台前的顾客越聚越多，他在前边为我开路，并用佛兰德语对他们讲了一句什么。我们挤了半天才到门口。他打开玻璃门，擦了擦鼻子。

"您不会忘记还给我吧，嗯？"他指着画报对我说。

他关上玻璃门，跟我走上人行道。

"您瞧……原先他们就住在楼上……三层……"

各家窗户上了灯，我还望见一个房间里端摆着一个深色木衣柜。

"现在是别的房客……"

"您跟他们吃晚饭，是在哪个房间？"

"那间……靠左面……"

他指给我看那间房的窗户。

"戴尼丝的房间呢？"

"她那屋朝另一面……对着院子……"

他站在我身边，若有所思。我决定告辞，伸过手去。

“再见。我会把画报送还给您的。”

“再见。”

他回到咖啡厅，那张大红脸还贴在玻璃上凝望我。烟斗和香烟冒的烟聚成黄雾，笼罩住柜台前的顾客，他那张大红脸也渐渐模糊，因为他的呼吸在玻璃上化为水汽。

夜幕降临。如果戴尼丝留下晚自习，现在该放学了。她走哪条路呢？是从左边，还是从右边来呢？我忘记向咖啡厅老板打听了。那个时期，街上车少，奥斯特利茨码头大街上面，有梧桐树枝叶交织的拱顶。不远处的码头，特别像西南部城市的码头。再往前便是植物园了，那边的酒市场的黑影和沉寂，给这个街区平添了宁静的气氛。

我走进楼门，打开定时楼道灯，只见过道旧石板地呈黑灰两色菱形图案，有一个铁丝网的擦鞋垫，黄色墙上挂着信箱。空气中又是这股猪油味。

我心想，我要是闭上眼睛，要是用手指按住额门儿，凝神静气，也许能远远听见她那双便鞋踏楼的嗒嗒声响。

十八

我倒认为我和戴尼丝，是在一家旅馆的酒吧间邂逅相遇的。当时，我同照片上看到的那个男子，即我的童年朋友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以及盖伊·奥尔洛夫在一起。他们从美国回来，只好暂住旅馆。盖伊·奥尔洛夫告诉我说，她在等一位女友，是她刚结识的一位姑娘。

她朝我们走来，那容貌立刻使我倾倒。她虽有一头金发，但脸型却有亚洲人特点：眼睛色彩很淡，有蒙古皱褶，颧骨很高，头发剪得很短，戴一顶奇特的小帽，如同蒂罗尔人[1]帽子的式样。

弗雷迪和盖伊·奥尔洛夫让我们稍等片刻，就上楼回客房去了。我们面对面坐着，她粲然一笑。

我们相对无语。她那淡色的眼睛里，不时闪现绿莹莹的光。

① 奥地利西部地区的居民。

十 九

芒苏尔。若望-米歇尔。第十八区加布里埃尔街1号。电话：CLI 72—01。

二 十

"实在抱歉，"等我按照他在电话里的提议，于晚上6时到白广场一家咖啡馆去见他，在他的餐桌落座时，他对我说道，"实在抱歉，我总是在外面约人相见……尤其是初次见面……现在，我们可以去寒舍了……"

他在电话里向我说明，他身穿一套墨绿色丝绒衣服，满头白发，理成平头，因此，我不难认出他来。他的平头理得如此齐整，显得十分突出，而他的黑睫毛却很长，不时地忽闪，眼睛则宛似巴旦杏仁，嘴型又具女性特点：上唇呈弧形，下唇绷紧而显专横。

他站起身时，看上去是中等个儿。他穿上风雨衣，我们便走出咖啡馆。

我们走上克利希大街的垒道时，他指着红磨坊①旁边一幢房子，对我说道：

"要是在从前，我就会约您在格拉夫酒家会面

① 巴黎的一个游乐场。

了……就在那儿……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们横过林荫大道，走上库斯图街。他往左首人行道的海蓝色酒吧间溜了一眼，赶紧加快脚步，我们走到大车库时，他几乎奔跑起来，直到勒皮克街口，他才站住。

“请原谅，”他气喘吁吁地对我说，“这条街总引起我怪诞的回忆……请原谅……”

刚才他的确怕得要命，我甚至觉得他浑身发抖。

“现在要好多了……到了这里，整个感觉就要好多了……”

他微笑着眺望前边勒皮克街的上坡路，街道两旁排着市场的货架，食品店灯火通明。

我们走进女修道院院长街，他的脚步平稳而放松了。我真想问问库斯图街引起他什么怪诞的回忆，但又不敢贸然开口，深恐又引起他那种令我惊诧的烦乱不安。还未到达女修道院院长街广场，他忽然又加快了脚步。我走在他右边。我们穿过日耳曼—庇隆街的当儿，我看见他目光惊恐，朝这条小街瞥了一眼；这条路很陡，一直冲到林荫大道，街道很窄，两旁是低矮昏暗的房屋。他紧紧搂住我的胳臂，就好像极力避免观望这条街。我拉他到对面人行道上。

“谢谢……要知道……真是太奇怪了……”

他本欲吐露真情，却又游移不定。

“每次穿过日耳曼—庇隆路口……我总想……

总想顺坡下去……身不由己……”

“那您为何不顺坡下去呢？”

“因为……日耳曼—庇隆那条街……从前有……有一个地点……”

他戛然住口。

“哦……”他似笑非笑地又对我说。“我这样也未免太愚蠢……蒙马特尔已经面目全非了……说来话长……您不了解蒙马特尔从前的样子……”

他又了解什么呢？

他住在加布里埃尔街，那幢楼房紧挨着圣心大教堂的花园。我们从便梯上楼。他好半天才打开门：一共三道锁，用不同的钥匙，他开锁时既缓慢又细心，真像开保险柜那样复杂。

他这套房间很小，只有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恐怕是一大间隔开的。卧室和客厅中间，隔了一道由银线绳拉起的粉红色缎幔。客厅墙壁糊了天蓝色绸壁纸，唯一的窗户也挂着同样颜色的窗帘。几张黑漆独脚小圆桌上，摆着象牙和玉石雕品；几把圆椅蒙了浅绿色布套，长沙发的拉幅绿罩色彩还要浅。整个陈设还算典雅，由镀金的枝形壁灯照明。

“请坐。”他对我说。

我坐到拉幅绿罩的长沙发上，他挨着我坐下。

“喂……给我看看吧……”

我从上衣兜里掏出那本时装画报，指给他看有戴尼丝像的封面。他接过画报，戴上玳瑁宽边眼镜。

"是的……是的……若望-米歇尔·芒苏尔拍摄……正是我……毫无疑问……"

"您还记得这个姑娘吗？"

"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很少给这家画报摄影……这家时装画报社挺小……要知道，我主要为《时髦》杂志社工作……"

他想表明关系疏远。

"关于这张照片，您还能对我讲点具体情况吗？"

他饶有兴味地打量我。在壁灯光下，我看见他脸上有细纹和雀斑。

"好吧，亲爱的朋友，我这就向您谈谈……"

他手里拿着画报，站起身来，用钥匙打开一道门。这扇门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它和墙壁一样，也糊了天蓝色的绸壁纸。门里是个贮藏室，他走进去。我听见他拉金属抽屉的一连串声音。几分钟之后，他从贮藏室里出来，又细心地将门关上。

"好啦，"他对我说，"我这些底片全附上小卡片。从一开始，我就全保存下来……是按年代和字母顺序排列的……"

他重又坐到我身边，开始查卡片。

"戴尼丝……库德勒兹……是这个名字吗？"

"对。"

"后来她再也没有要我给拍照……现在，我想起那个姑娘了……她请霍伊尼根-胡恩拍了许多照片……"

"谁？"

"霍伊尼根-胡恩，是个德国摄影师……对……确有此事……她同霍伊尼根-胡恩合作频繁……"

芒苏尔说到这个名字，声调总那么凄切哀怨，我立时感到像初次见面那样，戴尼丝浅色的眼睛又盯住我。

"我有她当年的地址，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我感兴趣。"我急忙回答。

"巴黎，第十七区，罗马街，97号，罗马街……"

他猛然抬头看我，只见他双目圆睁，脸色惨白得可怕。

"罗马街，97号……"

"咦……怎么啦？"我问他。

"现在，我完全想起了这姑娘……我有个朋友，当时也住在那幢楼……"

他疑虑重重地凝视我，又像经过库斯图街和日耳曼—庇隆街坡顶那样，显得心神不安。

"奇怪的巧合……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到罗马街她的住所找她，为她拍照，并趁机去瞧瞧我那位朋友……他就住在她上一层……"

"您到她家去啦？"

"去了。不过，照片是在我那个朋友的套房里拍摄的……他一直陪着我们……"

"哪位朋友？"

他那脸色越来越苍白。他是害怕。

"我……这就向您解释……不过，我还是想先

喝点什么……提提神儿……"

他站起身，走向一张小活动餐桌，把它推到长沙发前面。上边一层放着几只小的长颈大肚玻璃瓶，水晶玻璃瓶盖用链子系着小银牌，就像纳粹军乐队队员脖子上挂的那玩意儿。银牌上刻着酒名。

"我这只有甜烧酒……您喝没事儿吧？"

"没事儿。"

"我喝点玛丽·布里扎尔① ……您呢？"

"我也来点儿。"

他拿起玛丽·布里扎尔牌酒，斟满两只细酒杯。我一尝到这种甜烧酒，就感到它同房中绸缎、象牙雕刻制品和有点刺眼的镀金化为一体。这酒正是这套房间的精髓。

"住在罗马街的那位朋友……被人杀害了……"

他十分犹豫地讲出最后这个词，显然是为了我才咬牙讲出来，否则他决无勇气使用如此明确的词。

"他是埃及籍的希腊人……他写过诗，还出了两本书……

"您认为戴尼丝·库德勒兹认识他吗？"

"唔……她在楼梯上会遇见过他。"他颇为不悦地说道，无疑认为这个细节不值一提。

"那……案件是在那幢楼里发生的啦？"

"对。"

---

① 用茴香酿的甜烧酒。

“当时，戴尼丝·库德勒兹就住那幢楼里吗？”

他甚至没有听见我这句问话。

“是在夜间发生的……他让一个人进了他的套房……不管什么人，他都带进自己房间……”

“凶手抓到了吗？”

他耸了耸肩膀。

“这样的凶手，向来抓不到……我就知道他早晚得出事儿……他晚上招到家去的一些小青年，您要是瞧见那一副副嘴脸……就是大白天看见，我也会害怕的……”

他微笑起来，样子很怪，显得又激动又恐惧。

“您那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叫阿莱克·斯库菲。是个在亚历山大港的希腊人。”

他忽地站起身，撩开天蓝色丝绸窗帘看了看，然后回到长沙发，重又在我身边坐下。

“请原谅……有时候，我就觉得窗帘后边藏着人……再来点玛丽·布里扎尔吧？对，再来一点点玛丽·布里扎尔……”

他竭力拿出快活的声调，可又拉紧我的胳膊，就好像他要证实一下我的确在他身边。

“斯库菲到法国来定居……我是在蒙马特尔认识他的……他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名叫《抛锚的船》……”

“可是，先生，”我口气坚决，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好让他这次垂顾我的问题，“既然像您说

的，戴尼丝·库德勒兹就住在他楼下，那么出事儿那天夜里，她一定听到了异常的动静……恐怕要传她作证……”

“也许吧。”

他耸了耸肩膀。显而易见，我极为关切这个戴尼丝·库德勒兹，渴望了解每一件小事，可是他却根本不感兴趣。

“最为可怕的是，我认识凶手……他慈眉善目，一副天使般面孔，给人以好感……不过，他的目光很凶……一双灰色眼睛……”

他打了个寒战，就好像他所说的凶手就在这里，就在我们面前，用灰色的眼睛看穿他似的……

“那是个卑鄙的小无赖……我最后一次碰见他时，是在占领时期，在康蓬街一家地下室餐馆里……他同一个德国人在一起……”

他回忆到此处，讲话的声音都发颤了。尽管我还一心想着戴尼丝·库德勒兹，可是这尖厉的声音、这恼怒的哀怨，使我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同时令我感到此事一目了然：其实，他是嫉妒他朋友的命运，怪那灰眼睛的人没有把他杀害。

“那凶手还活着……一直住在巴黎……我是听人讲的……当然，他不再是那副天使模样了……您想听听他的声音吗？”

他提出这令人吃惊的问题，未等我回答，就已经从我们旁边的红皮圆凳上操起电话，拨了号码，并将听筒递给我。

“您就要听见他的声音……注意……他自称‘蓝色骑士’……”

起初，我只听见一阵阵短促的铃声，表明占线。继而，在铃声的间停中，我听见男女相呼的声音：“莫里斯和若茜要勒内回电话……”，“吕西安在国民公会街等候让诺……”，“杜巴里夫要找个舞伴……”，“阿勒西比亚德今天晚上独自一人……”

接着，又开始对话，尽管铃声阵阵，一些声音还在相呼。这些只有声音不露面的人，力图进行接触，交换一个电话号码或一句暗语。最后，我还听见一个更加遥远的声音反复地说：

“‘蓝色骑士’今晚有空……‘蓝色骑士’今晚有……请告诉电话号码……请告诉电话号码……”

“怎么样，”芒苏尔问道，“您听见了吧？听见了吧？”

他耳朵贴着话筒，脸凑近我的脸。

“我刚才拨的这个电话号码，早就不给用户使用了，”他又向我解释。“于是，他们就发现能以这种方式进行联系。”

他住了口，好听请“蓝色骑士”的声音；我心中暗想，这些是墓穴发出来的声音，是久已消失的人的声音，是飘浮游荡的声音，它们只能通过一个报废了的电话号码呼唤应答。

“真可怕……真可怕……”他一再重复，又把听筒紧按在耳朵上。“这个杀人凶手……您听见了吗？……”

他啪的挂断电话。他已经汗流满面。

“我来给您看一张我那朋友的照片，他就是被这个小无赖杀害的……我还要尽量给您找到他那本小说《抛锚的船》……您一定得看一看……”

他起身走进那间由粉红色缎幔同客厅隔开的卧室。我瞧见一张半被缎幔遮住的矮床，上面覆盖着原驼毛皮。

我走到窗口，朝楼下望去，看见蒙马特尔的缆车铁道、圣心大教堂的花园，再往远看便是巴黎全景，有灯光、屋顶和暗影。就在这大街小巷交织成的迷宫中，有一天我和戴尼丝·库德勒兹相会。千千万万的人行进在巴黎的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如同千千万万的小弹子在巨大的电动弹子台上滚动，有时两个就撞到一起。相撞之后，没有留下一点踪迹，还不如飞过的黄萤，尚能留下一道闪光。

芒苏尔又出现在帷幔之间，他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本书和几张照片。

“找到了！……找到了！……”

他满脸兴奋，刚才一定担心这些遗物放在哪里找不到。他坐到我对面，把书递给我。

“就是这本……我很珍视，不过我还是借给您……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书很不错……多准确的预感！……阿莱克已经预料要被杀害……”

他的脸色黯然。

“还有他的照片，我送给您两三张……”

“您不想保存啦？”

“哦，没关系！不必担心……这样照片，我有几十张……而且留着全部底片！……”

我真想求他给我洗几张戴尼丝·库德勒兹的照片，然而不好开口。

“我很高兴，能把阿莱克的照片交给您这样的男子汉……”

“谢谢。”

“刚才您从窗口观望了吧？景色多美，是不是？真难以想象，杀害阿莱克的凶手就藏在那一带……”

他用手背摩挲玻璃，巴黎全景尽收眼底。

“那家伙，现在该是个老头子了……一个可怕的老头儿……乔装打扮……”

他哆哆嗦嗦地拉上粉红色缎幔。

“我干脆不想。”

“我该告辞了，”我对他说，“再次感谢您送我照片。”

“您想丢下我一个人？您不想最后再喝点玛丽·布里扎尔酒吗？”

“谢谢，不喝了。”

过道墙上糊着深蓝色丝绒壁纸，由枝形水晶玻璃壁灯照亮。他从过道一直送我到通便梯的房门口。我还注意到靠门的墙上挂着一个椭圆形镜框，框里大照片上的男人一头金发，一副英俊的脸庞，两只爱幻想的眼睛。

“理查德·瓦尔……一位美国朋友……他也被

杀害了……”

他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背也驼了。

“还有一些人被害，”他悄声对我说……“多着呢……我要是计算一下……所有这些死者……”

他给我打开房门……我见他神色惶遽，便拥抱了他。

“不要在意，老兄。”我劝道。

“您一定再来看我，嗯？我感到非常孤独……而且特别害怕……”

“我一定再来。”

“阿莱克的书，千万要看呵……”

我大着胆子请求：

“求您一件事……您能否给我洗几张……戴尼丝·库德勒兹的照片？”

“当然可以。洗多少张都成……阿莱克的照片不要丢了。到街上当心……”

他关上房门，我听见他一道道上锁的声响。我在楼道里停留片刻，想象他又穿过糊了深蓝色丝绒壁纸的过道，回到绿墙红幔的客厅。我确信他准又拿起电话，拨那个号码，烦躁地将听筒按在耳朵上，既浑身颤抖，又百听不厌那“蓝色骑士”的远方呼唤。

二十一

那天早上，我们乘坐戴尼丝的那辆折迭车篷的小车，一大早出发了。我记得是从圣克卢门出城的。那天有太阳，戴尼丝戴了一顶大草帽。

我们驶到塞纳-瓦兹或者塞纳-马恩的一个村庄，沿着一条由树木夹护的缓坡街道行驶；最后，戴尼丝把车子停到一道白栅栏门前。栅门里面是一座花园，她推开门进去。我就在人行道上等候。

花园中央长着一株垂杨柳，靠里端有一座带游廊的平房。我望见戴尼丝进了房屋。

她领着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姑娘回来了。小姑娘满头金发，穿一条灰裙子。我们三人上了车。小姑娘在后座，我坐到开车的戴尼丝的身边。我已忘记我们是在哪儿吃的午饭了。

不过，午后我们在凡尔赛公园里散步，还同小姑娘划了船。水面阳光耀眼，戴尼丝便把墨镜借给我。

后来，我们三人围坐着大遮阳伞下的一张桌子，小姑娘吃着翠绿玫瑰双色冰淇淋。我们周围有

许多夏装打扮的游人。一个乐队正在演奏。薄暮时分，我们才带小姑娘回来。车驶过城区，到一个集市前停下。

我眼前重又浮现苍茫暮色中空荡荡的林荫大道、坐在淡紫色车篷留下一道闪光的小车里的戴尼丝和小姑娘。她俩笑容满面，小姑娘朝我挥动手臂。她是谁呢？

二十二

那天晚上，我坐在私人侦探所的办公室里，仔细端详芒苏尔送给我的照片。

一个身体肥胖的男子，坐在长沙发中间，他穿一件绣花绸便袍，右手拇指和食指在摆弄一只烟嘴，左手掐着翻开的书放在膝盖上。他已经秃顶，眉毛浓密，眼皮耷拉着，正在看书。他鼻子又短又宽，嘴角刻着苦纹，胖脸蛋具有东方人特点，貌似捕鼠犬。他上方有尊木雕天使，正是我在画报封面上戴尼丝·库德勒兹的身后所见到的。

第二张照片是立像，他穿一套双排钮扣的白色西装，配有条纹衬衣和深色领带。他左手握一根球头手杖，右臂弯曲，半握着拳，故作风雅之态。他脚下穿一双两色皮鞋，几乎踮着脚，身体挺直。他慢慢地走下照片，活动起来；我望着他沿着大道的树荫，步履蹒跚地走去。

二十三

姓名：亚历山大·斯库菲。

出生地点时间：亚历山大（埃及），1885年4月28日。

国籍：希腊。

亚历山大·斯库菲于1920年首次来法国。他的住址先后顺序如下：

巴黎第八区那不勒斯街26号

巴黎第八区伯尔尼街11号，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

巴黎第十七区罗马街99号，芝加哥饭店

巴黎第十七区罗马街97号6层楼。

斯库菲是一个文人，曾在好几家杂志上发表许多文章，还写过不同形式的诗歌和两部小说：《在备有家具的金鱼公寓里》和《抛锚的船》。

他还学过声乐，尽管不是专业歌剧演员，他却在普莱耶尔音乐厅，以及布鲁塞

尔的莫内剧院演出过。在巴黎，斯库菲引起便衣警察的注意，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警方甚至考虑过驱逐他的问题。

1924年11月，他住在那不勒斯街26号，因企图同一个未成年人搞同性恋而被警察局传讯。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他住在罗马街99号芝加哥饭店，和凡尔赛第八工兵团的士兵、二十岁的皮埃尔·D同居。斯库菲似乎经常出入蒙马特尔的特殊酒吧间①。斯库菲继承了他父亲在埃及的遗产，有巨额收入。

他在罗马街97号单身公寓房中被人杀害。凶手始终未查明。

姓名：奥列格·德·弗雷德。

电话AU Teuil 54-73

迄今尚无法查明用此姓名之人的身分。可能是假名或者化名，也可能是一个在法国短期逗留的外国侨民。

自 1952 年之后，AU Teuil 54-73 这个电话号码没有再投入使用。

从1942年至1952年的10年间，使用这个电话号码者为下面用户：

---

① 指搞同性恋等有伤风化的活动场所。

彗星停车场

巴黎第十六区福科尔街5号

该停场已于1952年关闭，不久即将拆毁，在原址修建一幢高级公寓楼。

这页打字纸还附了一张便条：

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我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材料。如果需要了解其它情况，尽管吩咐。请向于特转达我的问候。

您的朋友 若望-皮埃尔·贝尔纳迪

二十四

怪事，为什么斯库菲这个獒狗嘴脸的胖汉子，独独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浮现呢？也许是他身穿一套白色西装的缘故吧？一个鲜明的亮点，就像打开收音机时，虽有劈劈啪啪的嘈杂声，但仍响着一个乐队的音乐或一个优美的声音。

现在我想起来，他的白西装在楼梯上闪动的亮点、球头手杖点到楼梯台阶所发出的沉闷而有节奏的声响。他每上一层，都要停一停。我上楼去看戴尼丝时，有好几回同他交臂而过。那楼梯的铜扶手、浅灰色的墙壁、各套间的深色双道木门，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层楼的常明灯光，以及从昏暗中冒出来的那个脑袋、那种獒狗般温和而忧伤的眼神……我甚至认为在照面时，他还同我打了招呼。

在罗马街和巴蒂尼奥勒大道的路口，有一家咖啡馆。夏季，露天座一直排到人行道；我坐在一张餐桌旁，时近黄昏，我在等戴尼丝。落日的余辉还滞留在罗马街那边铁道旁汽车修理厂的门面和玻璃上……

猛然间，我望见他穿过林荫大道。

他穿着那套白色西装，右手拄着球头手杖，走路略微跛足。他朝克利希广场走去；我目不转睛望着那个在垒道树下的白色僵直的身影，只见它渐小，渐小，最后消失了。于是，我喝一口薄荷水，心里琢磨他去那里找谁？究竟去赴谁的约会？

戴尼丝经常迟到。由于望见在林荫大道上渐渐远逝的白色身影，现在我什么都想起来了。戴尼丝在拉博埃蒂街的一家妇女时装商店干活。时装店老板是个细高挑儿，满头金发，当时刚刚出道，后来则名声大振。我想起来他名叫雅克，如果我耐心查一查，在于特办公室的通讯簿上，一定能查到他的姓氏。拉博埃蒂街……

戴尼丝到咖啡馆露天座来和我相会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不过，我倒觉得无所谓，我对着薄荷水还可以坐很久。我宁愿在这露天座上等待，也不想呆在离这儿不远的戴尼丝的小套间里。晚上9点钟了。他像往常一样，准时穿过林荫大道。他的衣裳磷光闪闪。有天晚上，戴尼丝和他在垒道树下交谈了几句。他那眩目的白色西装、那茶褐色的獒狗型嘴脸，以及灯光辉映的绿幽幽的叶丛，具有仲夏失真的特色。

我和戴尼丝走上库尔塞勒大道，方向正好同他相反。那时候，我们俩走在街道上，也觉得整个巴黎跟磷光闪闪的斯库菲西装一样，具有仲夏失真的特色。我们经过蒙索公园的栅栏时，嗅着女贞树的

清香，更觉得身体飘浮在夜色之中。街上车辆稀少。红绿灯徒劳悄然地明灭，变换颜色，就像棕榈树枝摇曳那样轻柔而有节奏。

接近奥什林荫路尽头，在星形广场这边，左首便是巴齐尔·扎哈罗夫爵士公馆，二楼的几扇大窗户始终灯火辉煌。在那段时间之后，或许就在同一时期，我经常登上这家公馆的二楼；二楼有几间办公室，总是挤满了人。有的围拢一起在交谈，有的在烦躁地打电话，出出进进，人流不断。所有这些人连大衣也顾不得脱下来。过去的一些情景，为什么像照片一样清晰地展现在面前呢？

我们在维克托·雨果林荫路一带的一家巴斯克餐馆吃过晚饭。昨天晚上，我去寻找那家餐馆；但是没有找到，而整个街区都找遍了。那家餐馆座落在两条宁静街道的路口，门前的露天座围着一盆盆青翠的草木，上面遮着红绿两色相间的帆布大棚。顾客很多。那里谈话的嗡嗡响、碰杯的声音依然在耳；那里面桃花心木的酒吧柜台，以及柜台上方画着白银海岸风光的长幅壁画，还历历在目。我还记得一些人的面孔。戴尼丝的老板，在拉博埃蒂街开时装店的那金发瘦高挑儿，也到我们餐桌来坐一坐。一个蓄小胡子的棕发男人、一个红棕发女子、另一个金黄鬈发大笑不止的男人……可惜，我仅能想起面孔而忘记他们姓名了。一名秃顶的酒吧招待有秘方，调制一种特殊的鸡尾酒，那种鸡尾酒与餐馆同名，只要能回忆起来，就可以联想其它往事，

然而，怎么才能想起来呢？昨天晚上，我跑遍那一带，明明知道就是从前那几条街，可是怎么也认不出来，其实楼房并无变化，人行道还是那么宽，但那时期灯光不同，空气中还飘浮着异样的东西……

我们从原路回来。我们常去那个街道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这回找到了，就是莱维广场上的罗雅尔一维利埃电影院。莱维广场上有长椅、广告柱和树木；我能够认出这个地点，多亏这些东西，而不是由于电影院的门面。

我要是想起我们看过什么电影，也就能确定那个时期了，然而我只记得一些模糊的镜头：在雪上滑行的雪橇、走进一个身穿小礼服的男人的大型客轮船舱、玻璃门里舞动的身影……

我们回到罗马街。昨天晚上，我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到97号，看见栅栏和铁道，看见杜博奈酒广告，我觉得我又产生了同样惶恐的感觉。那广告在铁道另一侧的一座建筑物上，占了一面墙，但过去多年，颜色肯定黯淡了。

这条街99号的芝加哥饭店已然改名了，但是问讯处的人，谁也无法告诉我是什么时候改的名。不过，这无关紧要。

97号楼相当长。既然斯库菲住在六层，而戴尼丝正好住在他下面，那就是五层了。她的套间在大楼的右翼还是左翼呢？大楼这一面，每层少说有十几扇窗户，大概分成两三套房子。我久久地凝望楼房正面，希望能认出一个阳台、一扇窗的式样或百

叶窗。徒劳，这唤不起我一点记忆。

楼梯也认不出来了，并不是我记忆中的闪亮的铜扶手，房门也不是深色木板制成的。尤其楼道的定时灯，亦非当年显现斯库菲獒狗般神秘面孔时那么朦胧了。去问门房也无济于事，还会引起她的疑心。况且无事不变，门房也一定换了新人。

斯库菲遇害时，戴尼丝还住在这里吗？如果我们正好住在他的楼下，这种悲惨事件定然会留下一点印象，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什么也没有留下。戴尼丝在罗马街97号住的时间不长，也许只有几个月。当时我跟她住在一起吗？或许我在巴黎另有居所吧？

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很晚才回来，看见斯库菲坐在楼梯台阶上，双手交叉扶着手杖的顶球，支撑着下颏儿。他脸上的表情颓丧，獒狗似的目光也流露出忧伤的神色。我们在他面前停下，他却视而不见。我们真想劝说两句，扶他上楼回房间。然而，他像蜡人模特儿，一动不动。定时灯熄灭了，唯余他西装的磷光白点。

这一情景，想必发生在我和戴尼丝相识之初。

二十五

我在于特办公室里，关闭了电灯，在黑暗中呆了片刻，没有立刻离开；继而又打亮电灯，然后再关上，如此重复再三，这便唤起我的记忆：我又幻见我关灯的情景，那是在同样大小的房间里，什么时期难以确定，每天晚上同一时刻，我都重复这种动作。

涅尔林荫路的路灯照进来，于特的写字台和椅子的木头闪闪发亮。在那一时期，我关了灯，也是一动不动地呆上片刻，就好像害怕出屋似的。房间里端靠墙摆一个玻璃书橱，灰色大理石壁炉上方镶了一面镜子，还有一张抽屉很多的写字台，靠窗则放一张长沙发，我经常躺在上面看书。窗外街道很宁静，路边树木成行。

这是一幢小公馆，南美一个公使馆所在地。想不起来当时我是以什么身分使用这里的一间办公室，依稀记得我旁边的办公室有一男一女，还听见他们打字的声音。

我接待的人有限，都是来请求签证的。我翻找

瓦尔布勒兹那里的花匠给我的饼干盒、察看那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护照和身分证照片时，就猛然想起了这一情况。我在这间办公室替代一个人，并干他的工作。是个领事？抑或是个代办。还记得我给他打过电话，请求指示。他是何许人呢？

首先，那个公使馆在何处？我用了几天，走遍了十六区，因为我记忆中树木成行的宁静街道，类似这个区的几条街。如同勘探地下水源的人盯着测针的微小摆动，我站在每条街道的路口，盼望那些树木、那些楼房能使我的心悸动。走到莫利托尔街和米拉博街的十字路口时，我猛然确信，那时每天傍晚从公使馆出来，我就是走在这种地方。

天黑了。我沿着通楼梯的过道走去，听见打字的声响，便从半开的门探进头。那个男的已经走了，只有那个女的还坐在打字机前。我向她道晚安。她停下手，转过身来，是个漂亮的褐发女郎，我还记得那张热带人脸庞。她用西班牙语对我说了句什么，冲我笑了笑，便又接着打字。我在门厅里停留片刻，最后决定出去。

可以肯定，我是沿米拉博街走下去；这条路笔直，但十分昏暗，又空荡荡的，我怕惹人注意，便加快脚步：街上只有我一个行人。坡下凡尔赛林荫路的十字路口广场上，有一家还亮着灯的咖啡馆。

有时，我也会走上反方向的路，深入欧特伊区的宁静的街巷，在那里我才有安全感。最后，我就拐进女哑巴街。我想起了埃米尔-欧吉埃林荫大道的

那些楼房，以及我拐进右首的那条街道。楼下有一扇乌玻璃窗，像牙科诊所那样，总亮着灯。再往前走一点儿，就是戴尼丝等我的那家俄国餐馆。

我时常列举一些酒吧间和餐馆的名号，可是，如果没有路牌或霓虹灯招牌时时出现，我怎么能辨明方向呢？

餐馆连接一个有围墙的花园。从窗洞能望见挂着丝绒帷幔的里餐厅。我们在花园里一张餐桌落座时，天色不大亮。有一个齐拉特琴手。这种乐器洪亮的音响、花园的晚照，以及肯定从布洛涅树林飘来的清香，都融汇于那时的忧伤与神秘的氛围。我想找到那家俄国餐馆，然而徒劳。米拉博街依然旧貌，并没变样。有些夜晚，我在公使馆呆得晚些，就安步当车，到凡尔赛林荫路继续步行。我本可以乘地铁，但我还是喜欢在户外走走。帕西码头。比尔-哈凯姆桥。接着就是纽约林荫路；那天晚上，我和瓦尔多·布兰特一起，走的就是这条马路，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心里一阵难受。当时我重踏自己的足迹，却没有意识到。从前，我曾多少次穿行纽约林荫路……阿尔马广场，头一片绿洲。再往前走就是树荫清爽的王后林荫路。穿过协和广场，就快到目的地了。王府街。朝右拐是圣奥诺雷街，朝左拐则是康蓬街。

康蓬街暗无灯火，只有哪扇玻璃窗晃来的一道微紫的反光。我独自一人。我重又产生恐惧之感。这种恐惧感，我每次走到米拉博街时都要产生，怕

有人注意我，怕有人挡住我，检查我的证件。还有几十米远就到达了，吓成这样子实在遗憾。千万沉住气，脚步平稳，坚持到底。

卡斯蒂利亚旅馆。我跨进楼门，接待室无人。我走进小客厅，以便喘口气，擦擦额头的汗水。这个夜晚，我又逃脱了危险。她在楼上等我。世上唯有她等我，唯有她担心我会在这座城市里失踪。

淡绿色墙壁的房间。红色窗帘已然拉上。光线来自床左侧的床头灯。我闻到她身上的香味，馥郁刺鼻的芬芳，但是眼前只浮现她皮肤上的雀斑和右臀上的那颗美痣。

二十六

将近晚上7点钟，他和儿子从海滩回来，这是一天里他最喜爱的时刻。他有时拉着孩子，有时让孩子在前边跑跳。

林荫路寂静无人，几束阳光还在人行道上流连。父子俩走在树拱下，每到“阿丝特丽德王后①”糕点铺门前，孩子准停下脚步。他则好观望书店的橱窗。

那天傍晚，橱窗里有本书引起他的注意，石榴红色的书名中，有“卡斯蒂利亚”一词。他拉着儿子的手，走在树拱下，儿子则在夕阳投在人行道上的光影间跳着玩。“卡斯蒂利亚”一词令他想起一家旅馆，位于巴黎圣奥诺雷区附近。

有一天，一个男人约他到卡斯蒂利亚旅馆见面。在约会之前，他在奥什林荫路的办公室里见过那人；去那里的人都挺怪，低声地谈交易。那人说打算离开法国，来向他兜售一枚首饰别针和两只钻

① 阿丝特丽德（1905—1935），瑞典王国公主，比利时王后。

石手镯，并把首饰放在一只小皮盒里交给他，二人商定次日在那人下榻的卡斯蒂利亚旅馆见面。

他眼前又浮现旅馆的接待室、旁边的小酒吧间，以及围着绿栅栏的花园。门房用电话通告来客，然后告诉他客房号。

那男人躺在床上，嘴上叼着香烟，但他并不真正往里吸，而是神经质地大口喷出浓烟。这位褐发男子身材高大，昨天在奥什林荫路见面时，自我介绍是“卸任的南美洲一个公使馆的商务专员”，未讲姓氏，只说名叫“彼得罗”。

这个名叫“彼得罗”的人已经起身坐到床沿，冲他腼腆地微微一笑。他虽然不认识这个“彼得罗”，却不知道为什么对他顿生好感，觉得他在旅馆客房里形同困兽，因此立刻把装钱的信封递给这位卖主。昨天首饰顺利出手，他赚了一大笔好处。“给您，”他对卖主说，“我把多卖的钱也分给您一半。”“彼得罗”向他道谢，把信封收到床头柜的抽屉里。

这时，他注意到床对面的衣柜门半开着，露出挂在衣架上的几件连衣裙和一件皮大衣。看来，这个“彼得罗”和一个女人在此同居了。他再次想到，他们的处境，这个女人和这个“彼得罗”的处境一定不妙。

“彼得罗”又躺在床上，重新点燃一支烟。这人感到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便说道：

“我越来越不敢上街了……”

他甚至还说：

“有些日子，我害怕极了，干脆整天躺在床上……”

过了这么多年，他耳畔仍然回响“彼得罗”声音低沉讲出的这句话。当时，他不知道如何劝解，只是笼统地发一句感慨，大致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代。”

于是，“彼得罗”突然对他说：

我认为找到了离开法国的办法……有了钱，什么都好办……”

他还记得玻璃窗外纤微的雪花飞舞，几乎成霏霏细雨。纷纷扬扬的雪花、户外黑沉沉的夜色和室内狭小的空间，使他感到窒息。就算有了钱，能一准就逃出去吗？

“可以，”彼得罗喃喃地说……“我有办法进入葡萄牙……通过瑞士……”

听到“葡萄牙”这一字眼，他眼前立即浮现绿色海洋、灿烂的太阳，以及在遮阳伞下用麦管吮吸的桔汁。他心中暗道：说不定夏季哪一天，我和这个“彼得罗”会在里斯本，或者埃什托里尔的一家咖啡馆重逢吧？他们会悠然自得地喝着苏打水……而卡斯蒂利亚旅馆的这间小客房、飞雪、黑夜、隆冬凄苦的巴黎、为了脱身而进行的非法交易……他们会觉得这一切都已非常遥远……他告辞时，对这个“彼得罗”说了句：“祝您走运。”

“彼得罗”后来情况如何？他祝愿这个男人跟

他一样安宁幸福，他同此人虽然只见过两次，但毕竟有识面之缘，看见他在夏季那天傍晚的人行道上，领着在夕阳洒下的光影间蹦跳的孩子。

二十七

亲爱的居伊：

惠书收悉，谢谢。我在尼斯生活得很快活。我找到了隆尚街那座古老的俄国教堂，从前我祖母经常领我去那里。也正是在那一时期，我观看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打网球，也就萌生了这种志向……尼斯的每条大街小巷，都勾引起我童年的回忆。

在我向您谈的这座俄国教堂里，有个房间四周摆了玻璃书橱，中间放了一张球台一样的大桌子和几把旧扶手椅。当年每星期三，我祖母必去借书，而我总陪伴她去那里。

那些书都是19世末以来出版的。况且，那地方保留了当年阅览室的魅力。我去看书，一坐就是几小时，捡一捡有点淡忘的俄文。

沿着教堂是一座花园，高大的棕榈和桉树葱郁成荫。在这片热带林木之间，挺立一棵银白树干的白桦。我猜测它栽到那

里，是要时时提醒我们记住遥远的俄国。

亲爱的居伊，要我如实相告吗？我正谋求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事情要是进行顺利，如愿以偿，我将在我度过童年的地方欣然接待您。

历尽坎坷之后，我终于叶落归根，但我未敢告诉神父，我曾当过私人侦探。

您对我说过，生活里重在过去，而非未来，这话很正确。

至于您向我询问的事情，我看最好的办法就去找“族亲咨询处”。我刚给德·斯威尔特去了一函，估计他能回答您的问题。他很快就会给您寄去所需的材料。

您的朋友

于特

此外，关于我们迄今未能查明的那个名叫“奥列格·德·弗雷德”的人，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下一邮班您将收到一封信，便会了解一些情况。事情是这样，我觉得“弗雷德”这名字听起来像俄国人，或者像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就随便向尼斯的几个俄国老侨民打听，还真碰对了，有一位卡汉夫人说有印象。是些心酸的往事本来她想从记忆中抹掉，不过她允许我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全记下来寄给您。又及。

二十八

姓名：戴尼丝·伊韦特·库德勒兹。

出生时间和地址：1917年12月11日，巴黎。父保罗·库德勒兹，母亨利埃特(原姓博加埃尔)。

国籍：法国。

她于1939年4月3日，在巴黎第十七区区政府登记，与吉米·彼得罗·斯特恩结婚；男方希腊国籍，1912年9月30日生于萨洛尼卡(希腊)。

库德勒兹小姐的居所先后顺序如下：

巴黎第十三区奥斯特利茨码头大街9号，

巴黎第十七区罗马街97号，

巴黎第八区康蓬街卡斯蒂利亚旅馆，

巴黎第八区康巴塞雷街10号乙。

库德勒兹小姐以“穆特”之名拍过时装照片。后来，她可能在拉博蒂埃街32号J·M·时装店当过模特儿。再稍后，她可

能同一个叫冯·阿伦的荷兰人合作，冯·阿伦于1941年4月，在巴黎第九区歌剧院广场街6号开了一家服装店。该店经营时间不长，于1945年1月关闭。

库德勒兹小姐可能于1943年2月企图偷越法国瑞士边境时失踪的。此案在默热沃(上萨瓦省)和阿讷马斯(上萨瓦省)进行了调查，但毫无结果。

二十九

姓名：吉米·彼得罗·斯特恩。

出生时间与地址：1912年9月30日，生于萨洛尼卡(希腊)。父乔治·斯特恩，母吉乌维雅·萨拉诺。

国籍：希腊。

他于1939年4月3日，在巴黎第十七区区政府登记，同戴尼丝·伊韦特·库德勒兹(法国籍)结婚。

斯特恩在法国的居所不详。

只有1939年2月登记的一张卡皮标明，有一个吉米·彼得罗·斯特恩当时住在：

巴黎第八区拜雅尔街24号

林肯饭店。

在第十七区区政府的结婚登记卡上，写的也是这个地址。

林肯饭店已经注销了。

林肯饭店的登记卡上注明如下情况：

姓名：吉米·彼得罗·斯特恩。

住址：罗马(意大利)，暗店街2号。

职业：经纪人。

吉米·斯特恩先生大约于1940年失踪。

三　十

姓名：彼得罗·麦克沃伊。

无论是在警察局还是在情报局，都很难查到有关彼得罗·麦克沃伊的材料。

据悉，有一个人名叫彼得罗·麦克沃伊先生，是多米尼加人，在多米尼加驻巴黎公使馆供职，1940年12月住在塞纳河畔讷伊的朱连-波坦街9号

此后便无迹可寻。

种种迹象表明，彼得罗·麦克沃伊先生于上次大战时离开法国。

如同那一时期常有的现象，此人可能使用化名和假证件。

三十一

正值戴尼丝的生日。那是冬天的一个夜晚，雪花飘落到巴黎街巷，化作泥浆。市民拥进地铁的入口，步履匆匆。圣奥诺雷街的橱窗里灯火通明。圣诞节快到了。

我走进一家首饰店，又看见了那男人的脑袋。他蓄着胡子，架一副着色眼镜。我给戴尼丝买了一只戒指，从商店里出来，雪仍然下个不停。我担心戴尼丝不能来赴约，心头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我们在这座城市里，可能消失在这些脚步匆遽的身影之间。

我已经忘记那天晚上，我姓斯特恩还是麦克沃伊，名叫吉米还是彼得罗。

三十二

瓦尔帕莱索①。她站在有轨电车尾部窗子旁边，被夹在乘客中间，一边是一个戴墨镜的矮个儿男子，另一边是脸颊干瘪、身上散发三色堇花香气的金发女人。

过一会儿到埃首朗广场，大部分乘客就要下车，她就可以坐下了。她住在塞罗·阿莱格尔区高地，每周要到瓦尔帕莱索去两回买东西。她在高地租了一所房子，开办了舞蹈学校。

五年前，她踝骨折伤，知道再也不能跳舞，便决意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远走高飞，离开巴黎，至今并不后悔。为何选择瓦尔帕莱索呢？因为那里有她个熟人，是居瓦斯芭蕾舞学校的一位校友。

她不打算返回欧洲，只想留在高地授课，终将忘记她那些挂在墙上的旧照片，即当年她在德·巴齐尔上校芭蕾舞团时的留影。

---

① 智利港口城市。

她不大想受伤之前的生活，脑海中的往事已一片模糊，名字、日期、地点全混淆了。但有一件往事更加清晰，她每周两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有规律地回想起来。

恰好就在今天这样的傍晚，有轨电车停在埃拉宙里林荫路脚下的时刻。这条绿树成荫、缓缓上坡的街道，令她想起她童年居住的朱伊-昂若萨的那条街。她眼前又浮现居尔泽纳博士街头那座房子、垂杨柳、白栅栏、新教礼拜堂，以及对面脚下的罗宾汉旅店。她想起一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天，她的教母来接她。

她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女人，只知道她名叫戴尼丝。她有一辆折迭车篷的小车。那个星期天，一个褐发男人陪她来。他们三人去吃了冰淇淋，还划了船，直到傍晚，才离开凡尔赛，送她回朱伊-昂若萨，途径一个集市停下车，那个教母戴尼丝跟她一起玩碰碰车，而那褐发男人则在一旁观看。

她很想多了解点情况。那两个人究竟叫什么名字？他们住在什么地方？过了这么多年，他们情况怎样？当有轨电车沿着埃拉宙里林荫路上坡、驶向塞罗·阿莱格尔区时，她脑海里就产生这一连串问号。

三十三

那天晚上，我坐在风味酒吧间的一张餐桌旁。那家风味酒吧位于涅尔林荫路，正对着于特侦探事务所，也正是于特介绍我去的。餐厅里有一个柜台，食品架上摆满异国食品：茶叶、阿拉伯香甜糕点、玫瑰花瓣酱、波罗的海鲱鱼……从前的一些赛马骑师常光顾此地，彼此交谈一些往事，交换看一些赛马的旧照片，须知那些赛马早已被肢解了。

有两个男人在酒吧间里低声交谈。其中一个身穿枯叶色大衣，衣襟几乎垂到脚脖子。他跟大多数顾客一样五短身材。他朝门口上方的挂钟瞥了一眼，大概是要看时间，无意中目光落到我身上。

他的脸色刷地变白，张口结舌地望着我，眼珠子几欲鼓出来。

他紧皱眉头，缓步走来，到我餐桌前停下。

"彼得罗……"

他拂了拂我外套的上臂部位。

"彼得罗，是你吧？

我迟疑未答。他显得挺尴尬。

“请原谅，”他又说，“您不是彼得罗·麦克沃伊吗？”

“是啊，问这干吗？”我突然说道。

“彼得罗，你……你认不出我了吗？”

“认不出了。”

他在我对面坐下。

“彼得罗……我是……安德烈·维尔德梅尔……”

我很激动，抓住我的手。

“安德烈·维尔德梅尔……赛马骑师呀……你不记得我了吗？”

“请原谅，”我对他说，“我的记忆出现空洞。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这还用问……就是跟弗雷迪……”

我一听见这个名字，浑身就像触了电。一名赛马骑师。瓦尔布勒兹那儿的老花匠曾向我提起过……

“真逗，”我对他说。“有人向我提过您……在瓦尔布勒兹……”

他的眼睛模糊了，是喝多了酒，还是太激动呢？

“还是的，彼得罗……我们和弗雷迪一道去瓦尔布勒兹，难道你不记得啦？……”

“记不大清楚了。就是瓦尔布勒兹那儿的花匠向我提过……”

“彼得罗……这么说……这么说，你还活着？”

他用力握手，都把我的手握疼了。

“是啊。怎么啦？”

“你……你就在巴黎？”

“是啊。怎么啦？”

他惊恐地望着我，似乎难以相信我还活在世上。当时出了什么事儿啦？我很想了解，但显而易见，他不敢正面谈论这个问题。

“我嘛……我住在吉韦尔尼……在瓦兹省，”他对我说，“我……我很少来巴黎……你要喝点什么吗，彼得罗？”

“来杯玛丽·布里扎尔酒吧。”

“好哇，我也要一杯。”

他亲手往杯子里斟酒，但动作很慢，仿佛在争取时间。

“彼得罗……出了什么事儿啦？”

“什么时候？”

他举杯一饮而尽。

“就是你们同戴尼丝要偷越瑞士边界那时候，嗯？……”

我又能如何回答呢？

“你们一直没有给我们个音信。弗雷迪非常担心……”

他又给自己的杯子斟满酒。

“我们还以为你们在大雪中迷路了……”

“倒无需担心。”我对他说。

“戴尼丝怎么样？”

我耸了耸肩膀。

“您还记得戴尼丝吗？”我问道。

“这还用问，彼得罗，当然记得……我倒要先问一句：你干吗总‘您，您’地称呼我？”

“请原谅，老兄，”我说道。“这一阵的情况不大妙。我竭力回想整个那一时期……可是朦朦胧胧，一片模糊……”

“我理解。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弗雷迪的婚礼你还记得吧？”

他面露微笑。

“记不大清楚了。”

“在尼斯结婚……跟盖伊……”

“盖伊·奥尔洛夫吧？”

“当然是跟盖伊·奥尔洛夫……还能跟谁结婚呢？”

他提起这桩婚事，见没有引起我多少回忆，便神色怏怏。

“就是在尼斯……那座俄国教堂……举行宗教结婚仪式……不是公证结婚……”

“在哪一座俄国教堂？”

“就是带花园的俄国小教堂……”

大概是于特在信中描写的那座吧？有时巧合实在神秘莫测。

“对呀，当然，”我对他说……“当然了……那座俄国小教堂在隆尚街，带个花园，还有教区图书馆……”

“这么说，你想起来啦？我们四个是证婚人……我们把花冠举在弗雷迪和盖伊的头上……”

“四个证婚人？”

“对呀……你和我，盖伊的外祖父……”

“吉奥尔吉亚泽老头儿？……”

“对……吉奥尔吉亚泽……”

看来，我和盖伊·奥尔洛夫、老吉奥尔吉亚泽的合影，就是那次拍摄的了。我正要拿出来给他看，又听他说道：

“第四个证婚人就是你的朋友鲁比罗萨……”

“谁？”

“你朋友鲁比罗萨……波尔菲里奥……多米尼加的外交官……”

想起那个波尔菲里奥·鲁比罗萨，他微笑起来。一名多米尼加外交官。我在那个公使馆，也许正是给他干事吧。

“宗教仪式之后，我们就一道去吉奥尔吉亚泽老头家……”

我又看到时近中午，我们在尼斯城的一条梧桐林荫路上。阳光灿烂。

“也有戴尼丝吗”

他耸耸肩膀。

“当然有她啦……显然，你什么也不记得了……”

我们七个人：赛马骑师、戴尼丝和我、盖伊·奥尔洛夫和弗雷迪、鲁比罗萨和老吉奥尔吉亚泽，

我们穿着白色礼服，慢悠悠地走着。

“吉奥尔吉亚泽住的那幢楼，位于阿尔萨斯-洛林公园的拐角。”

几株棕榈高高耸立。有些孩子在溜滑梯。楼房白色门脸儿挂着桔黄色帆布遮帘。楼梯上回荡我们的笑声。

“为了庆贺这桩婚姻，晚上你朋友鲁比罗萨请我们到伊甸岩石餐馆吃饭……怎么样，想起来了吧？对不对？……”

他气喘吁吁，就好像卖了很大力气似的。他回忆弗雷迪和盖伊·奥尔洛夫婚礼那天的情景，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了；举行宗教婚礼那天，阳光明媚，大家欢欢喜喜，那无疑是我们青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

“总而言之，”我对他说，“你我二人，我们很久以前就相识了……”

“对……不过，我是先认识弗雷迪的……因为，我是他祖父的赛马骑师……只可惜，没有干多久……老头子全输光了……”

“盖伊·奥尔洛夫……你知道……”

“对，我知道……我就住在她家附近……在阿利斯康花园街……”

那幢楼很大，盖伊·奥尔洛夫站在窗口，一定能望见欧特伊跑马场的美景。她的前夫瓦多·布兰特告诉我，她担忧红颜易老，因而自杀了。我猜想，她一定经常在窗口观望赛马，每天，甚至一下午能

多次看到同一景象：十来匹马冲出去，沿场地飞奔，撞到障碍物上，碰得头破血流。这次越过障碍物的几匹，几个月后，又会同其它赛马一起消失。赛马必须不断更新。每次冲跑，结果总要撞死。这种景象，只能令人悲伤和沮丧。也许正因为住在跑马场旁边，盖伊·奥尔洛夫才……我很想问问安德烈·维尔德梅尔是怎么想的。他是赛马骑师，应当理解这一点。

“想起来真叫人伤心，”他对我说，“盖伊是个多漂亮的姑娘……”

他俯过身来，把脸凑近我的脸。他脸皮红赤赤的，有痘瘢，一对栗色眼睛。右腮帮子有一道伤痕，一直延伸到下巴头。他的头发也是栗色的，但有一绺白发，在额上翘起来。

“你呢，彼得罗……”

但是，我没有容他讲下去。

“我住在讷伊的于连-波坦林荫大道时，你就认识我了吧？”我贸然问道，反正我记住了“彼得罗·麦克沃伊”卡片上的地址。

“是你住在鲁比罗萨那里？……当然了……”

又是这个鲁比罗萨。

“我和弗雷迪经常去……每天晚上都欢天喜地。”

他哈哈大笑。

“你朋友鲁比罗萨请来乐队……一直闹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他总用吉他弹两支曲子，你还记

得吧？”

“不记得了……”

“弹《钟表》和《你使我习惯你》①，尤其是《你使我习惯你》……”

他用口哨吹出这支曲子的几个拍节。

“怎么样？”

“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说道。

“你们还给我弄了一本多米尼加的护照……不过，没有派什么大用场……”

“你到公使馆来看过我吧？”我问道。

“对。就是那次，你给了我多米尼加护照。”

“我一直未弄清楚，我在公使馆里究竟干什么？”

“我也不清楚……有一天你对我说，你是给鲁比罗萨大小当个秘书，对你来说，这是个美差……不料，鲁比那次车祸丧命，真叫我伤心……”

是叫人伤心，又是一个再也不能开口的证人。

“告诉我，彼得罗……你的真名实姓是什么？我一直觉得这里面大有名堂。弗雷迪跟我说，你并不叫彼得罗·麦克沃伊……那是鲁比给你搞的假证件……”

“我的真名实姓？我还想知道呢。”

我面带微笑，好让他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弗雷迪是知道的，你们是中学同学嘛……你

① 原文为西班牙文。

们在德·吕伊扎中学的那些鬼把戏，讲得我都听腻了……”

“德·什么中学？……”

“德·吕伊扎中学……你明知故问……别装傻了……那天，你父亲开车接你你们俩……他还让没有驾驶证的弗雷迪开车……这件事，你们至少向我说了上百遍……”

他摇了摇头。这么看来，我还有一个父亲，他经常到“德·吕伊扎中学”来接我们俩。多有趣的细节。

“你怎么样？”我问道，“你一直在赛马这行里干吗？”

“我在吉维尔尼那儿一个驯马场，找到一个骑术教师的差使……”

他声调严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要知道，我出了那次事故之后，就走下坡路了……”

什么事故？我不便问他。

“我陪你们去默热沃，陪你和戴尼丝、弗雷迪和盖伊，那时候情况就不大妙了……我已经丢了教练员的差事……他们都胆小怕事，因为我是英国人……他们只要法国人……

英国人？不错，我没大注意，他讲话带口音。他说出“默热沃”一词时，我的心脏跳得厉害些。

“去默热沃旅行，多怪的念头，不对吗？”我试探一句。

“怪念头，为什么？我们别无办法呀……”

“是吗？”

“那地方安全……那时，巴黎变成了危险的境地……”

“真是那样吗？”

“嗳，彼得罗，你想想嘛……检查越来越频繁……我呢，是英国人……弗雷迪持的也是英国护照……”

“英国护照？”

“是呀……弗雷迪家原籍是毛里求斯岛……那时候，你的处境似乎也不大妙……我们所谓的多米尼加护照，其实也保护不了我们了……你想想嘛……你朋友鲁比罗萨本人也……”

我没有听见这句话的下文，我想他是失声了。

他喝了一口酒。这时进来四个人，是这里的常客，都当过赛马骑师。我在这里经常听他们谈话，因此认出他们。他们之中有一个总穿着旧马裤和污迹斑斑的黄鹿皮大衣。他们拍了拍维尔德梅尔的肩膀，同时开口讲话，又哈哈大笑，一时十分喧闹。维尔德梅尔没有把他们介绍给我。

他们坐在酒吧间的高脚圆凳上，继续扯着嗓子说话。

“彼得罗……”

维尔德梅尔又朝我探过身来，我们的脸相距只有几公分。他的脸直抽搐，就好像他要使出超人的力量，才能说出几句话。

"彼得罗……你们企图偷越国境的时候，戴尼丝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不记得了。"我答道。

他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那样子有几分醉意。

"彼得罗……在你们动身之前，我就跟你说过，要当心那家伙……"

"哪家伙？"

"就是要帮你们去瑞士的那家伙……那个俄国佬小白脸……"

他满脸通红，又喝了一口酒。

"你想一想……我还跟你说过，也不要信另外一个人的……那个滑雪教练……"

"哪个滑雪教练？"

"就是要给你们带路的那个家伙……你完全清楚……叫鲍勃什么啦……哦，叫鲍勃·拜松……你们干吗要走呢？当时跟我们在一起，在小木屋里呆得好好的。"

能对他说什么呢？我摇了摇头。他举杯一饮而尽。

"他叫鲍勃·拜松……"

"那个俄国人叫什么？"

他皱起眉头。

"想不起来了……"

他的神思放松了。他刚刚作了极大的努力，同我回顾往事，现在已精疲力尽，犹如游泳者力竭之时，还最后挣扎一下，头探出水面，接着就慢慢下

沉了。平心而论，他在回忆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他起身到其他人堆里，恢复了常态，只听他侃侃而谈，评论下午在万森举行的一场赛马。那个穿马裤的人请一圈人喝酒。维尔德梅尔恢复了原来的嗓门儿。他显得极为冲动，极为活跃，连嘴角叼着烟都忘记点了。如果我站到他面前，他也不会认得了。

我临走时，向他说了声再见，还向他挥了挥手，然而他并未理睬。他全副心思谈赛马，无暇旁顾。

三十四

维希市。一辆满是污泥的美国轿车，到泉水公园旁边的和平饭店前停住，下来两男一女，朝饭店门口走去。两个男的未刮胡子，高个儿的挽着那女子的胳膊。饭店前面有一排柳条椅，有人躺在上面睡觉，脑袋来回摆动，好像根本不在乎 7 月的烈日。

三人进了门厅，要去接待处，开出一条路来相当费力；地上全是扶手椅和行军床，上面睡满了人，有些还穿着军装。大厅里端的人三五成群，甚至十人一伙，他们相互打招呼并交谈，真是沸反盈门，喧闹声比外面闷热的空气还要令人窒息。三个人终于挤到接待处，那位高个儿男人将三人护照递给门房。有两本护照是由多米尼加共和国驻巴黎公使馆签发的，持照人一个名叫“波尔菲里奥·鲁比罗萨”，另一个名叫“彼得罗·麦克沃伊”，第三个人持法国护照，名叫“戴尼丝·伊韦特·库德勒兹。”

门房汗流满面，一滴滴滚到下颏儿，他已疲惫

不堪，懒懒地将三本护照还给他们。没有客房，“鉴于目前情况”，整个维希市，也找不出一间空客房……实在要住，那还有两张扶手椅，可以搬到水房或者一楼盥洗室里……可是，他周围嘈杂的谈话声音、电梯铁门的撞击声响，以及安装在接待处上面的扩音喇叭的呼叫，早把他的说话声给淹没了。

两男一女走出饭店，脚步有几分蹒跚。天气陡变，一时乌云满天。他们穿过泉水公园，只见沿草坪的游廊下聚拢的人，比饭店大厅里还要密集，一堆接着一堆，连铺石甬道都堵塞了。所有人讲话都大声嚷嚷，有些人在各组之间往来穿梭；还有些人三三两两单独行动，呆在公园的长椅或铁椅上，过一阵又回到大堆儿里……这场面真像一所学校的避雨大操场，大家都焦急地盼着铃响，以便结束这种混乱和越来越响的震耳欲聋的喧哗。然而却迟迟不打铃。

高个儿褐发男子始终挽那女子的胳臂，另一个人则脱掉了外套。他们走着，被东奔西跑的人撞来撞去：那些人四处乱窜，寻找刚刚离开的一个人或一伙人，而那一伙人也已离散，被其他几伙人吞并。

三人来到复辟王朝咖啡馆的露天座。这里也满员了，不过就像出现了奇迹，有五个人刚好离开座位，这两男一女赶紧坐到柳条扶手椅上。他们眼神发直，望着游乐场那边。

濛濛雨雾侵入整个公园，被枝叶的拱顶拦住，滞留其间。这雨雾如同土耳其的蒸汽浴，冲人嗓子眼儿，渐渐使游乐场前面的一伙伙人朦胧不清，也窒息了他们闲扯的喧闹。邻桌一位老妇人放声大哭，一再唠叨说昂代一带的边境封锁了。

且说那年轻女子的头搭在高个儿褐发男子的肩上，来回摇晃，她闭着眼睛，睡得跟孩子一样香甜。两个男子相视一笑，接着又凝望游乐场前那一群群人。

一阵急雨，哗啦一声下来。这是季风吹来的骤雨，能穿透梧桐和栗树的浓密枝叶。那边的人蜂拥挤到游乐场的玻璃棚下避雨。露天座上的人也纷纷离开，你拥我挤地躲进咖啡馆里。

只有那两男一女稳坐不动，因为餐桌上方有遮阳伞挡雨。那女子头枕着高个儿褐发男子的肩膀，一直在睡觉。褐发男子眼神茫然，直视前方，而他的伙伴则打着口哨，轻声吹起《你使我习惯你》的曲调。

三十五

从窗口张望，可以看到一条砂石小径环绕的一大片草坪。小径缓缓上坡，一直通向我来到的这所房子。这房子令我想起地中海岸的一幢白色旅馆。可是刚才我拾级而上时，目光落到正门上的一块牌子，却看见那上面的银字是："德·吕伊扎-德·阿尔巴尼中学堂"。

草坪的另一端有一个网球场。右侧挺立一排白桦树，还有一个游泳池，但水已放干，跳台也半坍塌了。

他又赶到窗口，对我说道：

"真的……先生，实在抱歉……学堂的全部档案都烧毁了……一点儿没留……"

说话的男人有六旬左右，鼻上架一副浅色玳瑁框眼镜，身穿苏格兰花呢上衣。

"即使还有，让斯密特夫人也不会同意的……自从她丈夫过世之后，她就再也不愿听到有关德·吕伊扎中学的事了……"

"没有乱扔的班级旧照片吗？"我问他。

"没有，先生。我再说一遍，全烧毁了……"

"您在这儿工作很久了吗？"

"正好德·吕伊扎中学的最后两年。接着，我们校长让斯密特先生去世了……学校也就今非昔比了……"

他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

"我是老校友，很想找到几样纪念物。"我对他说。

"这我理解。可惜……"

"学堂以后会怎么办？"

"唔，他们要把整个学堂拍卖掉。"

他抬臂懒洋洋地指了指面前的草坪、网球场和游泳池。

"您不要最后看一眼宿舍和教室了？"

"不必了。"

他从外套兜里掏出烟斗，插到嘴里。他并不离开窗口。

"左首那座木房，原先作什么用呢？"

"原先是更衣室，先生。在里面换衣裳，好进行体育锻炼……"

"哦，对……"

他烟斗里装上烟丝。

"我已经忘了……当年我们穿不穿校服？"

"不穿，先生。只是晚餐和出门活动时，才规定穿上海军蓝宽条法兰绒外衣。"

我凑进窗口，额门儿几乎贴上玻璃。在下面的

那幢白色建筑物的前面，有一块铺砂砾的空场，已经长了杂草。我眼前又浮现我和弗雷迪身穿宽条法兰绒上衣的形象。我极力想象我父亲的相貌：那男人在我们放学时来接我们，下车朝我们走来……

三十六

E·卡汉夫

尼斯庇卡底街22号

应于特先生的要求，我写信告诉您有关“奥列格·德·弗雷德”这人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尽管回忆辛酸的往事令我伤感。

有一天，我到弗朗索瓦一世大街，走进一家叫“阿尔卡迪”的俄国餐馆。餐馆老板是个俄国人，姓名我已经忘记了。这是家小餐馆，顾客不多。老板饱经风霜，未老先衰，一副愁苦的面孔、站在摆着俄式冷餐盘的桌子旁……想起来，这大约是1937年前后的事了。

我看到餐馆里有一位青年，年龄在二十上下，举止随便，如同在自己家里。他的衣着特别讲究：礼服、衬衣，样样俱全，无可挑剔。

他的外表极有特色：显得很有魄力，蓝瓷色眼睛已有鱼尾纹，笑容可掬，一副笑面虎的样子，内里十分狡诈。

他跟我同桌用餐。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指着餐馆老板对我说：

“我是这位先生的儿子，说起来您相信吗？”

他对那可怜的老人摆出一副鄙视的神情，而那人的确是他父亲。

继而，他给我看一只表明出身的手镯，上面刻着姓名：“路易·德·弗雷德，德·蒙庞西埃伯爵”（在餐馆里，大家叫他奥列格，这是个俄国名字）。他问他他母亲在何处，他回答说她已亡故；我又问他，她是在哪里遇见蒙庞西埃家族的一个人（这似乎是奥尔良家族的一个旁系），他回答说在西伯利亚。这套说法站不住脚。我看他是个小无赖，给人拉皮条，靠粉头嫖客为生。我问他从事什么行业，他回答说弹钢琴。

接着，他又向我数说他在上流社会的所有关系：德·于泽公爵夫人如何向他施屈膝礼，德·温德索尔公爵如何跟他称兄道弟……我觉出他讲的话有真有假。即使“上流社会”的人，听到他那姓氏，看到他那笑容可掬、五分冷淡五分真挚的蔼然

之态，恐怕是要上当的。

战争期间——我想是在1941年至1942年——，有一天，我在瑞昂莱潘的海滩，忽见那个叫“奥列格·德·弗雷德”跑来，他格格大笑，仍然那样精力充沛。他对我说他当过俘虏，并得到德国一位高级军官的照顾。眼下，他在他的战时代母①，沃夫·亨利·杜维努瓦太太家住几天。可是他说：“她太抠门儿，也不给我点零花钱。”

他告诉我他要回巴黎，“打算跟德国人共事”。我问他干什么呢？他回答：“卖给他们汽车。”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也不知道他的情况。亲爱的先生，关于这个人，我只能告诉您以上情况。

此致

敬礼

E·卡汉

1965年11月12日于尼斯

① 战争期间负责向一名士兵写慰问信，寄送包裹的妇女。

三十七

现在，只要闭上眼睛，就会出现一幕幕场景。我们一道动身去默热沃之前的事件，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又回想起来。奥什林荫路扎哈罗夫旧公馆的灯火通明的大窗户、维尔德梅尔的断断续续的话、姓名嫣红闪光如“鲁比罗萨①”、苍白暗淡如“奥列格·德·弗雷德”，以及其它极细的情节，包括维尔德梅尔那沙哑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凡此种种，都是我藉以顺藤摸瓜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头一天傍晚，我恰巧到了奥什林荫路，登上扎哈罗夫旧公馆的二楼。那里人很多。他们一如既往，都不脱大衣。而我却未穿大衣。我穿过大厅，只见十五、六个人，有的站在电话机周围，有的坐在皮圆椅上谈生意；接着，我溜进一小间办公室，并随手关上门。我要见的那个男人正等在那里。他把我拉到一角，我们坐到中间有茶几的两张扶手椅上。我把用报纸包着的路易金币往茶几上一放，他也当

① 鲁比罗萨（Rubirosa）由两个西班牙语词组成，前者意为“红宝石”，后者意为“玫瑰”，故曰“嫣红闪光”。

即给我几叠钞票，我数也未数就塞进兜里。此人对首饰不感兴趣。我们一起离开办公室，又穿过人声喧哗、穿着大衣的人出出进进、气氛有点令人不安的大厅，最后来到街上。他给了我位于马尔泽尔布广场那儿的一个地址，说那个女买主可能购买我的首饰，并让我见面时讲是他介绍去的。当时正下大雪，但我还是决定步行前往。我和戴尼丝相识之初，经常走这条路。现在节气变了，大雪纷纷扬扬，树木光秃秃的，楼房正面昏黑，我几乎都认不出这条林荫大道了。沿着蒙索公园栅栏走去时，已闻不到那女贞树的清香，只有一股湿土和腐物的气味。

那一带人称死胡同为“花园街”或“别墅”，那幢楼就在一条死胡同里端，她在楼下有一套房间。她接待我的那间屋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长沙发和放在上面的一个电话。我们就坐在长沙发上。这个女人有四十来岁，一头棕发，有点神经质。电话铃几乎不断，但她并不是每次都接，即使接了电话，也只是在小本上记下对方讲的话。我给她看了首饰，有蓝宝石和两枚首饰别针，愿以半价出售，但要马上付现款。她拍板成交。

我告辞出来，向库尔塞勒地铁车站走去，不免想起几个月之前，那个青年曾到我们在卡斯蒂利亚旅馆的客房；他很快卖掉了那枚首饰别针和钻石手镯，并慷慨地向我提出平分他多赚的钱。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还向他透露一点出走的打算，甚至还向他谈到我有时连门也不敢出的恐惧感。他对我说

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期。

后来，我到爱德华七世花园街的住所去找戴尼丝。那套房间在二楼，恰好在辛特拉酒吧间的楼上，她的朋友，荷兰人冯·阿伦在里面开了一个服装店。我能回忆起这些，是因为我和戴尼丝经常光顾那个酒吧间，而且地下餐厅还有一个门，可以溜出去。巴黎凡是有两个出口的公共场所和建筑物，可以说我全熟悉。

别看这家服装店很小，却跟奥什林荫路的那座旧公馆一样繁忙，也许更加忙碌。冯·阿伦正设计夏季套服，我见他如此勤奋，如此乐观，不禁十分惊奇，心想是否还会有什么夏季。他往一位褐发姑娘身上试白色薄布连衣裙，其他模特儿在更衣室出出进进。一张路易十五世朝式样的写字台上散放着草图和一块块料子，围了好几个人在议论。戴尼丝在客厅一角，正同一位五十来岁的金发女人，以及一位褐发鬈曲的青年男子在说话。我也插了进去。他们二人要去蓝色海岸。突然大家喧哗起来，谈话听不见了。一杯杯香槟酒在人群中传递，却闹不清为什么。

我和戴尼丝挤出一条路，来到门厅。冯·阿伦送我们。他从门缝探出头来，用手给我们送个飞吻、祝我们交好运；我眼前又浮现当时他那浅蓝色的眼

睛和笑容。

我和戴尼丝，我们最后一次去康巴塞雷街。行李早已打好，有一只手提箱和两个皮包，放在客厅里头的大桌子上。戴尼丝放下百叶窗，又拉上窗帘，把缝纫机放回柜箱里，摘下别在模特儿上身的一块白布料。我回忆我们在这里的一段生活。戴尼丝照着冯·阿伦给的纸样剪裁或者缝制。我则躺在长沙发上，看一本回忆录，或者一本面具丛书，即她特别喜欢的侦探小说。那些夜晚，是我唯一得以暂时休息的时刻，也是这唯一能幻想我们在太平世界过安宁生活的时刻。

我打开手提箱，把在我兜里鼓鼓囊囊的几叠钞票塞进羊毛衫和衬衣里，还塞进一双靴统里。戴尼丝检查一个旅行袋里的东西，看看落下什么没有。我沿过道一直走到卧室。我没有开灯，伫立在窗前。外面仍然下雪。对面人行道上的值勤警察，也钻进了岗亭里，那岗亭也是为了冬天避寒，几天前才安装的。还有一名警察从索塞广场而来，匆匆走向岗亭，他与同事握手，递过去一个保温瓶，二人用平底大口杯轮流喝起来。

戴尼丝走进来，她穿着大衣，到窗口紧紧偎在我身上。她皮大衣里穿了衬衣，散发一股浓郁的香水味，我们又回到只剩下床绷的床上。

里昂火车站。盖伊·奥尔洛夫和弗雷迪在发车站台等候我们。他们的手提箱很多，都装在他们身边的一辆大车上。盖伊·奥尔洛夫拎着一只手提箱。弗雷迪给搬运工一支烟，并同他讨价还价。戴尼丝和盖伊·奥尔洛夫一边说话，戴尼丝问她，我们这些人去，弗雷迪租的那座木屋能否住得下。车站里一片昏暗，只有我们那个月台沐浴在黄色灯光里。维尔德梅尔也来会合，他穿一件橙黄色大衣，下摆还像往常那样拍打着小腿，那顶毡帽一直扣到额门儿上。我们叫人把行李搬到各自的卧铺车厢里。我们站在车厢外面等待开车的信号。盖伊·奥尔洛夫在这趟列车的旅客中认出个熟人，可是弗雷迪不让她跟任何人说话，以免引起别人注意我们。

我在戴尼丝和盖伊·奥尔洛夫的车厢里呆了片刻。窗帘拉下一半，我俯身朝窗外望去，看见我们正经过郊区，雪仍未停。我拥抱了戴尼丝和盖伊·奥尔洛夫，回到自己的车厢，弗雷迪在里边已经安顿好。不大工夫，维尔德梅尔来看我们。他那包厢里暂时只有一个人，但愿这一路别再上来人。他的确怕让人认出来，因为几年前他在欧特伊赛马场上

出了事故，那时期赛马报上多次刊登他的照片。我们劝他放心，说人们很快就会忘记赛马骑师的面孔。

我和弗雷迪躺在铺位上。火车已经加速行驶。我们没有灭掉小灯，弗雷迪焦躁不安，接连吸烟。很可能要检查，他心神不定，我也如此，但尽量掩饰。我和弗雷迪、盖伊·奥尔洛夫、维尔德梅尔四人，持的都是鲁比罗萨给弄到的多米尼加护照，但我们无法判断护照是否有效。当时，鲁比本人也跟我说到这一点。如果碰到更细心的警察或检查员，我们就倒楣了。唯独戴尼丝毫无风险，她是真正的法国人。

到了第戎站，第一次停车。由于下雪的关系，车站的高音喇叭听着也闷声闷气。过道里有人走动，一个包厢的门被拉开，也许有人进了维尔德梅尔的包厢。于是，我和弗雷迪一阵狂笑，简直神经质。

在索恩河畔夏龙站停车半小时。弗雷迪睡着了。我关上包厢里的小灯。我不知道为何关灯，但在黑暗中我感觉踏实些。

我极力想别的事，不注意过道里回荡的脚步

声。站台上有人在说话，我只能捕捉几句。估计他们就在我们窗下，其中一人咳嗽，带有粘痰声。另一个人则轻轻吹口哨。一趟列车隆隆驶过，盖住了他们的谈话声音。

包厢门突然被拉开，过道的灯光中显现一个穿大衣的男子身影。那人用手电从上到下照一遍，看看我们包厢里有几个人。弗雷迪惊醒了。

“出示证件……”

我们把多米尼加护照递给他。他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就交给了另一个人；那人在他身边，被门挡着看不见。我合上眼睛。他们交换几句，但听不清楚。

那人一步跨进包厢，手里举着我们的护照。

“你们是外交官吗？”

“对。”我机械地回答。

过了几秒钟，我才想起鲁比罗萨给我们搞的是外交护照。

他再也没有讲话，把护照还给我们，又把门关上了。

我们在黑暗中屏息敛声，一直到火车开动。火车终于启动了，只听弗雷迪哈哈大笑。他打亮了灯。

“去看看其他人好吗？”他对我说。

戴尼丝和盖伊·奥尔洛夫的包厢没有检查。她们被我们唤醒，闹不清我们为什么这么激动。继而，维尔德梅尔也来了，他脸色阴沉，浑身还在发抖。

刚才他出示护照时，检查人员也问他是不是外交官，而他却未敢回答，怕便衣警察和检查中有赛马爱好者认出他来。

列车在皑皑雪景中滑行。这景色多么宜人而友善。望着那一座座沉睡的房舍，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陶醉和信心。

我们到达萨朗什时，天还没有亮。车站前停着一辆旅行车和一辆黑色大轿车。我和弗雷迪、维尔德梅尔拎着手提箱，两个搬运工则抬着盖伊·奥尔洛夫的大箱子。我们十来名旅客，要上去默热沃的旅行车，这时，一个金发男人走到盖伊·奥尔洛夫面前，正是头一天她在里昂火车站看见的那个人。他们用法语交谈了几句。后来她向我们解释说，那是个俄国人，名叫基里尔，跟她只是泛泛之交。黑色轿车司机已在驾驶台前等候，基里尔指了指轿车，提出拉我们去默热沃。但是，弗雷迪谢绝了，说他还是愿意乘大客车。

雪还在下。旅行车行驶速度缓慢，黑色大轿车超过去了。现在是爬坡，每踩一下油门儿，车身就摇晃一下。我心想车不到默热沃恐怕就要抛锚。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黑夜渐渐退隐，而棉絮般白雾开始透过杉树的叶丛；我心中暗道，谁也不会到这里来找我们。我们毫无危险了，渐渐无踪无影了。甚

至我们这身城里人打扮，如维尔德梅尔的红棕色大衣、海军蓝呢帽、盖伊的豹皮大衣、弗雷迪的驼毛外套、绿色长围巾，以及宽大的黑白两色高尔夫球鞋，本来都会引起注意的，却融于浓雾中了。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最终会烟消云散。或者，我们完全变成一层水汽，牢牢附在车窗玻璃上，用手怎么擦也擦不掉。司机如何辨识道路呢？戴尼丝睡着了，她的头在我肩上摇晃。

车停到镇政府前面广场中央。弗雷迪叫人把行李搬到等在那里的雪橇上，我们则去教堂旁边的一家茶点铺喝点热饮料。茶点铺刚开门就接待我们，老板娘颇为惊讶，或是我们来得太早，或是盖伊·奥尔洛夫的口音，以及我们这种城里人装束未免特别。维尔德梅尔看什么都惊叹不已。他还未见过高山，也未做过冬季体育运动。他张着嘴，额门儿顶着窗玻璃，望着雪花飘落在死难者纪念碑和默热沃镇政府的建筑物上。他向老板娘打听缆车如何运行，他能否报名进入一所滑雪学校。

那座木屋叫“南方十字架”，相当高大，全是木头构造，涂成深色，百叶窗则是绿色的。我想弗雷迪是从他在巴黎的一位朋友那儿租到的。木屋俯临公路的一处弯道，而它有一排杉树作屏障，在公路上却望不见。从公路到那里要走一条“之”字形

路。而公路还顺着山坡往上盘，究竟通往何处，我从未怀着好奇心去打听。我和戴尼丝住二楼房间，在窗口从杉树顶端望过去，能看见默热沃全镇。天朗气清的时候，我就练习辨认教堂的钟楼、褐岩山脚下旅馆显现的赭色斑点、汽车站、滑冰场、墓地，以及远处的景物。弗雷迪和盖伊·奥尔洛夫住在楼下，卧室紧挨着起居室；还得下一层才能到维尔德梅尔房间，这屋半截在地下，小圆窗户刚接地面。可是，维尔德梅尔却选中这里，拿他的话说，就住在这地穴中。

开头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离开木屋外出，而是守在起居室没完没了地打扑克。这间屋的布置陈设，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铺一块地毯，靠墙放一张皮面长椅，长椅上方墙上镶一个书架，还有一张矮桌，两扇窗户对着阳台。有个住在附近的妇女负责到默热沃给我们采购食品。戴尼丝从书架上挑侦探小说看，我也跟着翻阅。弗雷迪留起胡子；盖伊·奥尔洛夫每天晚上给我们做俄罗斯甜菜浓汤；维尔德梅尔则请人从镇子定期给他买来《巴黎体育报》，躲在地穴中看。一天下午，我们正打桥牌。他突然跑来，手里举一份体育报，脸色都变了，原来一个专栏编辑复述近十年赛马界的重大事件，其中又提到："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在欧特伊发

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故”。文章还附了几张照片，其中就有维尔德梅尔一张，但尺寸极小，还不如邮票大。在萨朗什车站或默热沃，在教堂旁边的茶点铺里，很可能有人认出他了。给我们采购食品并料理点家务的那个女人，也很可能认出他就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正是这一点令他惊慌失措。在我们动身的一周前，他在阿利斯康花园街寓所，不是还接到过一个匿名电话吗？一个人闷声闷气地对他说：“喂，维尔德梅尔，还一直赖在巴黎吗？”说罢哈哈大笑，随即挂断电话。

我们一再劝慰他，说他既是“多米尼加公民”，就毫无危险了，可是他听不进去，显得十分焦虑。

一天夜晚，将近凌晨3点钟，弗雷迪猛敲维尔德梅尔的“地穴”门，连声吼叫：“安德烈·维尔德梅尔，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我们知道你就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马上给我们出来……”

维尔德梅尔很不满意这种玩笑，赌两天气没跟弗雷迪说话。接着又和好如初。

在木屋生活的最初几天，除了这个小小的风波而外，总的来说极为安宁。

然而，这么打发时间，日子一长，弗雷迪和盖伊·奥尔洛夫也就耐不住单调寂寞了。就连维尔德

梅尔都总打转转想出去，尽管他怕别人认出他是"那个英国赛马骑师"。他是个运动员，这么闲着哪里呆得惯。

弗雷迪和盖伊·奥尔洛夫到默热沃散步时，遇见了一些人。看来，那些人大多跟我们一样，是来此避难的。在此相遇，自然要组织"聚会"。弗雷迪、盖伊·奥尔洛夫和维尔德梅尔，很快就参加了这种夜生活，回来还向我们形容一番。我则心存戒备，宁愿和戴尼丝守着木屋。

不过，有时我们也到村镇去，一般是上午10点钟离开木屋，下山沿路有小教堂，有几次我们还走进去，戴尼丝点着一支大蜡烛。有几座小教堂已然关闭。路上积雪，我们走得很慢，以免滑倒。

再往下走，有一个圆形小坪台，中间竖立石刻耶稣受难十字架。从圆坪下去路很陡，上半段有木台阶，但是被积雪覆盖了。我走在前面，万一戴尼丝打滑好扶住她。走完这段路便到了镇子。我们沿中央大街一直走到镇政府前广场，经过白山旅馆，再往前走不远，右首人行道旁则耸立着邮局的灰不溜秋的水泥建筑物。我们去给戴尼丝的朋友寄几封信：莱翁，以及把康巴塞雷街的一套房间借给我们住的埃莱娜……我给鲁比罗萨写了封简信，说多亏他给搞的护照，我们顺利到达，并建议他前来同我

们会合，因为我们最后一次在公使馆见面时，他曾对我说有意到“绿野乡间度假”。我附去了我们的住址。

我们攀登褐岩山。从道路两旁的旅馆里，跑出一群群孩子，他们肩上不是扛着滑雪板，就是背着滑冰鞋，由身穿海军蓝冬季运动服的女辅导员带领。的确，近几个月来，疗养地的旅馆已被征用，好接待大城市里最贫穷的少年儿童。掉头返回之前，我们眺望一会拥到缆车售票窗口的人流。

我们从“南方十字架”木屋沿路上去，穿过杉木林，便到一座平房式的矮木屋，里边住着为我们采购食品的那位妇女。她丈夫养几头奶牛，在“南方十字架”主人不在时，那座木屋就由他看管。他把自己的木屋大间布置出来，摆了几张桌子，安了一个简陋的酒吧柜台和一张球台。一天下午，我和戴尼丝去他家打牛奶，他对我们不大热情。可是，戴尼丝一见球台，就问他能不能让她打一打台球。他乍一听露出惊异之色，继而态度和缓下来，回答说她随时都可以来玩。

那期间，弗雷迪、盖伊·奥尔洛夫和维尔德梅尔去参加默热沃的夜生活，还劝我们到运动队咖啡馆，或者哪家举办“朋友聚会”的木屋去找他们，但我们宁愿到上面去。到了晚上，等他们走后，我们常去那座木屋。那位妇女和她丈夫乔治等着我们。我觉得他们挺喜欢我们。我们和他以及他的两三位朋友打台球，还数戴尼丝技术最高。我眼前又

浮现她打台球的身影：那手持弹子棒的苗条的身段、亚洲型的妩媚面孔、明亮的眼睛、垂至臀部的闪着古铜色光栗色秀发……她穿一件弗雷迪借给她的一件旧的红色羊毛衫。

我们同乔治夫妇闲谈，一直聊到很晚。乔治对我们说，到默热沃来度假的人很多，他们寻欢作乐，已经引起注意，说不定哪天准得打架斗殴，因此要检查身份证。而我们不像那些人，万一碰到麻烦，他们夫妇会帮忙的……

戴尼丝私下对我说，“乔治”有点像她父亲。这家里经常生炉火，烧木柴，我们感到时间过得甜美亲热，如同一家人。

有时候，其他人走了之后，“南方十字架”木屋只剩下我们二人。木屋完全属于我们。我多想再度过几个那种明净的夜晚：我们观赏山下的村镇，它在雪野中清晰可见，显得小巧玲珑，好似圣诞节摆在橱窗里的一件玩具。在那些夜晚，似乎一切都那么单纯，那么令人心安，我们憧憬着未来：我们就在此安家，将来我们的孩子在镇里上学，夏季来到，吃草的牲畜群的铃声响成一片……我们将过一种幸福而无变故的生活。

还有些夜晚，大雪纷飞，我便产生窒息之感。我和戴尼丝，我们被囚在这幽谷之中，渐渐被大雪

所覆盖，永远再也出不去了。山峦遮蔽视野，没有比这更令人气馁的了。我心中充满恐慌情绪；于是，我打开落地玻璃门，我们到阳台上，我呼吸着有杉树清香的寒冷空气，就不再害怕了。我观赏山中夜景，反而产生一种旷达、一种漠漠忧伤之感。我们置身其中吧？我们的行为和生命的回响，似乎被大雪所窒息了。鹅毛大雪在我们四周飞舞，飘落在钟楼上、滑冰场上和墓地上，飘落在道路穿过山谷所显现的幽暗的线条上。

不久，盖伊·奥尔洛夫和弗雷迪开始邀请人晚上来我们木屋。维尔德梅尔也不怕被认出来了，总是说笑逗乐，十分活跃。有时一来十几个人，甚而更多，快到半夜闯来。在别家木屋开始的聚会，到这里继续，闹得更凶了。我和戴尼丝往往回避，但是弗雷迪请我们留下；盛情难却，有几次我们只好从命。

我眼前还能浮现一些人的身影，但是模糊不清。有一个褐发的人挺活跃，总拉人跟他打扑克，常开一辆在卢森堡登记的小轿车兜风；还有一个叫“安德烈-卡尔”的人，他身穿红色羊毛衫，一头金发，因长期滑雪而脸呈古铜色；另外一个人身体健壮，穿一件黑丝绒斗篷，还记得他像一只大熊蜂，总是东绕西转……擅长体育的美人儿，其中有个叫

“雅克琳”，还有个是“康庞夫人”。

晚会进行得正热闹，有时起居室里突然熄灭。还有时一对男女溜进一间卧室去。

最后，我眼前还浮现“基里尔”的身影，就是盖伊·奥尔洛夫在萨朗什车站遇见的、并请我们上他汽车的那个人。他是俄国人，而妻子是个非常漂亮的法国女郎。我想，他是走私漆盒和铝制品的，常常从我们木屋往巴黎挂电话。我几次对弗雷迪说，总挂电话会引起人注意我们，然而，不管弗雷迪还是维尔德梅尔，早把什么小心谨慎抛到九霄云外。

一天晚上，正是“基里尔”夫妇把鲍勃·拜松，以及一个叫“奥列格·德·弗雷德”的人带到我们木屋来。拜松是个滑雪教练，所教的主顾中不乏名人。他进行跳板滑雪，几次跌伤，脸上尽是疤痕，走路也有点跛。他一头褐发，五短身材，是默热沃本地人。他嗜酒，但每天早上8点起来照样滑雪。除了当滑雪教练，他在物资供应站还有份儿工作，因此掌握一辆车，就是我们到萨朗什时我注意到的那辆黑色轿车。弗雷德是个俄国青年，常到默热沃小住。此人自有谋生之道，倒卖汽车轮胎和零件，也常从我们木屋往巴黎挂电话。我总听见他呼叫一家神秘的“彗星停车场”。

那天晚上，我为什么要同弗雷德交谈呢？也许由于他那人好接近吧。他那副眼神显得很坦率，样子也天真活泼，动不动就笑起来。他总是那么关心人，问长问短："您身体好吧？""您不想再喝一杯酒吗？""您何必坐这把椅子，坐到大沙发上不是更舒服吗？""昨天夜里您睡得好吧？"等等……他微皱眉头，睁大眼睛，要把您的话一句句铭刻在心，就好像您的话是神谕。

他已然明白我们的处境，很快就问我，我们是否打算在"这深山"久住。我回答说我们别无选择，于是他就小声告诉我，他有偷越国境去瑞士的办法，问我对此是否感兴趣。

我迟疑片刻，才回答说感兴趣。

他对我说，每人要交五万法郎，还说拜松也参加行动。他和拜松负责把我们一直送到边界附近的一个地点，交给他的朋友护送过去。他朋友是引渡老手，曾把十几个人送往瑞士。弗雷德还一一说出他们的姓名。我有考虑的时间。他还要去巴黎一趟，下周就返回。他给了我一个在巴黎的电话号码：Auteuil 54—73，并说我要是很快做出决定，可以打电话同他联系。

我把这事告诉了盖伊·奥尔洛夫、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盖伊·奥尔洛夫挺奇怪，她看“弗雷德”无非是个不务正业的青年，靠点儿投机生意混日子，讵料他还搞帮人偷渡的勾当。弗雷迪则认为，我们既有多米尼加护照防身，就不必离开法国。维尔德梅尔却觉得弗雷德是一副“面首的嘴脸”，他尤其不喜欢拜松，向我们断言拜松脸上的伤疤是假的，是他每天早晨用化妆品涂抹出来的。他们俩都是运动员，也许同行是冤家吧？事出有因，他不能容忍拜松说他是“庸才”。不过，戴尼丝倒觉得弗雷德那人“挺和善”。

这事很快定下来，主要是下雪的缘故。雪下了一周未停，我再次产生在巴黎曾有过的那种憋闷之感。我心里琢磨在此滞留太久，我们就可能落入圈套。我向戴尼丝解释这种想法。

过了一周，弗雷德回来了。我同他和拜松商量偷越国境一事，并达成协议。我从未感到弗雷德如此热情，如此值得信赖。他那拍人肩膀的友好方式、他那明亮的眼睛、雪白的牙齿、殷切的态度，这一切都讨我喜欢，尽管盖伊·奥尔洛夫常常对我说，跟俄国人和波兰人打交道可得当心。

那天一大清早，我和戴尼丝就打好了行李。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们不想把他们叫醒。我只给弗雷迪留了一张字条。

他们在停在路边的贝松那辆黑色轿车里等我们，正是我在萨朗什见过的那辆。弗雷德坐在驾驶座上，拜松坐在他身边。我亲手打开车尾盖，把行李装进去，然后，我和戴尼丝坐到后排座位上。

一路上我们没有开口。弗雷德显得烦躁不安。

雪花飞扬，弗雷德车开得很慢。我们走的是山间小道，整整行驶了两个小时。

直到弗雷德停车向我要钱时，我才隐约有了预感。我把几叠钞票递给他，他数了数，接着回身冲我笑笑。他说现在要越境，为谨慎起见，我们要分头走。我和拜松一路，他和戴尼丝带行李另走一路，约好一小时后，到边界那边他朋友家会合……他脸上始终堆着笑容。奇特的笑脸，至今我还能梦见。

我和拜松下了车。戴尼丝换到前面，坐在弗雷德身边。我望着她，再次有种预感揪心。我想打开车门，让她下来，我们二人一道走。但我转念一想，自己生性多疑，总好胡猜乱测。看样子戴尼丝挺放心，情绪也很好，她还用手给我送了个飞吻。

那天早晨，她身穿臭鼬毛皮大衣、织花羊毛衫，以及弗雷迪借给她的滑雪裤。那年她二十六岁，长一头栗色秀发、一对绿油油的明眸，身高一米六五。我们的行李不多，只有两个皮箱和一个焦栗色

手提包。

弗雷德一直微笑，他启动了马达。戴尼丝从放下的车窗探出头来。我挥动手臂，目送汽车离去。汽车渐远，只剩下一个小黑点了。

我跟着拜松出发了。我观察他的脊背和他在雪地留下的足迹。忽然，他对我说快到边界了，他要去侦察一下，让我等着他。

过了十分钟，我才明白他不可能回来了。为什么我把戴尼丝拖进这个陷阱呢？恐怕弗雷德也要把戴尼丝抛到山里，我们俩都一命呜呼，但我还极力排除这种念头。

大雪一直不停。我继续走着，想找个什么东西辨认方向，但是徒劳。我连续走了几小时，最后倒在雪地里。我周围一片白茫茫。

三十八

我在萨朗什车站下火车。阳光灿烂。车站广场停了一辆大客车，发动机还在隆隆的响。人行道旁，只停着一辆DS19型的出租汽车。我上了出租车，对司机说道：

“去默热沃。”

他启动车子。司机是个六十上下的男子，头发花白，穿一件皮领磨损了的短大衣，嘴里嚼着一块糖或药片。

“天儿多好，嗯？”他说道。

“是啊……”

我从车窗向外张望，极力辨认我们走的这条路，然而没有雪，路上的景致跟从前大不相同。阳光照在杉树和牧场上，道路上空由树冠连成拱顶，同是绿色，而深浅浓淡各异，真令我惊诧。

“这里的景色，我认不出来了。”我对司机说。

“您来过这儿？”

“来过，那可有年头……而且是大雪天……”

"雪景那就完全不同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金属小圆盒，送到我面前：

"您吃块薄荷糖吧？"

"谢谢。"

他自己也拿了一块。

"我戒烟有一周了……是大夫嘱咐我嚼薄荷糖……您也抽烟吗？"

"我也戒了……请问……您是默热沃人吗？"

"是啊，先生。"

"我在默热沃认识几个人……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情况……就拿我认识的那个叫鲍勃·拜松的人说吧……

他放慢车速，回头对我说：

"那个罗贝尔？滑雪教练？"

"对。"

他摇了摇头。

"当年我跟他是同学。"

"现在他怎么样？"

"他死了。几年前，他跳台滑雪，一下子摔死了。"

"哦……"

"本来他的技术是不错的……您跟他熟吗？"

"不太熟。"

"罗贝尔非常年轻的时候，由于有主顾，就得意忘形了……"

他打开金属盒，又吃了一块薄荷糖。

“他跳下来时，当场摔死……”

大客车跟在后面，离有二十米，是一辆天蓝色大轿车。

“他同一个俄国人交情很深，不是吗？”我又问道。

“一个俄国人？拜松同一个俄国人有交情？”

他不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拜松那家伙的确不怎么地道……他呀，心术不正……”

我明白关于拜松，他再也不会讲什么了。

“您知道默热沃有幢木屋，叫‘南方十字架’的吗？”

“‘南方十字架’？……当初有许多木屋叫这个名字……”

他又把薄荷糖盒递给我。我拿了一块。

“就是在一条公路陡坡上的那幢。”我又说道。

“哪条公路？”

对呀，哪条公路呢？我记忆中的那条公路，同任何山区公路并无差异。如何找到呢？那幢木屋也许没有了。即使还存在的话……

我朝司机探过身去，下颏儿触到了他那短大衣的皮领。

“把我拉回萨朗什车站吧。”我说道。

他回过身来，一副惊讶的样子。

“随您便，先生。”

三十九

姓名：奥瓦尔·德·吕兹（阿尔弗雷德·若望）。

出生时间和地点：1912年7月30日生于路易港（毛里求斯岛）。父奥瓦尔·德·吕兹（约瑟夫·西姆蒂），母路易丝（原姓富凯罗）。

国籍：英国（和美国）。

奥瓦尔·德·吕兹先生的住址先后如下：

奥恩省瓦尔布勒兹镇圣拉扎尔古堡。

巴黎第十六区雷努亚尔街23号

巴黎第八区竞技场街18号夏多布里盎旅馆

巴黎第八区蒙田林荫路56号

巴黎第十六区马雷夏尔-利奥泰林荫路25号

阿尔弗雷德·若望·奥瓦尔·德·吕兹先生在巴黎没有固定职业。

在1934年至1939年间，他可能为一个旅居法国的名叫吉米·斯特恩的希腊人干事，搜罗并购买古家具，并可能借此机会去美国长期旅行一次（其祖母即在美国出生）。

奥瓦尔·德·吕兹先生虽然属于毛里求斯岛的一个法国家族，却似乎享有英国与美国双重国籍。

1950年，奥瓦尔·德·吕兹先生离开法国，到博拉·博拉(社会群岛)附近的帕迪皮岛上波利尼西亚定居。

这张卡片还附了一张便笺：

亲爱的先生：

谨奉告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奥瓦尔·德·吕兹先生的情况。迟复尚祈原谅，因这些材料极难寻找：奥瓦尔·德·吕兹先生是英国(或美国)侨民，在我们机构的档案中没有留下多少记录。

请您和于特接受我的拳拳之忱。

J.-P. 贝尔纳迪

四 十

亲爱的于特：

下周我将离开巴黎，动身去太平洋的一个岛上，在那里有可能找到一个能向我提供我的经历情况的人。他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

迄今为止，我仍觉得一片混乱而又零散……都是些片断，是我寻找过程中，猛然想起来的某件事的零碎情节……也许归根结底，人的一生就如此。

果真是我的一生吗？抑或是我冒名顶替的另一个人的一生吧？

我到那里之后便给您写信。

但愿您在尼斯诸事如意，能得到您所渴望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在那地方回忆您的童年。

四十一

AUTeuil 54-73：巴黎第十六区福科勒街5号，彗星停车场。

四十二

在特罗卡戴罗花园这边，有一条通向码头的街道；我记得盖伊·奥尔洛夫的前夫瓦尔多·布兰特，就住在这条街上，我曾陪伴那位美国钢琴家直到他的住所。

大铁门已经生锈，显然这个停车场关闭已久。大门上方的灰色墙壁上有蓝色字号，虽然模糊了，但仍能辨认出：彗星停车场。

二楼右侧有一扇窗户垂着橙黄色窗帘。那是一间卧室，还是一间办公室呢？当初我从默热沃拨AUTeuil 54-73号码，给那个俄国人打电话时，他就在那个房间里吗？他在这彗星停车场里干什么营生呢？如何才能了解到呢？在这座被弃置的建筑物前面，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

我转身来到码头，逗留片刻，观望行驶的汽车，观望塞纳河对岸演兵场一带的灯火。我一生的某个片断，也许还在那边，在靠花园的一套房间里存留，也许有个认识我的人还能忆起我。

四十三

一位妇女站在吕德街和西贡街路口楼房的一楼窗前。外面阳光明媚，孩子们正在稍远处的人行道上踢球，只听他们总喊："彼得罗"，因为其中有一个叫这名字，其他人边踢球边喊他。清脆的声音呼喊的"彼得罗"，在大街上回响，听来十分奇特。

她从窗口望不见孩子。彼得罗。很久以前，她认识一个叫这名字的人。孩子的阵阵喧哗欢笑、球在墙壁反弹的呼呼声传到耳畔，她极力回忆是在什么时期认识那人。哦，对了，那是她在阿莱克斯·马基时装店当模特儿的时候，认识一个戴尼丝的人，二人一见如故，成了好友。戴尼丝也在时装店干活，她是个金发女郎，脸型却有点象亚洲人。

戴尼丝跟一个叫彼得罗的男子一起生活，那大概是个南美人。她还清楚记得，那个彼得罗是个褐发的高个儿青年，在一个公使馆工作。他那面容在她脑海里也相当清晰，如今遇见，她也能认出来，当然人一定老多了。

一天晚上，他们俩一道来西贡街她的家里。她邀请了几位朋友吃晚饭，有住在附近夏尔格兰街的日本演员及其一头红珊瑚色金发的妻子、在阿列克斯·马基时装店相识的一个名叫埃芙莉娜的褐发女郎，以及陪埃芙莉娜来的一个面色苍白的男青年，还有一个人，但她忘记了是谁，再就是追求她的那个比利时人若望-克洛德……那顿晚餐非常愉快。当时她就想，戴尼丝和彼得罗是天生的一对。

一个孩子接住飞来的球，紧紧搂在怀里，大步离开其他伙伴。她瞧见一帮孩子从窗前跑过去。那个抱球的孩子跑上大军林荫路，并横穿街道，一直紧紧抱着球。其他孩子不敢跟过去，都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呆呆地望着他跑掉。他用脚带球。林荫路旁接连有几家自行车商店，镀铬的车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他忘记了其他伙伴，独自带球，朝右拐进阿纳托尔-德-拉福日街。

四十四

我的脑门儿顶着舷窗，只见两个男人在甲板上边踱步边聊天，月光给他们的脸涂了一层灰白色。后来，他们就俯在舷墙上了。

海上虽已风平浪静，我仍旧难以成眠。我一张张翻看戴尼丝、弗雷迪、盖伊·奥尔洛夫我们几人的照片。随着海轮继续航行，他们几人也渐渐丧失真实性。世间曾有过他们吗？我又想起别人对我说的弗雷迪在美国的活动：他曾当过“约翰·吉尔伯特的跟班”。这句话在我眼前展现一幕场景：在一座别墅的荒疏的园子里，两个男人并肩沿着落满枯枝败叶的网球场漫步，高个儿的无疑是弗雷迪，他正俯身倾听另一个人讲话；那人一定是约翰·吉尔伯特，他大概在低声讲什么。

继而，从纵向通道里传来一窝蜂的人的谈笑声。他们在争夺一支小号，以便吹奏《在我金发女郎身边》的头几节。隔壁船舱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他们里边有好几个人，又是哄笑，又是碰杯，还有急促的喘息声，以及细弱持续的呻吟……

有一个人顺着纵向通道转悠，一边摇着小铃，一边重复说我们已经过了赤道，声音尖细得像唱经班的儿童。

四十五

远处红色信号灯点点，乍一看还以为飘浮在空中，继而才明白那是安装在海岸沿线的。遥望依稀一座深蓝色的山峦。过了礁石口，水面很平静。

海轮驶入帕皮提港的锚地。

四十六

有人让我去询问一个叫弗里堡的人。此人在博拉·博拉住有三十余年，在太平洋各岛屿拍摄一些纪录片，总是送到巴黎的普莱耶尔影剧院放映。他是最熟悉大洋洲的一个人。

我都不用给他看弗雷迪的照片。当年他在帕提皮港上岸时，好几次遇见过弗雷迪。照他向我的描述，弗雷迪身高将近两米，从不离开这个岛，顶多独自驾着纵帆，远航，绕过土阿莫图岛的珊瑚礁，甚至一直到马基斯群岛。

弗里堡提出要带我去帕提皮岛。我们登上一条类似捕鱼的船。陪伴我们的是一个特别肥胖的毛利人，他跟弗里堡几乎寸步不离。我想他们准在一起生活。真是奇特的一对：一个身材矮小，举止像从前童子军的小头目，穿着短袖衬衣和磨破了的高尔夫球裤，鼻子架着金丝边眼镜，而另一个却是身体肥胖、皮肤呈古铜色的毛利人，他裹着一条缠腰布，穿一件天蓝色布上衣。在渡海过程中，弗里堡轻声

向我叙述他青年时，曾跟阿兰·热尔博①踢过足球。

① 阿兰·热尔博（1893—1941），法国航海家。1923年，他曾驾独桅帆船横渡大西洋，1924年至1929年，终于完成环球航行。

四十七

我们沿岛上一条小径走去。路径野草芊绵，两旁排列着椰子树和面包树，时而看见一道扶手栏杆高矮的白围墙，表明里面围着花园，花园中央又伫立着一幢房子，几乎一个式样：修建游廊，铁皮房顶漆成绿色。

我们来到一片由铁丝网围起来的草场，左首是一排库房，库房中间有一幢淡粉色的三层楼。弗里堡向我介绍，这原是一个机场，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建造的，弗雷迪就住在这里。

我们走进这幢三层楼里，只见楼下的房间摆着一张写字台、一把柳条椅、一张支有蚊帐的床铺。有一道门通向简陋的浴室。

楼上二、三层房间全空着，窗上的玻璃也残缺不全，走廊里还有瓦砾，墙上挂着一幅南太平洋军事地图。

我们又回到大约弗雷迪住的房间，看见棕褐色羽毛的鸟从虚掩的窗户缝钻进来，落到床上、写字台和靠门口的书架上，密密麻麻，而且越聚越多。

弗里堡告诉我这是摩鹿加乌鸫，它们什么都啄，纸张、木头，乃至房屋的墙壁，无不啄食。

一个男人走进屋来，他胡须已白，身缠腰布。他对弗里堡身后形影不离的这个肥胖毛利人讲了些什么。胖子摇晃着身体翻译出来。半个多月前，弗雷迪驾着纵帆船，要在海上兜一圈儿，直到马克萨斯岛，不料返回时，帆船触礁，搁浅在岛子的珊瑚礁上，船里已不见弗雷迪了。

他问我们要不要瞧瞧那只纵帆船，并带我们去了礁湖边。船还在那儿，桅杆已折断；为了保护船体，两边船帮挂了几个汽车旧轮胎。

弗里堡声称，我们一回去就要求调查。身穿天蓝色上衣的肥胖毛利人同另一个人说话时，声音特别尖，听着就像小声叫喊。过了一会儿，我就丝毫不再注意他们了。

记不清我在礁湖边伫立多久，想念着弗雷迪。不会，他绝没有沉入大海。毫无疑问，他决意割断最后的绳索，大概隐遁到哪个珊瑚岛上去了。我早晚会找到他。再者，我还要奔走，最后尝试一次，去我在罗马的旧居：暗店街2号。

夜幕降临。礁湖绿色渐淡，慢慢隐没了。水面上还时而飞驰暗紫色的影子，犹如飘忽不定的磷火。

我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我们的照片，带在身上原想给弗雷迪看，其中有一张是盖伊·奥尔洛夫的童年照。我一直没注意小姑娘在哭，从她皱眉的样

子能猜出来。一时间，我的神思又远离这礁湖，飞向世界的另一端，到了俄国南方的一个海水浴疗养地。这张照片就是在那里拍摄的：薄暮时分，小姑娘随母亲从海滩回来，她无缘无故就哭了，因为她还想再玩一会儿。她走远了，到路口已经拐了弯；我们的一生，不是跟孩子的这种伤心一样，倏忽间在瞑色中消失吗？

作 者 简 介

莫狄阿诺(Patrick Modiano)，法国当代作家。1947年生于布洛涅—皮朗库尔，曾在阿内西与巴黎上学。1968年发表他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当即获得成功。第二年，又出版小说《夜巡》。此后，不断有成功之作问世：1972年的《魔圈》、1975年的《凄凉别墅》、1976年的《户口簿》与1978年的《寻我记》。其中《星形广场》获尼米埃奖与费内翁奖，《夜巡》获钻石笔尖奖，《魔圈》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奖，《寻我记》获1978年龚古尔文学奖。

80年代后发表的小说有：《一度青春》(1981)年，《初生之犊》(1982)、《荒凉地区》(1985)，此外，他还从事过电影剧本的写作。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寻我记·魔圈
作者＝莫狄阿诺著　　李玉民等译
页数＝４４９
ＳＳ号＝１１０５２２７２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３１９３３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２年０３月第１版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